

顾问 李 琦
审稿 刘武生



曹应旺 主编

周恩来的智慧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前言

周恩来被外国人称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智囊。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说：“20世纪只有少数人比得上周总理对世界历史的影响。在过25年里我有幸会见过的一百多位政府首脑中，没有一个人在锐敏的才智、哲理的通达和阅历带来的智慧方面超过他，这些使他成为一位伟大的领导人。”斯里兰卡前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说周恩来是“伟大的行政官和卓越的谈判者，”“他以他的智慧和领导才能，帮助解决了中国的许多困难，并且成功地处理和解决了许多国际问题。”曾担任过联合国秘书长的哈马舍尔德则声称周恩来是“迄今我在外交政治中所见到的最超凡的头脑。”无疑，周恩来的智慧和才能给他同时代的世界各国领导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受过中华文化熏陶的海内华外，喜欢把周恩来比作诸葛亮。马来西亚槟榔屿华人大会堂主席庄汉良说周恩来“由学生的时代，就已献身为国家，为人民做事，担任了26年的国务总理，公而忘我，日理万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可比于西蜀丞相诸葛武侯。”对于诸葛亮，有一副诗联写道：“文章天下两司马，经济南阳一卧龙”。对于周恩来，儒学大师马一孚赠给他的诗联是：“选贤与能进信修睦，体国经野辅世长民”。周恩来不仅在国民经济方面，而且在足智多谋方面，都远在诸葛亮之上。当代中国周恩来的名字同历史上诸葛亮的名字一样是中华民族美德和智慧的化身。

奉献给读者的这本书试图通过周恩来在行政、经济、军事、统战、文教、外交、处世等方面的超人智慧来展现这位伟人的特殊魅力。我们生活在一个“争于智”的世界，一个“争于智”的时代，学习和思索周恩来的智慧，可以从中获得许多有益的启迪。

本书面世，我们要感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顾问李琦同志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周恩来研究组组长刘武生同志。李琦同志不仅担任本书顾问，指导写作，而且审阅了部分书稿，提出了重要的修改意见。刘武生同志审阅了全部书稿。

本书各篇撰稿人是：

行政篇 吴志鸿

军事篇 江 英

经济篇 曹应旺 魏 勇

统战篇 陈答才

文教篇 李 静 陈阳勇

外交篇 王 浚 晓 雨 志 江

处世篇 鸿 才 魏 松

周恩来是一个“通才”，周恩来的智慧是一个大海，我们遨游其间，海中觅珠，所获仅仅是一小部分，遗珠之憾是不待言的。周恩来的智慧不仅博大，而且精深，我们限于水平，对有些智慧故事的概括与内含的分析，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我们恳请热心的读者对本书广度和深度上的不足给以批评指正。

曹应旺
1993年夏

周恩来的智慧

行政篇

千案端详慎重抉择——建国前夕选定国旗图案

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确定周恩来以“其性质是内阁总理”的身份参与主持建国大计，并邀请各界民主人士共同建立新政府。从此，周恩来即负起了筹建新中国的重任。在建国大计中，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必须正确决定，就是国旗、国徽和国歌问题。

为了选定新中国的国旗、国徽和国歌，周恩来化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过问，因为它们一旦被确定后，就将成为新中国的一种象征。对于此事，周恩来动员了广泛的力量，用民主征集的方式，向海内外各界人士征求方案。在开国大典前的一个多月中，全国各族人民和海外华侨，满怀热情寄来了数以千计的国旗、国徽图案和推荐国歌，表达了对共产党和新中国的热爱。对于这么多方案，周恩来除了组织专门的委员会审慎地研究和甄别外，还亲自和大家一起审查、挑选方案。最后，周恩来看到一幅五星红旗的图案端详许久，对这幅图案中深含的寓意非常满意，他激动而高兴地评论说：“这红旗象征着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红的大地；这一颗大的星星，象征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周围四颗星星，象征着中华各民族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我觉得很好，寓意鲜明深刻。”就这样，新中国的国旗被选定下来，迎风猎猎的五星红旗成为新中国的一个象征。

知人善任民主建国——荐举党外人士担任政府要职

1949年初春，中国革命的胜利已成定局，大批民主人士先后来到北平，参加建设新中国的大计。这时，毛泽东和周恩来开始考虑对民主人士和起义将领的安置问题。

对于傅作义将军，考虑到他对和平解放北平有重大贡献，还考虑到他想治理河套水利工程，周恩来提名他担任水利部长，并支持他抓好工作。

对于黄炎培，周恩来提议他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周恩来还提议李书城担任农业部部长。黄炎培闻知此事，感慨地说：“以往我坚拒做官不愿入污泥，今天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我做的是人民的官啊！”

在周恩来的精心安排下，各民主党派的主要领袖或社会贤达、知名人士差不多都安排进来了。在政务院4名副总理中，党外人士有2人；15名政务委员中，党外人士有9人；在政务院所辖34个部、会、院、署、行中，担任正职的党外人士有14人。

周恩来不但能知人善任，促进民主建国，而且在聘用人才方面也是不拘一格，虚怀若谷。建国初期，为了充实中国科学院，中央有关部门要调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到中科院历史研究所工作。当时误传顾先生要求每月薪金500万元（指旧币，折合新币500元），不然就不去北京。这件事被周恩来知道了，他非但不生气，反而说：“中国有几个顾颉刚？他要500万就给500万嘛，但一定要请他到北京来。”顾颉刚先生听说后深为感动，向有关领导说明并无要高薪的意思，表示马上进京，他事后感慨地说：“我从周总理的身上看到了团结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真正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

公私分明俭朴廉洁——建国以后处理政府工作餐问题

周恩来担任国家总理以后，一方面注意精打细算，厉行勤俭建国；另一方面事事克己廉洁，狠刹大吃大喝、铺张浪费之风。有名的“四菜一汤”制度就是他为了解决公事用餐问题而亲自规定的。建国以后，在中南海里经常召开国务院会议，出席者都是部长级以上干部，会议时间一般都比较长，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减少大家吃饭往返所花去的时间，一般都规定会议到吃饭时安排工作餐。这工作餐为合餐制，通常一桌中摆上四个菜，一个汤，大家正好吃饱。

周总理常称赞这“四菜一汤”既经济，又实惠。于是，这就形成了一种惯例。吃工作餐时，周恩来和大家吃的都是一样的饭菜，一点也无特殊之感。有时在他家里开会，就餐时常常自己掏钱，自己的一份工资开销完了就用邓颖超的钱，吃完以后，他就补一句：这次是邓大姐请客。在周恩来家里吃这种合餐，还常常用一种“盆菜”，即一大盆菜里放上多种原料，搅在一起味道很浓，花样也多，也很省事。他常常说这种盆菜营养很好，经济实惠。

周恩来吃饭时也常注意不要浪费，他吃完饭后，夹起一片菜叶把碗底抹一抹，把饭汤吃干净，最后才把菜叶吃掉。他亲自规定，吃饭要付饭钱和粮票，通常是四两粮票二角钱，如果是哪位部长忘了带钱和粮票，就下次补交。

周恩来反对各级领导干部利用工作之便，携带家属，到外地吃喝玩乐，不交分文的作风。有一次，他到外地出差时了解到此种情况后很生气，回到北京后立即严肃而不点名地批评了这件事情，强调这种事情不许再发生，无论哪一级干部领导私自到外地大携带家属旅游，必须交费，自己付款。此后，这种事情渐渐很少了。

周恩来要求别人做到的，他自己先做到。有一次，周恩来到天津出差，看到各地大兴楼台之风，而接他的车子又朝新地方开去，于是严肃地要求车子开回老地方去住，这样，使天津的同志深受教育。

1964年春，周恩来出国访问后回到成都，第一餐饭是四菜一汤，周恩来一看，就说：菜多了，吃不完浪费，要注意节约，吩咐服务员端一个下去，晚餐再热上来吃。到了吃晚餐时，周恩来问服务员：中午那一样菜呢？有一天夜里，工作人员看他工作到深夜还未睡，就做了一小碗银耳羹端上来，总理一面感谢，一面说：“这个价太高，我不吃，以后不要搞了。”服务员说以后不搞了，这一点请总理吃了吧，结果周恩来还是未吃。

周恩来到外地视察，吃饭时常常补交饭菜钱。1966年7月28日中午，周恩来到北京第二外语学院听取群众的意见后，和同学们一起到学生食堂吃饭。他和同学们一样，从厨房里端出炒青椒、烧茄子和主食，站在饭厅里一边吃一边和同学们寒暄。这时，炊事员特意做了一碗汤送到他面前，他随即问：“同学们有没有？”当他知道同学们没有汤时，便也不喝这碗汤，而是倒了一碗白开水喝。饭后，他让工作人员向食堂交了粮票和菜金，并补交了汤钱。学生食堂的午饭是贰角伍分，而他的饭费收据上则开着“贰角伍分伍分”。

1973年9月16日下午，周恩来来到杭州西泠印社的楼外楼就餐，他请姜师傅做一个醋鱼，并对姜师傅说：“有醋鱼就可以了，这是你们的名菜，再搞两个菜就行了，不要搞多了，我们就这几个人，搞多了，吃不完，浪费。”姜师傅随即到厨房安排去了，此时，周恩来乘饭前间隙手握红铅笔审批起文

件来。

用餐时，总理向随同人员讲他过去来过楼外楼的情况，并称赞楼外楼的醋鱼味道鲜美，做法很好。当干菜肉、霉千层上桌时，总理高兴地说：“这是家乡菜，你们大家多吃一点。”饭后，总理叫秘书结帐，而自己一边服药片，一边继续批阅文件。浙江省一位负责同志劝总理休息一下，周恩来笑笑说：“我现在是休息。”秘书结完帐后，周恩来问付了多少钱，当知道菜馆只收了10元多一些时，就对姜师傅说：“那么便宜，那不行。”他向秘书交待，再去加钱，要按市价付足。这时姜师傅表示再收5元，总理又说：“不够的，不要骗小孩那样，你不收足钱，我就不走了。”姜师傅只得又收下了10元钱。可是过了一个多小时，杭州机场来了电话，说是总理上飞机前留下10元钱，补付今天午饭钱。原来周恩来上飞机前唯恐楼外楼菜馆没有收足钱，又拿出10元钱，托省接待处同志转交。这样，周恩来三次共交了30多元钱。于是，楼外楼菜馆只好将周恩来总理午餐用的饭菜按市价一一计算，用料除鱼、虾、鸡价格较高外，其余干菜、豆芽、霉千层等都是极普通的，算完细帐，总共才19元多一些。菜馆算完帐后，于17日给周总理详细地写了一个报告，并附上菜价清单，把多收的钱请有关部门的同志转交给总理办公室。

周恩来作为一个治理八亿人口的大国总理，在人民中间处处保持了一个廉洁奉公的光辉形象。

保留团城牌楼易地——1954年北京城建时保留古迹

北京是一座历史文化古城，解放以后，城市公路的扩建和市容修整都涉及到古迹文化的保留问题，其中在建筑史上颇具价值的团城与牌楼是否在城建中拆除，成为市政扩建争论中的两个焦点。问题一直报到国务院，等待周恩来拍板决策。

北京的团城与它北面的琼岛建于金代，元初在岛上建成了“仪天殿”，明代重加修葺，改名承光殿，并且改筑为砖城，即现在的团城。它两面临水，风景优雅，气势雄伟，与北海诸建筑构成一组严整的古代建筑群，且又在建筑群中自成一体，有根高的建筑艺术价值。但是，由于团城与南面的中南海之间马路太窄，公路扩建到这一带就无法进行。于是，对北海的团城是否保留成为争论的焦点，一种意见主张拆除团城，开阔道路交通；另一种意见主张保留团城，保留艺术价值与古文化风格。

于是，1954年炎夏的一个下午，周恩来来到团城一带进行实地观测。他先绕团城一周，视察周边环境，然后停在团城上眺望琼岛，研究观赏价值。接着，他又久久注视着北海大桥上来往的车辆行人。足足两个小时，周恩来在烈日之下竟不知不觉，他依然心神专注地观察、思索着交通的情况。在思考之中，周恩来还不时地同陪同他来的同志交换意见，向文物工作者询问情况。最后，周恩来作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安排：保留团城，同时又解决道路拓展的问题。怎么解决呢？他决定让南面的中南海院墙后移，让马路向南扩展。就这样，既保留了这一有价值的古建筑，又解决了交通问题，而中南海院墙南移并没有什么不良后果。

团城的问题仅是一处，而牌楼的问题带有普遍性。解放以后，北京一些狭窄街道上的牌楼严重阻碍交通，常常造成事故。从发展北京城建交通的角度看，必须全部拆除牌楼。而从保留古建筑学价值的角度看，牌楼又不能拆毁。尤其是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教授，他声泪俱下地请求保留那些牌楼。

问题提到国务院会议上讨论，在多次争论之后，只得由主持会议的周恩来拍板定案。他在仔细倾听了各方面意见之后，引了两句唐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意指牌楼虽好，但已临城市扩建之时，必须为拆除让步。怎样妥善处理呢？周恩来说，有艺术价值的牌楼要易地保存。无甚价值的应该予以拆除了。这一决定作出后，一些被认为有价值、值得保存的牌楼在拆除后被重新安且在一些公园内。这样一来，牌楼易地使各方都很满意，有些牌楼，如北海桥，还作了特殊处理，进行了重新设计，降低了急坡，减少了弯度，重装了汉白玉。

双线调动令情并施——为组建北京中医学院召集人才

在中国的行政文化中，有时一道行政命令并不能立即解决问题，必须有某种行政威望和人际情感的配合，方能达成行政目的。在这方面，周恩来总理是一位高手。

50年代中期，国务院拟筹建北京中医学院，周恩来决定调集全国中医界精英来办学。一天，名医施今墨给周恩来看病，周恩来谈到筹建中医学院之事，请施今墨推荐中医与西医兼通的人士负责教务工作。这时，施老举荐了他的得意门生祝谌予，周恩来很是赞成。

当时，祝氏夫妻已调至云南省西双版纳地区的一所公路医院行医。像祝谌予这样学贯中医的名医，云南省会不会放呢？国家卫生部两次发函调动，都无回音。云南不放祝谌予离开。

过些日子，施老又给周恩来看病，周恩来再次问起此事，他获悉尚未调成，知道云南不肯放，于是，就指示秘书，以周恩来的名义发电报给云南省，调令祝谌予进京。秘书刚走到门口，周恩来却又将他叫住，告诉他，发电报的同时给云南省卫生厅挂一个电话，向他们说明调祝之事。这样，电报加电话，又以总理的名义说明缘由，云南不得不割爱，忙派人下去通知祝谌予进京，这一问题圆满解决。

胸中有数熟能生巧——数字的掌握与巧妙运用

周恩来对国家财政经济的把握能力是众所周知的，他是一位总管家，理财能手。早在 1948 年 12 月 1 日人民币开始发行时，中央就要求各解放区（他们分担供应各野战军的军费开支）作出 1949 年的财政收入预订，以计划人民币的发行数量。但是由于各解放区开始没有经验，提出的款项和支援要求有很大悬殊，其中西北地区只要求支援七千万元。于是，周恩来同中央财政经济部秘书长薛暮桥等一起审核这个预算，计算出 100 个农民只能支援三个脱产人员（主要是解放军），超过这个数字就要中央补助。根据这个计算，确定对两北地方的支援不是七千万元，而是七亿元。周恩来叮嘱薛暮桥说：“管理经济必须掌握规律，没有这些数据是无法进行管理的。”

建国以后，有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有位记者提了一个涉及国家机密的问题要周总理回答，他问：“请问总理阁下，中国人民银行有多少资金？”这句话的实质是在讥笑中国的贫穷，而周恩来看了一眼这位记者，然后回答说：“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资金嘛……有 18 元 8 角 8 分。”

这一回答使全体在场记者为之愕然！场内鸦雀无声了，只听周恩来进一步解释道：“中国人民银行发行面额值为 10 元、5 元、2 元、1 元、5 角、2 角、1 角、5 分、2 分、1 分的主辅 10 种人民币，合计为 18 元 8 角 8 分”。他又说：“中国人民银行是由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金融机构，信誉卓著，币值稳定”。这段巧答，表现了周恩来的睿智。

婉转示意化解心愁——处理吴文藻“右派”问题

1952年初夏的一天，周恩来总理在百忙之中用汽车把从日本回国的冰心和吴文藻夫妇接进中南海，他从门内迎出来，紧紧握住冰心和吴文藻的手，笑容满面地说：“你们回来了！你们好啊？”然后，总理让他俩坐在自己旁边，详尽地询问他们在外面的经历，了解他们以后的打算，还特别关切地问了孩子们的情况，希望他们学好英语，为建设祖国服务。

然而，1958年4月，吴文藻教授被划成右派，这场意外的灾难使冰心和吴文藻夫妇陷入了深深的苦闷之中。当时吴文藻被定的罪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对此，吴文藻痛苦地挖着自己的错误，他对冰心说：“我若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我到国外去反好了，何必千辛万苦地借赴美名义回到祖国来反呢？”正在冰心夫妇深感委曲之时，周恩来派来一辆小车，把冰心接到了中南海西花厅。

冰心见到周恩来，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把一腔怨愤都倾诉出来。周恩来和邓颖超听完之后，周恩来说：“这时最能帮助吴教授的人，只能是他最亲近的人了，你要劝他思想别太窄。”这一番话语重心长，含意很深，使冰心心中的怨气消释了许多。冰心告辞周恩来夫妇回家后，把这一情况告诉了吴文藻。吴文藻听出了周总理的弦外之音，他说：“心里还是感到委屈和苦闷，但我坚信事情终有一天会弄清楚的。”

一年之后，1959年12月，吴文藻即被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以后，周恩来还常常关注老作家的创作，他对冰心说：“从作品中看出你是爱国爱人民的，要常常写。”

尊重战友谦恭相让——请陈毅为洛阳龙门伊河石拱大桥题字

1961年10月8日，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陪同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来到洛阳。他们参观完龙门石窟后，周恩来因有事回京，他利用专列开车前的一点时间接见洛阳市的负责同志。在谈话结束时，人们请周恩来为正在兴建中的龙门伊河石拱大桥命名题字。周恩来微笑着说：“还是请陈老总写吧，他比我写很好。”陈毅听罢，连忙摘下墨镜，爽朗地大笑：“我怎敢‘班门弄斧’？还是请总理写吧！”两位领导人谦虚地互相推让。这时，专列的开车时间快到了，周恩来歉意地商量说：“要不这样吧，现在不写了。回京后，我们商量一下，写好后给你们寄来，行吗？”人们不便强求，只得以此作罢。

然而，周恩来始终没有忘记洛阳人民的嘱托。到1962年春天，题字寄来了，是陈毅的手迹，宣纸上写着斗大的“龙门”二字和“陈毅题”三个较小的字。这一题字既为伊河桥命名，也有地方特色。题字被镌石四方，分别镶嵌在石拱桥东西两端和两侧。

到了“文化大革命”时，陈毅的题字也因“四旧”而被破坏。1973年10月14日，重病在身的周恩来又陪外宾来到洛阳参观，他路过伊河桥时，发现伊河桥上没有陈毅的题字，立即查询。有关人员向周总理报告了这一情况，周恩来满面怒容地说：“陈毅是好同志，他的题字要尽快地与洛阳人民见面。”不久，陈毅的题字重新被郑重地镶嵌在飞架东西的伊河桥上。这样，周恩来在陈毅逝世以后，维护了这一题字。

挂牌办公联系群众——60年代处理信访工作事务

周恩来非常重视人民来信的处理，他不仅经常亲自批阅人民来信，随时了解和洞察群众所关注的问题，而且指示信访部门将群众来信中所反映的问题汇总以后，编成简报，供各级有关部门及时了解情况，努力改进工作。

1964年以后，各地人民来信和来访者甚多，周恩来更加重视起来。面对来信来访者甚多的情况，周恩来觉得应该方便群众，让大家有一个反映情况的地方，于是，他指示国务院盖一个人民来访接待室，地址就选在来京上访的群众容易找到的地方。

后来，周恩来了解到人民信访接待办公室为了自己便利，不挂牌子办公，便明确指示各接待室全都要把牌子挂出去，认真做好群众来信来访工作，切实反映群众中最迫切的问题。他说：“你们接待来访不就是方便群众吗？为人民服务，为什么要把自己的牌子收起来？”在周恩来的督促下，人民信访办公室的牌子挂了出来，这项工作受到了一定的重视。

周恩来不仅要求人民信访办公室这样做，他自己也身体力行，亲自接待来访人员，处理人民来信。曾经有一次，一位兰州大学的学生来到中南海北门，执意要见总理。工作人员问明了情况以后，不让他进中南海。于是，这位大学生再三恳求，坐在地上哭着不走了。工作人员将此情况汇报到总理办公室以后，周总理对工作人员说：“学生也是人民中的一员，总理怎么能够不和他见面呢？”说罢，他亲自出去迎接这位来自兰州的大学生，使这位大学生的心理得到了很大的抚慰。

1966年的一天，周恩来亲自处理内蒙古的一件人民来访事情。他首先很快地把被接见人名单审视一遍，然后和这位上访者打招呼，问话，熟悉名字；接下来，他让这位上访者——一位来自边疆的青年申诉情况及上访原因。周恩来一边用亲切的神情鼓励这位青年申诉完情况，一边用笔飞快地记录着，中间插进一些询问。在听完申诉后，周恩来一面继续了解情况，一面对上访者做思想工作，他的谈话和解答很细致，有鼓励，也有批评，直到把这件上访事情处理完毕为止。

这次处理上访事情，周恩来一共用了5个小时，记满了几张纸，中间没有休息，也没有吃午饭和晚饭。他同时对陪同接见的的工作人员，从政策理论到工作态度和思想方法，都给以亲切的指导和教育。

上访事情处理完毕后，周恩来认为还未完全结束，他指示组成一个调查小组，深入到上访者的所在旗和大队去进行认真细致的调查研究，并写出有关材料，以提供政策依据和为最终处理参考。

事出有因不能盲断——1963 年处理“跃进号”吨轮沉没事件

1963 年 5 月 1 日，我国第一艘国产的万吨远洋货轮在驶往日本海域途中沉没。此事发生以后，国内震动很大，外电评论纷纷，被救回来的船员也众说不一。对于沉船原因，有的认为是被某国鱼雷击沉，主张发抗议；有的说只听到一声巨响，有的说有两次响动，结论与意见不一。因此，周恩来决定先查明情况，再作处理。于是，在上海专门召开了调查“跃进号”失事原因的准备情况汇报会议，周恩来亲自到会讲了话。会议决定海军派编队到失事地点进行调查。

当海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向周恩来汇报出海调查编队的组织成员时，周恩来看完突然问：“怎么都是舰队的副司令、副政委出海？舰队司令、政治委员呢？”接着，他又严肃地说：“‘跃进号’沉没事件，已成了国际事件了。对于这样的大事，我当总理的要抓；你们这些当司令、当政治委员的，也要亲临第一线，不能只是交给第二把手，第三把手！对于重大问题，我们主要领导干部，一定要亲自出马，这要成为一条规矩。”他还强调说：“主要领导干部，不但要亲临第一线，还要善于抓住带关键性的问题不放，一抓到底！”在周恩来的督促下，东海舰队派出了强有力的领导班子，亲临失事地点进行细致调查。

根据调查到的第一手资料，周恩来亲自召开专家与船员会议，反复研究分析，他发现“跃进号”出航前，舰长、政委、船员班子组建仓促，试航训练的时间很短，对航线、海域、暗流情况不熟悉，因此，他判断该船很可能是偏离航线触礁所致。

于是，他要海军派潜水人员潜入海底进行勘查，经 14 昼夜的搜索探摸作业，终于查明“跃进号”的沉没确如周恩来所判断的那样，系触礁沉没。

大力协同联合攻关——组织指挥“两弹”研制

在我国重大的行政执行活动中，周恩来显示了高超的组织才能和严密的协调艺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的组织研制过程，充分体现了周恩来的行政组织韬略和智慧。

我党中央对原子武器的研制情况注目已久，早在1944年，周恩来和中央军委情报部门的负责人就拟定了一份长达200多人的名单，打算一旦时机成熟，就将有关海外华裔科学家安排回国，发展原子能事业。1949年春季，周恩来在筹建新中国时就开始考虑核工业建设问题，他批拨一笔外汇，让有关的科学家们在国外采购一些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带回国内，以便筹备和发展中国的核工业。

1955年1月15日，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在听取了地质学家李四光、核物理学家钱三强和地质部负责人刘杰关于原子能问题的汇报后，决定开始发展中国的核工业，并加强核科学技术研究。会后，周恩来即作了五项布署：1.加速培养专业人才；2.及时统筹调整各类留学人员，以济急需；3.成立中央三人领导小组，加强党和政府对原子弹研制工作的领导；4.组建第三机械工业部，成立原子能核科学委员会；5.建立我国第一个综合性原子能核科学技术基地。在中美日内瓦谈判期间，周恩来巧妙地用美国战俘人员换回钱学森，并批准成立国防部第五院，开始正式研制原子弹。1956年，周恩来亲自主持制订了我国第一个科技发展12年规划，把发展原子弹放到重要的战略位置上。

1958年，毛泽东主席预言中国可以用10年左右时间搞成原子弹，周恩来进一步确定了到1968年以前完成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的战略决策。对于这项尖端科技事业的攻关，周恩来指示试验人员要“边干边学，建成学会”。1960年8月，苏联在单方面撕毁了所有援助中国的核科研协定后又撤走了全部专家，并断言罗布泊只会生出“鹅卵石”，“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来”。严峻时期，周恩来向有关部门下达指示：自己动手，从头搞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

经过1961年和1962年上半年的努力，我国核工业建设和核武器研制取得了很大进展，但许多重大技术难关还没有突破。在这种情况下，二机部部长刘杰于1962年8月代表二机部在向中央的报告中提出了争取在1964年迟至1965年进行第一次原子弹试验的奋斗目标。10月30日，总参谋长罗瑞卿向中央呈送了发展我国尖端事业的报告，11月2日，邓小平总书记批示：“拟同意，送主席、刘、周、宋、彭核阅。”11月3日，毛泽东主席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随后，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表示赞成这项规划目标，提出“这件事要情总理（指周恩来）出面才行。”政治局几位同志都表示赞成。于是，为加强对核试验工作的领导，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主任，由贺龙、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聂荣臻、陆定一、罗瑞卿七位副总理和赵尔陆、张爱萍、王鹤寿、刘杰、孙志远、段君毅、高扬七位部长组成的15人专门委员会，负责核武器研制工作。这15人中，除了专抓工业与核武器研制工作的部长外，还有分管计划、经济、财政的副总理和军队领导人。应该说，这是一个精干的便于协调的具有高度权威性的组织机构。

为了全面地组织核武器研制，加快各部门各单位的运作，周恩来亲自主

持各种专门会议，研究与制订核武器研制的各种具体方案，并大力统一组织和协调 26 个部、委（院）和 20 个省、市、自治区的 900 多个工厂、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的研制工作，这么多单位、部门和数十万人分别按各自的分系统扭成一股劲，共同为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进行科技攻关、设备制造和材料生产，解决了近千项重大课题，并于 1963 年 3 月正式拿出了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设计方案。实验科研人员进行了上千次的爆轰试验，于 1963 年 12 月 24 日在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进行的聚合爆轰出中子试验，获得了成功。1964 年 1 月 14 日，兰州铀浓缩厂拿出了可以作为原子弹装料的合格的高浓铀产品。对此，毛泽东批示：“很好”。周恩来批示秘书：“请转告刘杰同志，庆贺他们提前完成关键性生产和解决了关键性的技术试验，仍望他们积极谨慎，坚持不懈地继续完成今后各项任务”。

为了加强具体领导，形成系统管理合力，在方案实施过程中，周恩来选聂荣臻具体抓，副总参谋长张爱萍负责试验基地，二机部（原子能工业部）负责实施计划。在分工上，委员会设立总设计部和总调度部两套班子，技术方面由总设计部负责，组织管理、协调生产与试验保障服务方面由总调度部负责，千军万马拧成一般绳，委员会则负责总决策和督促执行。

周恩来作为总负责人，他亲自进行调查研究，抓计划制订、论证和试验进度，并赞成顺排计划、倒排措施的办法，抓试验难点的攻克，抓数十万人的协作配合，甚至细小的生活问题也不放过。这些都极大地鼓舞了试验人员的士气，激励了指战员们的斗志。在整个试验阶段，周恩来对试验的进展情况 and 把握程度是了如指掌的。对于二机部提出的“两年规划”，周恩来的要求是“实事求是、循序而进、坚持不懈、戒骄戒躁”。“两年规划”实施半年左右，周恩来已在考虑核装置与武器生产的配套问题。1963 年底，他明确指示：“核武器的研究方向，应以导弹头为主，空投弹为辅”。这一决策使核装置武器化的周期大大缩短，节约了许多经费，加快了配套研制的进度。

这次协同攻关的特点是计划方案顺排，措施落实倒排，因此，核燃料生产和核武器研制每个环节的进展抓比预期的好。周恩来亲自主持对气象等有关爆炸试验时间的问题研究以后，1964 年 10 月 14 日，下达了核武器装置就位的命令。10 月 16 日，我国成功地进行了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试验。首次核试验的成功，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周恩来提出了短时间内完成氢弹研制工作的要求，并决定下放权力给二机部，国防科委和国防工办妥分工负责。据此，二机部经过反复论证，向中央专委会呈报了《关于加速发展核武器问题的报告》。1965 年 2 月 3 日和 4 日，周恩来主持第 10 次专委会会议审议并批准了这个报告，决定：“力争于 1968 年进行氢弹装置的爆炸试验。”在氢弹研制过程中，周恩来还给试验人员制定了“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工作指导方针。这 16 个字，充分体现了周恩来一再强调的要“保证产品的高质量”和“绝对保证安全”的思想，深刻揭示了核工业建设和核武器研制试验的特点和规律。由于核试验人员切实贯彻了上述方针，从而避免了可能出现的奇灾大祸和巨大浪费。1966 年 10 月 27 日，周恩来批准进行导弹核武器的飞行爆炸试验，取得了圆满成功。1966 年 12 月 28 日，我国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氢弹试验。半年之后，即 1967 年 6 月 17 日，我国成功地进行了 1 次 300 万吨级的空投氢弹试验。其间，“两弹”试验成功相差两年零八个月，其发展速度、威力与技术水平均比美、苏首次试验的氢弹水平高。

对于“两弹”试验成功的组织协同经验，周恩来加以高度肯定，认为这种办法可以抓好飞机的科技攻关。若不是“十年浩劫”，我国航空工业早就会有新的发展。

筹集粮草“鲲鹏”吃饱——困难时期解除火箭部队断粮之危

酒泉。饥饿像猛兽一样扑向部队，威胁着火箭部队的生存。在严重的饥饿面前，火箭部队将额吉纳旗一条30里的沙枣防护林带的树叶抹得光光，然后磨成粉团，掺进粮食中去充饥。但是，毁掉防护林带严重违犯了纪律，额吉纳旗面对在漠风中颤抖的光秃秃的树干，告到国务院。此时，总参谋长罗瑞卿也接到火箭部队副司令员李福泽的报告，急如星火地赶到总理办公室。

没想到罗瑞卿一进门，周恩来就招呼他说：“总长，你来得正好，我刚刚批了一个文件，要求调查，妥善处理。”

“什么事？”

“额吉纳旗告到国务院，部队毁林三十里……你看吧。”罗瑞卿接过批件一看，吃了一惊，但从总理的批示中，又感觉到了总理对火箭部队的一片爱心。他感激地对总理说：“总理，这事不用调查了，完全属实，李福泽告诉了我，我正想向你报告”。接着，他把李福泽在电话中提出紧急请求的事情报告总理：再过一周，火箭基地就要断粮……

总理说：“绿色是牧民的生命，他们缚住一条沙龙不容易啊！……”他沉吟片刻，问道：“那个团吃沙枣叶多久了？”“据说，有五天了……”

周恩来沉默了许久，然后感叹说：“这是多么好的部队啊，为国分忧，这是百年不遇的，不要责怪他们。把断粮的情况告诉牧民，他们也会谅解的。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没有把粮食问题解决好啊。”

说罢，周恩来当即给粮食部打电话，但国库所存已经到了不能再动用的地步。周恩来叹了口气，疲惫而又沉重地放下电话。罗瑞卿发现，他明显消瘦的脸庞上长出一些老年斑，这些天他吃的是窝窝头，有时一顿就吃两个，三两重。这对于日理万机的大国总理来说，怎能吃得消呢？他劝总理休息，但周恩来挥了挥手，表示他不累。尽管聂帅等老同志都劝过他注意身体。

周恩来走到窗前，好半天，才说话：“你们正在开军委会议？”

“是的。各大军区都来了。”

周恩来转过脸：“各大军区负责人知道我们的国宝快要断粮了吗？”

“现在还不知道。”

“走，办法有了。”周恩来灵机一动，脸上愁云为之一扫，他说，“军队之间互相救助，这是我们的传统了，长征时就是这样做的。”

周恩来走进中央军委会议的大厅，当大家鼓掌起立欢迎他时，他抬眼望了望全场说：“各位将军，我建议今天的会议改一下议题：专门为我们的火箭部队募集粮食。”

周恩来说：昔日沸腾的大戈壁现在一片哑然。他们地处大西北沙漠深处，那里是不毛之地，有的地方真是寸草不生，连挖野菜都没条件……

周恩来心里苦得说不下去了。火箭基地断炊这个消息从总理嘴里说出来，分量显得格外重，将军们一时都难过得沉默了。举国都揭不开锅了，哪里不饥困，但，总理老着面子求援，与会者还能迟疑什么？

罗瑞卿说：宁可勒紧我们这些人的腰带，也要保证酒泉基地几千个胃袋。我们的火箭要上天，不能让它饿死在摇篮里。周恩来提出：半个月最好提前一星期给酒泉运去一列车粮食。他说：导弹，这是共和国的鲲鹏，只有让它吃饱，才能飞得高……不少军区当场表示：“请总理放心。我们保证按期节省出一个车皮。”

周恩来的目光逐一在将军们的脸上扫过：“时间尽可能提前，我们的导弹要如期发射！鲲鹏要展翅！”

就是这个“时间”，使有的将军踌躇不前，默默地抽烟：“支援火箭基地，这没问题，就是日子赶得太紧，一下子哪里去筹集这么多粮食？”

有人说：“我们尽量往前赶！”

周恩来焦虑地拧起眉，纠正道：“不是尽量，是要保证往前赶，要让他们吃着粮食打火箭，而不是吃着骆驼刺打火箭！苏联专家撤走的时候，酒泉基地对巴托夫讲，离开他们，中国的火箭不出二个月，最迟三个月就会飞起来。关于这一点，西方记者已经把中苏不和之风放到世界上去了。想想，这是一种什么情景吧，假如火箭部队不能完成发射试验……那我们国家的形象，军队的形象可就有点‘塌’了。”

周恩来这一说，群情激昂了，大家都把热烈的目光落在总理身上。

周恩来瘦削的肩膀，如同一座山峰耸立着。正是这座山撼人心弦地呼唤着将军们——他们回到军区后，很快调集粮食。不多日子，一列满载粮食的火车向大西北隆隆驶去……

沉着冷静指挥若定——1970 年指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

1970 年 4 月 24 日，年轻的共和国将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卫星发射时间定在 1970 年 4 月 24 日晚 9 时。

同指挥我国“两弹”试验一样，周恩来坐镇北京，双臂抱在胸前，十指连续不断地拍着双肩。当听说发射前尚有一些部位需要抢修时，周恩来叫通了现场指挥抢修的罗舜初将军：“请你快点告诉我，抢修怎么样了？”

“好啦，总理，”罗舜初报告说。

重大试验之前必须周到细致，万无一失，这是周恩来定下的规矩，负责前线指挥的钱学森也向他报告：“没什么大问题了，连二级脱落插头也检查过了。已下达一小时准备口令，预计九点可以发射。”

“好！”周恩来高兴地叫道。

但是，到晚 8 点 10 分时，又突然发现了一些技术性问题，罗舜初立即向周恩来请示。“那就推迟半小时嘛！”周恩来毫不犹豫地说，“注意，必须一丝不苟，开刀别把手术钳丢在肚子里。这可是我们共和国第一颗卫星。”

很快，晚 8 点 28 分，应答机问题解决了。但是，地面测试设备又有点毛病。于是，情况又一次报告给周恩来。

刚开始坐着接电话的周恩来霍地站起来：“给 40 分钟调整，快修！”周恩来还不放心，又补充道：“但不要慌张，不要性急，要沉着谨慎，延长 10 分 8 分的有何不可？正如第一次做母亲，难产也是正常的嘛。”

一会儿，罗舜初大声地向北京报告说：“全部修好！一切检查完毕！”

周恩来惬意地朗声笑了起来，一挥手：“好，9 点 30 分为零时，不再变动了。我在电话旁守着。”

零时终于到了：一片漆黑，无线电静默，一声轰响，载着卫星的火箭抖动了一下身躯，尾部喷出一股强烈的火焰，猛然腾空了。它留下光的顿翼，腾然向长空飞驰而去……接下来，一级火箭脱落……二级火箭脱落……第三级点火……13 分钟后，卫星与火箭分离，脱颖而出……

晚 11 点 30 分，中国发射人造卫星的新闻公报送到总理办公室，周恩来抑制不住兴奋，他字斟句酌地推敲着每一个词：

“……最近点 439km，最远点 238km，夹角 98.5°，绕地球一周 114 分钟，重 173kg，频率 2500 千兆周……”

最后，周恩来郑重地在新华社的发稿签上落下了“周恩来”三个大字。

这颗重 173 公斤的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成功，标志着我国航空航天技术的又一突破。

减少层次明确职责——检查批评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

1973年9月9日夜，巴基斯坦的一架波音720飞机，在首都机场腾空而起，飞向巴基斯坦的卡拉奇。机上乘坐的是亚非各国的体育代表团，还有一个由某国外长率领的政府代表团，共120名乘客。飞机升空后还不到5分钟，机场指挥塔就收到机组报告：“飞机第三发动机起火！”机组迫切要求返航降落！为了避免飞机接触地面瞬间因满负荷落地起火爆炸，机组同时申请把满载油箱放空——即空中放油。情况非常紧急，此时处理不当即会酿成大祸！

这时，塔台指挥员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他不懂飞机性能，不敢擅自作主，便向值班首长请示，而值班首长也不懂业务，无奈又向民航总局调度值班室请示，调度值班室又再向值班副局长报告，副局长也不敢拍板，又要求总局值班室请示空军调度室……就这样，一级级，一层层地上报。

33分钟过去了！请示了16道关口，还没有一个人点头做主，飞机只能在空中盘旋待命，机上包括机组成员138人的生命危在旦夕！塔台上的人员急得团团转，塔台指挥员情急之中，要通了飞行员出身的北京民航管理局副局长张瑞霭宿舍的电话。张瑞霭从睡梦中惊醒，抓起电话听完情况，当即回答：立即放油，同时做好紧急抢救准备。放下电话，张瑞霭抓起一件大衣披在身上，火速赶到机场。他抬头一看空中，大吃一惊，飞机仍在空中转圈，并没有放油。

“为什么还不放油？要让飞机掉在跑道上吗？”张瑞霭远远冲着塔台指挥员扯开嗓门吼叫起来。

“我们不敢放！因为总局值班首长不同意，说上级还没有指示……”

“立即通知飞机放油，出了事我一人承担！”见塔台指挥员还在迟疑，张瑞霭抢过话筒，不由分说地下达了命令：“720，放油降落！”

一声指令，飞机开始放油，最后终于安全降落了。此时停机坪上一片混乱，不同国籍、不同肤色的乘客们争相涌出机门，有的跪地祈祷，有的在胸前不停地划十字，有的掏出亲人的照片一个劲儿的吻……一场灾祸避免了。

但是，好事刚做完，追究擅自决定放油的风声却传来了，总局不但没有表扬他，反而要追究这擅自决定放油的责任，大家心里感到寒颤。

然而，仅仅几个小时以后，即第二天凌晨1时，周恩来亲自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紧急会议。民航、空军、总参三方人员到齐后，周恩来快步走进了会议厅。到会的人个个都很紧张，周恩来表情严肃，两只眼睛闪闪发亮，他一进门就把到会的人扫了一遍，最后，把目光停在张瑞霭身上，此时，张瑞霭心中一阵不安。哪知周总理边向张瑞霭走来，边大声说：“感谢你呀，张瑞霭同志！你办了一件大好事！你的决定很正确，很果断，很及时！”总理的评价，使张瑞霭的眼泪夺眶而出。

随后，周恩来严厉地批评了各级领导的官僚主义作风。他说：“作重要指示，像打仗一样，应该尊重前线指挥员，你们不但不这样做，还要追究责任，是谁决定的？”

周恩来的目光转向民航总局值班首长：“你当时是怎么想的？”

“我也是同意放油的。”

“那么你为什么不下达指示，还要一级一级向上请示呢？”民航总局值班首长垂下眼帘，不敢再吭气。

周恩来又很生气地问民航参谋长：“你在干什么？在睡觉？”值班调度

员忙替参谋长解释：“他不值班，也没有向他报告，是后来才告诉他的。”但参谋长此时当即作了自我批评。

周恩来一一查证了在场的每一级领导，发现有 13 个环节层层请示不得结果，继续说：“简直是官僚主义！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这不仅是关系飞行安全的重大问题，也是关系到国际影响的重大问题！不要说延误 33 分钟，有时即使是延误 33 秒钟，也会造成不堪设想的严重后果！……我们的事情之所以难办，就是层层太多，又不敢负责。机构不改革不行，权力一定要下放，领导者要懂行，官僚主义要不得……”

这次会议从 9 月 10 日 1 时到 4 时 30 分，在三个半小时会议中，大家都极为愧疚地听取周总理的批评，心中震动很大，受到了一次终生难忘的教育。不久，国家民航总局改进了体制和管理办法，提高了行政效率，进一步明确了责任和要求。

十年运筹一朝归来——争取李宗仁先生回国

1965年7月18日上午8时许，前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一行飞抵广州白云机场，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这一行动大大震惊了全世界，深刻感染了海峡两岸为统一大业而奋斗的人们。而为了这一重大举措，周恩来整整筹划了十个年头。

1919年底国民党势力被赶出大陆后，与蒋介石政见冲突公化的李宗仁（曾任代总统）未回到台湾，他拒绝了蒋介石的挽留，把心腹旧交程思远留在香港，自己于12月5日赴美国侨居。

1955年初，美国当局公布了与台湾当局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1月29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了《授权艾森豪威尔总统协防台澎地区案》。对此，李宗仁认为这是美国干涉中国内政，阻碍中国统一，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1955年4月，周恩来在万隆亚非会议上公开宣布，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这点也给李宗仁一个很大的启发。于是，李宗仁于1955年秋发表《对台湾问题的建议》，强调作为一个中国人，不能默尔而息，必须有所主张。此举引起了北京的注意。很快，住在香港九龙荔枝角的程思远接待了许多香港进步人士的登门拜访。

1956年1月，香港《大公报》的一位程思远同乡陪同香港《文汇报》副总编金尧如来看望程思远，交给程一份刊载在《大公报》上的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的报纸，试探程思远对国内知识分子问题的态度。3个月后，金尧如又来拜访程思远，一见面就开门见山地说：“我们接到北京长途电话：李济深先生希望你去北京一谈，来去自由，并且保密”。直到程思远排除顾虑到达北京后，方知是周恩来的决定。

1956年5月7日下午，全国政协举行小规模酒会，周恩来主动向程思远伸过手来，热情地说：“思远先生，久违了，我们1938年曾在武汉见过面”。5月12日中午，周恩来在中南海宴请程思远，并约请李济深、张治中、蔡廷锴、邵力子、黄绍竑、屈武等人参加，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在座。席间，周恩来高度评价李宗仁对台湾问题的建议，但回顾往昔，点了李宗仁在签订和谈协议问题上一误再误，最后，提出了国共两党重新携手团结起来，争取第三次合作，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主张。并且，他还宣布了对台工作“和为贵”的政策主张，请李宗仁先生回国看看，来去自由。这次接见、宴会和谈话整整用了三个钟头。程思远回港后，即将此行函告李宗仁，而李宗仁来信表示不快，谓此行关系重大，事前何不相商？并申明他虽提出对台建议，但其中间立场迄未有任何变化。

事隔三年，1959年9月24日，周恩来在中南海二次召见程思远，对程思远说：你转来李德邻先生信，他自愿将他收藏的历史名画献给国家，这是他爱国主义精神的表现，政府考虑接受。他又说：德邻另有信给李济深先生（此信系由费彝民转来），表示将回国定居，我以为他回国的时机还不成熟，将来我请你到欧洲去同他谈谈再说。

很显然，周恩来处理此事非常慎重、周到，细致。对于李宗仁所献历史名画，周恩来也着人一一进行了鉴定，然后寄语程思远：这些字画，有些是真的，有的是膺品，但政府体念李先生的爱国热忱，将助他一笔赴欧的旅费，以壮行色。可以看出，周恩来处理事务显出非常恰当、炉火纯青的功夫。1960年春，李宗仁派他的夫人郭德洁到香港，收下了这笔外汇。

李宗仁看到回归故国很有希望，就想为统一祖国做点工作。此时，恰逢肯尼迪入主白宫，美同人普遍对他寄以期望，认为这位 40 岁的总统可能对杜勒斯制订的偶硬的对外政策来一个根本性的转变。李宗仁也觉得肯尼迪对新中国的态度比较缓和，于是在张歆海教授帮助下给肯尼迪写了一封信，贺他当选总统，并望他就职以后，调整对华政策，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肯尼迪复了李宗仁一函，说此事关系重大，将予慎重研究。于是，李宗仁将来去函件都寄给程思远，嘱送周总理核阅。

对于此事，周恩来一眼看透。他于 1961 年 6 月上旬专门召见程思远，在接见时对程说：李德邻不要对美抱有过高的幻想。肯尼迪年轻气盛，想干出一番事业，但摆在他眼前的问题太多，改变对华政策，一时还不会列到他的议事日程上来。周恩来重申派程思远到欧洲去同李先生谈谈的意见，并希望李宗仁先生对美国不要抱有幻想。

1963 年 7 月，李宗仁对《欧洲周报》女记者玛赛丽说：“我由于自己的失败而感到高兴，因为从我的错误中一个新中国正在诞生。”此后，李宗仁与程思远约定于 12 月份在瑞士苏黎世会晤。行前，程思远于 11 月份再次返国向周恩来请示。一天晚上，国务院副秘书长罗青长将程思远引到了西花厅。

周恩来在这次接见中要程思远向李宗仁转达三件事：一是“四可”，即“可以回国定居，他决心回来，我们表示欢迎；可以回国后再去美国；可以在方便的时候再回来；可以在欧洲暂住一个时期再定行止。总之，我们欣赏德邻先生的向往祖国之心，但一切不强加于人，由他自己决定。”二是“四不可”：“李先生不要介入中美关系；不要介入美台关系；不要介入国共关系；不要介入第三势力。”三是要过“五关”即过“政治关、思想关、社会关、家族关、亲友关。”总理要程思远把上述各项内容背熟，然后来送程思远上车，殷殷嘱咐。在这次谈话中，周恩来突出了党和政府的政策和原则，显示了他处理问题时极强的政策观念。按照事先的安排，1963 年 12 月 19 日，程思远飞抵苏黎世，在一家饭店与李先生会晤，转达了周恩来对李宗仁的期待，完成了特殊使命。此行并且避开了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跟踪，一切都处在秘密状态中。

时机已经成熟，李宗仁先生抱定回归祖国之心，在进行了一些秘密准备后，向台湾当局打了去欧洲旅游两周的招呼，于 1965 年 6 月 13 日离美飞往瑞士，行前从纽约向程思远拍了电报。周恩来接到报告后，第五次约见程思远。

6 月 18 日中午 11 时，程思远飞抵北京，此时周恩来在等了三天之后，已于 18 日上午率团出访非洲各国。临行前，他托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中央统战部长徐冰、全国政协秘书长平杰三、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等同志向程思远传达三点意见：一、政府发给李先生一笔回国旅费，由你带往瑞士面交；二、同时发给你一笔旅费。请你去瑞士把李先生接回来；三、你到苏黎世时，将有负责同志同你联系，有问题同他商量解决，他将给你以必要的帮助。

按照周恩来交待的使命，程思远在我国驻外机构的秘密协助下，顺利地与李宗仁夫妇在瑞士见面。然后，再由我国有关组织的巧妙安排，李宗仁夫妇终于安全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当李宗仁一行乘上回归祖国的航班时，周恩来通夜未眠，一直等到接获李先生座机进入我国境内的讯息，他才安然上床休息。1965 年 7 月 18 日上午 8 时许，当李宗仁夫妇一行飞抵广州白云机场时，受到了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和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的热烈欢迎。

当李宗仁一行吃完粤式早餐继续起飞，于 11 时抵达上海时，万万想不到周恩来、陈毅和上海市市长陈丕显等人到机场迎接，李宗仁受到如此礼遇，感动极了。

7 月 19 日上午，周恩来在上海文化俱乐部与李先生会晤，满怀信心地谈到了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问题，并对李先生重申了“四可”精神。7 月 20 日，李宗仁夫妇飞抵北京，整个接待工作在周恩来直接指导下非常圆满。9 月 26 日，李宗仁在北京举行大型记者招待会，向全世界宣布了自己的心愿。

对于李宗仁先生的归国声明，周恩来曾客观地评价说：“德邻（李宗仁字）先生出走十六载，这次毅然归来，很不容易。他到北京时曾发表一个声明，说他以‘带罪之身’由海外‘归来’，向人民交代两大过错：一是 1949 年和平谈判时，他没有接受和平协议，‘至今犹感愧疚’；二是他在美国居留期间搞‘第三势力’。”“这样交代也好，可以取得人民的谅解。但是实际上这两件事情也难完全怪他。”“名为‘代总统’，实则一无权，二无兵，三无钱，真是孤坐石头城上，天低吴楚，眼空无物，打也不成，和也不成，一切都由下野后稳居在奉化溪口的蒋介石摆布。李宗仁受白崇禧的影响，也没有接受和平协议的决心。至于搞‘第三势力’，想依靠外国来取得政权，这说明他对美国有幻想，同时也是旧中国政坛显要的通病。”“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李宗仁先生这次回国定居，我们就是一家人，既往不咎了。”

巧用抓与促尽力保主产——“文化大革命”中贯彻“抓革命、促生产”指示

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动前夕，周恩来无意于党内斗争，倾其全力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筹划中。但是，当“文化大革命”运动降临在神州大地时，周恩来在“势不可挡”的情况下，则巧妙地运用“抓革命，促生产”的武器来缓和这场内乱对整个国家与社会正常生产和生活秩序的冲击，以尽量减少全体人民的损失。

1965年11月10日，经过精心准备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 海瑞罢官》一文在上海《文汇报》发表，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而毛泽东在当时不通知中央政治局就批准发表此文并示意全国转载。对于这一重大事态，中央书记处采取了慎重的态度，《人民日报》11月30日才转载姚文元文章。在严重的事态面前，周恩来知道无法阻止运动的开展，便试图在转载中将这场尖锐斗争导入学术争鸣渠道，并保护吴晗等同志。为此，周恩来亲自修改了《人民日报》按语，强调作为学术问题展开讨论，“既允许批评的自由，也允许反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意见，我们也采取说理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五·一六通知》以后，“文化大革命”开始全面展开与逐步升级。8月，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会上发表了毛泽东于5日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一文，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在“十六条”中，周恩来和陶铸等人经过反复磋商和力争，突出了“抓革命、促生产”的提法，以图“保证文化革命和生产两不误，保证各项工作的高质量。”

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前，“革命”还仅仅限制在“文化”领域和党政机关内。但18月中旬“红卫兵运动”掀起以后，“革命”开始迅速推向社会，妨碍了工农业生产，这些活动违背了周恩来等人希求稳定国家经济社会生活秩序的初衷。在这种情况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亲自主持起草了《关于红卫兵的几点意见（未定稿）》，试图用保护生产来“限制革命”。9月7日，周恩来指示《人民日报》发表了《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提出“要以文化大革命为纲，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产，保证革命和生产两不误”。周恩来还对红卫兵反复说：我们既要革命，还要生产，否则吃什么？用什么？所以，凡是生产的地方都不要影响，生产减少了于国于民都不利。

在周恩来的亲自主持制定下，经毛泽东的批准，中共中央于9月14日发出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和《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两个文件规定在工业、农业、交通、财贸部门立即加强或组成各级生产业务指挥机构，已经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在党委领导下迅速组成抓革命和抓生产、抓业务等两个班子；职工应当坚守岗位，外出串连的迅速返回，积极参加本单位的“革命”和生产，职工的文化革命放在业余时间去做；未开展文化革命而生产任务又重的单位，文化革命可以推迟进行；工矿企业与科研单位在文化大革命中对领导干部的撤换由上级党委主动调整，不采取群众“罢官”的作法；县以下的文化大革命仍按原“四清”的部署结合进行，北京和外地学生、红卫兵除省、地委另有布置外，均不到县以下各级机关和社队去串连，县以下各级干部和社员也不要外出串连；县以下各级领导应恢复和加

强领导力量，把各项工作全面抓起来。9月15日，林彪在毛泽东接见百万师生和红卫兵大会上强调“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斗争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周恩来在讲话中则重申“搞好工农业生产，关系很大”，要求红卫兵不要到工厂农村去串连，力图稳定工农业生产局面，把运动限制在有限的范围内。

周恩来关于以抓生产来限制“革命”的谋略在执行中很快被中央文革一伙人看清，当11月9日《人民日报》中《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社论发出以后，中央文革一伙炮制了一个新的文件稿，与周恩来唱对台戏。12月4日和6日，林彪两次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攻击周恩来用“抓革命、促生产”口号来压运动，形成对周恩来等同志的政治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要保住从国务院到各省、市、自治区的骨干力量不被打倒，要维护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其难度也就更大了。

众帅出席稳定军心——精心安排 1967 年“八一”招待会出席人员

1966 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以后，“全面内战”的浪潮逐步推向军队之中。1967 年 1 月 23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作出了《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实行军队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行动。1 月 28 日，中央军委颁布了八条命令以规范“支左”工作。但月底即出现了“打倒朱德”的大字报。接着，2 月 11 日发生的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大闹怀仁堂”事件和 7 月 20 日武汉发生的“百万雄师”事件，使“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矛头层层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内部。7 月 25 日，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对肖力（李讷）说：“要战斗！要突击！要砸烂总政阎王殿！”总政治部主任、副主任、部长们和大批干部遭迫害和诬陷。同时，康生等人在新华社电讯稿中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造反派开始冲击军事机关，揪“军内一小撮”。而 7 月 26 日中共中央在《关于纪念“八一”建军节的通知》中也提出“彻底批判反党分子彭德怀、罗瑞卿的反动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揭露他们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相勾结，在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支持和策划下进行篡党、篡军的罪恶活动，把目前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大批判运动推向一个更深入的阶段。”这样，由“文化大革命”掀起的内乱逐步导向军内，引起了整个军队上层的不安，军心颇有动摇之感。

在这种情况下，必须稳定军心，防止军队内部发生动荡。怎样做到这一步呢？周恩来煞费苦心。此时，正值“八一”建军节来临。按惯例，每年“八一”建军节前夕，国防部均举行招待会，以招待各国驻华使节和武官，届时，军内元老和国防部要员都要出席。但此时朱德和徐向前等德高望重的元帅们都已受到了冲击，能否按惯例出席“八一”招待会已成难事。因此，周恩来下决心要将朱德、徐向前等人安排出席“八一”招待会。

对于朱德、徐向前等人，林彪与江青两伙人均持反对态度，他们攻击朱德是“大军阀”，对徐向前等人也嫉恨很深。因此，他们自然反对和阻止朱德和徐向前等人出席招待会。这时，周恩来在非常复杂的情况下请示毛泽东主席，这一安排争取到了毛泽东的同意。此事直到 7 月 31 日下午才定下来。

为了防止意外，周恩来为元帅们参加招待会特别布置了有关行车路线和警卫措施，防止中央文革一伙人策动造反派堵车作乱，并派叶剑英通知徐向前，要他注意和小心。这样，在 7 月 31 日晚国防部举行的纪念“八一”招待会上，军队的几位元帅基本上都出席了。他们出席并见报有力地打击了中央文革一伙揪斗元帅们的气焰，遏制了林彪一伙排斥异己、在军内搞一统天下的阴谋，也象征了人民解放军内部的团结和稳定。此后不久，毛泽东也否定了林彪等人提出的“揪带枪的刘邓路线”的口号和图谋。

参加庆典稳定西藏——1966 年接阿沛·阿旺晋美进京

“文化大革命”给全国各地带来的冲击和祸害，使少数民族地区也未能幸免。在林彪、江青极左路线的冲击下，西藏地区党的民族、宗教、统战政策遭到了严重破坏，西藏的民族关系越来越紧张，作为西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的阿沛·阿旺晋美也难以工作了。在这种情况下，如不迅速缓解局势，则西藏地区很可能爆发更大的骚乱。此时，一直关注着两藏局势变化的周恩来想出了一个妙法：他在 1966 年 9 月 29 日，以参加国庆庆典为理由，派飞机把阿沛·阿旺晋美接回北京。到北京后，在周恩来的安排下，阿沛·阿旺晋美于“十·一”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看庆祝活动并受到毛泽东的接见，这一举措传到西藏，对西藏日益紧张的局势起到了很大的缓解作用。

以退为进能屈能伸——“文化大革命”中请陈毅带头“作检讨”

1966年8月以后，国务院各部工作相继受阻，周恩来的副手们几乎都被打倒或无法工作。这时，周恩来想出以退为进的办法。

有一天，周恩来把陈毅找来，要对他做工作，然后从外交部开始逐步把各部工作再恢复起来，方式就是恳求陈毅“作检讨。”

对于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在国内外的影响，江青一伙是非常清楚的，他们对刚直不阿的陈毅充满忌恨，自然要搅得外交部不宁。周恩来把陈毅找来后，话语充满忧虑和恳切之情，他对陈毅说：“这么大国家，千头万绪，我总不能没有几个帮手吧！部长们都被打倒了，他们的工作谁来做？我想安排部长们向群众检查，争取尽快过关，把各部工作抓起来”。见陈毅点头赞许，周恩来把话锋一转，对陈毅说：“陈总，我想让你带个头，你看怎样？”

“叫我带头？”陈毅明白了周恩来找他来的意图，然后问总理：“叫我向造反派检讨？我有什么错误？”

“陈总”，周恩来注视着陈毅说：“就忍了这一次吧。”正巧，秘书通知总理，接见外宾的时间到了。周恩来拉起陈毅：“陈总呀，你是外交部长，外事工作一天不能中断，你要总是被包围，被批判，工作让谁抓？我要管的方面太多，我一个人顶不下整个天哪。”

陈毅不愿再惹周恩来的烦恼：“好，想通了，我来找你。”

几天以后，陈毅副总理推开了周恩来的门：“总理，我想通了。从今天开始，不再放炮。我检讨，争取早日得到群众谅解，把握好外交部的工作。”

周恩来跨前一步，紧握陈毅的手，激动而又深沉地说：“好！你带个头，以大事为重。”他并一再叮咛：“检讨不要太长，写好拿来我看看……”

陈毅准备检讨了，但陈毅毕竟是陈毅，他的检讨最终只能批评“文化大革命”的极左行动，这自然招致中央文革一伙人的更大报复和围攻。

1966年11月29日，陈毅等四位老师接见军队院校学生的讲话捅了马蜂窝，直指中央文革。此事发生后，周恩来把陈毅请来。

周恩来先不说话，端过一杯飘着绿茶尖的清茶递给陈毅。待陈毅面色平静之后，他不紧不慢地说：“陈老总，现在我要请你接受一个任务。”

“什么任务？”陈毅放下杯子。

“从现在开始，你不要讲话。”

“什么，什么？”陈毅惊讶地睁大了眼睛，指着自已鼻子问道：“叫我不要讲话？！”

周恩来肯定地点了点头。

周恩来让陈毅检讨，是为了防止造反派夺权。这一次，周恩来让陈毅缄口，更是为了保护陈毅，因为周恩来明白，在运动的势头上，对抗是无济于事的，只能招致更大的麻烦。

1967年2月发生的所谓“二月逆流”，其阵容是可观的，其言词激烈而有理，但在当时情况下，只能被压制。大闹怀仁堂的结果是老干部进一步被批斗，解散了周恩来主持的政治局碰头会，中央文革抓过了大权，代替了中央书记处。

“二月抗争”以后，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四位老师和李先念、李富春、谭震林三位副总理处境困难。但过了一段时间，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有意要促使他们复出，让他们在委屈中重新伸展出来。

毛泽东问周恩来：现在北面的情况怎么样？周恩来告诉毛泽东，最近的情况不能掉以轻心，苏军在临我边境地带，陈兵数十万，虎视眈眈。他们的意图从各种情况分析：一种可能是搞边境摩擦，小打小闹，第：二种可能是炸毁我核设施；第三种可能是大动干戈，发动全面进攻。

毛泽东沉思良久，忧心忡忡地说：苏联是亡我之心不死啊！要把这种形势告诉全国人民，加紧备战，特别是军队，一定要有准备，要防患于未然，防止突然袭击。几位老帅怎样？

周恩来听出了毛泽东对老帅们的关心，趁此机会向毛泽东说：政治局和中央文革联席会议，已经开过几次了，四位老帅、三位副总理都已作了深刻的检讨。看到国家混乱，自己的战友被打倒，他们对“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不理解，想不通，现在已经认识了错误。毛泽东听后，显得非常高兴。这样，在极左势力甚嚣尘上的九大上，朱德、刘伯承、叶剑英、李先念当选为政治局委员，陈毅也当选为中央委员。1969年4月28日，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又当选为中央军委副主席，从而在军内站稳了脚跟。

殚精竭虑以身相护——“文化大革命”中不准揪斗陈毅

在“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浪中，周恩来为保护陈毅过关，一方面劝陈毅“作检讨”，以退为进；另一方面同林彪、江青策动的揪斗陈毅、“打倒陈毅”的阴谋进行了旗帜鲜明的斗争。

一次，林彪、江青一伙策动造反派批斗陈毅，还想在批斗会上把陈毅揪走。周恩来指示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将警卫部队部署在主席台下边，把陈毅保护起来。周恩来还亲自参加大会，坚决反对呼喊“打倒陈毅”的口号和张贴“打倒陈毅”的标语。当造反派喊出“打倒陈毅”的口号时，周恩来为了表明自己的态度，教育受蒙蔽的群众，愤然退出会场，同时命令警卫人员保护陈毅也离开会场。当一伙人居然把陈毅抢走后，周恩来立即指示卫戍区派部队把陈毅救护出来。

有一次，林彪、江青指使一伙人围攻周恩来，扬言要拦截陈毅的汽车，要冲到人民大会堂去揪斗陈毅，致使周恩来连续 18 个小时不能吃饭，心脏病犯了。周恩来气愤地说：“谁要在路上拦截陈毅同志的车子，我马上挺身而出；你们要揪斗陈毅同志，我就站在人民大会堂门口，让你们从我身上踏过去！”由于周恩来坚持斗争，林彪、江青一伙揪斗陈毅的图谋始终未能得逞！

又有一次，由陈毅主持在北京饭店举行招待会。当时，林彪、江青一伙正煽动一些人抓陈毅，揪斗陈毅。周恩来指示卫戍区：一定要保证陈老总的安全！陈毅对傅崇碧开玩笑说：“呵！总理把我交给你们了！”去北京饭店时，没有发生什么问题。到了饭店，傅崇碧发现有不少形迹可疑的人。傅崇碧把陈毅的汽车停在正门，没等招待会结束，就把车子开走了，那伙人被引到车子开去的方向；招待会结束后，傅崇碧用另外准备的车子，从另外的门，把陈毅接回中南海。陈毅笑着说：“谢谢你们了！”这时，周恩来又查问此事，得知陈毅已完全返回，才放了心。

退避三舍迂回反击——1967年解决“王、关、戚”问题

退避三舍，是古代兵家争战中一种有节制有计划的后撤，以便后发制人的谋略。周恩来在谈到“退避三舍”时说：“这就是说，你来，我先退，给你警告。再来，再退，再给警告，但事不过三。”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曾数次运用这一谋略躲过了明枪暗箭。

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动以后，周恩来一度成为攻击的对象，但毛泽东又让他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1967年5月中旬，江青等人见周恩来保护老干部、缓和运动的冲击力，把《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送给林彪、康生和周恩来，企图诬陷周恩来。对此，康生虽为知情人却不愿作证。此后，周恩来不露声色，隐忍不发，静观变化。

中央文革小组一伙人见此案整不倒周恩来后，倒周之心不死。王力等人从武汉“凯旋而归”后，开始组织了一场倒周的夺权运动，一张有组织的反周大字报贴上墙，巨幅标语悬挂起来，“火烧周恩来的右倾机会主义”、“周恩来代表的是什么阶级？”“活埋周恩来”等口号开始由红卫兵提了出来。8月7日，王力又窜到北京外语学院发表反周夺权的讲话，煽动夺外交部的权。他说：“部党委班子没有动吧？这么大的革命，班子不动还行？”在王力的唆使下，造反派坚持要打倒陈毅，夺外交部的权。红墙里的造反派与外面的“揪刘邓陶”大军串通一气，矛头直指周恩来，北京进一步陷入混乱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深知王力背后还有人，必须对动乱的策源地中央文革采取措施，但要制住中央文革必须毛泽东亲自下决心才行。于是，周恩来决定迂回反击，他让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带上王力的“八·七讲话”到上海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看后斥之为“大、大、大毒草”！他最后对杨成武说：“你回去告诉总理，‘王关戚’破坏文化大革命，不是好人，你单独当面向总理汇报，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不过，还是先抓王力、关锋，把他们分割一下，看戚本禹有无转变。”

杨成武回北京后马上向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的决定，周恩来说，“事不宜迟，马上开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集有关人员开会，宣布了毛泽东的命令，当场把王力、关锋隔离审查。

这一断然决策，维护了周恩来的地位，使他稍稍摆脱了一下当时的困境，打乱了林彪、江青两伙人的阵脚，使此后反周的这些人不敢轻举妄动。

临事应变晦莫如深——1971年紧急处理“9.13”事件

周恩来在重大的决策活动中不仅能够慎重稳妥地进行决断，而且还善于在极其复杂而又微妙的事态中临事应变，驾驭事态的变化，显示了丰富的决策经验和临危不乱的决策胆略。1971年“9.13”事件发生前后的紧急处理，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1970年8月23日至9月8日，在江西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是林彪集团向毛泽东夺权的一次特殊较量。这次较量围绕着是否设立国家主席问题而展开，实质上是要使林彪在国家事务中握有更重要的权力。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等文件，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此后不久，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先后代表中央改组了北京军区的领导成员，对“批陈整风汇报会”进行了总结，指出当时的军方重要人物黄永胜（总参谋长）、吴法宪（空军司令）、叶群（军委办公厅主任）、李作鹏（海军政委）、邱会作（总后勤部部长）“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错误”，“希望他们实践自己的申明，认真改正错误。”

林彪集团在庐山会议上被挫之后，开始了新的对抗。1971年3月18日，林立果提出“根据目前局势，要设想一个政变计划”。随后，林立果等人制定了《“571工程”纪要》，确定政变手段是“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党政要员，迫毛泽东就范。此后，“联合舰队”开始了紧张的武装政变准备。

1971年8月16日，周恩来、张春桥、纪登奎、黄永胜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去北戴河向林彪汇报工作。周恩来在汇报结束时说：根据毛主席的提议，党中央决定“十·一”前后召开九届三中全会，然后召开四届人大，现在各项准备工作正在逐步就緒。林彪一伙对此安排惶恐不安，担心九届三中全会将要提出他们的问题，也担心林彪在四届人大会议上当不成副总理和国防部长。

与此同时，毛泽东从8月中旬起至9月12日，巡视南方各地，在向九省市负责人打招呼时矛头指向林彪。于是，接到密报，林彪一伙进行了紧锣密鼓的秘密部署。

9月7日，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了“一级战备”的命令，决定实施两项阴谋：（1）乘毛泽东外出巡视之机在途中谋害毛泽东，以武力谋害毛泽东后林彪则以“接班人”的身份宣布“接班”；（2）如上一计不成，则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发动内战。8日，林彪在北戴河正式下达了“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的武装政变手令。这一切急剧的变化，将双方的矛盾冲突推向了白热化的程度。但是，在“文化大革命”热潮的掩盖下，这一切又在表面上显得非常地平静。

毛泽东在9月3日到达杭州后对林立果等人的若干行径有所觉察，遂突然改变行程，于11日下午乘列车提前离开了上海，并安然通过了苏州硕放铁桥，打乱了林立果一伙的部署。12日晚，毛泽东安抵北京。这样，林彪一伙就只有南逃广州或北叛了。

林立果执行第一方案的同时，一架256号三叉戟—IE型专机被调往海军山海关机场，供在北戴河的林彪随时使用。就在这一紧要时刻，驻北戴河的警卫部队将林彪、叶群之女林立衡关于叶群、林立果要带林彪坐飞机叛逃的报告火速报告了北京，中央警卫局又立即报告了正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讨论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草案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周恩来接到这个报告后沉思片刻，凭着长期的斗争经验预感到事态的极端严重性。他立即中止了《政府工作报告》的讨论，回到东大厅总理办公室，首先查问 256 号飞机调往山海关机场的情况。在周恩来的严厉追问下，空军司令吴法宪和海军政委李作鹏分别作了某些掩盖真相的报告。周恩来获悉后立即下达了限制飞机起飞的措施，并通过李作鹏向海军山海关机场下达指示：256 号专机必须有总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四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飞行。但李作鹏在传达命令时作了篡改。就这样，叶群，林立果等人眼见阴谋败露，已经惊恐万状，决定施展手腕，借周恩来之手调动飞机。

12 日深夜 23 时 22 分，周恩来接到叶群从北戴河打来的电话，叶群用故作亲切的口气说：“总理呀，有件事要向您报告：林彪同志想动一动。”

周恩来一听叶群的试探，立即反问：“他准备到哪里？是空中动还是地面动？”叶群在周恩来的紧问下猝不及答，吱吱唔唔地回答说：“……空中动，需要调几架飞机”。见叶群渐露马脚，周恩来步步紧追：“你们调了飞机没有”？

叶群原以为打这个电话能骗过周恩来，不想周恩来步步追问，她不得不再次撒谎，她说：“还没有调，林彪同志让报告总理再调”。周恩来见叶群再露马脚，必定内藏阴谋，他想用缓兵之计定住林彪，用平稳的口气答复说：“今天晚上飞夜航不安全。调飞机的事儿，我和吴法宪商量一下，看看天气再说。”

周恩来机智的问答，不仅摆脱了叶群的手腕，而且使叶群显露了马脚，迫使林彪一伙乱了阵脚，改南逃为北叛。当 13 日零时 53 分林彪一伙强行突破阻拦乘 256 号三叉戟飞机逃跑后，周恩来马上掌握了主动权，他立即向毛泽东作了报告，然后向全国下达了禁空令，并将黄永胜扣在人民大会堂休息室，令李德生前往空军作战室进行控制，派杨德中“寸步不离”盯住吴法宪。当周恩来请示是否拦截林彪飞机时，毛泽东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都是没有办法的事，由他去吧。9 月 13 日凌晨 3 点多钟，周宇驰等从北京沙河机场乘直升飞机向蒙古方向逃跑，周恩来等下令派战斗机拦截迫降，如飞进城区就坚决打掉。几乎在同一时间，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在京政治局委员会议，通报了夜间发生的一切情况，说明了应付万一的准备，第二天，边防部队进入了一级战备状态。14 日下午，周恩来得到外交部转来我驻蒙大使馆的报告：获悉 9 月 13 日凌晨 3 时中国民航 256 号三叉戟飞机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肯特省贝尔赫矿区南 10 公里处坠毁，机上乘员 8 男 1 女全部死亡。此时，周恩来已经连续 50 多个小时没有休息，他在风云突变、斗争深入的复杂情况下，以其卓越的决策智慧临机决断，巧妙制敌，使全国避免了一场更大的内乱。

计天下利争国家名——“文化大革命”中为学者讣告登报排除阻力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运动的领导权归中央文革，这是《十六条》的规定。1970年11月6日，中共中央又作出《关于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的决定》，由中央组织宣传组管辖中央组织部、中央党校、人民日报社、红旗杂志社、新华总社、中央广播事业局、光明日报社、中央编译局等部门的工作，原中央宣传部、政治研究室均取消，中央组织宣传组织长康生，组员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这样，中央组织宣传的大权为江青等人所掌握，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也很难统驭。

1973年9月，全同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委员何鲁教授病故，当时负责国务院文教工作的周荣鑫和刘西尧提议，可在光明日报上刊登此消息，但似有难言之处，怕被姚文元等驳回。于是，他们请示了周恩来。周恩来当即批示：

一般政协委员、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哲学家、文学艺术家逝世的消息可在光明日报刊登，如何鲁先生病故即属此类。妥否，请批。周恩来20/9/197这“妥否请批”问的是姚文元。从这里不难看出周恩来当时的处境。但姚文元迫于无奈，也不得不同意周恩来的提议。就这样，周恩来为当时不能在党报上发表正式讣告的知识分子在《光明日报》上争得了一角之地。

设法缓冲练藏积精——“文化大革命”中处理尖锐矛盾与人事问题

设法缓冲，是周恩来处于矛盾中心而把握原则以求灵活解决问题的特殊策略。这既不是什么庸人的和解，更不是什么“和稀泥”，而是在矛盾尖锐对立的状态下，为了暂时平抑事态，更好地保存力量，减缓冲击力，达到练藏积精，以图将来发展的一种方法。这样，才能够驾驭住事态的发展与格局的形成。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斗争不断升级，这大大超出了周恩来的预想。对于这场平地而起的狂飙，周恩来深感“方兴未艾，欲罢不能”，“做梦也没有想到”。怎么办？周恩来认为硬顶是不行的，必须“因势利导，否则就会被冲垮”。他说：要做“弄潮儿”，站在潮头上，做旁观人不行，做对立的把你冲垮。1966年12月间，周恩来对并肩战斗了几十年的老友李富春说：“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他还说：“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

为了减缓“文化大革命”运动对刘少奇等人的冲击，周恩来正面阻挡不了，就拿出调和的方式来“降温”。1966年10月1日，林彪在国庆17周年大会上进一步提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的论调，使“文化大革命”性质进一步升级。10月3日，经毛泽东审阅的《红旗》杂志第13期社论又发出了“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的号召。对此，周恩来感到斗争在升级，就试图以调和的方式减缓运动对广大老干部的打击。他专门找了毛泽东谈此事，表示不同意这一提法。他说：党内历来提路线问题，都说是“左”倾右倾，并没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的提法，这样提合适么？当时毛泽东仍坚持了自己的看法，不采纳周恩来的意见。而周恩来则在以后多次接见群众代表的讲话中反复强调“资反路线”的错误，是认识问题，是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周恩来的缓冲策略在人事安排上则体现出能进能退、时柔时刚、刚柔相济的特点。1971年“9.13”事件发生后，全国上下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盲从有了信仰上的危机和新的觉醒。这时候，人事安排工作对实现周恩来的主张非常有利。于是，当毛泽东找周恩来商量由谁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时，周恩来力荐叶剑英元帅。1971年10月23日，即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后的第十天，毛泽东把周恩来请到自己的办公室，进行了彻夜长谈。议题之一，就是谁来接替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周恩来说：“剑英同志合适。他本来就是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但是林彪想搞他的一统天下，想把自己的心腹安插进去，竭力地排斥剑英同志，使他无法进行工作。”就这样，一锤定音，使叶剑英等老同志重新掌握了军委的日常工作，避免了以后江青等人想插手军队的祸害。

1974年6月1日周恩来住进医院以后，觊觎总理之位已久的江青一伙急忙开始了篡党夺权的活动。10月18日，王洪文飞往长沙向毛泽东诬陷周恩来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受到毛泽东的批评。20日，毛泽东指示唐闻生、王海容回北京转告周恩来和王洪文：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问题要总理和王洪文一起管。建议邓小平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但11月12日和19日，江青两次写信给毛泽东，提出谢静宜当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迟群当教育部长，乔冠华当副总理，毛远新、迟群、谢静宜、金祖敏列席政治局，作为“接班人”来培养。以后，又提出

王洪文当人大委员长。对此，毛泽东尖锐指出：“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周恩来的“组阁”就成为一桩难事。他既要安排好邓小平，叶剑英等同志，又不能排除江青及其爪牙。为此，他约王洪文于12月23—27日，飞往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工作，着重谈了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问题。周恩来返京后，与几位老同志反复商量了组阁问题。对于“四人帮”一伙提出的教育部人选，周恩来感到关系重大，以周荣鑫掌管为宜，而对其他部门人选，则作了策略上的让步。于是，他在医院分批召集政治局成员开会，通过了人选方案。这样，一方面在政府中保证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老同志掌握了实权，另一方面又确保了“组阁”的成功。

为了扶助邓小平，在1975年1月四届人大举行以后，2月2日，周恩来在病榻上拟就了一份《关于国务院各副总理分工问题的请示报告》，呈毛泽东。《请示报告》中提出邓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毛泽东批准了这个报告。这样，邓小平同志实际上居于代总理的地位，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相互依存相互转换——处理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关系

领导者与被领导者，是领导活动中的两个关键要素，任何领导活动如果缺少领导者与被领导者就构不成领导活动。

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曾明确指出：“旧政府权力的纯粹压迫机关应该铲除，而旧政府权力的合理职能应该从妄图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那里夺取过来，交给社会的负责的公仆”。而这个公仆“应该为组织在公社卫的人民服务”。很显然，在马克思的思想中，新型的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有一个“公仆”与服务对象的关系。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这一伟大思想，在全党确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形成了党在一切工作中的群众路线。周恩来一生始终以这条路线为宗旨，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领导干部树立了“人民公仆”的光辉典范。并且，他明确地在理论上提出了社会主义领导与人民群众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

首先，周恩来认为人民群众是领导存在的力量，没有这一种力量，领导也就不存在了。1954年12月10日，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指出：“我们每一个人，不管过去做了多少工作，现在担任什么职务，没有党和人民，就既不会有过去的成绩，也不会有今天的职务。”这段话言简意赅地阐明了社会主义领导在人民群众中的地位和作用。人民群众的这种历史地位决定了领导者只是沧海一粟，领导者一旦脱离了人民，必将一事无成。

其次，周恩来认为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实现，需要有勤勤恳恳为之服务的千百万领导者，也就是说，领导者是人民群众需要与利益的代表。人民群众之所以需要领导，是因为领导者能够代表人民群众利益并在其中进行组织、指挥、控制、协调，这是人民群众需要领导的原因，也是领导者最基本的功能。因此，周恩来把领导的全部意义归结在“为人民服务”之中。“为人民服务”不仅是社会主义领导的本质，而且也是周恩来所揭示的领导与被领导相互依存关系的核心，正是因为人民群众需要服务与领导能够提供服务，才会构成领导活动。

但是，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整个过程中，领导的这种本质意义，不是每个人都能理解和发挥得很好的，有的甚至悖离了人民的利益，用人民予以的权力为个人谋取私利。周恩来指出，导致此种原因的“主要危险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他说：“犯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严重错误的同志，只能听好的，不能听坏的，成绩既冲昏了头脑，利欲就必定会熏心，蒙蔽了共产主义的良知，这是最危险不过的事了”。周恩来长期以来一直坚持对广大领导干部进行反对个人主义的教育。早在建国初期，他就告诫全党同志要坚决“反对任何共产党员由满腔热忱地、勤勤恳恳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宝贵品质堕落到资产阶级卑鄙的个人主义”。

周恩来不仅在理论上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领导与被领导这种相互依存的本质内涵，而且将其贯穿于他一生的全部实践中。1973年春天，周恩来因癌症手术，显得十分瘦弱。当时谷牧刚恢复工作，看到总理很憔悴，就问起他的身体情况，周恩来随意地说：“我已经得了癌症。”谷牧听后心情突震，惊愕万分，可周恩来立即换了一个话题说：“你恢复工作了，担子很重，还得好好干呐！现在不是时兴‘爬坡’、‘拉车’那些话？我们这些人一辈子就为国家，为人民拉车啊！一息犹存，就得奋斗。”听了总理的话，谷牧十

分难过和激动。周恩来知道自己患了不治之症，却仍每时每刻想着国家和人民，勉励全体领导干部要为国家和人民“拉车”，这是一种多么崇高的精神境界！

在周恩来的有关著作和讲话中，对领导所下的定义是十分广泛的。他认为在领导机关工作的上、中、下各级干部都是领导者，至少“都有做领导工作可能”。他说“有些同志虽未直接做领导工作，但实际上仍是领导干部”。这一广泛的领导定义，可以反映出周恩来所坚持的一个基本思想：即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没有绝对界限，领导这个岗位只是提供了更多的为人民服务的机会。领导是从群众中产生的，“一般干部都有做领导工作可能”，被领导者今天是群众，是一般干部，因工作需要，德才素质的适应，明天就有可能成为领导者；同样，今天的领导者，明天也有可能成为一个普通群众。领导者如果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职。

领导者与被领导者这种相互转换的基准是什么呢？周恩来将它归结为“政治标准与工作能力”两方面。政治标准，即能否坚持为人民服务。他说：“为准服务是个政治标准”，凡是不能很好为人民服务，在工作中表现出的马马虎虎，空谈家、妄自尊大、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文牍主义以及蜕化或腐化思想等，都应该坚决反对。工作能力，即能否实现为人民服务。周恩来认为，领导者除在立场上必须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与意志为转移外，在能力上还必须具备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否则将不能很好地实现为人民服务的目标。为此，他要求每个领导者都必须虚心向群众学习，努力吸取群众智慧，在向群众学习的过程中提高为群众服务的本领。

周恩来所提出的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这种相互转换的思想，对明确我们这个国家的“领导”涵义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由于受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影响，在我们革命干部队伍中仍存在着种种官僚主义、特权思想以及终身制等问题，“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唯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这些问题若不能予以彻底解决就会耽误社会主义事业。周恩来从当时的情况出发，提出领导干部的标准，以防止一些人在领导岗位上的蜕化与变质，表明了周恩来对该问题的高度关注。

内外上下和谐一致——协调上下新旧各目标之间的关系

协调，就是对领导系统的各种关系进行调整，使整个组织内外上下联系紧密，和谐一致。综合周恩来有关这方面的思想，其提出的协调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协调上下级之间的关系。上下级关系既是组织关系，又是工作关系，这一关系，在领导活动过程中是十分重要的。那么如何才能协调好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周恩来提出了一个最基本的方法，即必须明确各自的职权与责任。如果职责不清，上推下诿，必然造成互相掣肘，人为地制造内耗，降低工作效率。在谈到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时，周恩来就明确提出中央应该只管战略问题，而把战役的组织 and 战术的运用交给地方去机动处理，因为他们最了解具体情况。上下级之间明确了这样一种职责，不仅使行政系统的工作有了一个整体的分工，使之上下协调，集中统一，而且将“一个积极性”变成“两个积极性”，下级可以在上级确定的战略总目标下，积极地、创造性地结合本部门的情况予以贯彻落实，从而使整个组织和谐、有序地发展。无论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还是一个部门的上下级关系，维系其中正常关系的都首先是相互的职权、职责关系，任何越权、越职的行为，都只会严重挫伤下级的积极性，助长上级的官僚主义和瞎指挥，以致最终造成整个工作系统紊乱。

协调各国标之间的关系。由于领导工作的复杂性和决策对象的广泛性与多样性，在领导活动中往往会同时存在多个目标，而且有时每个目标之间又是相互矛盾和冲突的。对于这样的一个复杂的领导问题，任何简单急躁的办法都是不行的，必须用协调的方法予以妥善解决。周恩来在谈到要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发展时，对面临的重工业与轻工业、工农业生产和运输及商品流通、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国家建设与人民生活提高、沿海发展与内地建设、各民族之间的发展等多种目标就明确地告诫人们，这些目标不是在任何条件下都是相容的，如果处理不好，目标之间缺乏有机的协调和统一，互相之间就难以共存。他对处理这多层目标的基本思想是：突出重点，兼顾其他，综合平衡，稳步发展。多个目标同时实现是不可能的，因为它要受到一定的人、财、物等资源的限制。盲目的放弃也是不足取的，因为这违背客观事物的复杂规定性。正确的方法就是：在多个目标中根据轻重缓急的情况，先实现重、急的目标，同时兼顾其他目标，然后稳步地推动整体事业的发展。建国初期，周恩来在领导制定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就是根据毛泽东以重工业为中心的意见，首先确立发展重工业的重点目标，同时按照一定的比例兼顾其他目标的有序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协调新旧之间的关系。任何一种社会变革都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在相当一个时期内，新与旧、困难与发展、历史与现实的种种矛盾总是相伴而存在。面对着这复杂的局面，任何急躁、沮丧或回避的态度都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只有正视问题，积极协调，方可转化矛盾，推进发展。建国之初，周恩来就用这样的策略来面对各种复杂的矛盾和困难。新中国的诞生从根本上消灭了剥削制度，确立了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但是当家作主的人民还必须要“承受必要的负担”。这是种什么负担呢？周恩来说：“我把这种负担叫做胜利负担”。因为胜利，我们要把俘虏或改编的国民党军队包下来，在人民生活十分贫困的情况下，还要解决这些人的吃饭问题，怎么办呢？周恩来说：“要告诉人民，这是胜利的负担，是推不开的”。包下来有什么意义、

有什么困难，都要向人民讲清楚，使人民增加克服困难的信心和勇气，共同度过难关，这是周恩来协调新旧矛盾的基本思想，即将道理向人民讲清楚和人民共同来解决不同利益之间的矛盾，人民增强了承受能力，就可以正确地面对困难。这既是一种高超的协调艺术，又是党的群众路线在协调过程中的具体体现。

领导有方决策有序——掌握决策制定的四个基本环节

1943年，周恩来在《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一文中从如何将政治总决策分解和转换为具体的分决策的角度，精辟地论述了决策制定中的几个环节问题，他指出，“必须正确地决定问题。首先，要估计环境及其变动，并找出此地此时的特点。次之，要依此与党的总任务联系起来，确定一时期的任务和方针。再次，要依此方针，规定当前适当的口号和策略。又次，然后据此定出合乎实际的计划和指示。这一切，必须经过最实际的调查研究，并使这些实际材料与党的原理原则联系起来。”

在这段论述中，周恩来把决策制定与转换过程分解为四个基本环节，并形成环环相联的制定顺序。应该说，他描述了从依据环境特点确定决策目标到最后形成可供执行的分决策的基本过程。要全面理解周恩来的这一理论，我们有必要更细致地分析一下这四个基本环节。

周恩来提出，制定决策的第一步就是研究环境的变化，并找出此地此时的特点。对于这一环节及整个过程，周恩来强调需要作最实际的调查研究，并使实际材料与党的原理原则联系起来。这实际上是一种从实际出发决定问题的思想方法，只是周恩来更细致地突出三个基本要素：（1）环境；（2）特点；（3）材料与党的原理原则相联系。因此，在确定目标的过程中，首要的工作就是抓住这三点要素。

第二个环节就是依据环境及其特点，联系政治决策，确定一个时期的决策。周恩来在这一环节中突出的是决策必须与党的总任务相联系，即行政决策的依据是政治决策。事实上，所有的政治性决策与行政性决策都必须依据于党的总任务，离开党的总任务的行政性决策是无法制定的。因此，行政性决策在一定意义上是政治决策的分解与转换，在行政政治化增强的情况下，这是中国行政决策的一个重要特征。在当时特定的条件下，周恩来突出了这一点，也是强调制定决策离不开党的总路线和总任务。

决策制定的第三个环节就是依据政治方针规定相应的行动策略。在这里，周恩来已经考虑到决策的具体执行问题，指出适当的策略是制定决策时不可缺少的一项内容，也是一个基本环节。

最后，周恩来认为在上述条件满足的情况下才可以制定出实际可行的具体分决策。可见，一项决策的制定过程必须经过分析环境特点、确定决策框架、规定执行策略、形成具体决策这四个环节，抓好了这四个基本环节，使决策制定过程建立在调查研究与联系党的原理原则的基础上，才能够做出正确的决定，形成正确的决策。

周恩来所提出的把握制定环节的理论，在当时特定的政治条件下，其要旨是启发一个领导者如何将党的总任务适时适地转化为一定时期内可供执行的决策，并要求一个领导者必须掌握决策制定过程中的基本环节。虽然这一理论的提出首先是针对政治性决策的，但是这一理论对于深入分析我国政治决策与行政决策的关系，更好地把握党的总任务与行政政治性决策的联系及其政治决策向行政决策的转换，进而抓住这些基本环节制定出有利于政治性决策执行的行政决策，具有很重要的指导作用。

军事篇

吊民伐罪众口铄金——领导两次东征战役的政治工作

《孟子·滕文公下》曰：“诛其君，吊其民，如时雨降，民大悦。”《宋书·索虏传》写道：“吊民伐罪，积后已之情。”《战国策·魏策》曰：“张仪为秦连横，说魏王曰：‘臣闻繁羽沉舟、群轻折轴、众口铄金’。”其意思为抚慰人民，讨伐有罪，可以争取老百姓的支援：争取舆论，众口一词，所发生的威力足以使金子熔化。这些古代富有哲理性的论述，朴素而又鲜明地说明一个道理：从事军事活动，伸张其正义性，用以统一军心、争取民心，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条件。这既是一项重要的政治谋略，也是一项重要的军事谋略。

大革命时期，中同共产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建立了革命统一战线。1924年5月，创立了黄埔军校。周恩来除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外，又于同年11月，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1925年2月和10月，广东革命政府为巩固革命根据地，举行了两次东征。周恩来先后作为军校政治部主任和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兼第一军政治部主任，随军出征。在激烈的军事斗争中，周恩来领导了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对推动两次东征胜利，起了重大作用。

东征作战中的政治工作，主要是按照战前确定的“对本军、对民众、对敌军”这三个方面来进行的。

第一，对本军。东征之初，面对英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支持下的陈炯明这一凶恶敌人，东征军将士虽有昂扬的斗志，但对取得胜利，并无绝对把握和信心。蒋先云曾说：“我校开办后，外界很不相信我们能真正去杀贼，未必能杀得贼死。非独外界如此，即我们自己也不敢十分过于自信。”周恩来领导政治工作机关对本军官兵进行了大量政治工作，使官兵更加明确东征是“与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军阀作战，以达民族解放之目的。”第一次东征前，周恩来在军校作了战前动员。第二次东征前，周恩来担任党代表的第一军第一师举行了誓师大会。在周恩来的组织下，东征军部队响亮地提出了“为拯救东江人民而战”、“为保护东江人民而战”的口号。作战中，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宣传鼓动工作。《杀贼歌》中唱道：“同志们前进！杀！杀！杀陈炯明，不杀不甘心！”在追悼阵亡将士大会上，周恩来亲读祭文，使官兵深受感动。经过宣传鼓动，广大官兵同仇敌忾：“卒皆忠忱雷动，不避艰难，不顾生死”。第一次东征的棉湖会战中，黄埔军校教导第一团面对号称劲旅的林虎部主力五六千人，舍生忘死，奋勇搏杀，写下了以少胜多的光辉篇章。淡水战斗中，率领教导队第一团的10名干部，有8名是中共党员。第二次东征攻打“南中国第一天险”惠州时，报名参加奋勇队者争先恐后，均以舍身成仁为光荣。

第二，对民众。主要是宣传东征的意义和革命军队与军阀军队的区别。第一次东征开始前，中共两广区委发表了《中国共产党檄告广东工农群众、保卫革命、打倒陈炯明》的文告；黄埔军校政治部印发了《告东江人民书》等传单。第二次东征时，总政治部发表了《革命军东征告各界人民书》。行军所至，“传单飘扬空际，俨如雪片之纷纷，村民牧童欢呼而拾”。仅第二次东征宣传总队就散发传单20万张，标语8万条，孙中山、廖仲恺像片10万张。周恩来在各地发表演讲，呼吁民众团结起来，协助东征军，巩固革命

成果。在东莞群众大会上，周恩来发表演说，指出：“本军系解除人民痛苦而来，增加人民幸福而来，愿大家戮力同心，共促革命成功。”东征军建立了严格的群众纪律，并作了广泛的宣传。《爱民歌》中唱道：“扎营不要懒，莫走人家取门板，莫拆民房搬砖石，莫踏青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砍柴莫砍坟上树，挑水莫挑有鱼塘……”政治部《告百粤父老兄弟姊妹》书说：“有违犯我们所宣告的行为者，请不必客气，具实向我们的官长报告，定必依法惩办。”以往东江人民横遭陈炯明等摧残，往往视兵如匪，军队一来即四散逃亡。东征军鲜明的主义和严明的军纪，使民众交口赞誉。《商报》报道说：“学生军之受人欢迎，初不在战功卓著，而其纪律亦有足令人起敬者……行军行所至，不扰民间一草一木，老妇孺，喜而挤观。鸡犬不惊，商市安堵。入夜无公家空房，则扎蓬营露宿，东江人民父老，谓民国以来，仅此次所见，乃是真正革命军，真正卫国保民之革命军。”这样，广大民众，就积极起来支援东征军作战。彭湃在《革命政府应如何对待东江问题》一书记述说，革命军一来，农民群众即“或为党军内应，或作外援，如当冲锋队、充夫役、向导、侦探、及截击逆军等等。无不踊跃去做。”而陈炯明军队一到，则不是逃之一空，便是井中投毒、粥中放桐油，甚而揭竿执锄，歼灭敌人。

第三，对敌军。主要是声张正义，揭露邪恶，宣传俘虏政策。黄埔军校政治部和东征军总政治部均印制了对敌宣传品，广为散发，还由航空队进行了空投。据东征军《本部东征日记》记载：“由前线解来的俘虏数十名，优待异常，故乐不思返。”《惠州战役日记》载：“闻石龙商团颇具有反革命气质，经总政治部数日宣传之力，一变而为本党信徒。”

两次东征的胜利，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也显示了政治工作的巨大威力。《政治周报》1926年3月刊登的《东征纪略》中说：“革命军与别的军队的最大不同点，就是他军队内面的政治宣传，这是革命军打胜仗的根本原因。这种政治宣传工作在平时要紧，在战时更发要紧。在战时要使人民与军队合作以协力对付敌人，全靠这种工作做得好。此次东征，组织了伟大的政治宣传队，设立东征军总政治部为之统率，以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为总政治部主任。”

吊民伐罪，众口铄金，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是被普遍重视和运用的军事谋略。事实证明，在军事斗争中，忽视精神力量、舆论力量，便难以取得成功。周恩来在1925年领导两次东征战役的政治工作，熟练地运用了吊民伐罪、众口铄金的军事谋略。

对于周恩来领导的黄埔军校和东征军政治工作，毛泽东曾给以高度的评价：

“那时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组织新制度的军队，在开始时候不过两个团，便已团结了许多军队在它的周围，取得第一次战胜陈炯明的胜利。往后扩大成为一个军，影响了更多的军队，于是才有北伐之役。那时军队有一种新气象，官兵之间和军民之间大体上是团结的，奋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充满了军队。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在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

势险节短相机而发——掌握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时机

《孙子兵法·势篇》：“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势如弩，节如发机。”势险节短的要领是，战前精心准备，时机一旦成熟，即以迅猛的动作、凌厉的动作发起进攻，一举达成战役、战斗企图。周恩来在1927年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中，成功地运用了这一谋略。

1927年春，北伐战争迅猛发展。为配合北伐进军，上海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了反对北洋军阀的武装起义。第一、二次起义，在军阀孙传芳的镇压下失败了。1927年3月，中共决定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由周恩来任特别军委书记、武装起义总指挥。

这时，北伐军已控制了浙、赣两省和安徽大部分地区，前锋从南、西两面直逼苏南。直系军阀孙传芳因遭惨败，将军队撤离上海，而奉系军阀张作霖又派鲁军毕庶澄部进驻。毕部有3000人左右，加上当地2000警察，共5000人左右，战斗力不强。上海总工会的会员有28万9千多人，工人纠察队有3000人，自卫团有100人。这些都是进行武装起义的有利条件。另一方面，北伐军中，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已经开始了明目张胆的反共活动，对工人武装起义不仅不会积极呼应，还会予以破坏；已经组织起来的工人武装人数不多，训练不够，武器装备也十分缺乏。这些是起义的不利条件。

周恩来总结前次起义的经验教训，认为主要问题有两条：一、没有准备；二、领导人在事变中缺乏果断。在组织第三次武装起义时，他对这两点给予了极度的关注。

关于准备工作，主要是组织队伍，筹集武器和制定计划。工人纠察队扩大到5000，自卫团扩大到500，同时组织特别队。工人武装按区组织成大队、中队，每天夜里进行训练。周恩来经常到各纠察队去指导训练，并亲自教工人练习射击。为了培养起义骨干，指挥部举办了军事训练班，由具有军事经验的中共党员作教员，讲授枪械使用方法，《暴动须知》和巷战战术，并进行战术运动射击刺杀等军事训练。经过训练1800名纠察队员学会了使用武器。周恩来还积极组织筹集武器弹药。他们在租界购买了250支手枪，并用染料制造炸弹。周恩来还化装参加了弹药的运送。当时，上海一些军阀和资本家为了保护自身安全而组织了保卫团，周恩来指示工人骨干参加进去，以掌握武器，分化敌人。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全市和各区都制定了书面作战计划，对进攻目标、力量、方法、时间等作了详尽的规定。

关于时机掌握，即要与北伐军的军事进展相配合，又要独立行动，不能失去时机。陈独秀的主张是，两个条件具备方可行动。一是上海没有驻兵；二是北伐军到松江后仍继续前进，或者等它到上海南郊的龙华。周恩来不同意。其主张为：“假使松江下，必可动，因毕决不致再守上海。苏州下，也必可动，因他也不能枯守上海，同时他的兵队必有一部分溃散。”会议接受了周恩来的主张，确定：“一、松江下。二、苏州下。三、麦根路与北站兵向苏州退。三条件有一个就决定发动。”

3月18日，北伐军到达松江，与军阀部队激战。3月19日，上海区委主席团召开紧急会议，周恩来估计说：“毕有败退可能”。他提出：“我意今天都准备好，如果十二点以前，有毕军溃退消息，即一面下令罢工，一面今晚动作。”当天，下达了预备动员令并颁布了行动大纲。第二天，北伐军攻克松江，前锋推进到上海龙华。上海已有28万工人罢工。

3月21日，中共最后作出武装起义的决定。12时，全市各大工厂汽笛长鸣，80万工人举行总同盟罢工。下午1时，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爆发。

制鸿去翼竭泽而渔——指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

上海，是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城市，不仅面积大、人口多，街道建筑复杂，而且有着被称为“国中之国”的帝国主义列强的租界。在这样的城市中举行武装暴动，必须有正确的军事指导，以求减少伤亡，较快取得胜利。周恩来在领导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中，运用了制鸿去翼、竭泽而渔的谋略思想，实行分区进攻，先易后难的办法，逐次攻克敌军据点，最后集中兵力，对固守之敌展开武力上和宣传上的强大攻势，使其土崩瓦解，归于全面失败。

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爆发后，起义军分南市、闸北、虹口、浦东、沪西、沪东、吴淞七个区开始行动。当时军阀毕庶澄所部为了便于逃跑，将其主力集中于火车站所在的闸北地区。工人纠察队依总指挥部部署，首先实行分区进攻。当天下午4时，除闸北以外其他各区相继告捷。起义中缴获了大批武器，徒手的工纠队员武装起来。随后，周恩来命令各区工人纠察队向闸北增援。

闸北敌军主要猬集于东方图书馆、北火车站等据点。这些地方工事坚固，敌兵力、火力都很强。在东方图书馆，敌凭借四层的钢筋水泥建筑和两挺轻机枪的火力扼守。在北火车站，敌设有重机枪阵地，其白俄雇佣军拥有装甲火车，还配备了迫击炮。此外，附近的外国租界当局，也设立了重机枪阵地。工人纠察队展开进攻则伤亡较大。

战斗进行中，吴淞区委送来报告：这天清晨，有500余名敌军，携带机枪，乘火车开往吴淞，准备从海上逃跑，因吴淞已被工人纠察队占领，又掉转头返回上海。现军车正向北站驶来。周恩来分析了战局，认为，决不能让这列火车进入上海，否则就会冲破工人纠察队的防线，并增强敌人在北站的力量。应将敌军分割包围，各个歼灭。他决定：对乘车返沪之敌，在市郊天通庵火车站附近组织伏击，务期就地全歼；对东方图书馆之敌“围而不打”，待其援无望而停止抵抗；对北站之敌，步步为营，渐次压缩，以一网打尽。

决定作出后，周恩来亲自率领工人纠察队来到天通庵，勘察地形，修筑工事，部署兵力，并将路轨道钉拔除。黄昏时分，敌列车进入伙击圈。由于道钉被拔，列车倾覆，埋伏于铁路两侧的工人纠察队员立即发起进攻。敌人毫无准备，又车门关闭反锁，只能在窗口抵抗。入夜，又有一部分学生纠察队投入战斗。敌人军心涣散，于次日缴械投降。纠察队又得到新的补充。

在东方图书馆，纠察队紧围敌军，并对露头敌军实行火力压制。天通庵战斗结束后，起义指挥部用广播喊话，通知对方天通庵战况，劝告对方立即投降，否则即实行炸药爆破。敌军挥舞白巾乞降，武装工人并未马上理解其中含义，还继续进攻，又有6人牺牲。这时周恩来赶到，命令停止战斗，接受对方投降。这样，攻占了东方图书馆，起义总指挥部也随之迁入。

此时，敌人在上海只剩下最后一个据点——北火车站。按照周恩来的部署，纠察队在机枪掩护下，在敌人前沿修起了三道防御工事，逐步接近敌人。黄昏后，敌重机枪及白俄迫击炮射击，引起居民区着火。在现场的周恩来一面组织工人救火，转移居民；一面调整火力配备，以防止敌军反扑。果然，敌人借助火势，向纠察队发起进攻，纠察队被迫后撤。这时，周恩来亲自指挥纠察队实行反冲击，将敌打回北站。

在最后的围歼战中，周恩来与工人们一起冒着炮火加固工事，并开展战场除奸活动，就地处决一些在前线造谣生事的工贼和敌探，鼓舞了士气。当

时，北伐军东路军已抵达市郊新龙华。上海市总工会派员前往慰问，希望北伐军速进上海，与工人纠察队一道解决战斗，会师北火车站。国民党右派分子则称，北伐军不支持上海工人纠察队，让毕庶澄消灭了纠察队再进上海。慰问团向周恩来汇报后，周恩来说：“我们上海工人纠察队是有骨气的，我们完全有力量拿下北站！”周恩来在前线召集军事会议，决定集中兵力、火力向北站进攻。

22日下午5时，传来消息说，敌首毕庶澄见大势已去，已化装逃入租界；敌军及白俄雇佣军已近土崩瓦解。周恩来向工人纠察队员发表动员讲话，指出，全市各区敌人已基本被我们消灭，现在这里剩下的最后两千敌军已经成为网中之鱼，逃不掉了！他们坐火车也不行，因为火车头早开走了；若想从吴淞口出去也不行，因为天通庵的敌人被我们解决了。他向全体纠察队员下达了总攻的命令。纠察队员士气高涨，立刻向北站发动总攻。6时，北站大厦上升起了革命的旗帜，工人们举着形形色色的武器，兴奋地欢呼胜利。

制鸿去翼，竭泽而渔，就是说，要达到目的，就要创造达到目的的条件。《东周列国志》第七十二回称“夫鸿鹄所以不可制者，以羽翼在也。欲制鸿鹄，必先取其羽翼。”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开始时，工人纠察队有5000队员，150杆破旧枪枝和3枚炸弹。而面对的敌人，则是固守各军事据点，装备精良的5000反动军警。依当时双方军事实力，如首先集中进攻敌重兵防守坚固据点，必会造成久攻不克、损失惨重的局面。周恩来等审时度势，指挥纠察队对敌实行分区进攻，先易后难，各个击破，不断夺取敌人武器武装自己，不断用新的军事进展对敌展开心理攻势，使敌之首要四面楚歌，步步孤立，犹如鸿之被去羽翼，鱼之被竭池泽，最后丧失抵抗能力。仅经过30余小时的激战，敌全军覆灭。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是中国革命史上的辉煌篇章，也是世界工人阶级武装起义史上有数的成功范例，其军事指挥艺术十分值得珍视。

射人射马擒贼擒王——“四·一二”政变后提出东征讨蒋的建议

杜甫诗云：“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出塞曲·前出塞》）。《三十六计》把“擒贼擒王”作为第十八计，其解语曰：“摧其坚，夺其魁，以解其体。龙战于野，其道穷也。”在军事活动中，敌对方，有主要部分，有次要部分；而主要部分中，有首要分子，有协从势力。高明的军事家，要在纷纭多变的情况下，正确判断和打击主要敌人，从而游刃有余地把握在战略上的主动和优势。周恩来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向中共中央和武汉革命政府提出的迅即出兵东征讨蒋的建议，充分体现了这一谋略。

1926年开始的北伐战争，其军事锋芒首先指向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等北洋军阀。但当革命胜利推进到长江流域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集团，在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阶级的支持下，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东南各省陷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4月15日，蒋介石在革命人民的血泊中，建立了所谓“南京政府”这一反动政权。

当时，周恩来正担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四·一二”政变爆发时，他作为上海工人纠察队总指挥，率领群众同国民党反动军队进行了英勇斗争。时局的变化，使他敏锐地认识到，所有这一切，“纯由蒋氏直接指挥”，蒋介石已经成为帝国主义和买办地主阶级的忠实走狗，成为革命的凶恶敌人。

当时，在北方还存在着张作霖军阀集团，他们已经出兵向武汉进攻。而在东南，蒋介石集团又以武力与武汉政府相对立，并与四川、广东军阀相呼应，从东、南、西三方面对武汉实行包围。应继续北伐，还是应首先东征？这是摆在武汉政府面前亟待回答的问题。周恩来认为，蒋介石政变后，已经成为反动营垒中的首要的人物，其军事力量对革命已构成最重要的威胁，应乘其在东南羽翼未丰，迅即出兵讨平，再继续北伐。

4月15日，周恩来在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上，力主武汉方面武力讨蒋，并断言：“五万精兵一月即可削平”。对于武汉方面犹豫不决，周恩来十分不满。4月16日，在中共特别委员会会议上，周恩来气愤地说：军事上，武汉方面对于老蒋无积极对付的方策，而主张先北伐，并怕老蒋军事力量太大，完全自己站于弱点，是很不好的。照我们观察，对于老蒋军队并不无法，且应先解决老蒋然后可以北伐。现在我们应打一电报给武汉提出抗议，要求赶快决定打东南的方策。

此后，周恩来又起草致中共中央的电报，与赵世炎等联名发出，要求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其中指出：“蒋氏之叛迹如此，苟再犹豫，图谋和缓或预备长期，则蒋之东南政权将益固，与帝国主义关系将益深。”如此，即使武汉北伐，能直捣京津，而蒋之政权已固，继蒋而起者亦将大有人在，日帝国主义在北方亦未尝不可与国民政府成直接冲突。在这种情况下，武汉政府应下决心讨蒋，迅速出师，直指南京。

周恩来还以其军事家的战略眼光，冷静分析了双方军事态势。认为，攻占南京，有相当把握。“在安庆有三军二师与芜湖七军隔江相持，二、六军之一部闻已退至安徽，可任侧面攻击。七军不过万人。陈调元仅四团，且在前敌不易调回。芜湖如下南京必震动，蒋能直接使用之军队仅五个师，但一师、二十一师薛、严走后，战斗力已失泰半，现改驻镇江、苏州；二师久败

之师，现驻昆山；在南京者仅为三师，十四师，如何能抗东下之兵？四十军已一半渡江，余者未必尽为蒋助。十七军为蒋牺牲于扬州，隕大。二十六军、十四军都有反蒋愿望。南京一失，苏、沪可不战自定。”

由此，周恩来得出结论说，“为全局计，政治不宜再缓和妥协。上海于暴动后，已铸此大错，再前进，则彼进我退，我方亦将为所动摇，政权领导尽将归之右派，是不仅使左派灰心，整个革命必根本失败无疑。”周恩来强调，对“东南军事工作，必须有计划、有名义；有负责人、有密函，方能使左派军官相信中央政府”，以击退反动派的进攻。

周恩来提出的这一建议，指出了当时武汉政府所应确立的主要进攻方向和打击目标，体现了擒贼擒王的军事谋略，是挽救时局的重要主张。但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错误的领导者却拒绝了这一建议。武汉政府决定继续北伐。后来又发生了汪精卫“七·一五”反革命政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归于失败。

操刀必割执斧必伐——发动“八·一”南昌起义

《六韬·文韬·守土第七》写道：“太公曰：……日中必彗，操刀必割，执斧必伐。日中不彗，是谓失时；操刀不割，失利之期，执斧不伐，贼人将来。”时机是军事活动的命脉。抓住时机，果断决策，方能把握军事斗争的主动权；犹豫不决，当断不断，不仅会坐失良机，还会暴露意图，以至受制于人，功败垂成，而怀终天之恨。操刀必割，执斧必伐，是鲜血凝成的古训。隋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李渊亲率甲士三万进攻长安。中途遇强兵阻击，时大雨如注，粮草匮乏，道路崎岖，无法继续前进。李渊一筹莫展，反复犹豫后，准备退兵。李世民劝阻道：现正值秋收，遍地为粮；敌方外和内争，有隙可取。我师兴义救民，应先入长安，号今天下。今遇小敌，尚未交战，匆匆撤兵，全军失望，退守亦难自保，还盼三思。李渊不听。李世民遂在帐外嚎陶痛哭。李渊召问何故，李世民答曰：“今举义兵，进则得民心必胜，退则失民心必散；我散于前，敌攻于后，全军覆没，岂能不悲乎？”李渊说：“然则依尔所言。”不久天晴，粮草又到，全军奋勇克敌，大获全胜，渡黄河面入关中，占领长安，奠定了唐朝的基础。

周恩来在其军事生涯中，十分注重运用操刀必割的谋略，在一些重大的历史关头，审时度势，断然决策，表现了英勇无畏的革命精神和雷厉风行的军事素养，因而创造了令人瞩目的业绩。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为了挽救革命，决定发动武装起义，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临时中央常委会于7月中旬作出决定，在江西南昌组织部分党掌握和影响的北伐军实行武装起义。根据中央决定，组成了由周恩来为书记，有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等参加的起义前敌委员会。周恩来赶赴南昌，迅即开始了准备工作。参加起义的部队有：贺龙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叶挺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师、朱德原领导的第三军官教育团等共计3万余人。当时，驻守在南昌的敌人，共有6个团又2个营，兵力1万余人。这是难得的起义有利时机。前委决定，起义于7月30日晚发动。

就在这关键时刻，中央代表张国焘于7月29日发来密电称：暴动宜慎重，并要求无论如何要等他到方能决定。30日晨，张国焘赶到南昌，前委举行了紧急会议。张国焘提出，起义如果有成功的把握，可以举行，否则不可动；应该征得国民革命军第四方面军总司令张发奎的同意，否则不可动。准备工作亦已基本就绪，张国焘这一主张立即遭到周恩来等前委成员的反对。李立三说：“什么都讨论好了，哈哈！哪里现在还讨论。”其他委员也说：暴动断不能迁移，更不可停止，张发奎已受汪精卫的包围，决不会同意我们的计划。更重要的是我党应站在领导的地位，不能依赖张发奎。张国焘称，这是共产国际代表的意见，必须尊重。周恩来十分生气，把桌子一拍说：“国际代表及中央给我的任务是叫我来主持这个运动，现在给你的命令又如此，我不能负责了，我即刻回汉口去吧！”会后，有人主张把张国焘绑起来。周恩来制止说，张是党中央的代表，怎么能绑呢？

前委正在就起义问题争论时，同盟党反共活动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汪精卫、孙科、张发奎、朱培德等在江西庐山召开会议，议决：严令在南昌北伐军贺龙、叶挺部限期撤回九江；第二方面军实行清共。

31日晨，前委继续开会。张国焘又提出新的问题，他主张，如果发动起

义只能作为“兵变”，不要发表宣言和政治纲领，以免引起注意。起义后偃旗息鼓，退回广东。周恩来反驳说，这是我党独立领导的武装斗争，怎么是“兵变”？起义后，我们要与国民党左派共同组成革命委员会，不发宣言和纲领怎么行？张国焘说，修改宣言需要时间，起义只能再等一等。周恩来斩钉截铁地说：“宣言由我来改！”张国焘无奈，只得服从前委多数的决定。起义确定在次日凌晨4点。

当晚，各项准备就绪。忽然，有人报告，第20军一名营副向敌人告密。当此千钧一发之际，周恩来断然决定，起义提前两小时发动。8月11日凌晨两点，枪声骤起，南昌起义终于爆发了！起义军以精确的战术动作，控制要点，解决顽敌，经过4个多小时激战，歼敌3000余人，胜利占领了南昌城。前委以宋庆龄等名义发布了由周恩来改定的《中央委员宣言》，指出：“武汉——南京所谓党部政府，皆已成为新军阀之工具，曲解三民主义，毁弃三大政策，为总理之罪人，国民革命之罪人”。号召一切革命者团结一致，“继续为反帝国主义与实行解决土地问题而奋斗”。

南昌起义是中国现代军事史上的伟大事件。它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在全国人民面前树立了鲜明的武装斗争的旗帜，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新时期。周恩来出色地领导了这次起义，其军事思想与业绩，在中国军事理论宝库中闪耀着夺目的光辉。

以石投卵避实击虚——指挥第四次反“围剿”

《孙子兵法》云：“兵之所加，加以石投卵者，虚实是也。”“反之形，避实而击虚”。《晋书·温峤传》曰：“今之进讨，若以石投卵耳。”《淮南子·要略训》称：“避实就虚，若驱群羊。”虚实是中国古代兵法上一对对立统一的范畴。以虚击实，犹若以卵投石，必败；以实击虚，犹若以石投卵，必胜。劣势之军，要战胜优势之敌，就要以客观条件为基础，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避实击虚。若此，方能如庖丁解牛，游刃有余，稳操胜券。

1933年二三月间，蒋介石调集四五十万兵力，分三路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其左右两路军负责“清剿”和防堵，中路军十余万人在总指挥陈诚率领下直入中央苏区，试图寻红军主力决战。

此时，中共党内“左”倾错误的领导者，通过宁都会议，取消了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为了进一步贯彻其军事冒险主义的错误方针，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要求红一方面军强攻敌人重兵防守的南丰城，以先发制人的作战行动，粉碎敌人的“围剿”。

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周恩来和总司令朱德等认为，进攻南丰是以己之所短，攻敌之所长，因而一再电请更改作战方针。1月27日，周恩来致电中央和苏区中央局指出：“本来依现时敌情，即抚河流域敌之两个较强的‘进剿’军还未组织完全以前，我军能在抚河东岸会合十一军求得运动战消灭敌人主力，确比围攻南丰暴露我军企图去打敌增援队为好”。1月30日，周恩来在致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电报进一步指出：“连续的残酷的战斗转眼就到。我如立即转到抚河西，只有攻城才能调动敌人。攻城除前电所述，一暴露全力，二易受夹击之不利外，还有三损伤大，四不能筹款，五耗费时日的不利。因此在敌人部署完毕前，如能在抚河东岸连续求得运动战解决敌人，我都不主张立即过河攻城。”他说：“我终觉消灭敌人尤其主力，是取得坚城的先决条件，敌人被消灭，城虽坚，亦无从围我，我可大踏步地直入坚城之背后，否则徒损主力，攻坚不下正中敌人目前要求。”

但中央局无视战场实际情况，强令红一方面军执行其任务，并称：“此新计划经中央局全体通过，请立即讨论并电告执行的具体部署。”不得已，周恩来只能向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提出攻击南丰的军事部署，但声明：“上述部署不是呆板的，敌情地形有变尚须活用。”如强袭不成，“便须转移地区，攻宜黄、乐安调功敌人，于山地运动战中解决。”

2月12日，红军开始围攻南丰城，彻夜激战，未能得手。陈诚闻讯后，立即命令南丰据城坚守，以中路军三个纵队提前向指定地区集结，企图围歼红军主力于南丰城下。

在此险恶局势之下，周恩来等当机立断，迅速改变原有军事部署。2月13日，周恩来致电苏区中央局：“改强袭南丰为佯攻，决心先消灭增援队。现部正在南丰西部一带集结，今明两日弄清敌军行进路线后，当求得预期遭遇的运动战中消灭敌之一翼，以各个消灭之。”他们以少量部队继续佯攻南丰，并以一部兵力伪装主力，向东面黎川方向转移，而将主力四五万人秘密至南丰两南的东韶等地，隐蔽集结，待机歼敌。

敌军被红军佯动部队吸引，以第2、3两纵队跟踪追击，以第1纵队两个师堵截红军归路，袭击红军后方。鉴于敌第1纵队两个师态势孤立，侧翼暴露，周恩来等即令主力在其所必经，且又山高林密的黄陂一带设伏。红军又

故丢“密信”，其中说：我军主力正围攻南丰，惟白军若向黄陂前进，对我有极大危险。故应由地方武装竭力抵抗，滞敌行动。敌军信以为真，冒雨推进，终于落入主力红军伏击圈中。27日，红军发起攻击，激战两日，全歼该敌，取得重大胜利。随后，又秘密撤离战场，使敌在半个多月内失去进攻目标。

陈诚在遭红军痛击后，命主力掉头西援，周恩来等又命红军一部向广昌开进，以调动敌人。陈诚为避免再被各个击破，变“分进合击”为“一路”进剿，中间突破。他把第1、2纵队近10万人编为前后两个梯队，交替掩护，向广昌方向搜索前进。周恩来等命佯动红军在广昌方向积极引诱敌前梯队加速前进，使之与后梯队拉开距离；而以主力秘密向草台冈一带地区集结。3月20日，敌前后梯队已相距百里，周恩来等下达作战命令，“采取迅雷手段，干脆消灭草台冈、徐庄附近之十一师，再突击东陂、五里排之敌。”敌第11师是陈诚赖以起家的基本部队，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是蒋介石嫡系部队的佼佼者。但红军主力几倍于敌，且草台冈一带为盆形谷地，山峦起伏，敌空中难以支援，重武器威力难以发挥。21日拂晓，红军突然发起猛攻，至午后1时，将敌第11师基本歼灭。敌其余各部闻风丧胆，竞相后撤，第四次“围剿”终被粉碎。

在第四次反“围剿”战役中，周恩来等成功地运用了以石投卵，避实击虚的谋略，创造了大兵团伏击歼灭战的宝贵经验。他根据战场实际，灵活变换战法，避敌锋芒，寻敌弱点，以佯攻迷惑、调动敌人，造成敌人失误；而将大兵团秘密集结于有利地区，出其不意歼敌一部，使敌既无招架之功，更无还手之力。毛泽东曾经评价说：“第四次反‘围剿’时攻南丰不克，毅然采取了退却步骤，终于转到敌之左翼，集中东韶地区，开始了宜黄南部的大胜利。”蒋介石在写给陈诚的“手谕”中哀叹“此次挫败，凄惨异常，实为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因失败而被撤职留任的陈诚也痛苦地说“诚虽不敏，独生为羞。”国民党的战史在总结这次失败的教训时，曾直言不讳地说，红军善用机动原则，避实击虚，以大吃小等战法增强其作战能力，造成局部胜利，使国军此次围剿，仍蹈第一、二、三次围剿之覆辙。

以静制动瓮中捉鳖——参加指挥直罗镇战役

毛泽东曾高度评价 1935 年 11 月的直罗镇战役，他说：“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着陕甘宁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这次战役，是毛泽东、周恩来和彭德怀等直接指挥的，周恩来曾亲上前线，对取得战役的全胜起了重要作用。

1935 年 10 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与红十五军团相会合。中央决定，组成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红十五军编入红一方面军序列，全军共 1 万余人。

这时，国民党军正向陕甘宁边区进行第三次“围剿”。红军的会合，使他们感到十分恐慌。敌“西北剿总”决定，以 5 个师的兵力，构成沿葫芦河的东西封锁线和沿洛水的南北封锁线，然后实行南进北堵，以消灭红军。10 月底，西线国民党东北军第 57 军 4 个师经太白镇沿葫芦河东进，东面敌第 67 军 1 个师已到达鹿县。而直罗镇就在两者之间的葫芦河畔。

据此，红一方面军决心，首先集中兵力歼灭沿河东进的敌一两个师，尔后视情况转移兵力，各个歼敌，打破敌人“围剿”。红军以一部在直罗镇以东实施攻击行动，以吸引敌军东进，主力待机歼敌。

果然，敌 57 军 3 个师自太白镇东出，其军部及第 106、111 师到达张家湾地区时，而先头部队第 109 师，已由师长牛元峰率领，在 6 架飞机掩护下，已经进抵直罗镇。

直罗镇处于群山环抱之中，是一条狭长的谷地，人口不到百户。红一方面军以 10 个团以上的兵力，于 1 月 20 日夜将敌 109 师 3 个团包围，并于次日拂晓发起攻击。敌军从睡梦中惊醒，仓卒应战。不到两小时，红军就占领了该镇，牛元峰率 1 个多营逃到镇东头的一个小寨里顽抗。

这时，直罗镇西面敌第 57 军 2 个师，东面第 67 军 1 个师已逼近直罗镇。而牛元峰固守的土寨地势复杂，宜守难攻。周恩来到达前线，观察了战场情况，然后说：敌人已经成了瓮中之鳖，不好攻暂且围着算了。寨子里既没有粮，又没有水，他们总是要逃跑的，争取在运动中消灭他。

红军以一部围困直罗镇土寨之敌，一部阻击东面援敌，而以主力迎击西面援敌。在红军的猛烈攻击下，敌 106、111 师支持不住，遂置 109 师残部于不顾，掉头西撤。红军跟踪追击，在张家湾地区歼敌 1 个团。东面援敌见势不妙，也退回鹿县。这时大雪纷飞，被围 3 天的牛元峰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完全绝望，于 23 日午夜突围逃跑。红军猛追 20 余里，终于全歼该敌，牛元峰被击毙。

直罗镇战役，共歼敌 1 个师又 1 个团，俘敌 3400 余人，缴枪 3500 余支，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甘地区的第三次“围剿”，使根据地出现了一个比较稳定的局面。

《三十六计》称，兵书论势，其旨在“以简驭繁，以不变应变，以不动应动，以小动应大动，以枢应环也。”俗语曰：“关起门来打狗，堵住笼子捉鸡”，当将敌人围困，而又能断绝敌军增援之望时，实行以逸待劳，静观其变，有较大可能歼敌于运动之中，以少量的代价，获得较大的胜利。

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西安事变前后建立“三位一体”的联合战线

《左传·僖公五年》记载：“晋侯复假道于虞以伐虢。宫之奇谏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从之……谚所谓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者，其虞虢之谓也。”辅者，古车两边之横木也，无辅即不成其车，犹唇亡则齿寒是也。在军事斗争中，树立整体观念，正确处理本军与友军相互辅助、相互依托的关系，是战胜敌人的重要条件。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中共中央科学分析了形势，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并派周恩来为代表到西安参加谈判。

张、杨发动西安事变，是由于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不满，并受到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影响，断然采取的行动。同时，他们之所以敢于这样做，重要原因之一，是在此之前，他们所领导的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已经与红军建立了“三位一体”的军事联合战线。1936年4月周恩来在肤施（延安）与张学良直接会晤，随后，中共中央先后派刘鼎、叶剑英为正式代表驻东北军，负责红军与东北军的联络。在与杨虎城部沟通联系后，红军也在该部派驻了正式代表。1936年5、6月，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共同举办王曲军官训练团，张、杨分任正副团长，红军代表帮助工作，巩固了三方的团结。10月，毛泽东、周恩来等40余名红军将领致信国民党在西北的将领，提出，“红军誓与你们合作到底”。至此，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和红军“三位一体”的合作关系正式确立起来。

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方面立即做出了强烈反应。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操纵国民党中常会、中央政治会议和南京政府，通过了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的决议，发布了对西安的讨伐令，并任命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实行讨伐。何应钦调动十几个师的兵力，任命刘峙、顾祝同分别为东、西两路集团军总司令，举行所谓“白衣誓师”仪式，气势汹汹地向西安进逼。他们还把全国空军主力集中于洛阳，轰炸渭南、三原等地，并扬言要炸平两安。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在西安一方面与张、杨一起与蒋介石及其他代表谈判，严正要求国民党停止进攻；一方面根据谈判情况，向中共中央建议，调动红军，采取必要的军事步骤，援助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在与张学良会谈时，双方商定，东北军、第十七路军集中于西安潼关一线，红军南下肤施、庆阳一带接防，红军加入东北军、第十七路军成立的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12月21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希望红军主力十天内集中长武、分县一线，再十天集中咸阳、兴平一线。并建议中央发政治训令，宣布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及其指挥下的民团为抗日同盟军，以友军相待。为保证红军南下，周恩来派员到泾阳县云阳镇、耀县建立办事处，并建立由西安、三原、耀县、洛川、肤施通向陕北的运输线。根据中央命令，红军主力在彭德怀、任弼时率领下，经环县取捷径南下，巩固了三位一体的联合防御体系，成为西北三方与蒋介石进行政治谈判的强有力的后盾。

经过针锋相对的谈判斗争，蒋介石被迫在口头上接受了中共与张、杨提出的六项条件，西安事变获得和平解决。

但是蒋介石被放后，又在南京扣留了张学良，并实行“军法审判”。他还将杨虎城等撤职留任，派顾祝同为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调集37个师的兵力分五路向西安推进，其中进入潼关、直逼西安的就达12个师。战云再

度笼罩西安。

面对蒋介石的进攻，中共和西安方面进行了回击。东北军、十七路军联合举行元旦大检阅，杨虎城发表演说，反对南京政府的压迫。经周恩来与杨虎城等协商，由杨虎城领衔，东北军、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参加，于1月5日发出通电，谴责中央军挑动新的内战。电文指出：“若不问土地主权丧失几何，西北军之真意如何，全国舆论之向背如何，而唯知以同胞血汗金钱购得之武器，施于对内，自相残杀，则虎城等欲求对内和平而不得，欲求对外抗战而不能，亦唯有起而周旋，至死无悔。”

经中共中央批准，周恩来电调一部分红军主力向关中开进。1月初，红1军团到达耀县、三原，红15军团到达咸阳，红27军到达洛川。周恩来亲往洛川视察，说明西安事变和保持“三位一体”重要意义。红军开入关中，在各方面都引起巨大的兴奋和震动。这时，中共的基本方针，仍然是争取和平解决，逼迫蒋介石实行其诺言，巩固西安事变的成果。在写给蒋介石的信中，周恩来指出：中央军竟重复开进陕境，对张学良实行扣留，致群情愤激不可终日。“只要中央军不向此间部队进攻，红军决不参加内战。”若“不顾大局，挑起内战”，“不仅西北糜烂，全国亦将波及无疑，而垂成之统一局面又复归于破碎。”在致张学良的信中，周恩来也说：“只要中央军不向此间部队进攻，红军决不参加作战。若进入潼关之中央军必欲逼此间军队，为自卫而战，则红军义难坐视。”

由于西安方面“三位一体”的坚固，加上国内外舆论普遍反对内战，蒋介石不敢轻易发动大规模内战。于是派遣代表前往西安，商讨和平解决的办法。蒋介石提出甲、乙两案。甲案：东北军移驻甘肃和陕西分州以西的西兰路上；十七路军移驻泾、渭河以北地区；红军仍返陕北；中央军进驻西安，沿陇海路潼关至咸阳段驻十二个团；陕西省政府主席可委十七路军方面的人充任。乙案：东北军移驻安徽和淮河流域；十七路军移驻甘肃；红军仍返陕北；中央军进驻西安和关中地区；安徽省政府主席可委东北军方面的人充任，甘肃省主席可委十七路军方面的人充任。蒋介石之所以提出两个方案，其主要目的是要分化红军、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的“三位一体”。如接受甲案，则三方面仍可靠在一起，接受乙案，东北军可移住较富庶的地区，“三位一体”自然瓦解。蒋介石致信杨虎城，劝他接受甲案；而何应钦又致信东北军将领王以哲等劝他们接受乙案。

这时，在“三位一体”内部发生了明显分歧。东北军因张学良被扣南京，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杨虎城因受张学良委托指挥东北军，但因其实力不够，实际上难以发挥作用。在东北军内部，形成了以王以哲等为代表的元老派和以孙铭久等为代表的少壮派。十七路军主张接受甲案；东北军元老派军官虽公开表示接受甲案，但暗中却想接受乙案；东北军少壮派军官主张首先逼迫蒋介石放张学良回来，其余一概不问。为维护“三位一体”，周恩来建议杨虎城基本接受甲案，要求中央军全部退出甘肃，在两安保留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各一部，东北军进至咸阳。军事上三单位靠拢，政治上利用国民党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来解决。这一建议在东北军、十七路军高级将领会议上获得通过。经与南京方面在潼关会商，决定采取甲案。

然而，东北军少壮派军官坚持主战，在东北军、十七路军主战派的影响下，杨虎城主和决心一度动摇。他对蒋介石的报复深怀顾虑，要求中共也为他“打算打算”。面对这种情况，周恩来表示：“我们一定对得起朋友，我

们绝不做出对不起朋友的事。”周恩来出席了红军司令部会议，会议认为：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是我们的朋友。只要东北军、十七路军两方面一致，红军可以暂保留自己的意见而支持他们的主张，跟他们一起打。周恩来回西安后把这一意见告诉了杨虎城和少壮派。叶剑英参谋长还与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参谋人员具体研究了军事部署和作战计划。

后来，东北军高级将领仍然主和。经东北军、十七路军和中共代表三方最高级军事会议商定，仍取和平解决办法。这一方针得到了周恩来的称赞。这时，少壮派军官发动了“二·二”事件，枪杀了主和的王以哲。这一行动，严重破坏了东北军内部团结及“三位一体”的巩固，削弱了西安方面同南京谈判和营救张学良的实力和地位。东北军人心涣散，决定接受乙案，全军东开；十七路军也撤离西安，国民党中央军开入。

“三位一体”虽然最终解体了，但它存在期间，促进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了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此外，东北军、十七路军所部，在这一过程中，也受到中共和红军的深刻影响。抗日战争中许多部队英勇作战，吕正操等部还改编为八路军。解放战争中，孔从周等部起义，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疾矢突发出奇制胜——组织、指导平型关战斗

1937年9月24日，毛泽东接到周恩来从山西抗日前线发来的密电：日军正向我进攻。八路军主力在灵、广以南待机，宋时轮支队出东北游击，王震旅开阜平，贺龙率第120师师部及张宗逊旅开晋西北，驰援雁门关。

这是一份关于平型关作战准备的重要电报。电报中所说灵、广指山西北部的灵丘和广灵。灵、广以南，即平型关所在方位。

抗战初期，对于日军的猖狂进犯，国民党军虽进行了一定抵抗，但由于实行片面抗战路线和单纯防御方针，连遭挫败，出现了兵败如山倒的严重局面。日军在占领平绥线一些重要城镇后，在山西骄横推进，如入无人之境。这时，八路军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代表也来到山西，与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洽谈国共合作抗日问题。

在与阎锡山交涉过程中，周恩来反复强调，在对敌正面抗击的同时，要运用侧击、伏击的办法来消灭敌人，同时，还要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为了挽救晋北局势，阎锡山准备在平型关与日军会战。周恩来、朱德和彭德怀与阎锡山一起研究了战役计划，并商定八路军以运动战与国民党军配合。会谈中，周恩来还向阎锡山及所部军官讲解了运动战和游击战的要领，商讨了两军战场配合问题。

9月24日，八路军总部向115师下达了侧击平型关日军的命令。24日，周恩来向中共中央发出电报。当晚，115师冒雨进入阵地，秘密设伏于灵丘通往平型关道路两侧高地。

25日拂晓，日军精锐部队板垣师团第27旅团主力，大摇大摆向平型关开进，前后达十余里长。全部进入伏击圈后，115师突然以摧枯拉朽之势，向敌发起攻击。经短兵相接的格斗，歼灭日军一千余人，击毁其全部辎重，取得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第一次大胜利。

奇与正，是军事理论中常用的一对概念。《孙子兵法·势篇》云：“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杜佑注：“正者当敌，奇者从傍击不备，以正道合战，以奇变取胜也。”又《百战奇法·奇战》云：“凡战，所谓奇者，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也。”一个军事指挥者，既要善于用正兵，也要善于用奇兵。在军事史上，出奇制胜这一谋略被广泛运用，精采战例数不胜数。春秋时代，郑国进攻卫国，燕国出兵救援，双方战于北制。郑国以三军部署在燕军正面，而以另一部偷袭燕军侧肯，燕军无备大败。周恩来在组织指导平型关战斗中，战功地运用了出奇制胜的谋略，因此取得了胜利。

虎口排险金蝉脱壳——宣化店谈判与中原突围

1946年初，中原地区上空翻卷着内战的乌云。依照国共《双十协定》和《整军方案》，中原人民军队应撤至其他地区。而国民党政府不让转移，他们调集30万军队，把中原军区6万多人包围在以宣化店为中心，东两不到100华里，南北仅为50华里的狭小地区，伺机一举消灭。4、5月间，国民党在向东北四平街长春进攻的同时，试图在中原发动突然袭击，以挑起全国内战。

这时，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到达南京，与国民党、美国代表继续举行和平谈判。中原局势，引起周恩来的严重关注。5月3日，他致电中共中央，分析国民党方面动向：“蒋本定卅日飞汉，今忽飞西安，更可证其避开武汉，为发动歼灭五师之战。现关内各地顽军伪装八路军破路袭击，其目的在借口侵占，发动进攻，我被迫自卫，彼必大嚷我破坏停战实行进攻。对五师则诬蔑土匪、挑衅，逼我自卫，好发动进攻。美马熟视无睹，并不制止，执行小组亦不前往调解，则很可能发展成为全国内战。”

为制止中原内战，周恩来与国、美代表严正交涉，力主进行中原实地调处。他还向记者发表谈话指出：争取和平，应“首先协议停止中原内战，以免牵动全局，发展成为全国内战。”在周恩来坚持下，国、美两方被迫接受建议，同意前往宣化店视察。中共中央致电中原军区，告知周恩来将到宣化店，指示，要“速准备充分材料，阻止国民党阴谋，并提出方案，要求合法转移。”

5月5日，军事三人会议成员周恩来、徐永昌以及美国特使马歇尔的代表白鲁德到达汉口，连夜会商调处事项。同日，中共代表团在上海发表谈话，目前形势极为严重，中原大战一触即发。如果中原内战爆发，必将成为全国内战的起点，所以周恩来、徐永昌、白鲁德此行，关系重大。中原军区也发表声明，表示被围军民正以必死的决心保卫和平，国民党当局应悬崖勒马，勿玩火自焚。同时，要求全国人民重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5月8日，三人会议成员及其代表，会同军调部小组成员抵达宣化店。军事调停会上，中原军区负责人和干部战士愤怒揭发了蒋军围困、侵犯解放区的暴行。周恩来根据前线报告和调查事实，严正指出：国民党“打下中原必然进攻东北。中原内战是全国内战的爆发点。”他再次呼吁，“现在全国需要和平，内战应无条件停止，千百万人的生命所系，如何能拖，又如何忍拖！”国、美代表理屈辞穷，表示愿意维护和平，随行记者一一记录、报道，把中原战事置于舆论的监督之下。在宣化店视察期间，周恩来参加了中原军区领导干部会议，严肃地告诫大家，国民党反动派从来都是不遵守协议的，他们和谈是假，内战是真。绝对不要依靠国民党发善心，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用枪杆子设法突围出去。根据中共中央有关指示，周恩来与军区领导一起研究制定了武装突围实行战略转移的方案。

5月10日，三方代表签订了关于停止中原内战的《汉口协定》。这一协定，打乱了蒋介石的内战部署，使中原局势有所缓和。根据协定规定，中原军区合法转移了2000余名伤病员、非战斗人员及部分地方干部，解决了部分经费、粮食、医药、救济等问题，为武装突围创造了条件。为争取时间，保护中原部队，周恩来还时时从全局考虑，杜绝国民党内战借口。5月下旬，山东解放军某部围攻枣庄。周恩来立即致电中央，认为这样做“恐于大局不利，

并将影响五师处境”，建议“停止进攻，如已拿下，则应宣布我退出枣庄。”中央即电告山东。

为应付突然事变，中原军区加紧了突围准备。国民党以为中原军区会朝东北方向突围，向新四军主力靠拢，因而将大部兵力集中在东线、北线。我军则按照与周恩来研究好的预定方案，以少数兵力向东北佯动，造成敌人的错觉，而大部则秘密向西集结。6月19日，中共中央致电中原军区：“宁周电称：蒋决定大打，你处须随时注意敌情，准备突围。”22日，中原郑位三、李先念致电中央并周恩来等，称：依据情报，大战难免。“我们为主动计，建议六月三十日前主力突围”。23日中央指示：“同意立即突围，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一，胜利第一”。6月26日，国民党撕毁协议，向中原军区大举进攻，挑起了全面内战。中原解放军以主力向西，一举突出重围。

在中原部队转移途中，周恩来密切注视时局动向，进行强有力的支援。针对国民党诬蔑中共首先移动，挑起战争的谎言，周恩来发表谈话指出：“政府的计划，是要聚歼该地我军，而政府却在宣传我军向西移动”，“据我想，该地我军为自卫计，可能干政府军力薄弱之处，设法避开惨遭消灭之命运。”周恩来还说：“现在平汉路西政府有五个军追击，一个军堵截，情况极严重”，国民党必须停止这一行动。根据中共要求，军调部驻汉口、宣化店执行小组三方代表到达南京，报告中原战况，中共要求国民党停止进攻，使中原解放区部队能够和平转移。7月底，军调部达成《关于中原突围部队的过渡协定》，规定国民党停止追击，突围部队停止移动。而国民党称李先念部被打散了，拒不执行协定。周恩来坚定地指出：“李部绝对打不散，将来问题更大！”

中原突围后，部分指战员与所部失去联系，到南京来找中共代表团。在周恩来领导下，代表团进行了接待转移工作。凡经审查核对，弄清政治面貌的，及时送往解放区；碍于环境一时不易了解的，动员利用社会关系或去解放区或留国统区；面目没有暴露的，动员留国统区进行地下工作。周恩来还致函国民党行政院救济总署署长蒋廷黻，要求接济、安置中原军区离散人员，并查寻被国民党扣留的中共方面救济人员，敦促释放。

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全国各战场的积极策应下，从6月到8月，中原突围部队以无比坚强的毅力，冲破敌人重重包围和堵截，胜利完成了战略转移任务。主力在陕南、鄂西创建了新的游击根据地，一部转入陕甘宁边区，向东掩护主力突围的部队则进入了苏皖解放区。中原突围粉碎了蒋介石聚歼我军的毒计，大量牵制了敌军，有力地支援了其他各解放区。正如中央军委所指出的：“整个突围战役是胜利的，敌人毫无所得。你们这一行动已调动程潜、刘峙和胡宗南三部力量，给反动派以极大震动与困难，故你们的行动关系全局甚大”。

全面内战爆发前夕，周恩来通观全局，敏锐认定中原将是国民党把内战由关外引向关内的导火索。他亲往调处，虎口排险，延缓了内战爆发时间；而谈判期间，又利用可以与中原部队直接商谈之机，秘密确定了武装突围的金蝉脱壳之计，这是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巧妙结合的成功范例。

础润备伞未雨绸缪——南京谈判中判断苏北内战即将爆发

础润备伞，未雨绸缪，是指在事物即将发生变化而尚未发生变化之时，要悉心观其动向，察其端倪，以做好相应准备，防患于未然。《诗经》云“迨天之未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今女下民，或敢侮予！”绸缪者，修缮也。欲雨而未雨之时，要修缮门窗，准备雨具，虽狂风暴雨之来，又何惧乎？军事活动更是如此。军事活动的残酷性、激烈性和其筹划的隐秘性，决定了战争形势常如白云苍狗，瞬息万变。高明的军事家，要善于认识和把握战争规律，明察秋毫，见微知著，努力争取主动权。这一点上，周恩来堪称大师。

1946年6月，国民党以进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发动了全面内战。除中原而外，国民党军还有哪些进攻方向？这是中共中央极为关注的问题。

这时，周恩来正率中共代表团在南京与国民党和美国代表进行谈判。综合各方面情况，周恩来认定，苏北等地必是国民党发动内战的重要进攻方向。

首先，国民党代表在谈判中，坚持要中共部队和地方民选政府退出苏北等地。蒋介石在同周恩来、董必武会谈时一再说，“苏北地方并不大，让出来不算什么，你们还有很多地方可以生存。现在大家都看到，你们在苏北，对南京、上海威胁很大”，“这个问题解决了，全国就和平了”。周恩来批驳说，要中共部队和地方民选政府撤出苏北，而由国民党军进占，是违反政协协议和整军方案的。“政府认为苏北威胁南京，承德、张家口威胁北平，铁路沿线中共部队威胁交通，应一律撤退，实在毫无道理。因为整编统编之后，大家都是国家军队，不能说谁威胁谁。反过来，如果我们也说南京威胁苏北、北平威胁承德、张家口，铁道线上驻军威胁附近各县村庄，那么问题便无法解决。这样的提法，并不是从同家观点出发的。”蒋介石又提出了所谓“难民问题”。他说，中共在苏北搞土改，有五百万难民由共产党地区进入“政府地区”，他们要求还乡。周恩来指出，这些“难民”不能代表解放区广大人民，如果国民党军队回到那个地区，难民要比现在多得多。大量难民也从政府地区进入共产党地区，但是共产党的办法是帮助他们重建家园，而不是为了宣传目的和制造混乱而利用他们。但国民党方面寸步不让，始终坚持他们的方案，并称，这一条不能做到，对于其他问题的协议也一概不能成立。

谈判进行中，社会上也出现了反常现象。6月底，集苏南各地的所谓“苏北难民”，与国民党特务勾结在一起，呼风唤雨，兴风作浪，掀起“武装还乡”的狂潮。“江淮旅沪同乡会”、“苏北难民请愿团”等各种名目的“难民团体”纷纷致电蒋介石，要求“收复苏北以苏民困而解倒悬”。国民党要员谷正纲、王懋功等到各地散发“难民面粉”，“常有成千难民随谷王两氏之后，狂呼‘请政府保护我们还乡’！”南京的“难民”更为猖獗，甚至扬言要到梅园新村向中共代表团请愿。

这种情况报刊上也有大量反映。国民党所控制的各种宣传媒介，不仅连篇累牍发出歪曲苏北等地实况的报道、评论，“武装还乡”的论调也甚嚣尘上。6月27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称，“苏北难民还乡请愿团”发表告各界同胞书，“要求共党立即放下武器，撤去苏北中共军。”7月2日，《东南日报》刊发镇江专电：“自周恩来宣布共军无退出苏北之意向后”，“苏北难民数万人，将在此间举行大游行，街头巷尾已贴有标语：‘打回老家去！’”

综合上述情况，并与通过各种渠道获取的军事情报相印证，周恩来对国

国民党进攻方向作出了明确判断。全面内战爆发前，周恩来致电中央：蒋决定大打，除围攻五师外，胶东苏中两区必定进攻。中央将此通报华中，要求华中“须准备于蒋军大举进攻苏中时坚决粉碎之。”全面内战爆发后，周恩来于6月30日致电中共中央：“蒋介石政策如中央所指是边打边谈。东北方面因兵力不足，一时不致有大动作；关内则必在所谓自卫、恢复交通及难民还乡等口号掩护之下，向我中原、苏北、山东、热河等地进攻。”中央要求各地，“加紧粉碎国民党进攻。”

关于战略方针，中共中央本来曾设想一个南线作战计划，准备全面破裂后，苏北中共部队实行外线出击，既策应中原，又开辟新区。7月12日，周恩来致电延安并北平，通报了严重敌情：“苏北大战即将开始，部队（指国民党军）由徐州向南、津浦路向东，江北向北，三面同时开始进攻，以武装难民作先锋，先求解决苏北后，再打通津浦、平汉等。”接到周恩来密报，7月13日，中共中央致电华中：“在此情况下，待敌向我苏中、苏北展开进攻，我苏中、苏北各部先在内线打起来，最好先打几个胜仗，看出敌人弱点，然后我鲁南、豫北主力加入战斗，最为有利”。

由外线出击改为内线作战，这是解放战争初期具有重要意义的军事战略方针的转变，它使中共部队得以以解放区为依托，集中优势兵力，大量歼灭装备优良之敌的有生力量，推进自卫战争的胜利进程。从7月13日起，苏北解放区军民对进攻之敌实施抗击，至8月底，取得了七战七捷的胜利。

南京谈判期间，周恩来密切注视前线战况，以谈判斗争配合军事斗争，粉碎国民党的种种阴谋。苏北内战爆发后，恰逢黄河、淮河、沂河、沐河等河夏泛。因国民党不仅不开放沿江各坝，使河水入江，反出动飞机轰炸河坝，扫射修坝民工。结果，堤岸溃漏，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苏皖边区致电国民政府行政院，要求开放河坝，而国民党仅在报端公布，而迟迟不来采取行动。周恩来认识到，国民党当局的意图，是想以此造成苏北重大水患，以达到其军事目的。他致函宋子文，要求国民党立即开放归江各坝，并制止轰炸和阻挠运河修堤工程，并一针见血地揭露说：“勿再以此为政争战争之武器。”此外，周恩来还通过统战途径，获取了国民党军向苏北运送毒瓦斯炸弹的情报，经过同美国、国民党代表的交涉，制止了这一阴谋的实行。

础润备伞，未雨绸缪，是军事斗争的重要原则，周恩来关于苏北问题的谈判，是对这一原则的成功运用。

军政兼施水火并克——1946 年领导黄河堵口归故的谈判斗争

1946 年 7 月 19 日下午 2 时许，一架飞机飞临河南黄河花园口，盘旋十余分钟后，徐徐降落，停在附近的机场上。舱门一开，中共南京谈判代表团团长周恩来从里面走了出来。他来到黄河岸边，详细查看了水势和堵口改道工程。当晚又匆匆驱车前往开封。

抗战初期，国民党为阻止日军进攻，在河南花园口决堤，使黄河改道经运河、长江入海。抗战胜利后，由联合国救济总署提供援助，协助中国疏导黄河归入故道。这时，黄河故道已与两岸连成一片，上面建有大量村镇和居民点，属冀鲁豫解放区和渤海解放区，旧有 2000 多里堤坝早已残败不堪。如使黄河归故，必须清浚河道，迁徙居民，修复堤坝。为此，国共双方达成了《菏泽协议》，确定先浚河复堤，再堵口放水。

然而，蒋介石为达到其消灭解放区的目的，却试图使用以水代兵、水火交攻的阴谋，一方面对解放区实行军事进犯，即火攻；一方面在下游复堤以前堵复黄河花园口，水淹解放区，即水攻。这一招极其险恶，看起来是为了“复兴建国”。且为联合国救济总署所援建，而实际上，则利用复堤先后这一时间差，欺骗舆论，以寻求其军事目的。如这一阴谋得逞，则冀鲁豫解放区和渤海解放区势必成为一片汪洋泽国，刘伯承、邓小平所部再难立足，或退至黄河以北，或在黄河南岸背水一战；同时，山东、豫东、苏中、苏北解放区与华北解放区也将被分割开来，处于被各个击破的危险境地。周恩来对此有权为清醒的观察，后来曾指出：“黄河是蒋介石的‘外壕’，陇海路是他的‘铁丝网’，长江是他的‘内壕’。蒋介石总想赶我们过‘外壕’”。蒋介石堵复花园口，“自始至终都是想以黄河归故来加害解放区人民和部队”。在中共中央领导下，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与解放区军民密切配合，以军事、政治两种手段与国民党的阴谋作斗争，打破了他们的火攻和水攻。

1946 年 5 月初，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由重庆迁至南京，与国民党和美国代表继续举行和平谈判。这时，黄河浚堤工程远未完成，而国民党当局加紧堵口的消息却不断传来。中央社 5 月 8 日发出专电称：“堵口工程，尚称顺利，截至现在止，已至西坝进修千余公尺，仅留口门约四百公尺”，当局“指饬将堵（口）工程于五月内打桩逐渐堵筑。”鉴于事态已极为严重，中共中央发言人发表谈话指出：国民党违约堵口，是借黄河为名，蓄意淹毙豫、鲁、冀三省解放区同胞，而这是与国民党内反动派的内战阴谋分不开的。中共对于千百万人民的生死存亡，决不能坐视不顾。现各有关解放区政府和中共在南京的谈判代表已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如国民党一意孤行，则解放区军民为了生存将被迫采取必要的措施，后果当由国民党当局负其全责。中共中央还致电刘伯承、邓小平：国民党借黄河归故，阴谋泛滥我冀南豫北解放区。我方除在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谈话外及恩来在京活动外，你们应加紧修筑大坝，准备将黄河水逼回头，并尽可能将合龙员工驱散以破坏其计划，延缓放水时间。

根据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周恩来在南京展开了紧张的谈判活动。直接领导冀鲁豫治黄代表赵明甫、王笑一同国民党水利委员会和联合国救济总署官员谈判，先后达成《南京协议》、周恩来同联总驻华代表福兰克芮、工程师塔德的六点口头协议和马歇尔、薛笃弼、周恩来三人对执行协议的“保证”。其中规定“下游浚河复堤工程完全竣工后，再行花园口合龙放水”。随后，

周恩来又向马歇尔提交备忘录，指出：“堵口以前，应做好一切准备工作。”通过谈判和公布协议，中共使国民党当局在黄河问题上的行动，完全置于中外舆论的监督之下。

6月下旬，国民党在发动全面内战的前三天，不顾中共一再警告，悍然在花园口抛石堵口合龙、白崇禧、陈诚亲往现场督促。周恩来、董必武即致电冀鲁豫边区党委：“此项关数百万人民生命财产事，我们时放在心，不敢丝毫懈怠。”周恩来一再向马歇尔致送备忘录，并赶赴上海参加有关方面的会商和谈判，要求合理解决堵口复堤和灾民救济问题。会上未能达成合理协议，周恩来旋即赴河南听取冀鲁豫行署的意见，并到花园口实地视察了堵口工程。此时，因中共游击队对采石场破坏造成石料紧缺，加上黄河复泛，工程主要部分被洪水冲毁，堵口失败。

在开封期间，周恩来在各界人士座谈会上，以大量事实揭露了国民党当局把黄河问题当作战争工具的阴谋。阐述了中共的主张，并与到会的工程技术人员达成一致认识：堵口复堤都应该按照协议进行。在接见冀鲁豫行署负责人及解放区治黄代表时，周恩来指示他们，在与国民党谈判中要研究斗争策略，以揭露敌人阴谋，争取主动权，要抓紧赶修堤防工程，争取时间。周恩来还要他们转告刘伯承、邓小平，从整个形势上来看，靠谈判不能解决问题。现在主要靠自卫战争，做好准备，迎击敌人的进攻。

随后，周恩来回到上海，与各方代表继续谈判。最后终于达成协议，堵口推迟至9月汛期过后进行。好修复故道，迁移居民，工款救济等事项也作了具体规定。

国民党“水攻”一手受挫后，立刻加紧了“火攻”。7月下旬，陈诚叫嚣要同中共军队“武力决赛”，白崇禧在新乡会议上宣布了由刘峙任指挥，兵分三路向冀鲁豫解放区发动进攻的军事计划。这时，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在黄河问题上的谈判斗争，已为解放区自卫战争创造了有利条件。刘、邓军经过数月来的休整。练兵，斗志正旺；广大农民经过土改，踊跃参军。为粉碎敌人的进攻并减轻华东解放区的压力，刘、邓军纵横转战于黄河故道，8月中旬，在10万民兵的配合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出击陇海铁路；9月上旬，取得荷泽定陶战役的胜利；10月上旬，以远距离奔袭作战歼敌一个旅于鄆城。正如《解放日报》所说：中原、苏中、定陶“这三个胜利。对于整个南方战线，起了扭转局面的重要作用。蒋军必败、我军必胜的局面是定下来了。”

此后，国民党又在同年12月在花园口抛石合龙，再遭失败。刘、邓军乘花园口将堵未堵之际忽又穿越故道，取得鲁西南鱼台大捷，与陈毅、粟裕所部取得的鲁西南临沂大捷交相辉映，形成了对徐州的钳形攻势。直至1947年3月，第三次堵口成功。这时，刘邓大军已转移至黄河北岸，堤坝基本修复，未发生重大水患。国民党向陕北、山东实行重点进攻，把黄河当作抵40万大军的天然屏障。而刘、邓军则于1947年6月突破黄河天险，千里跃进大别山，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蒋介石水火交攻的黄河战略彻底破产。

攻心为上不战屈兵——敦促郑洞国率长春守军投诚

1948年9月辽沈战役中，国民党军郑洞国部被人民解放军铁桶般围困在长春。10月18日，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郑洞国接到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来信，全文如下：

“洞国兄鉴：

欣闻曾泽生军长已率部起义，兄亦在考虑中。目前，全国胜负之局已定，远者不论，近一个月，济南、锦州相继解放，20万大军全部覆没，王耀武、范汉杰，先后被俘，吴化文、曾泽生相继起义，即足证明人民解放军必将取得全国胜利已无疑义，兄今孤处危城，人心士气久已背离，蒋介石纵数令兄部突围，但已遭解放军重重包围，何能逃脱。曾军长此次举义，已为兄开一为人民立功自赎之门。届此祸福荣辱决俄倾之际，兄宜回念当年黄埔之革命初衷，毅然重举反帝反封建大旗，率领长春全部守军，宣布反美反蒋、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造成土地改革，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行列，则我敢保证中国人民及其解放军，必将依照中国共产党的宽大政策，不咎既往，欢迎兄部起义，并照曾军长及其所部同等待遇。时机急迫，顾念旧谊，特电促速下决心。望与我前线萧劲光、萧华两将军进行接洽，不使吴化文、曾泽生两将军专美于前也。”

郑洞国原为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当他率军身处绝境，中国共产党最高统率部的重要领导者、当年军校政治部主任亲自向他写信，要他重举反帝反封建大旗，率部反正，加入人民解放军行列，这在郑洞国心中，不能不引起巨大震动。这封信言简义赅，情真意切，而且发得适逢其时，生动体现了周恩来高超的军事谋略。

长春，是国民党在东北的一个重要军事战略支点。经日军和国民党军多年经营，建造了大量碉堡、工事，形成了现代化的防御体系。1948年3月，人民解放军攻占四平街，切断了长春守军与沈阳、锦州守军的陆路联系，长春成为远丢在解放军战线侧后的一座孤城。5月，东北人民解放军曾向长春发起攻击，团兵力和火力均未开成绝对优势，未能成功。经中央军委批准，从6月开始，人民解放军对长春实行了久困长围的作战方针。

在解放军的严密包围和封锁下，国民党守军给养断绝，市内经济生活发生了严重危机。少量空投难以支撑10万军队的巨大消耗，全城出现严重的粮荒。6至10月，粮价上涨700倍，高粱米从每斤几万元上涨到一亿几千万元。国民党驻军之间，时常为争抢空投物资而发生内讧，官兵士气低落，大量逃亡。新七军军长李鸿哀叹说：“现在是师长有师长的算盘，士兵有士兵的想法，真是离心离德。现在圈在城里，还能这样守着，出去，就散了！”

9月，东北人民解放军根据中央军委指示，除一部继续围困长春守敌外，以主力南下北宁路，发起辽沈战役。10月15日，攻克锦州，全歼守敌10万余人，俘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司令范汉杰。锦州，同样是国民党坚固设防的大城市，战役发起后几天之内即被攻克，对长春守军不能不发生强烈震撼；且锦州一失，国民党东北部队向关内撤退的陆上通道已被完全切断，不仅长春，就连沈阳守军也陷入人民解放军的天罗地网，成为瓮中之鳖。

这时，蒋介石由南京飞抵沈阳，向长春空投手令，命郑洞国率部突围。其中说：“尔后即令守军全成饿殍，亦无再有转进之机会。如再迟延，坐失机宜，致陷全般战局于不利，该副总司令、军长等，即以违抗命令论罪，应

受最严厉之军法制裁。”这时，早已经中共作了大量工作的长春第60军军长曾泽生于17日，毅然率部起义，人民解放军兵不血刃，迅速控制了长春东城。新七军官兵也纷纷放下武器，长春守军顿呈土崩瓦解之势。

曾泽生起义时，致函郑洞国；劝他一道行动。信称：“长春被围，环境日趋艰苦，士兵饥寒交迫，人民死亡载道，内战之惨酷，目击伤心。”“今本军官兵一致同意，以军事行动，反对内战，打倒蒋氏政权，以图挽救国家于危亡，向人民赎罪，拔自身于泥淖。”“公乃长春军政首长，身系全城安危。为使长春军民不作无谓牺牲，长春地方不因战火而糜烂，望即反躬自省，断然起义，同襄义举，则国家幸甚，地方幸甚。”郑洞国出于对蒋介石的“愚忠”思想，不愿起义，表示，曾军长要怎么做由他去，要我和他一路，我不干。随后，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政治部前方办事处处长刘浩从曾泽生临时指挥所给郑洞国打电话，劝他不要作无谓的牺牲。郑洞国回答说：“既然失败了，除战死以外，还有什么可说，放下武器是做不到的！”

长春前线的情况，中共中央军委十分关注。在西柏坡，当60军起义的消息传来后，周恩来即向毛泽东等介绍了郑洞国的情况。他说，郑洞国是黄埔军校第一期的毕业生，人老实，“在目前情况下可能争取其起义，则对整个黄埔系军队的影响当会很大。”毛泽东同意这一分析。随即由周恩来向郑洞国写信，希望他率部起义，并为中央军委起草致东北的电报，要求东北人民解放军对郑洞国及其所部展开政治攻势，迫其起义或投诚。

1月18日，中共中央军委致电东北局并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等，指出：“关于逼迫和争取郑洞国起义的重要性，今晨已告你们望令肖（劲光）、肖（华）、陈（伯钧）及各部对长春取威迫政策，堵塞其一切可能的逃路暂时不攻击他。据恩来称，郑洞国系黄埔一期生，人还老实，在目前情况下可能争取其起义则对整个黄埔系军队的影响当会很大，你们除将恩来致郑洞国电派人送交外，林彪及肖劲光亦可写信给他，肖、肖、陈并应选派适当人员与郑进行谈判。”中共东北局复电说：“曾泽生本人已到我处，其行动已暴露，曾本晨已向郑公开劝告；郑派来代表二次，图从长计议”。“根据上述情况，估计郑亦有可能被迫起义；我们意见，如郑在接受我之起义条件下，当亦表示赞成。”东北局还就与郑洞国谈判的条件和处理办法向中央作了请示。

10月18日夜；长春守军代表在未得到郑洞国同意下，与人民解放军全权代表解方进行谈判。解方表示：我们完全相信你们谈判的诚意，事实上，你们绝大多数的官兵已不愿再打了，特别是锦州解放，60军起义之后，就更加打不起来，突围当然更是幻想。为了减少长春军民的无谓牺牲，我们极欢迎你们放下武器。如果我们要打的话，首先一进城就会把你们全部解决，我们之所以一枪未放，正是从实际行动中对你们一个宽大的表示。双方达成协议，守军放下武器，中共军队负责保障守军自兵团司令官以下之官佐士兵的生命安全。

10月19日，郑洞国所部放下武器，解放军和平解放长春。此时，郑洞国本人仍有顾虑，率兵团机关及一个团困守伪满中央银行大楼不出。在这种情况下，解放军继续开展政治攻势，派代表与其谈判，郑终于决心率部投诚。中共中央军委致电东北局称：“郑洞国及新七军既然愿意投降缴械，肖、陈已作受降处理，就照这样处理为好，免去许多麻烦。郑洞国为黄埔高级军官，此次又率部投降，肖、陈应给以礼遇。”中共中央就长春和平解放发出贺电，指出，“锦州解放，歼敌十万之后，长春即告解放，曾泽生将军率部起义，

郑洞国将军率部投诚，名城光复，秩序井然。人庆更生，欢声雷动。”

长春和平解放，深刻地影响了东北战局和全国战局。10月19日，中共中央军委在致东北的电报中说：“既然长春敌人愿意投降，我五纵、六纵、十二纵即可停止去长春，该三个纵队似宜以两个位于沈阳、营口之间，以一个在营口筑工守备，并宜在你们打锦（西）葫（芦岛）以前到达该区，堵塞沈敌向营口的退路。如沈敌向锦、葫增援，则该三纵从侧后箝制沈敌，长春附近之九个独立师亦宜以大部开沈、营间，肖、肖则赴该区指挥。”此后，东北人民解放军集中兵力在沈阳以西全歼了国民党精锐部队廖耀湘兵团十万余人，并于11月2日解放沈阳、营口，至此，东北全境获得解放。

《孙子》曰：“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襄阳记》中记述：诸葛亮向马谡问“良规”，马谡对曰：“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公服其心而已。”在战争中，解决问题的基本方式，或以军事手段，兵刃相接，打垮对手，或以政治手段，攻心夺气，瓦解敌军。两相权衡，军事手段固然干脆利落，但人、财、物则不免有所消耗和损失，而政治手段，即解决了敌人，也保存了自己，同时扩大了政治影响，无疑是较为合算的选择。当然，攻心并不等于否认武力，没有强大武力做后盾，也很难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如能综合运用伐谋、伐交、伐兵、攻城等多种方式，对可能放下武器之敌施之以威，示之以利，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就有希望迫使敌人就范。辽沈战役中，周恩来关于对郑洞国部展开政治攻势，争取和平解放长春的主张，是灵活运用这一谋略的生动范例。

以静待哗张机设阱——部署石家庄反偷袭作战准备

以静待哗，张机设阱，是中国历代兵家所重视的军事谋略。它表明，在强敌进攻面前，要处变不惊，设阱以待，争夺战争主动。《孙子兵法·军争篇》首先提出了“以静待哗”的作战方法。《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中，靖曰：“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此略言其概耳。善用兵者，推此三义有六焉：以诱待来，以饱待饥，以静待躁……”明《兵经百篇·发字》曰：“制人于危难，扼人于深绝，诱人于伏内，张机设阱，必度其不可脱而后发。”这些都是打破强敌进攻的至理名言。公元383年，前秦王苻坚以90万军队攻晋，时东晋总兵力不超过15万，局势危急，朝野震动。宰相谢安实行外松内紧之策，一而从容出游，会见亲友，并与谢玄悠然下棋，一面暗中探秦军内情，调兵遣将，实施制敌要害的军事部署。结果，晋军以少胜多，秦军大败而归。李白有诗赞曰：“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

1948年秋，人民解放军发起了歼灭国民党重兵集团的伟大的战略决战。10月下旬，辽沈战役胜利在即，淮海战役、平津战役亦将逐次展开。这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最高统帅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正驻在河北石家庄附近的两柏坡村。蒋介石为挽救其败局，亲飞北平，与国民党华北“剿总”傅作义商量，策划集中第94军、新编第2军，配备汽车400辆，炸药100吨，组成快速部队，以突然行动，偷袭石家庄，直抄中共中央所在地。

10月25日，这一情报由华北局城工部报到中央军委，军委立即进行了审慎的研究和周密的部署。周恩来为军委起草了致聂荣臻、薄一波、滕代远、杨得志、罗瑞卿、耿飆等的电报，指出：据北平确息，蒋、傅决定集中第94军3个师及新2军2个师经保定向我石门（即石家庄）突施空心袭击，并企图炸毁石门。估计27、28两日敌94军可能集中保定，29日可能会合新2军大部向石门前进。为坚决保卫石门，破敌计划，华北军区第7纵队主力应即移至保定以南坚决抗拒南进敌人，第3纵队于26日起以5天的行程，不惜疲劳赶到望都地区，协同7纵作战并指挥之。杨得志、罗瑞卿、耿飆率主力相机行动。同时，周恩来还为中央起草致杨成武、李井泉等的电报，指示：攻打归绥计划暂缓实行。但为吸引傅作义一部分兵力注意归绥，以利第2兵团主力隐蔽南下，第3兵团应令第1纵队及第8纵队第11旅作攻打归绥的准备，另以第8纵队一部及地方部队仍在绥东方面积极行动，迷惑敌人。这样，人民解放军就作出了内紧外松，张机设阱的巧妙部署，在全局上争取了主动。

10月27日，周恩来不断向毛泽东通报敌情和华野部队行动情况。同时，与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频繁通话，要求7纵当夜在指定位置布防，3纵在4天内赶到满城，主力未到以前，应把冀中、冀晋地方部队和民兵部署在铁路、公路两侧，作大纵深节节抗击的准备。此时，3纵根据军委要求，已于两日内行军270余里，翻过紫荆关。周恩来经聂荣臻告知该部：第7纵队等邻将在保定一带阻敌两天以上，第3纵队只要在30日赶到望都地区，就有破敌把握。

10月28日，国民党第94军军长郑挺锋率两个师向南作试探性推进，第35、16、92军的三个师奉傅作义之命南下增援。10月29日，周恩来为中央军委起草致聂荣臻、薄一波、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李井泉等的电报：按傅作义部署，国民党军真能向保定以南进攻的不过两个军多一点，此为歼

敌良机。我应集中第3、4、7纵队及第2纵队1个旅，各个歼灭该敌。电报对华野各部的任务作了具体规定：第2兵团主力赶至满城地区，会合3、4纵，击破敌进攻石门计划；第3兵团主力攻打归绥。电报还通报了东北战局：“我东北林、罗昨日在辽两全歼敌五个军十二个师，现正乘胜歼灭余敌，夺取沈阳。”30日拂晓，第3纵队提前一天到达望都，次日，进入了第7纵队防线。傅作义闻讯，急令第94军回撤。周恩来指示3纵：抓紧休息，恢复体力，作好战斗准备。如敌撤得慢，4纵又能赶到，争取在满城打一仗，吃掉它一部。

这时，国民党军已发现，人民解放军正在不动声色中张网以待，慌忙全部回窜。10月31日，周恩来为中央军委起草致杨得志、罗瑞卿的电报：傅作义昨飞保定，其侵扰石家庄的计划有可能已经取消。这时，新中社播发了毛泽东写的述评《评蒋匪军梦想偷袭石家庄》。其中以辛辣的笔调指出，蒋介石最近时期是在北平，在两个星期内由他经手送掉了范汉杰、郑洞国、廖耀湘三支大军。亏他挖空心思，想出了偷袭石家庄这样一条妙计。傅作义出骑兵，蒋介石出步兵，附上些坦克和爆炸队，从北平南下了。真是异常勇敢，一个星期到达了望都地区。这里发生一个问题：究竟他们要不要北平？现在北平是这样的空虚，只有一个青年军二〇八师在那里。通州也空了，平绥东段也只稀稀拉拉的几个兵了。总之，整个蒋介石的北方战线，整个傅作义系统，大概只有几个月就要完蛋，他们却还在那里做石家庄的梦！

中共原来对国民党的偷袭计划了如指掌，这不能不使傅作义心惊胆战。11月2日，蒋、傅军在损失3700余人、战马240匹，汽车90余辆以及大量物资后退回保定。偷袭石家庄的冒险计划终告失败。

藏锋敛锷匕见图穷——协助毛泽东指挥平津战役

藏锋敛锷，匕见图穷，就是在一定的时间里，隐藏进攻方向和目标，以假象造成敌方失误，等待时间成熟，一招制敌。

1948年11月，辽沈战役胜利结束，淮海战役全面展开。国民党华北“剿总”傅作义集团60余万人，在上述两大战役的震撼和华北人民解放军的打击下，惊恐万状。他们将兵力收缩在张家口、新保安、北平、天津、唐山一线，对固守平津，或海运江南，或西撤绥远，仍犹豫不决，举棋未定。蒋介石和傅作义均认为，东北人民解放军经辽沈战役后，需3个月到半年时间休整，方能入关作战，故暂时采取了静观待变的方针。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军委，决心趁华北敌军尚未逃窜之际，调东北野战军秘密入关，会同华北军区所部，将傅作义集团就地全歼，以加速国民党统治的总崩溃。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在一定时间内，隐蔽战役企图，抑留敌军，等敌军发现之时，已陷于插翅难逃之境。

平津战役是自11月29日发起的，而准备立作从10月底就已开始。根据毛泽东指示，东北野战军组成先遣兵团，由第二兵团司令员程子华等率领，先行入关。11月初，东北野战军主力在锦州、沈阳、营口诸地休整；华北第1兵团正围攻太原；第2兵团位于阜平地区准备参加太原作战；第3兵团已包围归绥，准备夺取该城，第7纵队正围攻保定。综合分析华北形势，周恩来于11月9日，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华北、东北领导人的电报，指出：傅作义正徘徊于平、张、津、保之间，对坚守平洋或两退绥包似尚未下最后决心。如我攻打归绥，有促使傅及其嫡系三个军及骑兵三、四个旅提早西退可能。为抑留傅军，待我主力入关协同华北力量彻底歼灭该敌，特改定华北第2、3兵团部署：第2兵团主力向太原地区移动，准备参加太原作战；第3兵团停止攻打归绥，主力移至归绥、集宁之间休整；程子华部担任监视北平之敌，如该敌再向石家庄进攻，则以全力攻击北平拖住该敌。这样，华北战场暂呈平静态势，对傅作义集团起了麻痹作用。

这时，在淮海战场，人民解放军作战取得了重大进展。11月11日，华东野战军已将国民党军第7兵团合围于碾庄地区，并发起猛攻。华北放军更为动摇，而蒋介石则要更多地考虑收缩兵力，加强长江防线问题。

11月12日，周恩来为中央军委起草致程子华、黄克诚并告林彪、罗荣桓等电，再次强调：对付傅作义部，重在抑留它在平津张保地区，不使西退，也不使其得以由海上南撤。11月17日，周恩来又为中央军委起草了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并告东北局、华北局电，指出：淮海战役第一阶段，我已可达歼敌18个至19个师的胜利。在我胜利威胁下，蒋必将考虑其长江防线问题，而蒋嫡系24个师从华北海运江南，是蒋介石今天唯一可以使用的机动兵力。不论他将这个兵力直接使用于防守江南，或先使用于协同黄维、李延年向北接出邱、李、孙三兵团，然后集中约90个师的兵力，布防长江下游两岸，对于延缓蒋介石反动统治的最后崩溃说来，都会起较大作用。电报指出：“从全局看来，抑蒋系二十四个师及傅系步骑十六个师于华北来消灭，一则便利东北野战军入关作战，二则将加速蒋匪统治的崩溃，使其江南防线无法组成，华东、中原两野战军既可继续在徐淮地区歼敌，也使东北野战军将来沿津浦路南下，直捣长江下游。但欲抑留蒋、傅两部于华北，依华北我军现有兵力是无法完成的。”据此，要求郑重考虑下述两种方案：其一，东北野战军提

前本月 25 日左右向关内开动，预计现在锦义（指锦州、义县——引者注）地区的部队，下月 10 日以前可到天津、唐山地区，如敌正在南撤，我可歼灭其一部或大部；如敌尚未开动我可扣留该敌，继续休整并修复北宁路，然后大举歼敌。其二，仍按原计划休整到 12 月半，然后南进，这样，则准备到平津后无仗可打时，好沿平汉路南下，先在长江中游作战，逐步东进与刘陈会攻京、沪。电报中还说：“太原甲克确有惊动蒋傅促其西撤南撤的危险，现在与徐（向前）、周（士弟）电商是否可以暂时停攻，就地休整，待你们攻平津时再打太原。”

18 日，中央军委致电东北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决定：着东北野战军在一二天时间完成出发准备，于 21 日或 22 日全军或至少 8 个纵队，“取捷径以最快速度行进，突然包围唐山、塘沽、天津三处敌人，不使逃跑，并争取使中央军不战投降。”电报要求东野首长先行出发，到冀东指挥。电报还说：“我们已令杨、罗、耿在阜平停止，并准备出张家口附近，协同杨成武阻止傅作义西退，徐、周已复电同意停攻太原。”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程子华、黄克诚致电中央，请示派部队占领滦河铁桥一事。19 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电：“此举将会有惊动榆关滦州之敌，使其过早退缩唐山津沽，从海上撤退的危险，应暂缓执行。东北野战军正提早入关，派队占桥问题应在林罗整个计划之内。”

11 月 23 日，东北野战军主力 10 个纵队和特种兵全部，分别由锦州、沈阳、营口地区秘密出发，夜行晓宿，向关内进军。同时，新华社、广播电台大量播发东北野战军在东北地区祝捷、庆功、练兵、开会的消息，造成东北野战军正在休整的假象。29 日，华北第 3 兵团攻击张家口，吸引傅作义部两援，平津战役由此开始。

12 月初，傅作义发觉东北野战军开始入关，加强了北平的防御。为不使敌军决策狂跑，人民解放军对敌实行了“围而不打”、“隔而不围”的方针，抓住西线，稳住东线，迅速将敌分割包围于北平、天津、张家口、新保安和塘沽 5 个孤立的据点上。待傅作义反应过来的时候，其南撤、西退之路已被完全切断。接着，人民解放军采取先打两头，再取中间的战法，逐次歼灭新保安、张家口和天津诸敌，北平国民党守军 25 万人，陷入解放军百万大军的重重包围之中。最后，在人民解放军的争取下，傅作义率军接受改编，北平和平解放，平津战役结束。

平津战役是解放战争战略决战三大战役中的最后一个战役。这一战役历时 64 天，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 1 个“剿匪”总司令部、1 个警备司令部、3 个兵团部、13 个军部、50 个师，共 52 万余人。至此，华北全境基本获得解放。这次战役之所以能取得如此重大的胜利，关键之一，在于人民解放军通过各种手段，成功地将傅作义集团抑留于平津地区，并首先完成了对这个集团的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从而能够周密部署，各个歼敌。周恩来在这一战役指挥中所作的杰出贡献，在毛泽东军事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久困长围覆巢毁卵——参与指挥太原战役

1948年7月晋中战役后，国民党阎锡山部主力龟缩太原孤城，一部困守大同。中共中央军委命华北军区所部17个旅共10万人于太原附近休整，准备发起太原战役，夺取太原。

太原是阎锡山的老巢。它位于晋中平原北部，南为平川，北为丘陵，西濒汾河，东依罕山，地势复杂，易守难攻。该城工业发达，有钢铁厂、机械厂、兵工厂等重要工厂80余座。经多年经营，具有以5000多个各式地堡为骨干、纵深30余里的环形防御体系。城周有铁路，南北市郊有机场。敌守军总兵力约10万余，火炮600门。

鉴于敌城守备坚固，且敌我兵力相当，周恩来指示前线我军全面作好攻击准备工作，在对太原守敌实行军事进攻的同时，加强政治瓦解。7月16日，周恩来为中央军委起草给徐向前、周士第的电报，指出：为配合太原攻城行动，应对阎锡山部开展政治攻势，如与太原工人、工程师等有关系的，望派人送信进去，保护机器勿遭破坏。徐向前、周士第等就对阎锡山劝降的内容及条件向中央请示，中央复电指出：据薄一波同志电话谈，阎锡山在我兵临城下控制机场情况下，逃走之望既绝，自杀又非其所愿，故投降的可能是有的。阎及其部下，最顾虑的是他们的家产，别的都不容易打动他们的心，最击中要害的是如能保全他们的私人财产，则阎的部下会纷纷劝阎投降，即使阎不同意，也可能发生内变，或者在我军攻入城后，愿以保护公共财产自赎。故我方在与其交涉时，可告以如阎及其部下任何人肯早日自拔，将功赎罪，我们不但保证其本人及其家属生命安全，即其私人财产，只要不是以特权掠夺的官僚资本，我们亦将予以保护。

为加强对太原守敌的军事攻势，聂荣臻、薄一波、滕代远致电中央，要求抽调兵力，增援攻坚部队。7月26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电，指出：目前尚是围困阶段，故可暂不增派。但支前后勤工作需要加紧准备，而对已收复的十几个城市及恢复铁路的工作，更需人检查、领导。9月28日，华北军区第一兵团前委决定：“战役的指导方针，系以围困、瓦解、攻击、逐步削弱敌人，然后一举攻下太原，全歼敌人。”

10月初，阎锡山部以攻为守，出动7个师的兵力，向城南进犯，企图向外扩张，确保其城南武宿机场，破坏解放军进攻太原的战役准备，并抢粮抓丁。徐向前等决心利用敌军脱离防御阵地的有利时机，提前发起太原战役。10月5日，太原战役正式展开。人民解放军各部奋勇出击，至15日，歼敌1.2万余人，从南北两翼突破守军第一道防线，向其纵深推进约6公里，完全占领了城南武宿机场，并以火力控制了城北新城机场。10月15日至11月13日，解放军又攻占了东山4大要点，控制了城东主要阵地，瞰制了市区。

这时，辽沈战役已结束，华北国民党军成为惊弓之鸟。为稳住傅作义集团，防其南逃或西撤，中共中央军委于11月16日发出缓攻太原的电令。11月19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徐向前、周士第的电报，指示在太原战场上控制要点机场，准备过冬。并告知东北野战军即将入关，杨、罗、耿兵团将开往察南，策应平绥作战。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太原前线解放军在攻占太原城东、北、西三面部分据点，以火力封锁城西、城北机场，断绝敌空运后，即停止进攻。围城各部队开展阵前练兵，提高攻坚能力，同时，对敌进行广泛的政治攻势，瓦解敌军。至次年3月底，又瓦解敌守军1.2万余人。

1949年初平津战役结束。中央军委增调两个兵团，两个炮兵师开赴太原前线，并决定成立以徐向前为首的中共太原前线总前委和人民解放军太原前线司令部，开始总攻太原作战。此时，太原前线人民解放军已达32万余人，为阎锡山守军的三倍，拥有火炮达1100门。在全国战场上，人民解放军自取得战略决战的伟大胜利后，又于4月20日，发起声势浩大的渡江战役，这对太原守敌产生了极大的心理震撼作用。经外围作战，解放军于4月24日，对城垣发起总攻。数小时后，全歼守敌，俘太原国民党军政要员孙楚、王靖国及日本顾问多人，太原终获解放。

历时6个多月的太原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1个绥靖公署、1个保安司令部、2个兵团部、6个军部、20个师，总计共13.5万余人。大同国民党守军万亲人因陷于绝望境地，于4月29日接受和平改编，至此山西全境解放。

对太原实行久困长围的作战方针，是中共中央军委的英明决策，而周恩来也是重要的决策参与者之一。围困期间，解放军对敌实行了围困、瓦解和攻击相结合的方针，在反复争夺外围据点中逐批地消灭了部分敌军，同时以强有力的政治攻势瓦解了敌军士气，从而在总攻前就极大地削弱了敌人的战斗力。最后，以较小的代价顺利围歼了守敌。实践证明，在战略和战役的主动权均操于我手，而我之兵力一时又不占优势的情况下，对孤守城市之敌采取长期围困而后总攻的方针是正确的。

轮番作战以盈待竭——抗美援朝战争中提出轮班战法

1950年6月，爆发了朝鲜战争。随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对朝鲜实行野蛮入侵，不仅给朝鲜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而且对中国和世界和平造成了严重威胁。7月，根据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军委由副主席周恩来主持，召开会议，讨论加强东北边防的军事部署问题，作出了《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根据这一决定，组建了东北边防军，调第13兵团等部为边防军所属部队，进行保卫边防和必要时援助朝鲜人民的准备。

当时敌我双方军事力量各有不同特点。敌方装备优良，但战线过长，兵源有限；我方装备较差，但后方较近，兵力雄厚。为以己之长，克敌之短，周恩来对我方兵力组织和补充问题，提出了富有创建性的轮番作战、以盈待竭的谋略。1950年8月26日，在边防军工作会议上，周恩来说：今后如何补充还要研究。一种是从各部队抽调10万人来补充，一种是用建制补充，另一种用换班的打法进行补充，即准备第二线部队为后备，待第一线部队一个军或一个师作战后，需要补充时，可以开到第二线整补。用这样办法整补为最好。此时，根据聂荣臻的建议，中央军委已决定调华东第9兵团和西北第19兵团为边防军的二线部队。

10月，中共中央作出出兵参战，抗美援朝的决策。东北边防军奉命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开始了抗美援朝战争。11月，第9兵团入朝参战。

1951年2月，鉴于朝鲜战争趋于长期化，中共中央军委确定了“在朝鲜采取轮番作战的方针”，并具体规划了轮番作战的部队。后来这种轮番作战的方针，又发展成为“轮番与换班相结合”。1951年，志愿军第19、第3、第20、第23兵团相继到达前线。

1952年5月，周恩来指示总参谋部与彭德怀具体协商国内部队同志愿军部队的轮换计划，经毛泽东批准后，又采取以军为单位实施轮换。1952年9月，进行第一期轮换，12月进行第二期轮换，至1953年朝鲜战争停止，先后以国内7个军轮换了在朝作战的7个军。1953年上半年，兵团以上高级指挥员和领导机关工作人员也进行了轮换。

采取“轮番作战”和“轮番与换班相结合”的方针，充分发挥了自己兵力雄厚的优势，始终保持了第一线部队的坚强战斗力，对于取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普遍锻炼了国内部队，为后来的保卫国防作战提供了有益经验。

控制疫情驱扫瘟神——抗美援朝战争中领导反细菌战

1952年1月28日，一批美国飞机飞临朝鲜江原道平康郡一带志愿军阵地上空。经过一阵低空盘旋，又悄悄飞走了。随后，白雪皑皑的阵地上出现了许多当地很少见到的苍蝇、跳蚤、蜘蛛等昆虫。不久，朝鲜一些重要城市和交通要道也发现了美机撒播的苍蝇、蚊子、老鼠、兔子等生物，还有食品、树叶棉化、传单等杂物。2月末3月初，美国飞机又侵入中国东北领空，在抚顺、新民、安东、临江等地撒播生物和杂物。

此后，疫情报告不断由各地传来。在当地历史上已经绝迹的鼠疫、霍乱等烈性传染病开始发生，回归热、天花、斑疹、伤寒等其他疾病也开始流行。3月份，志愿军中患鼠疫的有16人，患脑炎和脑膜炎的有44人，患其他急性病症的43人，其中36人死亡。

专家对美国飞机的抛散物进行收集和鉴定，触目惊心的事实呈现在人们眼前：美国为达到其战争目的，竟不顾公认的国际法准则，悍然使用大规模残害人类的细菌武器。早在1925年国际《日内瓦议定书》中，细菌武器就被明确规定禁止使用。

当美机在朝鲜洒播昆虫和杂物的消息刚传到北京，周恩来立即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2月21日，他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志愿军彭德怀、甘泗淇和东北军区高岗、贺晋年的电报，指出：“据许多征候来看，敌人最近在朝鲜所撒放的各种昆虫，显系进行细菌战行动，应引起我各级领导同志的高度注意。”

“现在的重要问题是必须抓紧每一分每一秒钟的时间进行细菌撒播区的消毒和隔离，克服麻痹大意和侥幸心理。但在部队中则亦应特别注意不要造成惊慌和恐怖。为便于掌握敌人继续撒放细菌和我们的防疫情况，请志司务应每日作一简报。”2月25日，周恩来又为中央军委起草《防细菌战指示》，指出，“根据许多事实（许多部队看到敌人用飞机撒下昆虫；很多比虫朝鲜人民过去从未见过，且季节上亦过早；朝鲜专家的化验报告；敌人所撒昆虫和投掷方法部与敌人以前准备细菌战时所研究的一样；敌军内在一月中旬集训军医进行瓦斯、细菌、原子力等训练等）都肯定地证明了敌人是在进行细菌战。”“各级领导干部和机关，必须把防疫工作当做目前部队和居民工作中的首要任务。”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下，一场驱扫瘟神的斗争立即全面展开。

首先，进行了声势浩大的反细菌战的宣传。1952年2月24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表示支持朝鲜政府反对细菌战的正义立场，指出：“如果全世界人民不坚决地加以制止，那么，今天落在朝鲜人民头上的灾难，明天就会落在世界和平人民的头上。”“中国人民将和全世界人民一道，为制止美国政府这一疯狂罪行而坚决斗争到底”！美机侵入中国领空后，周恩来再次代表中国政府向美国提出最强烈的抗议，指出：“美国政府竟公然破坏国际公约，违反人道，继在朝鲜进行大规模细菌战之后，又在我国东北大量撒布传播细菌的昆虫，企图以大规模虐杀和平人民的历来方法来达到其侵略中国、威胁中国人民安全的目的。”“这种穷凶极恶的残暴罪行，是中国人民绝对不能容忍的。它在中国人民的愤怒和反对之下，一定要遭受到可耻的失败。”在此同时，中国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各界知名人士和科学组织纷纷发表声明，抗议美国暴行，报刊上发表了大量反细菌战的报道和文章，沈阳等地群众还举行了游行示威活动。

当侵朝美军实施细菌战的罪行被揭露出来后，美国政府开始故作沉默，直到3月初才发表声明，称“联合国军过去没有进行过现在也没有进行任何细菌战。”周恩来提出，应当组织国内和邀请国际的专家、学者、知名人士到朝鲜和我国东北等地区进行实地调查，取得人证、物证，用事实向国内外揭露美帝发动细菌战的罪行。3月至4月，根据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决定组成的“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罪行调查团”分别到朝鲜和中国东北进行实地调查。3月至8月，朝中两国政府还先后接受了“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调查团”和“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到朝鲜和中国东北进行调查。这些调查团通过现场调查，收集了美军进行细菌战的大量证据，并根据这些证据分别公布了调查报告。“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在调查报告中指出：“朝鲜及中国东北的人民，确已成为细菌武器的攻击目标，美国军队以许多不同的方法使用了这些细菌武器，其中有一些方法，看起来是把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进行细菌战所使用的方法加以发展而成的”。他们号召“全世界人民都应加倍努力，使世界免遭战祸，并制止科学的发明被用来毁灭人类！”

为了进一步揭露美军罪行，周恩来提出，应举行“美帝国主义细菌战展览”，邀请国内外人士参观，扩大宣传。4月初，周恩来电告志愿军和东北军区。迅速将在朝鲜和我国东北地区的标本运来北京，组织专家进行审查整理。5月初，在中央防疫委员会的具体组织下，展览在北京、沈阳、朝鲜同时举行。毛泽东题了词：“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1952年到1953年，中国新华社还陆续公布了25名美国被俘飞行员关于美军在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进行细菌战的供词和公开信，这就使美国政府更加陷于狼狽不堪的被动境地。

在进行反细菌战宣传的同时，周恩来协助毛泽东，精心组织领导了除病灭害的斗争。周恩来指出，这次反细菌战工作，必须以战区为主，以军队为主，军民兼顾，统一组织，全面部署，统一行动，以求得彻底消灭帝国主义的细菌战争。防疫工作的部署应根据三个原则进行：划分不同的区域，采取不同的措施；分清缓急，明确防疫对象；在发动群众性防疫运动的基础上，结合专家指导，开展各项工作。

3月13日，政务院、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将原有的中央防疫委员会加以扩大和加强，由周恩来兼任主任委员，郭沫若、聂荣臻兼任副主任委员，以便更有力地领导全国防疫工作。全国各大行政区、各省市自治区、政务院有关部、委和志愿军、各大军区各军兵种都相继成立了防疫委员会。周恩来指出，各级防疫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收集敌人进行细菌战的情况和动态，研究反细菌战的对策，拟制本级防疫工作计划，贯彻上级防疫工作指示，检查下级防疫工作情况，总结交流防疫工作经验，组织人力物力对敌投疫情的侦察、敌投标本的采集和检验，进行防疫宣传教育，组织疫情的扑灭等。

同时，中央决定，在同内，由总参、总政、总后、公安部、卫生部等方面组成中央防疫办公室；战区由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联合司令部组织防疫指挥处；东北地区先由军区组织防疫办公室，以便分别掌握防疫的情况，交换情报，研究和领导前方的防疫工作和后方的支援工作。到3月底，全国共组织了129个防疫大队，共计万余人，在国内交通线及国境海港设立了66个检疫站。

志愿军和全国各地加强了疫情侦察和疫区划分。志愿军规定，军以下单

位要利用最快的通讯工具在每日 18 时向上级报告新发现的疫情,内容为敌机或敌炮投撒昆虫的地点、时间、面积、形状和疫病情况。综合全面情况,周恩来指出,防疫应主要由鼠疫为对象。同时也不放松对饮食传染和呼吸道传染疾病的防止。防疫区域的划分,以有无鼠疫和是否靠近发生鼠疫地为主要标志。

为了防止细菌和病疫的传播,3 月 12 日,周恩来以中央军委的名义,给志愿军和东北军区下达了《对目前防疫工作的几项规定》。规定指出,朝鲜和我国东北地区已成为紧急防疫区,除在朝鲜和东北境内进行消毒、注射、化验和必要的隔离外,急需对铁路交通进行有效的管制。凡由朝鲜进入东北和由东北进入关内的车辆,必须进行消毒。鸭绿江各口岸车站和山海关均分设防疫检验站,专负来往车辆和人员的消毒和注射之责。凡由关内进入东北和朝鲜的人员,均须强制注射。凡由东北和朝鲜进入关内和东北的人员中,发现有症状时,应进行隔离治疗,凡非十分必要的物资应暂停运回。必须运朝的物资应妥为包装。凡非十分必要的人员和部队,应暂停来往和减少调动。凡疫情严重的车站和地段,车辆经过时,应禁止停车和办理装卸。

在周恩来的组织领导下,全国迅速开展了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在全国防疫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会议上,周恩来强调,要通过这次运动,不仅将敌人的细菌战粉碎,而且要把卫生工作提高一步。中央防疫委员会给志愿军和全国各大军区防疫委员会下达了《扑灭昆虫及媒介动物注意事项》的指示。指示要求,凡敌机投下的昆虫和媒介动物,一经发现,除留必要标本及物证外,要立即扑灭,同时对扑灭的组织、方法、使用工具、药品等都作了明确规定。国内还加紧研制和发放了大量的疫苗和消毒杀虫剂。4 月 10 日前,对东北地区 485 万人进行了鼠疫预防注射,还向朝鲜运送各种疫苗、消毒剂、喷雾器和防疫衣物等。到 1952 年 6 月底为止,全国清除垃圾 1000 多万吨,疏通多年不通的沟渠 40 多万条,长 3 万多公里,填平臭水坑 5.7 万多个,捕鼠 3000 多万只,捕火蚊、蝇、蚤等害虫 185 亿多只,重 167 万多斤。

侵朝美军发动的细菌战,初期对朝中两国军民造成一定的危害。但由于及时采取措施,很快就控制了疫情的发展。经过近一年的努力,中朝两国军民彻底粉碎了美军进行的细菌战,美国不但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反而陷入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声讨之中。

抽薪止沸塞源断流——和平解决印度支那问题

西汉《淮南子·本经训》云：“以汤止沸，沸乃不止，诚知其本，则去火而已。”《资治通鉴·汉纪五十九》中习凿齿有道：“塞其本源而未流自止”。这些都是揭示事物因果联系，除因制果的精彩论断。它不能不成为军事谋略家的一条重要思路。

新中国成立后，为履行国际主义义务、维护自身安全，中国在进行抗美援朝战争的同时，还以不出兵的方式进行了援越抗法的斗争。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根据朝鲜停战的先例，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提出建议，表示愿意同法国讨论和平解决越南问题。1954年1月，苏联倡议召开日内瓦会议，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英、法政府赞同。然而，这时美国政府却另有打算。他们不甘心朝鲜战争的失败，不愿从朝鲜及中国的台湾海峡撤军，还试图出兵印度支那，扩大印支战争，从另一个方向对中国进行军事威胁，并保持国际紧张局势。美国侵略企图，是亚洲局势不安定的重要根源。

日内瓦会议召开前，周恩来前往莫斯科，同苏联、朝鲜、越南领导人进行会商，达成一致看法，决定采取“联法抗美”的策略，争取和平解决印支问题。

日内瓦会议于1954年4月至7月召开。起初，法国政府中的主战派和越南保大伪政府中声称越南民主共和国是没有固定领土的“幽灵”。为显示力量迫使法方让步，越南人民军在中国强有力支援下，于5月7日，一举攻克奠边府，歼灭敌军万余人。这次战役造成了很大国际影响，法国国内反战情绪更高，主和派势力占据上风。

日内瓦会议上，中、越、苏等国代表团结一致，与法、英、美等国代表进行了激烈的谈判斗争；同时，在谈判中遇到难点时，中、越代表也互相协商，研究对策，妥善解决。

首先，关于停火问题。法国政府不愿宣布停火，美国方面也极力纵容破坏。会谈开始了三个多星期，未获得实质性进展。越南代表团团长、副总理范文同表示：越方主张就地停火，稍加调整，等待普选。周恩来认为，越南战场的实际情况是，双方占领区犬牙交错，而敌方又占据中心区和交通线，如就地停战，则越南力量容易被分割，而难以长期生存。这种想法，在会前中、苏、越商讨时，他已作了说明，并且提出了争取以16度线为界实行停战的方案。当时，越南方面曾表示同意，而开会时，又出现了顾虑。周恩来与范文同会商时，向他分析说：如果就地停战，则尚处于敌方控制中的红河三角洲及河内、海防等大城市均无调整的可能。各根据地过于分散，在南越的容易被敌人挤掉，在北越、中越的也不能得到必要的加强。即使以后能够实现普选，也会居于不利地位。周恩来还以朝鲜战争为例说明美国干涉的严重性，并结合中国的“皖南事变”和日本投降后及时撤出江南根据地以争取东北的经验，说明进退的辩证关系。这些，都使范文同受到启发。在与法国总理会谈时，周恩来严正表示，让步应是双方的，不能指望一方让步。根据周恩来的建议，中、越、苏提出了停火和区域调整的建议，法国表示接受，会谈终于获得进展。

其次，关于从老挝、柬埔寨撤军问题。商讨这一问题时，法国表示同意从老、柬撤军，同时要求越南也从这两国撤军。这时，越方虽有武装人员在这两国，但并未公开承认，所以对这一要求不予答复。美国利用这一机会，

与法国暗中达成协议，由美方向老、柬援助 3 个师的兵力，向越方施加压力。谈判遇阻，面临破裂的危险，周恩来向越方建议，承认有越南“志愿军”在老、柬作战，可以按照撤退一切外国军队的办法办理。越南反复考虑后表示同意。于是，周恩来会见法国代表，提出在老、柬撤出包括越南志愿军在内的一切外国军队的建议。英、法代表团立即表示愿意商讨。最后会议达成了有关方面军事代表就老、柬问题进行直接谈判的协议。美国虽然反对，但已陷入孤立。

经过近三个月的斗争，日内瓦会议最后就印度支那问题达成协议：法军撤出印度支那三国，越南军队从老挝、柬埔寨撤出：原老挝抗战武装以桑怒、丰沙里两省为集结区；柬埔寨抗战武装就地复员。柬王国政府保证他们享有同于全国公民的权利，印度支那成为和平区。

对于这样的结果，美国大失所望，其代表拒绝在协议上签字。但是由于英国、法国和老挝、柬埔寨两个王国政府都赞同这种解决方式，美国政府被迫声明“美国将不使用武力来干扰这一决定”。1954 年 8 月 8 日和 12 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两次会议得出结论，日内瓦协议时美国是一场“灾难”。

五十年代初，美国的侵略，对亚洲和世界和平构成严重的威胁。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上所作的斗争，犹如抽薪止沸、塞源断流，对于制止当时印度支那战争升级，美国对印度支那直接的武力介入起了重要作用，维护了国际和平。

经济篇

贵食之本重政之正——管好用好中国的土地资源

很久以前，我国有一位思想家曾说：“四海之内，六合之间，曰，奚贵？曰，贵土，土，食之本也”。又有一位作者写道：“地者政之本也、是故地可以正政也。地不平均和调，则政不可正也，政不正则事不可理也。”如此重视土地，是因为土地是基本的生产资料，是物质财富的源泉之一。马克思说：“劳动并不是它所生产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正象威廉·配第所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重视土地，一方面要设法理顺土地的所有与经营关系：另一方面要根据土地的经济供给的稀缺，设法实现土地的最佳利用。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片面追求一大二公的所有制关系和高度集中的经营管理方式，搞乱了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刚刚理顺的土地所有与经营关系，损伤了广大农民的劳动积极性，招致了土地生产力的倒退和巨大破坏。另一方面，由于大办钢铁、大办土铁路、大办社有经济、大办水利、大办城市建设等主观蛮干，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和土地资源的极大浪费。

1962年，周恩来认真总结了“大跃进”的教训。1月20日，他建议刘少奇对7000人大会的书面报告，把所有制的改变要根据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农民觉悟程度来决定的意思补写进去，并说对自留地、家庭副业也补写几句为好。与此同时，周恩来多次强调要爱惜土地，要保证粮食耕种面积不致减少。

1月8日，周恩来说，过去我们有些盲目性，想一下子把工业发展起来，结果造成了不平衡和人为的破坏现象。他对城市建设、办工厂大面积占地很不安。并说，我们自开国以来占了1300多万公顷好地，全国只有耕地11400多万公顷，一下子就占去1/10，很痛心。虽开了点荒地很有限，要接受这个教训。我国地方虽大，但真正能耕种的地并不多，苏联和美国都比我们大约多一倍。以后要往山地发展，我们将面临些新的问题。

2月7日，周恩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为纠正错误、正本清源，他以身作则承担责任。在总结基本建设战线过长的教训时，周恩来特别说了两个问题。一是不爱惜土地，占用耕地过多。我们国家幅员很大，但是可耕地并不很多，人门密的地方，耕地恰恰比较少。12年来，为了搞基本建设、城市建设、水利建设，交通建设等等，占用的好地超过2亿亩以上。而12年来，开荒不过1亿多亩，增减相抵，少了1亿多亩好耕地，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另一个问题是拆掉民房太多。在城市搞基本建设，拆掉了很多城市的民房，搞水利、交通工程，拆掉了很多农村的民房。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的拆迁户，都要挤占耕地建房以安置他们。

工业建设和城市建设的过速发展，不仅在资金、原料、劳动力等方面限制了农业的发展，而且还在土地（在经济学上也包括水）配置方面使工农业比例失衡，从而加剧农业的萎缩和整个社会经济的不稳定。4月8日至9日，周恩来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说，目前的农业生产条件，在某些方面，不如第一个五年，粮食耕地面积减少了，人力弱了，地力弱了，畜力弱了。1962年的农业总产值比1957年下降22%，比重由44%下降到32%，各种农产品产量只相当1951—1952年水平。而1962年工业总产值是880亿元，比1957

年的 704 亿元增长 25%，这是不相适应的，在这样农业基础上，工业生产水平是不稳固的。

如何保证农业的发展以及耕地的绝对数和人均面积的不致下降？周恩来主张按照“先抓吃穿用，实现农轻重”的原则对国民经济进行大的调整。同时，强调进行土地资源的国情教育和倡导计划生育以控制人口增长。1963 年 10 月，周恩来指出，“我国资源有两个很大的弱点，第一，耕地少，不到 16 亿亩，在全国土地总面积中不到 12%。将来要扩大到 20 亿亩，这需要经过很大的努力。等到我们扩大到 20 亿亩时，我国的人口又要增加到 10 亿左右了。第二，我国的森林覆盖面积也很小，不到全国土地总面积的 10%。所以每年要有那么多人在农村就业，也不是很容易的。根据这种情况，我们教育青年，除了首先要使他们知道我们这个江山来之不易，还要教育他们上山下乡，爱护耕地，爱护山林，发展农业，发展畜牧业，并且努力造林，发展辅助食品、木本油料以及其它各种经济作物的生产”。

学习周恩来爱惜土地的几次讲话，他有两个方法特别值得我们珍视。一是掌握具体数字。周恩来对于每年耕地增减的数字，对于人均耕地的增减数字，对于国土面积与耕地面积与森林覆盖面积的比较，对于中国与其他大国耕地绝对数与人均占有数的比较，都了如指掌。周恩来解决其它经济问题亦有掌握具体数字的方法特点。二是思考百年大计。将来耕地的绝对数能不能增加？增加的极限是多大？随着人口的增加，人均占用耕地会不会下降？如果放任食之口日增，耕之地日减，我们的子孙后代还有没有方寸可耕之地？正是基于这些思考，他号召爱护耕地，通过垦荒努力增加耕地，通过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以保证人均耕地的一定数量。1963 年 7 月 22 日，周恩来说，从 1949 年到现在，每年生产 1500 万人，过去 15 年，出生的婴儿共 22500 万人，每年都要安排就业升学。他认为，若不实行计划生育，我们留给后代的人多地少的包袱将越背越重。与爱护耕地相联系，周恩来在水利、林业方面亦表现了思考百年大计的特点。周恩来在土地方面掌握具体数字、思考百年大计的方法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每一个公民特别是村、乡、县、省以及各个部门的领导同志，若都能掌握土地方面的具体数字，都能为子孙后代着想，那就能够增强爱惜土地的自觉性。

10 多年改革，我国农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随着工业建设、城市建设、乡镇企业和农村建房的发展，以及工业污染对一些耕地的破坏，1919—1987 年中，全国共减少耕地 5251 万亩，其中仅 1985—1986 年的两年中就减少 2400 万亩，全国人均耕地由 1949 年的 2.7 亩降到不足 1.4 亩。李先念 1988 年 4 月到河北栾城视察，当他得知那里的人均耕地已由土改时的 3 亩下降到 1.6 亩时，语重心长地说：1 亩耕地可以养活两三个人，占 1 亩耕地就等于剥夺两三个人的饭碗，乱占耕地等于杀人。进行建设要少占土地。

党中央指出，全国都必须继续认真贯彻实行计划生育和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让我们重温周恩来 60 年代调整时期爱惜土地的几次讲话，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为坚决制止和纠正滥占耕地现象，为实现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而奋斗。

细察粮情躬亲粮政——制作“哈达表”和改革粮食工作制度

根据周恩来工作台历的记载，从1960年6月到1962年9月，两年零四个月里，周恩来关于粮食问题的谈话达115次，其中1960年下半年19次，1961年51次，1962年45次。他及时审阅粮食报表，精心计算粮食的安排，多次出京调查粮食情况，解决粮食调拨问题。

从周恩来办公室退给粮食部办公厅，现仍保存的32张报表中，周恩来的笔迹计有994处之多。例如在《1962年至1963年度粮食包产产量和征购的估算》这张表上，周恩来用红蓝铅笔作标记145处，调整和修改数字40处，在表格边上进行计算6处，批注数字70处，批注文字7处，整个表格密密麻麻的留下了周恩来的手迹。这些报表作为珍贵的历史文物，既反映了周恩来认真负责的工作精神，也表现了周恩来解决当时最困难的粮食问题的杰出才能和智慧。

当时，由中央安排调拨的粮食除了增加进口粮外，又增加了一些列入中央开支的专项用粮，头绪繁多，原来的粮食报表已不适用。为了能够一目了然地反映出省间调拨和中央粮食收支情况，周恩来亲自设计了一张《中央粮食调拨计划表》。这张表由于长，被称为“哈达表”；由于清晰、明了，后来一直使用它安排中央粮食收支调拨计划，检查执行情况。

周恩来抓粮食工作，还十分重视粮食工作制度的改革。1962年以前，我国粮食年度是7月1日到下年6月底，从各地调粮支援缺粮地区，当年的夏粮调不出来，因为夏收小麦在6月，从收割到入库正好跨了两个粮食年度。周恩来说，这个办法不合理，应当改一下。当年生产的粮食当年就应该能用上，这是个原则。经反复研究，粮食年度改为从4月1日起到次年3月底止。这样，北方最晚的庄稼已收割入库，南方最早的粮食还没下来，可以做到当年生产的粮食当年使用。这虽是个具体问题，但牵涉面宽，各省过去的统计概念和数字都要重新改过来。周恩来把这件事向毛泽东汇报并征得同意后，亲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宣布。

1961年3月，周恩来说：“下去调查，要敢于正视困难，解决困难。”“畏难苟安，不是共产党人的品质。”周恩来既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细察粮情，躬亲粮政则是一个具体表现。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摸清行情进口粮食以济急需

“大跃进”之后，由于天灾人祸，我国经济形势异常恶劣，不少地方发生了饥荒，饿死了很多人。粮食成为当时最突出的问题。很多城市只有几天的库存，粮食部白天黑夜都有人打电话来催要粮食。

为了解决粮荒，周恩来想了很多的办法。办法之一是进口粮食。

1960年底，在周恩来亲自督促下，从澳大利亚进口的第一般粮食到了天津。

1961年，我国要进口500万吨粮食。怎样才能进口这么多的粮食并将其顺利运回国内？周恩来决定派随同他访缅甸的雷任民从缅甸直接去香港，了解国际市场上的粮食行情，搞清楚三个问题：其一，能否买到粮食；其二，能否找到运粮的商船队和能否运走（在当时美国对华封锁禁运的背景下，担心海上有挟持）；其三，中国银行的外汇能否周转，有没有能力买这么多粮食。

雷任民带着这三个问题去了香港，经过调查摸底后，向周恩来作了汇报：第一，国际市场上粮食货源充足，加拿大、澳大利亚都有粮食急于要卖；第二，这两个国家经济上有地位，政治上有影响，购买这两个国家的粮食没有什么风险，还可以采用到岸付款或租外轮运输的方法；第三，中国银行支付这么一大笔外汇确有一些困难，但经过仔细的统筹安排还是可以周转的。

周恩来掌握这些情况之后，立即决定向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买进了一些粮食，缓和了国内粮食紧张的形势。

此后，我国连续几年每年进口500万吨粮食，这批粮食虽然占我国粮食总量的比重很小，但在全国的粮食调节上却起了很大的作用：其一，减少了产粮区的调出；其二，保证了重灾区的粮食供应；其三，避免了京、津、沪、辽粮食脱销的危险；其四，补充了部分国家库存。

借题发挥意在酒外——连干三杯酒调粮三亿斤

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为了帮助严重缺粮的省份渡过难关，周恩来亲自抓粮食调拨工作。有些难以实现的粮食调拨任务，却在周恩来的动员说服中得以实现。周恩来向江西调粮即是一例。

1961年9月，中央庐山工作会议之后，周恩来下庐山到南昌视察。

一天晚上，江西省的领导同志与周恩来共进便餐，同叙国事，气氛十分热烈。周恩来借《江西是个好地方》这支歌子，风趣地说：“这个歌儿不错，江西确实是一个好地方，三面环山，还有鄱阳湖，既是鱼米之乡，又是革命老根据地，这些年，你们工作抓得很不错！粮食也比较多嘛！”

听了这番话，在江西省委分管农业的刘俊秀高兴地站起来向周总理举杯：“南昌是总理领导八一起义的英雄城，人民解放军的诞生地，总理离开南昌34年了，今天来到南昌视察工作，我们心里格外高兴，为总理的健康敬一杯酒！”

周恩来也站了起来，双手交叉抱在胸前，借“敬酒”这个话题进行了发挥：

“江西对国家贡献是大的，特别是这几年暂时困难时期，又多支援了国家粮食，应该受到人民的表扬。俊秀同志，你要敬我一杯可以，但有条件！”

“有什么条件？”刘俊秀说。

“干一杯酒，要增加外调粮食1亿斤，我们干3杯，增加3亿斤好不好？”

“总理啊，国务院今年给我们的外调粮任务12亿斤，我们保证一粒不少，坚决完成，再增加3亿斤就是15亿斤了，怕有些困难啊！……”刘俊秀有些不敢承担了。

这时谭震林、罗瑞卿站起来鼓动刘俊秀说：“老刘啊！总理多年没有来南昌了，看到你们江西形势比较好，心里很高兴，你既然敬总理的酒，敬三杯！3亿斤就3亿斤嘛！”

周恩来接着说：“我有调查，江西老表口粮水平比较高，还有储备粮，比严重缺粮的晋、冀、鲁、豫好多了。增加3亿斤虽有困难，还是可以完成的！”

刘俊秀想，国家面临这么大的困难，周总理是全国人民的当家人，今天亲自向江西要粮食，再困难也要想办法拿出3亿斤粮食来。于是，他答应接受增加调粮的任务：“可以！就按总理的意见办。总理的心情我们理解，国家有困难我们应该大力支援，3亿斤就3亿斤！”

这时，周恩来兴奋地拿起酒杯同江西省的领导连干了三杯。

后来，经过江西省委研究，同意周恩来的意见，决定增加3亿斤外调粮。到1962年6月，江西省基本上完成了15亿斤外调粮的任务，缓解了其他省的粮荒。

顾全大局整体协调——从黑龙江调粮 30 亿斤

1962 年 1 月 6 日至 2 月 6 日，周恩来先后 12 次与有关中央局第一书记、有关省第一书记谈粮食问题。他列举历年的粮食细帐，指出，1962 年国家统一支配的粮食差 100 亿斤左右。3 月至 4 月，他又多次约谈东北三省的粮食问题。5 月底至 6 月下旬，他到东北一省调查研究，目的是贯彻经济调整的方针，解决粮食调济问题。

一次，周恩来在辽宁召集东北三省领导同志开会，讨论粮食调济问题。黑龙江省欧阳钦和主管财贸的杨易辰参加了会议。

黑龙江是全国重要的产粮基地，当时的经济状况虽比有些省稍微好一些，但粮食也很紧张。人吃马料，马代人死，不少人患浮肿病。但从全国的大局出发，为了解决更困难的省份的缺粮问题，1962 年初中央给黑龙江省下达了调拨 28 亿斤粮食的任务。

这次会上，周恩来向杨易辰提出要黑龙江省再增拨 2 亿斤粮食支援外地。

杨易辰认为黑龙江已经调出不少粮食，为国家作出很大贡献，再要多调出 2 亿斤粮食，实在有些困难。他是个直性子，想不通的事也不晓得转弯，当场就同周恩来争了起来，表示对再增调 2 亿斤粮食有意见，要求中央考虑黑龙江的实际困难。

在杨易辰“顶牛”时，周恩来不是盛气凌人，强迫其执行命令，而是耐心地等待他把肚子里的话全倒出来，然后推心置腹地同他交谈。周恩来说：黑龙江有困难，但其他省份更困难，很多省死了不少人，国家要拿出粮食来帮助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全国上下团结一致，同心同德，才能渡过难关。每一个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一定要顾全大局，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坚决支持和执行中央的统一部署。

周恩来的话沟通了与杨易辰感情与思想上的交流。他感到自己确实是考虑黑龙江的利益多了，想全国的利益少了。于是，他在行动上坚决执行了中央的调粮计划，想方设法完成了调粮 30 亿斤的任务。

30 亿斤粮食，对正常年景的全国粮食数字来说，这是个不起眼的小数。但在 60 年代初的困难时期，30 亿斤粮食是个大数啊！

它能救活很多人命，能解决许多地方的燃眉之急。多少年过去了，周恩来仍然记着在救命粮问题上，杨易辰对中央的支持。“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杨易辰受到造反派批斗。周恩来在一次会上理直气壮地对黑龙江省造反派头头说，杨易辰是干工作的，是顾全大局的，困难时期支持中央，应该让他出来抓生产。周恩来对杨易辰设法进行了保护。

以出养进一举数得——出口大米进口小麦调剂品种增加外汇

经过 5 年的国民经济调整,到 1965 年,我国的粮食生产形势已明显好转。在这种情况下,我国还需要不需要大量进口粮食。为此,周恩来把有关部门的负责人找去,同他们一起研究,特别是同他们一道对国际市场上的大米价格和小麦价格进行了对比计算。当时,一吨小麦价格是 60 多美元,大米价格是 100 多美元,出口一吨大米至少可以换回一吨半小麦,虽然我国进口小麦量大于出口大米量,但加上出口大豆等粮油产品,一进一出,在金额上大抵平衡。周恩来果断地提出了出口大米、进口小麦的以出养进方略。

“两利相权哪个重,两害相权哪个轻,要比较。”这是周恩来解决复杂问题,作出重大决策时运用的一个重要方法。对出口大米、进口小麦,他经过比较、计算,认为一举数得,对国家有利。第一,出口大米,进口小麦,可以多得粮食,增加外汇。第二,进口小麦供应京、津、沪、辽,有利于农民休养生息;并且,小麦便于储存,以备急需。第三,海运费便宜,相反,靠陆路从我内地运粮到沿海大城市,运费高;通过海运进口小麦供应沿海大城市,既可以节约运费,又可以缓解内地运输紧张状况。周恩来在 1967 年 10 月接见全国粮食会议代表和 1969 年 8 月接见全国农机工作会议代表时都谈到:通过进出口,可以调剂粮食品种,增加储备,出口好大米、好大豆,差不多可以换回二倍小麦。

执行周恩来“以出养进”的指示,粮食部门和外贸部门通力合作,取得了一举多得的可喜成果。1971 年至 1976 年小麦、大米等进出口相抵,国内增加粮食 187.33 亿斤,还给国家增加外汇收入 7.27 亿美元。

蓄泄兼筹鲇禹结合——处理蓄水与泄水的关系

鲇和禹都是传说中的中国古代治水英雄。“帝尧之时，洪水滔天”，浩浩荡荡，漫山遍野，“下民其忧”。帝尧到处访求能治水的人，群臣推荐用鲇治水。鲇采用水来上挡的办法治水，“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死于治水任上。禹继审了父亲鲇的治水事业，改而采取疏导的办法，薄衣食，卑宫室，陆行乘车，水行乘船，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披日月，“决九川致四海，浚畎浍致之川”，终于获得了成功。这一传说表明中国治水自古就有蓄泄之争。

1950年6月至7月，豫皖交界地区连降暴雨，百年未有。史、洪、淮、淝数河洪水并涨，水头高达丈余，皖北一半以上的地区被洪水吞没。由于水势凶猛，灾民们来不及逃走，或攀登树上，失足坠水（有在树上被毒蛇咬死者），或船小浪大，翻船而死，人民的生命财产损失惨重。毛泽东为此落了泪，提出了根治淮河的伟大号召，并由周恩来具体过问治淮之事。如何根治淮河？在周恩来亲自参加的8月至9月的治淮会议上、河南、安徽力主排水泄洪，而江苏则极力反对，蓄泄之争，十分激烈。

大地接受的降雨量是不均衡的，河流输送的径流量也是不均衡的。这在全世界都如此。在我国，由于受季风的影响，水资源在时间和空间分布的不均衡更加显著。干旱时滴水贵如油，水涝时良田成汪洋。蓄水对预防旱灾，对兴灌溉与舟楫之利是十分重要的；泄水则对防洪排涝是十分重要的。单纯地蓄水或单纯地泄水，都是片面的，都不能全面达到除害兴利的要求。为解决蓄泄之争，周恩来反复召集各单位负责干部讨论、协商，开大会解决问题达六次之多，会下还与同志个别谈话，征求意见。在综合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周恩来运用唯物辩证法和现代科学技术的观点，提出了蓄泄兼筹的治淮原则。他说，淮河是一下大水，一下干旱。水量不多，但山洪很多，到平原水的流动又慢，因此调节水量很重要。在蓄泄兼筹的原则下，还做出了淮河上游以蓄洪发展水利为长远目标，中游蓄泄并重，下游则开辟入海水道的重大决策。由于指导原则和决策的正确，到1951年7月底，根治淮河的第一期工程胜利完成，结束了淮河“大雨大灾，小雨小灾”的悲惨的历史，达到了“大雨减灾，小雨免灾”的初步目的，并为淮河流域水利资源的全面开发打下了基础。

20年后，周恩来总结治理海河的经验教训，提出鲇禹结合，进一步丰富了蓄泄兼筹的治水方针。

1963年8月上旬，华北平原西部、太行山脉的东侧，不少地方旬内暴雨日数有5、6天，有的地方连降暴雨4、5天，旬雨量普遍超过300毫米，安阳至保定一线在600毫米以上，河北的赞皇达1187毫米，邯郸1034毫米，河北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洪灾。1964年，河北很多地方从4月份开始下雨直到10月初，有的地方下10多场雨，大部分地方下40多场雨，沧县和衡水两个专区平均降雨1000—1300毫米，加上客水流入，造成部分县大面积积水，出现了严重的涝灾。河水连续两年的洪灾、涝灾之后，开了大中八条入海口，遇大洪水时可分路排水入海。但是，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河北又出现了连年干旱，连白洋淀都干了。1972年春夏之交，因干旱，天津出现了供水告急。对此，周恩来说：水天天需要，须臾不可少，须臾不可多。他提出，治水要鲇禹结合起来才好，光当鲇不对，光当禹也不行；走和留不能只强调

一面，只强调留不对，不留也不行。在周恩来过问下，抗旱防涝，推动了华北农业的发展。

蓄泄之争，不仅在建国初期的淮河治理上有反映，而且多反映到全国水利建设的指导方针上。周恩来总是坚决地站出来纠正片面性，始终坚持蓄泄兼筹的方针。

1958年至1960年的“大跃进”时期，淮河流域的一些领导，面对治淮的初步胜利，头脑发热，否定了蓄泄兼筹的方针，片面强调群众修水渠，节节拦水，不讲排水。他们把群众遍地修渠，在沟里一节节把木拦住，叫“葡萄串”；在地面上一片片拦住水，叫“满天星”。这种做法被概括为“蓄、小、群”（蓄水为主、小型为主、群众自办为主）的治水方针，由于得到毛泽东的肯定，在报刊上广为宣传，在全国大力推行，并把持不同意见者戴上“排、大、国”的帽子进行批判斗争，引起了极大的思想混乱。推行“蓄、小、群”为主的方针，结果，在黄淮海平原造成严重的涝碱灾害和排水纠纷。

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大家对“蓄、小、群”意见很大。2月9日，周恩来在国务院会议厅主持召开了解决水利纠纷问题会议。会上，他责成有关负责人亲自到淮河流域现场查勘，听取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并向他汇报。后来，在有关的省委书记参加的会议上，他重申了蓄泄兼筹的方针，形象而深刻地说：“我问过医生，一个人几天不吃饭可以，但如果一天不排尿，就会中毒。土地也是这样，怎能只蓄不排呢？”

“文化大革命”动乱中，“蓄、小、群”的“三主方针”被再次提出。红卫兵还以钱正英没有执行毛主席支持的“蓄、小、群”的“三主方针”为由，对钱正英进行批判。对此，周恩来说：“这不是钱正英的问题，”“我们当时没有经验，都有责任。”同时，周恩来还从根本上指出：“排（到大海）、大（型）、国（家办）与蓄（水）、小（型）、群（众办），这两句话不能绝对讲，不能只要这不要那”。周恩来的努力，不仅保证了钱正英站出来能够顺利地开展工作，而且在当时特定的条件下再次澄清了对蓄泄关系的认识。

百家争鸣博采众长——对待长江黄河治理的不同意见

海纳百川，其容乃大。一个领导者只有善于听取各种不同的意见，善于博采众家之所长，才能保证决策不出差错或减少出差错。

周恩来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达 26 年之久，在内政、外交特别是经济建设的决策中，他从不自以为是，而是乐于同大家商量，倾听各种意见，让种种意见充分争论，以便集各家之长。周恩来说：“唐代皇帝李世民，能听魏征的反对意见，‘兼听则明’，把唐朝搞得兴盛起来。他们是君臣关系，还能做到这样，我们是同志关系，就更应该能听真话了。”周恩来在亲自领导和指挥新中国水利建设的过程中，典型地表现了他百家争鸣、博采众长的决策方法。

一个大的水利工程，技术要求很高，影响它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因素极其复杂。水利专家们从不同的立场、不同的经验、不同的理论水平、不同的视角、不同的兴趣出发，其看法和主张的分歧是不可避免的。治理长江、黄河的工程，规模巨大，举世瞩目，其复杂性更高，不同意见的对立更是在所难免。但是，周恩来采取百家争鸣，博采众长的决策方法，调动了各方面水利专家和不同地区干部群众水利建设的进取心和向心力，保证了许多重大水利建设决策的正确性及其顺利实施。

1954 年长江大水，推动了长江流域规划主体三峡工程的研究。1956 年 6 月，毛泽东三次畅游长江之后，写下了“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的雄伟诗篇。一时三峡工程成了人们的热门话题，并产生了要求三峡工程上马和反对上马的激烈争论。1958 年 1 月，中央南宁会议上，以林一山和李锐为争论双方代表，各自向中央力陈了自己的主张。毛泽东指定周恩来具体过问三峡工程。2 月底到 3 月初，周恩来溯江而上，视察了荆江和三峡，广泛听取了各种不同意见。3 月 5 日，周恩来在积极准备兴建三峡枢纽会上，充分肯定了争论的意义和必要。他说，两年来的争论是必要的，不争论哪会有这样多的材料回答各个方面提出的问题？在今后工作中，还允许有反对的意见，这是我们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三峡是千年大计，对问题只看见一面，很容易走到片面，为使三峡搞得更好，还是可以争论的，因为这样才有利于工作，而不是妨碍工作，这是在促进事物的发展而不是阻碍事业的前进。周恩来经过实地调查和综合各方面意见，认为“高峡出平湖”是伟大的理想。他说，主席有伟大的理想，我们要全面领会。理想总是要实现的，但是要经过一个历史时期，不能急，不能随便搞。周恩来十分赞赏毛泽东“高峡出平湖”的雄伟气魄和伟大理想，并努力为之奋斗，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但周恩来反复强调理想不能代替现实。他始终认为三峡是关系到中华民族前途的大事，始终以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戒慎恐惧的态度对待三峡问题。他在条件不充分，情况没摸透，各种意见尚难统一的情况下，一直没有做出三峡上马的决策。这种决策态度，在头脑发热的“大跃进”年代，在周恩来身受反冒进的压力和责难下，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黄河三门峡工程 1957 年开工后，泥沙淤积问题不断引起上游的疑虑，几种意见争论不下。一种意见针对淤积，认为没有兴修三门峡水库的必要；另一种意见是把坝再提高一些；还有一种意见是把全部泥沙都放下去，只拦洪，不发电，不灌溉。1958 年 4 月 21 日至 24 日，周恩来亲自主持三门峡现场会议。周恩来在总结发言中，首先肯定了不同意见展开争论的必要。他说，这

个会是有意以地要听取不同意见，树立对立面。如果说这次我们在水利问题上，拿三门峡水库作为一个中心问题，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百家争鸣的话，那么现在只是一个开始，还可以继续争鸣下去。综合各方面的意见，周恩来根据原规划设计蓄水位海拔 360 米，改为大坝按 360 米设计，350 米施工，初期蓄水位降为 335 米。1960 年 9 月，三门峡大坝建成蓄水，泥沙淤积情况比预计的要坏得多，且日益严重。围绕三门峡工程的治黄大论战更加激烈。1964 年 12 月，在周恩来主持下，又召开了一次治黄会议。周恩来说：“治理黄河规划和三门峡枢纽工程，做得是全对还是全不对，是对的多还是对的少，这个问题有争论，还得经过一段时间的试验、观察才能看清楚，不宜过早下结论。”“不管持哪种意见的同志，都不要自满，要谦虚一些，多想想，多研究资料，多到现场去看看，不要急于下结论。”“不要自己看到一点就要别人一定同意。个人的看法总有不完全的地方，别人就有理由也有必要批评补充。”这次，周恩来综合各种意见，批准了二洞四管的改建工程，变原来的蓄水拦泥为滞洪排沙。改建后效果很好。

周恩来对治水的不同意见，就是这样既不全面肯定，也不全面否定，“而是集中对的，去掉不对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他说：“这样才能不断前进。”

周恩来对国外治水专家的意见也体现了百家争鸣、博采众长的思想。1944 年美国萨凡奇提出过“三峡开发初步计划”。萨凡奇拟定的三峡坝址是在石牌至南津关长约十公里河段上。但那里江面狭窄，且存在“卡斯特”（溶洞）问题。新中国的设计者拟定花岗岩地质的三斗坪做三峡坝址。1958 年 3 月初，周恩来视察三峡时问林一山，萨凡奇作的三峡设计，你们有吗？并说，萨凡奇虽然是个美国人，但他是一位科学家。如果要否定南津关坝区，也要有料，三峡大坝是世界性问题，有了根据也可以说服萨凡奇。1958 月底，北戴河长江会议上，周恩来再次指出，萨凡奇只搞了一个南津关坝区，可是他提出了问题，是有功的。为了否定南津关坝区也要多花一些力量。对世界高坝应作些研究，科学家要摆问题，以论证。1957 年初，周恩来出访阿富汗。考虑国内根治黄河水的措施，为弄清有关水坝淤塞问题，亲自向正逗留在阿富汗的德，美国和苏联的水利工程师询问、了解水坝的含沙量等有关资料。对外国专家的意见，既不盲从，也不排斥，而是取其所长，避其所短。这不仅仅是周恩来在治水实践中体现出来的一个重要决策方法，而且是周恩来对外关系的一个重要思想。“一切国家，一切民族，都有长处，也有短处，有优点，也有缺点”。“敢于向一切国家的长处学习，就是最有信心和自尊心的表现，这样的民族也一定是能够自强的民族。”

现在建设社会主义，实行改革、开放、搞活的政策，各种问题要复杂得多。各项重大决策的形成过程中，只有通过百家争鸣，博采众长，才能比较正确，少出差错；出了差错也能较快地发现和改正。

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我们不能苛求每个领导都要有周恩来那样高超的领导艺术和卓越的决策才能，然而，每一个领导者根据自己的具体岗位和实际情况，从周恩来的领导艺术和决策方法中吸取教益，对我们的事业是大有好处的。

南水北调打井抗旱——解决北方缺水与南粮北调问题

中国大陆受季风影响，降水量夏多冬少、南多北少。而且在时程上降水高度集中，常导致洪灾和旱灾交替发生。因季风出现的频率、强度及挟带水汽量等在各年间有所不同，降水的年际变化也很大，常有连续多年的丰水和连续多年的少水情况的出现，加剧了洪灾和旱灾的严重性。在我国北方尤以旱情为重。

历史上由于北方缺水，严重影响了北方农业的发展。自宋开始，经济中心南移，长江流域成为漕粮的主要供应地。大运河在唐、宋、元、明、清各个朝代都是连接北方政治权力所在地与南方经济区之间的生命线，元、明、清三代更加突出地成为南粮北调的运输线。元、明、清时期许多官吏建议或尝试用发展海河流域农业生产所得到的粮食代替江南运来的漕粮，虽偶有小成，但从未扭转过南粮北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北方常常春旱秋涝、旱涝交替，有时连年干旱，严重威胁着农业生产。根据 1965 年统计，山西、河北、山东、河南、陕西、内蒙、辽宁、北京八个省、市、自治区，人口占全国的 34%，耕地占全国的 40%，而粮食产量只占全国的 27.5%。当时，这个地区的粮食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国家每年都要南粮北调、甚至用进口粮食来解决这个地方的民食问题。

如何解决北方缺水、南粮北调问题？周恩来任国家总理期间，对此进行了精心的筹划，付出了极大的努力。

从长远的目标和根本上解决北方干旱问题着眼，周恩来赞成南水北调。

南水北调的设想是毛泽东提出来的。1952 年 10 月底，毛泽东视察黄河时曾说：“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一点来是可以的。”1953 年 2 月，毛泽东视察长江，目的就是想探求向长江借水，南水北调，解决北方缺水问题。1958 年 3 月，中央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打开通天河、白龙江与洮河，借长江济黄。丹江口引汉济黄，引黄济卫，同北京连起来”的南水北调方案。

周恩来具体过问南水北调工程。他十分重视把务虚与务实、理想与现实、目标与步骤、远景与近期、战略与战术结合起来。

1958 年 8 月，从北京到北戴河的飞机上，周恩来向林一山询问了丹江口工程和中线南水北调规划。林一山说：“丹江口工程正常水位 175 米最好，保证有 200 多亿立方米水量从方城缺口直通华北平原，是引长江三峡之水北去的组成部分。”周恩来指着中线南水北调的规划图问：“这里有一个始皇沟？”林一山说：“这是宋朝程能献带领 30 万民工开的，中途停止。现在南水北调的渠道正好经过这里。”

8 月 29 日，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水利工作的指示》，强调：“除了各地区进行的规划工作外，全国范围的较长远的水利规划，首先是以南水（主要是长江水系）北调为主要目的即将江、淮、河、汉、海河各流域联系为统一的水利系统的规划，和将松、辽各流域联系为统一的水利系统的规划，应即加速制定。”

8 月 31 日，周恩来在北戴河长江会议上指出：“江水北调有四条引水线路，长江的上中下游都可以设想，要搞一个全面的规划。”

9 月下旬至 10 月中旬，黄河水利委员会、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会同有关

部门，对引汉济黄郑州至丹江口段的引水路线进行查勘。确定引水枢纽选在陈岗，经方城缺口，至燕山水库经调节后沿线经鲁山、宝丰、郟县、禹县、新郑、郑州，在桃花峪或岗李入黄。不久，黄河水利委员会又组织查勘了郑州至北京段引水线路。

1959年春，周恩来在北京主持召开了讨论南水北调问题的会议，讨论了好几天，充分听取到会者的意见。水电部有个叫肖秉钧的工作人员有一套南水北调的方案，他知道召开这次会议的情况后也跑了去。警卫人员不让他进会议室，他就写了一张条子送到周恩来那里。尽管大多数人都认为肖秉钧的方案离现实太远，并称之为“肖方案”，但周恩来非常重视不同意见，当即请肖秉钧进去讲了一个多小时。

1958年至1960年，在“大跃进”的氛围下，南水北调工作出现了脱离现实条件急于求成的倾向，并提出了“开河十万里，调水五千亿”等不切实际的口号。对此，周恩来做了耐心的说服工作，并对错误倾向进行了严肃的批评。1959年6月9日，他提出水利建设不能把设计能力当实际，把前途当成现实，新工程上马要非常谨慎。1961年7月4日又提出，理想总是要实现的，但是要经过一个历史时期，不能急，不能随便搞。他说：“把珠江的水调过长江，把长江的水调过黄河，设想得非常容易，落实起来有很多困难。”“实际上这些问题要结合起来研究才行。有多少水可用？多水年、平水年、少水年的情况各如何？要改变现状，对地下水的影响如何？蒸发多少？渗漏多少？都是复杂的学问。”

我国在50年代与60年代的经济、技术条件下，全面实施宏伟的南水北调工程是不现实的。但是，在毛泽东、周恩来关怀下，50年代与60年代，水利工作者为南水北调做了大量的规划、研究与有关线路的查勘工作，付出了艰巨的劳动，积累了宝贵的资料，为南水北调工程的全面实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60年代以来，我国个别地区已修建了一部分南水北调工程。江苏省通过江都抽水站抽引长江水入里运河，灌溉里运河以东的里下河地区，并经沿途各级抽水站送水入洪泽湖，再沿京杭运河经骆马湖送水至徐州附近，补充徐州、淮阴地区灌溉和航运用水。丹江口水库于1973年建成初期规模，为实施引汉任务的陶岔渠首闸同期完成。

1972年春夏之交，华北干旱，天津供水告急，周恩来指示研究“有无更好办法解决天津缺水问题”。同年12月13日，周恩来说：“河北省最大的问题是旱。”此后，在兴修引滦入津工程以解天津缺水的燃眉之急的同时，南水北调工作也有了新的发展。据统计，海河、淮河流域1980年引黄河水量91亿立方米，淮河流域引长江水量101亿立方米。80年代中后期，引长江、黄河水量约占海河、淮河两流域总供水量的23%左右。

从当前的需要和应急措施上解决北方干旱问题，周恩来提出了抗旱打井的主张。

1965年，华北地区出现严重干旱，1966年初仍在发展。1966年1月下旬至2月初，周恩来主持召开了北方八省市抗旱会议。会上，周恩来系统阐述了抗旱防涝、扭转南粮北调的思想：

第一，北方地区通过抗旱防涝扭转南粮北调，要像搞大小三线、国防工业、基础工业那样重视。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协同北方地区各级党政领导一起来抓，建立北方农业小组加强领导，使北方地区实现粮食自给，队有余粮，

国有储备，农民生活达到全国第二，抗旱防涝，紧急的任务是抗旱。抗旱防涝、争取丰收要与备战、备荒结合，与农业的长期规划结合；要全面安排、长远打算；要以自力更生为主，国家支援为辅；要安排好群众生活，防止疾病，特别要解决最小限度饮水问题；要保护牲畜，特别要严防兽疫；要保护、修理农具；要多备种子，加紧积肥、沤肥；千方百计开辟水源，节约用水，控制用水；打井（机井、砖井、土井）、开渠、截潜流、挖水窖、平整土地、修四田（梯田、台田、园田、坑田）都要因地制宜、因势利导、有阵地地前进；抓好排灌机具的修配、使用、管理；安排好、使用好农业水利基建资金；地方上机动的财力、物力要集中使用，用在刀刃上；要节约民力，不误农时，抢季节，分先后，抓重点；要高产田与基本田并重：各省分片管、分地形管，抓两头带中间。

周恩来亲自担任中央地方农业小组组长，并到邯郸地区亲临抗旱打井第一线，调查研究，指导工作。“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全面爆发后，北方打井抗旱的战略部署不可能不受到影响。但是，1968年当激烈动乱中刚出现一点可以工作的机会时，在周恩来主持下，国务院又全面部署了华北地区打机井的工作。此后，每年以30多万眼机井的速度持续建设。到80年代，华北大地上已有近200万眼机电井，一亿多亩耕地提取地下水灌溉，大大改变了十年九旱的农业生产条件，加上化肥工业的发展，使粮食产量大幅度增长，初步改变了中国历史上长期的南粮北调局面。

周恩来是华北抗旱打井建设的组织者与战略决策者。

解决北方缺水、南粮北运问题，周恩来把跨流域引水、南水北调与挖掘本地区水利资源、抗旱打井结合起来，把长远的根本的目标与当前的应急的需要结合起来，表现了他运筹国事缜密、全面、周到的特点。

综合利用除害兴利——提出治水要协调不同部门之间的关系

早在 1950 年确定治淮原则时，周恩来就精辟地指出，治淮既要重视泄洪入海，也要有利于灌溉农田，还要注意配合发电，配合航运。这实际上是指出了治淮要协调农业、工业和交通运输业之间的关系，要发挥治淮系统工程的作用。对于治黄，周恩来既注意利用含泥沙的黄河水灌溉土地以解决干旱和提高土地肥力，也注意预防泥沙淤积引起洪灾问题。周恩来认为治黄也有灌溉、发电、航运等综合利用的问题，但防供应放在第一位，不能跟前三者等量齐观。对于长江、仅水的治理，周恩来多次指出要把远景与近期的开发、干流与支流的关系、大中小型工程联系起来考虑，力争做到防洪、发电、灌溉、航运、养殖五利俱全。他认为水利工程要注意鱼道，要注意便利运输。他指出新安江工程木材不能过坝是个缺陷。

综合利用，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各个部门从各自的角度出发容易陷入片面性。1961 年 7 月 4 日，周恩来说，计算水利资源，专业部门只算他们需要的那部分，不是综合计算，发电的只算发电，把所有的水都算来发电；讲灌溉的，只算灌溉，按最好的情况算灌溉多少公顷地；防洪就算洪水多人；搞运输的想将河道搞得越深越宽、来往的船只越多越好。还有计算水土保持的，他就算种多少树就可以绿化保持水土多少，实际上这些问题要结合起来研究才行。有多少水可用？丰水年、平水年、枯水年的情况各如何？要改变现状对地下水的影响如何？蒸发多少？渗漏多少？都是复杂的学问，要综合起来计算。周恩来这段精彩的论述，既指出了各个部门在用水上的矛盾，也强调了从全局出发、综合计算、综合利用的重要性。

治水既要处理好一利与多利的关系，综合利用；也要处理好利与害的关系，把除害和兴利结合起来。1951 年 1 月 12 日，周恩来说，增加水利时，同时要减少水害，只有这样才能逐步达到用水目的。未知水之害者，不能尽知水之利。水害可以转化为水利，水利也可能转化为水害。对一个地方一个方面从害变利，对另一地方另一方面也可能从利变害。周恩来认为除害兴利需要全面比较、综合研究，以便做到趋利避害，两害相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避免做出不能得益反受其害的蠢事。一个大的水库工程的兴建，首先要侵占土地，迁移居民，然后才能发挥它的效益。周恩来说，有时候坝未修起来，灌溉等作用还未发挥，已淹没了很多土地，群众有意见。另一方面，围湖造田，蓄洪垦殖，虽然增加耕地，增加生产，但会影响水产和水利。周恩来说，围垸，别处会淹没更多，不然这样大的洪水又往何处去挤？洪水泛滥为害，缺水干旱亦为害。不能为治洪水之害而忽视兴灌溉之利。周恩来指出，除涝不忘抗旱，防涝亦防旱。

70 年代初，随着人口的过度增长和工业的发展，水资源短缺与河流污染问题渐渐暴露出来。这时，周恩来综合利用，除害兴利的治水思想中，强调了治理三废、保护水源水质问题。1970 年 11 月 21 日，周恩来说，上海炼油厂的废油、废渣、废水怎么办？统统回收，综合利用才好。不然，倒进黄浦江里把鱼都弄死了，这是一个新课题。他还针对工业“三废”，意味深长地说，搞工业不能给人民生活带来不利。

分工合作同福同难——提出治水要协调不同地区之间的关系

周恩来以国民党时期治淮由江浙人管事，只管下游，不管中上游，闹地方主义为戒，反复强调水利工作不能明哲保身，更不能以邻为壑，要反对地方主义。他在过问治淮、治江、治黄时，都论述了上中下游分工合作，有福同享，有难同当，顾全大局的思想。

1950年治淮时，周恩来提出上中下游的利益都要照顾到。他说，今后治淮工作，以华东为主，中南为副，集三省之力一块来搞，上中下游共同分工合作。在工作进行时，水利部应经常驻人在当地具体领导、监督。周恩来特别重视具体解决皖北和苏北的水利纠纷。他说，站在苏北的立场，当然要维护苏北的利益，想保存归海坝以东的土地，当地人民也不愿意大水在自己的附近过去。但我们要从全局利益出发，不能只淹皖北不淹苏北。又说，三河活动坝如果挡不住洪水，下游就不可能不淹。应该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不能只保一省的安全。有关全局的事情总是应该大家分担才能解决，哪一方面只想白保都不行。

1951年初，周恩来在第67次政务会议上讨论1950年水利工作总结时说，治水要各方面配合，比如治淮，就要上中下游配合，要豫、皖、苏三省配合。治理长江，更要14省的配合。工作如果失去了步骤，失去了联系和配合是不易做好的。1952年兴建荆江分洪工程，湖北是乐于接受的，但湖南则存在着顾虑。为了消除湖南的顾虑，保证荆江防洪的大局，周恩来深入细致地做了许多协调工作。他说，荆江分洪工程不能完成，如遇洪水，进行无准备的分洪，必致危及洞庭沿湖居民；如肯定不分洪，则在荆江人堤濒干涉决的威胁下，仍存在着不得已而被迫分洪的可能和危险。因此，荆江分洪工程必须尽快完成。在周恩来具体指导下，从全局出发，两湖紧密配合，保证了荆江分洪工程的顺利完成，使其在战胜1954年长江特大洪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黄河三门峡水库因设计不合理，泥沙淤积严重，必须改建。可是下游有关省的领导从局部利益出发反对改建。周恩来耐心地说：“反对改建的同志为什么只看到下游河道发生冲刷的好现象而看中游发生了的坏现象呢？如果影响西安工业基地，损失就绝不是几千万元的事。对西安和库区同志的担心又怎样回答呢？”“希望多从全局想一想。”他还说：“如果三门峡水库淤满了，来了洪水，淹了上游，洪水还要下来；如果再遇上伊、洛、沁河洪水，能不能保证下游不决口？即使不决口也会有很大风险。”在周恩来说服下，终于通过了改建方案。

北方缺水，争水纠纷时有发生。为此，周恩来亲自找有关省市开会，努力协调解决用水问题。

水利纠纷不仅存在于干流的省与省之间，有些支流，县与县、区与区、社与社之间也有上下游放水争水问题。甚至有的地方民兵为争水竟相互打起来。民兵本是对敌人的，现在反而来对付自己人了。对此，周恩来说，上中下游应该统一规划，照顾全局。如果淹一块地方能使全局增产，就可考虑牺牲局部迁移居民，当然要安排好移民的生产、生活。治水要照顾全局，要有共产主义风格，有时要牺牲自己救别人。要上游到下游进行教育，基层干部都要有这个认识。干部应该教育农民，否则上面同意，下面争执就不好了。

周恩来在治水活动中的卓越的领导艺术及其所体现的分工合作、同福同

难的治水思想，不仅对调动上中下游、不同地区的治水积极性起了重要作用，而且保证了上中下游、不同地区之间许多复杂而尖锐的水利纠纷的妥善解决。

巧与周旋保证安全——阻止林彪以备战为名迁厂放水

1969年是林彪最得意的一年。4月召开的党的九大上,林彪被规定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1969年也是林彪“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叫喊得最凶的一年。10月下达的“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以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为名,把刘少奇等领导人及其家属遣送到外地。

为广把林彪集团的备战狂热减少到最低限度,以缓解对生产建设的破坏和对人民生活的不利影响,周恩来巧与周旋,进行了机智而勇敢的斗争。阻止林彪搬迁核燃料工厂、放掉密云水库的水就是两个具体的例子。

1969年,林彪以备战为名决定搬迁核燃料工厂。反应堆和核燃料后处理工厂具有强烈放射性,根本不能搬迁,其他核工厂搬迁也必然中断生产。在千钧一发的危急时刻,周恩来主持专委会讨论了核工厂的搬迁问题。他针锋相对地指出:“一线工厂不能搬,要继续生产,加紧生产,力争多生产多储备。”专委会一致赞成周恩来的意见,否定了搬迁核燃料工厂的决定,避免了搬迁可能带来的一场灾难。

1969年国庆节前夕,林彪要放掉密云水库的水,说是为了防备敌人利用节日进行轰炸,防止因轰炸造成水库决堤。黄永胜(时任总参谋长)把林彪的意见用电话告诉周恩来,周恩来立即表示反对,并召集水电部负责人开会,否决了放水意见。林彪集团垮台后,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回忆了保护密云水库的情况。他说:“那时,林彪搞阴谋诡计,他先跑到西郊机场,把飞机都弄走,以后又要把坦克弄走。后来又要放密云水库的水,黄永胜、吴法宪找我,说要把水库的水放出。他们说,不放,敌人要炸。我不准放。我说,密云水库十几亿立方的水还要用,不能自己淹自己”。当时,如果放掉密云水库的水,不仅会造成人为的水灾,而且会造成北京的水荒。

采育结合重点育林——提出林业发展方针

我国林业既要解决森林覆盖率低与生态环境差的问题，又要解决木材资源有限与国民经济发展需要大量木材的问题。周恩来针对二者之间的矛盾，提出了“伐木与育林，重点放在育林”，越伐越多，越多越伐，青山常在，永续作业的林业发展方针。

周恩来认为国民经济发展迫切需要木材，不采伐是不行的。不能说越多不伐，一定要给任务，不给任务不行。没有木材，钢、煤、矿都上不去。但是，采伐必须同育林相结合，不能多于育林。“用剃光头的办法采代森林，采光了就走，修一条林区铁路废一条，这怎么得了！营林是建设社会主义，我们不能吃光了就算，当败家子”。“16年来，全国砍多于造，是亏了。20世纪还剩下三十几年，再亏下去不得了。造林是百年大计，要好好搞。”

怎样才能使伐林少于育林呢？周恩来提出了一系列正确主张。

第一，林业工作要以育林、造林为重点。“林业部过去只注意林区采伐，我看主要任务还是造林”。“重点放对了，才能用得少，造得多。”

第二，植树造林，要依靠全党全民，走群众路线。“我国的森林资源是不足的，除了必须加强国家的造林事业和森林工业，有计划有节制地采伐木材和使用木材以外，还必须在全国有效地开展广泛的群众性的护林造林运动”。“林业工作要面向全国，依靠全党全民，要两条腿走路”。“造林也要两条腿走路，要依靠六亿农民。四旁植树也是个大工作。”

第三，发展林业要重视科学，重视林业人才。开国之初，周恩来说：“基础大小，林政不修，森林采伐不按科学的方法，这都需要大力整顿。如东北森林地区，据调查，如果林业工作不加以改进，快则十年，慢则二十五年，就会完全毁了。不科学的采伐，没有护林和育林，森林地带也会变成像西北那样的荒山秃岭。我们需要林业专家从事这方面的工作。”

第四，植树造林，要总结经验，因地制宜，注重功效。“要调查公社的造林办法，总结推广经验”。“西北地区造林要集中在黄河泥沙主要来源地区，不要孤零零地分散搞。分散了，投资很大，功效很小，起不了多大作用”。“西北黄土高原搞了多少年造林啦？劳大功小，要很好总结经验。陕北防沙林带有人烟，地下水浅，就可以造林。靖边、定边高原上水位低，不容易成林。要有选择、有阵地地前进”。

第五，各级领导、各个部门要支援林业，植树造林。“两北局要搞一个领导小组，管农垦、水土保持。农林互相支援有好处”。1964年5月7日，周恩来提出，从中央到地方，每个负责同志，除年老有病的，每年都要带头种种树。要养成一种风气，并对此事作出相应的规定。

第六，对各级各类学生要进行爱护自然资源的教育，教育他们知道我国耕地和森林资源不丰富，要爱护耕地，爱护山休，发展农业，发展畜牧，并且努力造林。

周恩来的伐木与育林相结合，使伐林少于育林的思想主张是十分全面的，对指导我们今天林业的发展，仍然有着现实意义。

防救结合预防为主——预防灾害的近期中期长期方略

我国是个多灾的国家，没有哪一个省份无灾害发生，也没有哪一个年度无灾害发生。灾害使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到巨大损失，破坏和延缓生产力的发展，历来是中同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之一。周恩来主持内政 26 年，一直把防灾救灾看成是治国安邦、顺利地进行经济建设的一个关键问题。他经常不避艰险，来临救灾抗灾第一线，寻求防灾救灾的对策。

如何对付自然灾害？周恩来既重视救灾，更重视防灾；主张防救结合，预防为主；强调居安思危，防患于未然。

1951 年 8 月 17 日，在第 98 次政务会议讨论华北农业生产和抗灾情况报告时，周恩来说，救灾必须联系到预防，每年都要准备与灾害作斗争，象华北这些人多地少、水量不多地区更是如此。一方面华北水量不够，易成旱灾；另一方面，久学之后必有大涝。他要求农业部也要象卫生部对付疾病一样，以预防为主方针去对付灾害。20 天后，在第 101 次政务会议上讨论全国水灾情况时，周恩来再次强调对于灾害应该以预防为主，每年都要预防水、旱、虫等灾。他还具体指出，今年要防明年之灾，现在要防今后之灾；在救今年之灾时要结合预防明年之灾，在救当前之灾时要结合预防今后之灾。

1951 年上半年全国共发生森林火灾 4270 次，森林受害面积约达 3450 万亩，损失木材 677 万立方米，森林受害面积相当于同时期内造林面积的 12 倍。发生火灾的主要根源是防火工作抓得不紧。对此，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刘少奇、朱德、李富春，提出“非严加管制不可”。1952 年 3 月 4 日，发布了周恩来签署的《政务院关于严防森林起火的指示》，要求“在每年容易发生由火的季节，山区及山区附近的各级人民政府应把护林防火工作列为中心工作之一，由首长负责，亲自布置，检查和督促”。这对减少今后的森林火灾起了重要作用。

1966 年 3 月，河北邢台地区两次发生地震。周恩来组织各方面力量，紧急部署抗震救灾工作。同则，强调要做好地震预防工作。3 月 9 日，他在致中共中央、毛泽东的信中提出：“对于是否续有地震的问题，要提高警惕，组织民兵值班放哨”，“要防止再次发生地震而受损失。”由于有防备，3 月 22 日地震比 3 月 8 日地震损失小得多。4 月 1 日，周恩来在慰问宁晋县东汪公社的灾民时说：1963 年水灾倒了很多房子；这几年天旱，抗旱；最近又来了地震，地震也是自然灾害，我们有防备就好一些。1970 年 2 月 7 日，周恩来接见全国地震工作会议代表时说，我们的地震工作一定要从预测到预防，以预防为主。一定要加强预测预防工作，不要等地震后才去救，去救是很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预防。

由于水旱灾害比较普遍，且危害也大，周恩来几乎年年都强调防旱防涝问题。1973 年，周恩来的病情在发展，几次去玉泉山作手术，接受治疗，但他仍然关心着全国抗旱防涝工作。5 月 14 日，他致信李先念、纪登奎等，请他们好好读一下 5 月 14 日的《参考消息》关于世界气象变化的两篇报道。他指出：“今年我们可能还遇到南涝北旱的局面，请告农林部多多提醒各地坚持实行防涝抗旱的措施，不要丝毫松懈。”

周恩来还精辟地指出，对各种灾害的预防要结合起来，不要顾了水灾而疏忽了旱灾；在水灾上不要顾了大江大河而疏忽了小川小河。周恩来在领导海河流域的抗旱防涝斗争中，反复告诫干部：除涝不忘防旱；抗旱不忘防涝。

水灾和震灾的预防也要结合起来。1970年2月7日，他对钱正英说：你的水库还要“更立西江石壁，”“高峡出平湖”。要到现场去总结经验，研究在什么情况下工程震不垮，使我们知道以后怎样更好地去做。

怎样预防灾害？周恩来的思想是：从近期的因素看要加强预报；从年度之间看要丰不忘灾，储粮备荒；从长时期的因素看要治水造林，保持水土。

对于气象灾害，周恩来在立国之初就提出要加强气象预报的作用。1951年9月7日，周恩来指出，中央救灾委员会商讨今后积极的救灾方针和办法，气象局应参加会议。他夸奖气象部门对1955年东北水灾作了预报。他说，虽然地方气象台预报得不十分精确，但知道了大体情形，对预防水灾是有好处的。

1954年1月28日，周恩来主持第204次政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政务院《关于加强灾害性天气的预报、警报和预防工作的指示》。3月6日，周恩来签署发布了这一指示。《指示》指出：“我国地区辽阔，各地时常遭受台风、寒潮和随之而来的暴风雨（雪）和霜冻等大范围灾害性天气的袭击，不仅在工业、农业、林业、水利、航运、铁道、渔业、牧业、盐业等方面，造成了国家资财的重大损失，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我们国家的建设和人民的生活，而且给人民带来了疾病和死亡。”“今后为了加强气象工作对于国家建设和各种生产任务的保证，更好地领导和组织人民与自然灾害作斗争，中央和地方各有关部门必须更进一步地重视对大范围灾害性天气的预报、警报，并抓紧做好各项预防工作。”《指示》对如何预报？各部门如何配合气象工作？预报消息如何传递、落实等做了规定。

在十年动乱中，为了维持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为了保证灾害不使农业大幅度减产，保证人民有饭吃，周恩来亲自过问气象预报工作。1969年1月29日，他指示，在我们的卫星没有出来以前，要想办法接收别人卫星传递的气象情报，而且应该搞我们自己的气象卫星。几天之后，他又对中央气象局的年轻同志说，气象工作对国计民生各方面都有直接影响，因此，你们要做好气象服务工作。1970年4月24日，我国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1972年7月30日，周恩来询问：“收听国际气象预报和预测，不知地面卫星站能否通过空中卫星收听更多情报，请打听一下，如行，立即办。”他要求同务院业务组不要受体制的约束，将气象局业务抓起来。“凡属空白地区、海洋都要分类补上，对北线西线寒流、东线南线暖流也要管。人不够，要从‘五七’于校调回，或者将转业或遣散走的调回。要打破军民界限，共同努力，军民两用。预防各种气象变化，特别要防气流、大风突变转向。总结经验，并且要考虑到空气中有无新的因素、元素增变”。周恩来对气象预报的深深关切溢于言表。

对于地震灾害，周恩来也多次强调要加强预测、预报工作。1966年邢台地震后，有些科学家说，地震预报世界上没有解决。李四光独排众议，认为世界上未解决，我们为什么就不能解决？周恩来赞成李四光的看法，并说，我们派去大批人马，到现场实践，大力协同，就能得出结果。1969年7月18日，发生山东地震。当日，周恩来一面紧急部署救灾工作，一面组织以李四光为组长、刘西尧为副组长，有地质部、科学院、科委、石油部、海洋局等有关同志参加的地震工作小组前往山东、辽宁等地，加强那里的观察和预报能力。1970年2月7日，周恩来在全国地震工作会议上，论述了地震预测与预防的关系。他说，地震是可以预测预见的，有实践才能有预见，有预见才

能预防。自然现象总是有规律可循的，要研究地震发生的规律。他又说，对今天发生的地震，要到地震现场去，到地震区去，通过实践，不断总结劳动人民的经验，做好预测，然后实现预防。如何预测地震？周恩来指出：第一，物理、化学、生物等各种预测的办法都要采用，进行综合比较。第二，不仅要有专业队伍，还要有业余群众队伍，团结在专业队伍周围，用土办法观测，要专群结合、“土”洋结合，实现预测预防。

为了预防灾害，我国历史上曾有过常平仓、义仓等具体措施，有识之士还论述过储粮备荒的重要性，荀子主张“善藏其余”、“必时藏余”；贾谊主张“畜积足恃”、“夫积储者，天下之大命也”；晁错提出“广畜积，以实仓廩，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范蠡的平粜策、李悝的平余之策则主张国家在丰年要购粮积储，以调剂荒年的粮食不足并调节粮食价格。

周恩来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历史上储粮备荒的思想。1956年9月16日，周恩来在党的“八大”会议上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他指出：“我们过去对于物资储备的重要性还认识不够”。“应该增加后备力量，健全物资储备制度”。他说：“今后若干年内，我国农业生产受自然灾害的影响还会是很大的，为了应付款收，就必须有粮食和主要经济作物的储备；为了满足我国建设和生产的规模日益扩大的需要，就必须有器材和原料的储备”。1957年6月26日，他又指出：“象我们这样人多且穷的国家，由于农业的比重很大，自然灾害时常发生，要求国民经济年年都毫无起伏地按照同样的速度向前发展，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我国的农业，有时丰收，有时歉收，并且往往这里丰收，那里歉收，为了照顾这种不平衡情况，必须在丰收的年份和地区照顾到歉收的年份和地区，并且还准备应付特别严重的自然灾害和其他意外。”

如何储备？他提出在国家、集体、农民个人三方面进行。首先，“由国家储备必要的物资，特别是比较缺乏的重要物资”。其次，队有余粮，也要有储备。再次，要藏粮于民。他说：“粮食多了百分之十，只有好处，农民是不会乱吃掉的，藏在欠民家里比国家收购来还好。”

周恩来认为治水、造林、保持水土，是预防气象灾害最积极、最根本、长期起作用的措施，只有经过大水利、大造林，才能逐步减少乃至避免气象灾害。1950年5月22日，周恩来说，中国农村要避免灾荒，首先要避免洪水泛滥，而要避免洪水泛滥，首先是修水利。他认为水旱灾害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大力治水，防灾减灾，除害兴利，既是最直接的为人民服务，也是发展经济、建设国家最基础的工作。治水工作需要植树造林与水土保持工作的配合。森林及植被的破坏，造成水土流失和河流淤塞，常引起水旱灾害。周恩来在强调治水的同时，也十分重视造林、护林与水土保持对防灾减灾的作用。他指出：“林业对供应建设事业所需木材和防止水旱风沙灾害都有重大的意义”。“必须在全国有效地开展广泛的群众性的护林造林运动”。他要求在抗旱防涝的同时应大力推广水土保持工作。首先应在山区丘陵和高原地带有计划地封山、造林、种草和禁开陡坡，以涵蓄水流和巩固表土。其次，应推行先进的耕种方法，如修梯田、挑旱渠、等高种植和牧草轮作等办法，以使降落的雨水尽量就地渗入，缓和下流，不致形成冲刷的流势和流量。再次，对已经冲刷的山溪沟壕，要修筑拦沙坝和缓流坝，截留其挟带下泄的泥沙。

以工代赈生产自救——积极救灾的主要办法

如何救灾？周恩来不赞成单纯依靠救济的消极救灾观点，而主张以工代赈、生产自救、辅之以各方援助的积极的救灾方略。

以工代赈是一项古老的救灾方法。春秋战国时齐国晏婴就曾运用以工代赈的办法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北宋范仲淹、欧阳修也都曾运用过以工代赈的办法。欧阳修在颍州做官时，遇到饥荒，他一方面奏免黄河夫役，得全者万余家；另一方面又给民工食，大修诸陂以溉民田，尽赖其利。

周恩来继承和发展了以工代赈的救灾传统。早在1946年黄河堵口归故斗争中，他就提出采用以工代赈的办法抢修浩大的复堤工程。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签署的《政务院关于生产救灾的指示》规定“在有水利交通等工程的地方，应当注意组织灾民工作，以工代赈”。《政务院关于1950年水利春修工程的指示》指出：“在灾区的工程，要结合救灾，切实做到以工代赈。春修工程若能善于运用灾区群众的劳力，一方面可以完成春修的任务，同时对于目前救济灾民渡过春灾，也有极大的作用”。1950年5月13日，周恩来在回复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救济工作的电报中指出：“对于两三个月以上的长期救济，应用以工代赈（如修筑公共工程等）为主要方向”。“发救济粮平均每人连家属在内月需粮80斤至100斤，若以工代赈，每人每月有粮150斤亦可够了，在经济上增加不至太多，而能使工人有工做，又可惜此修整一些必要的工程，是一举两得的办法”。1950年淮河大水，1963年海河大水，周恩来都强调了以工代赈的办法。1963年9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周恩来针对水灾，号召要采取积极的方针，要有长远的规划，首先要用以工代赈的办法，复堤堵口。

如何正确解决工和赈两个方面的关系？1950年11月3日，在讨论治淮报告时，他又说，在灾区实行以工代赈，而不是以赈代工，重点在治淮工作。如果观念上是以赈代工，那么就不应该用那么多钱来赈。工作要找强壮的人来做，工人要合乎工作上的需要。他赞成作一方土二斤半小米，多作多得，少作少得的具体规定。

周恩来的以工代赈思想包含着丰富的内容。第一，将救灾工作与治水工程结合起来，既解决大量灾民的饥饿问题，也解决大规模治水所需要的民工问题。第二，工赈结合，重点在于工，在于治水，并相应地体现出治水劳动贡献大能得到较多的救济粮的原则，既克服单纯救济和依赖救济的思想，又奖励先进，提高劳动效率。第三，将劳动义务与劳动报酬结合起来，治水是为人民的利益服务的，人民有义务为治水贡献力量；同时，在国家财政困难的情况下，也不可能完全按照商品经济的原则招雇治水劳工。

建国初期的以工代赈，有其特殊的历史原因。但周恩来通过以工代赈所表达的思想，对今天的防灾、救灾仍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周恩来把生产自救作为整个救灾工作的中心。1949年12月，周恩来签署的《政务院关于生产救灾的指示》要求灾区各级人民政府发动和组织人民生产自救、战胜灾荒。1950年4月12日，周恩来针对救济工作指出，经过长期战争的中国，创伤是需要医治的，灾荒就是创伤的一种，如何医治呢？自救。中国人民能从战争中战胜，解放了自己，也必能在战后医好创伤，从和平中建设起来。1951年9月26日，周恩来在阐述发展生产巩固财政经济问题时，总结了淮河流域对待水灾生产自救的经验，他认为皖北1951年夏粮

丰收是救灾跟生产结合在一起得到的好处。

1964年，河北很多地方再次遭受洪涝灾害。10月24日，周恩来仔细审阅了灾情报告，致信李先念：“在开会前，请你打个电话告诉河北，请他们确定一个书记或一个副省长认真地将生产救灾抓一抓，并一直抓到底，重点放在生产自救。救灾费应先拨一些，实事求是地发给那些确实买不起粮的灾户。”

1965年华北干旱，1966年初旱情仍在发展。1966年3月8日、22日，河北邢台两次地震。对当时的旱灾、震灾，周恩来都强调要生产自救。他到震区的每一个群众大会上，都要号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发展生产，重建家园”。他说：“恢复了生产，恢复了力量，就对得起死去的人。”1966年4月5日，周恩来在邯郸磁县，对抗旱打井、海河工程，提出了“干劲要大，步子要稳，讲究实效，实事求是”的总要求。他说：“救灾离不开生产，生产自救要很好地结合起来”。“整个邯郸干劲是大的，精神是好的，但要强调生产自救”。“生产自救，整个说来就是自力更生”。

为什么救灾工作要立足于生产自救？第一，避免单纯救济的做法，克服依赖救济的思想，使国家救济能真正发挥作用。1966年3月15日，他说，关于地震救灾款，我批了，现在我还有点不安心，这样做究竟是办了好事，还是办了坏事？拿3500万元倒不是难事，问题是就怕一宣布，给群众造成一种依赖思想。我不吝啬钱，也不吝啬物，就是不要使群众认为来得太容易了，把自力更生精神丢掉了。第二，减少国家财政对救灾的支出，以便集中财力进行四个现代化的建设。1963年9月7日，周恩来在8省生产救灾会议上说。“我们要建立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国家，必须下几十年的功夫，争取在本世纪内建成社会主义的强国”。因此，“特别要强调节约，要搞生产自救”。否则都要靠国家救济，就要影响国家积累，影响四个现代化的建设。第三，单纯救济只能解决眼前的和一部分人的困难，杯水车薪，救济有限；组织灾民恢复生产与发展生产，提高自救能力，既可以尽快渡过眼前的困难，还可以为克服来年的困难打下基础。1951年9月26日，他说，救灾一定要跟生产相结合，使农民得到了救济以后，又能够为明年的生产打下基础。这样做会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同时，对于全国发展生产、巩固财政来说会有决定性的意义。1953年5月16日，周恩来签署的《政务院关于加强增产粮食和救灾工作的指示》指出：“只有帮助灾民搞好生产，才能安定灾民情绪，缩短灾荒困难时间，渡过灾荒”。邢台地震时，他对灾民们说：“家里丢的，地里收回来，才会把我们家园重新建好。”

怎样进行生产自救？周恩来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具体措施。首先，从季节上，夏季损失要力争秋季补上；冬季加紧积肥、沤肥、保护牲畜、修补农具、备好种籽；春季多种早熟作物与果菜。周恩来说，要不误农时，抢季节，分先后，抓重点。干旱面前，只要下一点雨就要及时抢种；洪涝面前，只要水一退就要组织生产。其次，在农业受灾后，要因地制宜，恢复与发展副业、手工业、运输业、渔业等等。开展运销事业，变人养牲口为用牲口赚钱来养人。在沿海沿河湖泊地区，组织灾民捕鱼、打捞水产。他说，尽管是灾年，粮食减产了，副业和多种经营可以多搞一些，粮食少了，其他收入多增加一些也好。再次，有震抗震，有旱抗旱，有涝排涝，通过人事努力减少受灾损失，反对被灾害吓倒、听天由命、悲观失望的情绪。对于水旱之灾，他强调要组织灾民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打井，开渠，截潜流，挖水窖，平整土

地，修梯田、台田、园田、坑日，长期打算，有阵地的前进。另外，开展节约互助运动，号召灾民省吃俭用。

一方有难，八方相助，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具体表现之一。周恩来多次指出，在灾区实行生产自救以后，实在困难的，国家还要帮助解决。救灾拨款，一是给灾民解决吃、穿、住、烧和治病问题；二是恢复农业，堵口复堤；三是工业交通受了影响的，校舍、行政机构房屋损坏了的，要加以修复。1966年初，面对华北旱灾，周恩来提出要从各个方面积极支援抗旱斗争。他列举了物资支援、地方自助、工业支援、三清（清设备、清材料、清资金）支援、财粮准备、运输调动，他支持余秋里的建议：要减少一些自行车的生产，增产一些胶轮车，支援抗旱，并指出，要抽调一些车辆支援抗旱。地方挂钩，他提议天津市与天津专区、承德专区挂钩，北京市与张家口专区挂钩。

在各方面的援助中，周恩来还提到贷款的有偿援助方式。

长期坚持多难兴邦——防灾抗灾的恒心与信心

周恩来指导防灾、抗灾，同他指导整个经济建设一样，主张把理想和现实、战略和战术、当前和未来、目标和步骤，既重视长期坚持的恒心，也重视多难兴邦的信心。

1950年8月18日，周恩来主持第46次政务会议，讨论全国民政会议综合报告。会上，他指出，对自然灾害来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还不能控制它，只能做到防止它和减少所给予我们的灾害。同年11月3日，在讨论治淮报告时，他又指出，治淮的过程是由有灾到少灾，由少灾到无灾，一步一步来。1953年8月20日，在186次政务会议上，周恩来针对“看见灾就想战胜”的急躁行为，指出，中国地方这样大，每年没有灾是不可能的。改造大自然不是短期的事。农、林、水利3个部的工作是长期的奋斗，我们要提高警惕，不可高枕无忧、盲目乐观。1954年9月23日，他在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指出：“对自然灾害的斗争是我国人民的一个长期的艰苦的任务”。1957年4月24日，他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改造自然是一个长期斗争。拿水来说，要把黄河的灾害、淮河的灾害、长江的灾害、珠江的灾害、辽河的灾害、松花江的灾害克服了，而已控制它了，那不晓得要多少世纪，决不是20世纪能够完成的。

“大跃进”期间，经济建设贪多贪快、急躁冒进的倾向，对防灾抗灾工作也有影响。1959年10月，全国水利会议上曾设想提出在3年内基本解决水旱灾害的口号。当文件草稿拿到周恩来那里时，他哈哈大笑地说：“3年内要基本解决水旱灾害？太积极了一点。”经他再三说服，水利部修改了这个口号。同年11月，周恩来听取王化云汇报黄河流域水土保持治理规划初步方案时指出：规划口号要提得恰当，过去认为作了水上保持工程和措施，保水保土就解决了，现在看来距离还很大，祖宗欠下的债我们一定要还，但水土保持是长期的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提出，备荒是长期的事情，总得一步步来；抗旱防涝，步子要稳，要有长远打算，不能一锤子买卖，不能太急太热。

防灾、抗灾的长期性，归根到底决定于人类认识、掌握自然规律的长期性。周恩来说：“任何经济建设总会有些未被认识的规律和未被认识的领域。这就是恩格斯说的，有很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必须不断地去认识，认识了一个，解决一个，还有新的未被认识”。他以治理黄河为例，“我们的认识还有限，经验也不足，因此，不能说对黄河的规律已经认识和掌握了”。但是，在自然灾害面前悲观失望、听天由命的消极无为观点，周恩来是坚决反对的。他认为循序渐进、长期坚持防灾抗灾工作，一定能最终实现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我们总要逐步摸索规律，认识规律，掌握规律，不断解决矛盾，总有一天可以把黄河治理好”。

新中国成立之初，自然灾害不断发生，加上底子薄、美帝国主义封锁，人民政府面临着极大的困难。对此，1949年12月23日，周恩来说：“要迎接困难，‘多难兴邦’”。

60年代初，由于连续3年大面积的自然灾害和“大跃进”的人为灾祸，我国遇到了严重的困难。当时，周恩来反复指出既要正视困难，又要有克服困难的信心。“懵里懵懂，怕说困难，一听说困难就泄气，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革命就是要认识困难，摆出困难，提出办法，克服困难。共产党就是

在克服困难中取得胜利的。革命战争是这样，社会主义改造是这样，社会主义建设也应该是这样”。在危难关头，周恩来一边同老百姓一起过艰苦的日子，一边精心领导经济调整工作，终于使国家赢得了考验，渡过了难关，出现了 60 年代中期的繁荣。

1966 年 3 月邢台两次地震。周恩来两次深入震区。他每到一处都要谈 1963 年水灾，1964 年涝灾，1965 年旱灾，现在正在抗旱又来了地下的灾——地震，并由此指出：“要贯彻自力更生精神，多难兴邦”。

中国自古是多灾之国，特别是水、旱、震灾如影随形地威胁着中华民族。然而，中华民族在与自然灾害的抗争中，一次又一次地显示了她的凝聚力。在洪水横流面前，大禹率众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劳累得大腿上没了肉，小腿上没了毛，终于赢得了夏的振兴。起源于春秋战国时代的黄河大堤，始于东晋时代的荆江大堤，开创于东汉时期的江浙海塘，造就了著名天府之国的四川都江堰，创造了塞外江南奇迹的黄河河套灌区……这些都是中华民族多难兴邦的标记。近代中国，外侮日深，内乱不已，水利失修，自然灾害与社会动乱形成恶性循环，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新中国建立以来。党和人民政府高度重视防灾抗灾工作，全面整修和新建江河湖海的堤防共计 20 万公里，修建水库 8 万多座，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大大提高了防洪、防旱能力。三门峡、丹江口、葛洲坝……一座座水利枢纽在告诉人们：新中国的振兴正从这里开始。

农业恢复百业之基——经济恢复时期的以农业为基础

1949年7月，在人民解放战争已经取得基本胜利，但还没有完全胜利，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开始组织建设，但还没有结束战争的形势下，周恩来提出了“恢复生产，建设新中国”的口号。同时，他又明确指出：“我们要恢复生产，首先就得恢复农业生产。”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此后的几个月中，周恩来反复指出，今天的工作中心是恢复生产，凡是对恢复生产有利的都要尽量发展。要想恢复生产就必须依靠农业生产，它是可靠的基础。他说：“现在不抓生产靠什么来支援战争和巩固胜利？生产是我们新中国的基本任务。当前生产任务的重心是恢复而不是发展，当然也不排斥可能而且必要的发展”。“农业的恢复是一切部门恢复的基础，没有饭吃，其他一切就都没有办法”。

三年经济恢复时期，百废待举、百业待兴。周恩来的基本思路是：以抓生产作为全国的基本任务；以恢复生产作为抓生产的重心，在恢复生产的基础上发展生产；以农业恢复作为恢复生产乃至一切部门恢复的基础。

周恩来是根据以上思路指导经济恢复工作的。无论是恢复工业、巩固财政、搞活流通、发展外贸，他部强调了农业的恢复与发展的基础作用。

第一，农业的恢复与发展是工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的基础。1949年12月，周恩来在分析城市与乡村、工业与农业的关系时指出：“我们必须在发脏农业的基础上发展工业，在工业的领导下提高农业生产的水平。没有农业基础，工业不能前进；没有工业领导，农业就无法发展”。“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取消或忽视乡村这个广大的农业基础”。“如果没有广大农业的发展，工业发展是不可能的。目前的任务首先要恢复农业生产，然后再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城市离不开乡村而且要依靠乡村，工业离不开农业而且要以农业为基础”。农业对工业的基础作用，当时周恩来指出了以下四个方面：其一，提高“农民的购买力，增加他们对工业品的需要和对工业原料的供应，也就可以在恢复和发展农业的基础上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其二，轻工业的原料，绝大部分都要依靠农业，“今年全国棉花产量为八百多万担，明年计划增加到一千三百万担。如果没有这一千三百万担棉花，一百万纱锭就得停转。”其三，如果没有农业提供粮食，工业人口和城市人民就不能生活下去。“京、津、沪三地一千万人口的吃穿都要靠乡村来供应”。其四，发展重工业也要依靠农业来积累资金。

第二，农业的恢复与发展是巩固国家财政的基础。经济恢复时期，我国财政收入主要来自四个方面：一是来自农村的负担；二是来自城市的负担；三是国家企业的收入；四是预支即借债。1949年12月，周恩来说：“现在农村负担占国家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一·四，城市负担占百分之三十八·九，而实际上许多税收如盐税、货物税、屠宰税等，很多还是要转嫁到农民身上的”。1950年4月，他又说：“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比重约占百分之九十左右，现代工业仅占百分之十左右，在国家税收中农业税也占一半以上，这些在量上是很大的。”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毛泽东、周恩来把土地改革、兴修水利，恢复与发展农业生产作为当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首要条件。

第三，农业的恢复与发展是搞活流通的基础。1951年3月9日，政务院第75次政务会议，讨论中国人民银行1950年工作简要总结与1951年工作计

划及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 1950 年工作报告与 1951 年方针任务时，周恩来说，农业生产提高了，农民就要求出售农产品和换回工业品。这种物中易其流的任务就落在金融贸易方面来。贸易部门不仅要收购农产品及其副产品，还要以加工订货、代销等方式帮助工业生产，以适应农民的需要。城乡交流起来后，呆货即少了，城乡皆动起来。1952 年 10 月 25 日，周恩来进一步指出：“土地改革完成后，农民的购买力会有大幅度的提高。农业增产后，农产品如粮食、油料、工业原料、土产、畜产等，不仅可以供应国内市场的需要，还可以大量出口”。“农民购买力的提高和对工业品需求的增加，势必会刺激市场的活跃”。

第四，农业的恢复与发展是发展中外经济交流的基础。1949 年 12 月，周恩来说：“我们明年增产一百亿斤粮食，四百多万担棉花。粮食增产了，可以增加出口，换取外汇；棉花增产了，可以减少进口，少花外汇”。1952 年 4 月 30 日，周恩来在阐述新中国的外交方针时指出：“我们开国以来就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同外国做买卖”，“我国出口的主要是农产品，换回来的是工业装备”。“我们入口的东西是我们所需要的，出口的东西如鸡蛋、猪肉，是人家所需要的，这种互通有无是互利的”。

经济恢复时期，周恩来对农业是基础的认识，具有以下特点：第一，深刻性。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只有恢复与发展农业，解决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其他一切工作才有条件进行，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才能站立得住。“没有饭吃，其他一切就都没有办法”，揭示了“农业的恢复是一切部门恢复的基础”的最深层的关系。第二，全面性。周恩来不仅分析了农业对工业的基础作用的个几主要方面，而且分析了恢复与发展农业对巩固财政、搞活流通、发展外贸的基础作用。特别是对后三者的基础作用的认识许多是发前人所未发，在当时也堪称创见。第三，辩证性。他坚持辩证地看待农业的基础作用；既重视农业是工业的基础，也重视工业对农业的领导作用；既重视农业是财政的基础，也强调财政在农业方面的投资对农业的促进作用：既指出恢复与发展农业是搞活流通、发展中外经济交流的基础，又指出了搞活流通、发展外贸对农业的促进作用。

在“农业的恢复是一切部门恢复的基础”的思想指导下，三年经济恢复时期，我国农村成功地实现了土地改革和农业恢复的目标。1952 年，我国农业恢复到战前农业的最高水平，粮食超过了战前最高产量的 2800 亿斤，达到 3278 亿斤。

发民农业促进工业——“一五”计划时期的以农业为基础

从 1953 年开始，我国进入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建设。“一五”计划的基本任务是：首先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相应地培养技术人才，发展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和商业；有步骤地促进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和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正确地发挥个体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作用；保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

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很容易出现对农业的轻视。为此，1953 年 9 月 29 日，周恩来指出，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不是说把一切力量都摆在重工业上，其他的都不搞了，农业不发展了，轻工业不发展了，那是不行的。他说，我们的交通运输业不发达，轻工业不足，同时我们也是一个农业不足的国家。我国人口之多是世界第一。这样多的人口要满足他们的需要，首先而要的就是粮食。我们还要争取一部分粮食出口，换回机器。中国拿什么东西向兄弟国家甚至向资本主义国家换回机器呢？主要是农产品。在出口的人种东西中，就有五种是农产品（粮食、油籽、牲畜、土产、经济作物）。粮食的生产跟不上需要的增长，这种情况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会存在。因此，要用极大的力量注意发展农业。他要求地方党委，特别是省以下的党委，除去一些城市搞工业外，主要的力量都应放在农业方面。一年后，周恩来在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农业的发展对于工业的发展有多方面的影响。许多工业特别是纺织业和食品工业的原料是由农业供给的。工业人口和其他城市人口所需要的粮食、油类和其他副食品都依靠农业。工业所需要进口的机器大部分需要用出口农产品去交换。许多工业产品的主要市场是农村”。为此，他主张国家要用很大的力量在经济方面、水利方面和技术方面帮助农业发展。

周恩来以上论述，从发展农业对发展工业、发展市场、发展对外贸易、保证全国人口的粮食等作用出发，分析了农业的基础地位。这同他在经济恢复时期提出的“农业的恢复是一切部门恢复的基础”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所不同的是，那时他是立足于经济恢复来强调农业的基础作用，这里他是立足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来强调农业的制约作用。这里一个突出特点是，他强调发展农业、出口农产品换回机器对建立国家工业化的重大作用。40 年后的今天，我国进出口的产品构成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依靠出口农产品以换回工业机器与技术设备已成为过去。然而，50 年代和 60 年代，在我国工业建设的初始阶段，不出口农产品就无法得到工业所急需的机器和技术设备。怎样才能保证一定数量的农产品的出口以满足工业建设对机器、设备的需要？除了全国人民的节衣缩食，最根本的途径还是发展农业、增加农产品总量。

但是，“一五”计划时期，由于急于要把中国由一个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再加上受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影响，突出强调了工业化，农业的发展未能受到足够的重视，对农业索取过多、投入过少。与经济恢复时期相比，“一五”建设，我国对农业是基础的认识，多少有些淡化。这对农业的增长也带来不利影响。农业总产值指数如果以 1952 年为 100，1951 年是 86.8，1950 年是 79.3，1949 年是 67.4；1953 年是 103.1，1951 年是 106.6。可以说，经济恢复时期，农业的恢复与发展速度是很高的；“一五”计划的头两年农业发展速度相对的是降低了。

1956年2月，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4月，毛泽东综论十大关系，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开始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鉴于苏联片面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粮食产量长期达不到革命前最高水平的教训，毛泽东指出：“我们现在的問題，就是还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

此后，周恩来在各种会议上阐述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思想时，多次提出：我们对农业的发展应有足够的注意。1956年9月，党的八大会议上周恩来说：“经验证明，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建设，是不能够也不应该孤立地进行的，它必须有各个方面的配合，特别是农业的配合。农业是工业发展以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延缓农业的发展，不仅直接地影响轻工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而且也将极大地影响重工业以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影响工农联盟的巩固。”1956年11月，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周恩来说：“苏联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都是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个原则是对的，但是在发展中忽视了人民的当前利益。直接与人民利益关系最大的是轻工业、农业，轻视这两者就会带来不好的后果，就会发生经济发展上的严重不平衡”。1957年3月，周恩来根据我国人多地少，人口跟可耕地面积比平均每人不过三亩的同情，根据我国主要依靠人力、手工搞饭吃的农业生产水平指出：“这样一个农业的基础，来供养我们现有的人口，来建设工业，就有困难。”1957年10月3日，他提出，工农业并重很重要，如果农业减产，粮食和原料供应不上，发展工业也困难。1957年12月20日，他进一步指出，中国这个大国一定要认以到工农业如一辆车的两个车轮、人的两条腿两只手一样缺一不可。我们必须工农业并举，农业必须要有更好的配合，不然工业涨不上去。

周恩来的上述思想对指导1957年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1957年是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的最后一年，也是为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设作准备的一年。因此，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是很难安排的一年。在党的八大前后所形成的对农轻重关系的正确确认的基础上，周恩来主持制订的1957年国民经济的计划突出了对农业的安排。1957年农业总产值达604亿元（按1952年不变价格计算），比1952年增长24.8%；粮食产量3901亿斤，比1952年增长19%。1957年是我国经济建设进行得最好的年份之一，也是农业发展得最好的年份之一。似是，整个“一五”计划时期，农业的增长落后于工业的增长，粮棉紧张的局势一直未能根本缓解。

怎样估计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周恩来认为“第一个五年计划基本上是正确的，成绩很大，但是错误不少”。从工农业生产指标完成的情况看，“农业比工业差一点，值得我们重视”。“同工业相比，我们对农业的重视和安排不够。”1957年9月26日，周恩来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作《关于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的报告》时说：解放以来，我们着重地宣传了工业化的意义，这是对的；但是，对于发展农业的重大意义却宣传不够。周恩来对农业问题的估计与对农业工作的批评是符合“一五”时期的实际情况的。尽管我国在“一五”建设中，没有像苏联那样片面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在工农业关系上“没有犯原则性的错误”。似是，由于急于要把中国由一个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由于受苏联经济发展模式的影响，“一五”建设中也还存在着对农业的重视和安排不够的缺点。

“一五”计划时期，周恩来对农业是基础的认识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在进行“一五”计划的建设，开始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时，提出要预防轻视农业的倾向，要求省以下地方党委（除去一些城市搞工业外）要用主要的力量抓农业，第二，从国民经济发展的角度阐述了农业的地位和作用：1.农业的发展制约着工业以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2.农业能否发展影响工农联盟的巩固，关系到国家的政治稳定；3.农业能否发展直接关系到人民当前的利益，关系到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第三，从人多地少、依靠手工搞饭吃的条件出发，分析了我国发展农业这个基础的困难与艰巨性。第四，初步分析了苏联片面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弊端；初步总结了我国“一五”建设的经验教训，坦率地指出了“一五”建设对农业的重视和安排不够的缺点。周恩来的这些认识，对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对确立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国民经济发展方针，无疑有着重大的意义。

调整各业转轨兴农——经济调整时期的以农业为基础

1958年到1960年的三年“大跃进”，我国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社会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最严重的是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1959年粮食产量3400亿斤，比1957年减少了501亿斤，跌落到1954年水平。1960年粮食产量2870亿斤，比1957年减少1071亿斤，跌落到1951年水平；整个农业生产水平也跌落到建国初期。

“大跃进”是在批判反冒进中发动起来的。周恩来是反冒进的主要代表，并因反冒进在1958年1月至3月的中央杭州会议、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上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大跃进”的主要内容是大办工业、大办钢铁、争取中国15年钢产量赶上或者超过英国。这样，周恩来在党的八大前后所提出的对经济速度和农轻重关系的正确认识也就受到了严重冲击。

1958年下半年，“青壮炼铁去，割禾童与姑”，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1959年5月1日周恩来安排八个副总理下去调查研究，提出把劳力从钢铁、水利方面尽量抽下来，充实农业生产第一线。周恩来认为大炼钢铁、大搞工业之后出现了国民经济的不平衡、工业与农业的不平衡、生产与生活的不平衡，需要进行调整。到庐山会议前，周恩来一直在宣传上述思想主张。庐山会议前夕，国家经济委员会党组在给中央的《当前工业生产中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中，指出大跃进以来所出现的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以及工业内部比例关系的某些失调现象是严重的，要求下半年首先是第三季度必须进行整顿和巩固工作，调整比例关系和整顿生产秩序。7月3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建议将这个报告分送给到会同志参考。周恩来是赞成这个报告的主张的。当时毛泽东也是支持这个报告和周恩来的思想主张的。毛泽东提出，过去安排经济计划的次序是重、轻、农，今后要倒过来，按农、轻、重安排，就是要强调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首先要把农业搞好。似是，庐山会议后期，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调整被搁置起来，掀起了新的“大跃进”高潮。

1960年农业生产继续遭到破坏，经济形势继续恶化，许多地区出现了饿死人的严重后果。1960年8月，周恩来、李富春主持研究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时提出了以调整为中心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实行这一方针。从1961年到1965年是我国历史上五年的国民经济调整时期。

国民经济调整包含着多方面的内容，而首要的是要适当地调整农业和工业的相互关系，使工业的发展规模能与农业基础相适应。周恩来说：“在当前的国民经济调整工作中，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是一个中心环节。我国国民经济中出现的不协调现象，农业生产下降的影响最大。没有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工业的发展不能不受农业的限制，也就是说，工业的发展规模，绝不能超过农业提供商品粮食、工业原料和其他农副产品的可能性，也绝不能挤掉农业所需要的劳动力。”

“大跃进”所造成的工业发展规模与农业基础的不相适应主要表现在哪里？

首先，周恩来通过运用工业总产值与农业总产值的变化来说明二者的不相适应。1962年3月28日，周恩来指出，过去几年中。一方面是重工业生产发展速度过高，另一方面是农业严重减产，轻工业生产增长得少。1960年

比 1957 年，工业总产值增加 1.3 倍，农业总产值下降 23.6%；在工业中，生产资料产值增加 2.3 倍，消费资料产值只增加 47%。这种状况表明，工业和农业之间，重工业和轻工业之间，比例关系是很不协调的。过去几年的工业生产指标和基本建设规模，不但同灾年的农业生产水平很不相适应，就是同目前条件下正常年景的农业生产水平也不相适应。几天后，周恩来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指出，1962 年农业总产值计划为 420 亿元，比 1957 年的 537 亿元下降 22%，只相当于 1951—1952 年之间的水平。而 1962 年工业总产值计划是 880 亿元，比 1957 年的 704 亿元增长 25%，这是不相适应的，在这样的农业基础上，工业生产水平是不稳固的。

其次，周恩来根据当时的农业生产条件没有什么变化，仍然主要依靠人力、畜力，依靠手工劳动，而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构成却有了变化，农业劳动力却相对减少来说明当时工业规模与农业基础的不相适应。1960 年 10 月 29 日，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大跃进这三年，农村人口到城市的多了，1957 年城市占总人口比例是 15%，而现在是 19.5%，如果我们再不刹住这个车，那还要递增上去。这对我们今天没有过机械化关的农业是不许可的。1961 年 6 月 19 日，周恩来再一次指出，大跃进使得农村的人力减少，而城市人口却大大膨胀起来。到 1960 年底城市人口占 20%，达到一亿三千万人，而农村人口所占比例降到 80%，绝对数也降为五亿四千万人。城乡人口的这种比例同手工劳动为主的农业生产水平不相称，引起了粮食和农副产品的紧张。

为调整“大跃进”所造成的工业规模与农业基础的不相适应，周恩来特别突出的强调实行以下措施：

必须放慢重工业的发展速度，有些重工业部门的生产指标，必须大幅度地下降。他说：“重工业部门当前的首要任务，是保证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增产更多的化肥和农药，增产更多的中小型农具和适合需要的、质量更好的农业机械。”“对于那些不是当前急需、原料材料供应不足的产品，应该降低它们的生产指标，并且对生产这些产品的企业进行必要的裁并。”

必须缩短基本建设战线，腾出一定数量的材料、设备和人力，用到最急需的方面，特别是农业生产方面，并使那些最重要的项目能够建成投产发挥作用。“现在一般地不应该再增加新项目，而且，对还在施工的项目必须逐个地进行审查，坚决地停建一切应该停建的项目，推迟一切应该推迟的项目。”

必须压缩城镇人口，精简职工。周恩来认为“这是调整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1961 年动员了一千万城市人口下乡，其中绝大多数是“大跃进”中从农村来到城市的。1962 年 3 月，周恩来说：“目前的城镇人口仍然过多，农业可能提供的商品粮食和其他农产品，供养现有的城镇人口还有困难。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指标降低以后，现有的职工人数也还显得过多”。1962 年继续减少了城市人口一千二百万。

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周恩来初步总结了“大跃进”的经验教训，分析了国民经济调整的原因和任务，具体负责了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组织实施，在理论和实践上进一步深化和拓宽了对农业是基础的认识。

第一，进一步加深了对以农业为基础的重要性的认识。大跃进中大办工业不仅脱离了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脱离了农业基础，而且削弱了农业基础。农业基础不稳，工业也不会稳。农业兴，百业兴；农业衰，百业衰。在农业

生产受到极大破坏的情况下，“如果不把农业这个基础恢复起来；现在这个工业基础也站不住”。大跃进之后的农业生产条件在某些方面不如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耕地面积减少了，人力弱了，地力弱了，畜力弱了，中小农具和运输工具十分缺乏，肥料的增长和机械化的提高不可能很快，农业的恢复和发展需要时间。“现在的农业基础没有办法负担这样规模的工业”。“在这样的农业基础上，工业必须有一个大幅度的调整”。背离以农业为基础的规律就要受到惩罚，自觉调整不适应农业基础的工业规模，是坚持按以农业为基础的规律办事的积极办法。

第二，进一步加深了对农业是基础的内容的认识。农业是基础既有其质的规定性，也有其量的规定性。“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社会为生产小麦、牲畜等等所需要的时间越少，它所赢得的从事其他生产，物质的或精神的的生产的时间就越多”。马克思的这两句名言，第一句是从质的规定性上讲的，第二句是从量的规定性上讲的。周恩来在经济恢复时期提出：“农业的恢复是一切部门恢复的基础，没有饭吃，其他一切就都没有办法。”他对农业是基础的质的规定性早有深刻的认识。在经济调整时期，周恩来进一步阐述了农业是基础的量的规定性。1961年3月，他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目前的问题，最集中的表现，就是农村到底能供应城市多少商品粮、劳动力、工业原料，解决多大的市场问题，在这个基础上，城市能搞多大的工业。此后，他又多次阐述了以农业为基础，工业发展受农业生产水平制约的五个方面的具体内容：（1）农业能供应多少商品粮给城市，城市就能办多大的工业；（2）农业能够提供多少劳动力来办工业；（3）农业能够为工业提供多少原料；（4）农业能够为工业提供多大的市场；（5）农业能够为工业提供多大的运输力。此外，关于农业对商业、外贸、财政、国家资金积累，甚至对文教的作用，他也时常有所论列。

第三，明确地把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作为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1949年12月，周恩来就提出了农业是基础、工业是领导的思想。1960年8月1日，周恩来会见波兰驻华大使克诺泰时说，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农业是基础、工业是主导，如果二者结合得好就可能发展得快一点。但是，在这之间的十年中，党和国家最高决策层并没有明确地把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作为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把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作为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是1962年明确地提出来的。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提出：“以农业为基础来发展国民经济，是我们的一个根本方针”。同年3月，周恩来在二届人大三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多年来的经验完全证明，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必须以工业为主导，而以农业为基础”。这对于当时的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和对于以后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具有根本性的指导意义。

第四，明确地提出以农轻重为序安排计划，把农业放在发展国民经济的首要地位。即制订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必须首先安排好农业的发展速度和生产规模，安排好农业内部的粮食、棉花、油料的生产，安排好种植业与林牧副渔各业的结构和比例关系；其次安排好轻工业的发展速度和生产规模及其内部的结构和比例关系；然后根据农业、轻工业特别是农业的发展速度和生产规模来决定重工业的发展速度和生产规模，安排重工业内部的结构和比例关系。在党的八大前后，毛泽东、周恩来都十分重视研究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并多次强调要处理好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但

怎样处理好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尚处于摸索之中。当时，他们还只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框架之内提出“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1959年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曾提出过去安排经济计划的次序是重、轻、农，今后要倒过来，按农、轻、重安排。但是，经过庐山会议后期“反右倾”斗争的冲击，这一思想很快淹没在继续“大跃进”的浪潮中。明确地提出以农轻重为序的思想，并把它作为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的原则是在1962年。其中，周恩来作出了重大贡献。1962年3月7日，周恩来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提出了“先抓吃穿用，实现农轻重”的思想。3月28日，他对这一思想作了系统阐述，指出：“在一九六二年，我们必须采取更有力的措施，切实按照农业、轻工业、重工业这样的次序，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全面调整，合理安排，以便集中主要力量，逐步地解决人民的吃、穿、用方面的最迫切的问题，并且逐步地存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建立新的平衡”。以农轻重为序，使正确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有了行之有效的可操作的方法。同时，以农轻重为序对贯彻实行以农业为基础是一个具体可靠的保证。

第五，明确地提出把一切工作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不仅工业要以农业为基础，而且各行各业、国民经济各部门都要以农业为基础。1962年3月28日，周恩来要求“各级计划机关，把主要的注意力，从工业交通方面转移到农业和市场方面来”。“重工业必须为农业提供越来越多的各种农具、农业机械、化学肥料、木材、燃料等等，来不断地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使农业能够为工业和城市提供越来越多的粮食、原料和其他农副产品。轻工业必须尽可能为农村提供越来越多的日用品，以利于发展城乡交流”。不仅工业要支援农业，而且交通运输、财政贸易、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等等都要支援农业。同年12月24日，周恩来分析前几年（“大跃进”期间）的错误之一是对把一切工作、同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工作都要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这个方向问题没有弄得很透。今后应该引以为戒，具体地、切实地把各部门的工作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使支援农业能够有效、持续和不断发展。把一切工作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使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进一步具体化了。

周恩来以上认识，丰富和发展了他自己在经济恢复、“一五”计划时期中的农业是基础的思想，不仅对1961—1965年的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发挥了极为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后来探索如何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稳定农业支撑全局——“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以农业为基础

在“文化大革命”动乱的艰难岁月中，周恩来为保持国民经济能够继续运行、为保证全国人民能够有饭吃，夙兴夜寐，竭尽全力，忘我工作。他曾对余秋里、谷牧同志说：“你们可得帮我把住经济工作这个关啊！经济基础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设法收拾了。所以，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生产停了，国家怎么办？不种田了，没有粮食吃，人民怎么能活下去？还能闹什么革命？”这段语重心长的话道出了周恩来对“文化大革命”的忧虑，同时也表达了以下思想：在经济与政治的关系上，经济最终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在经济工作的各个环节中生产是关键；在各项生产活动中处于最基础的地位的是农业。

1966年上半年，在“文化大革命”动乱到来之前，周恩来正在集中精力抓北方抗旱防涝工作。1月下旬至2月初，他主持召开了北方八省市抗旱会议，并于2月1日下午作了总结发言。2月下旬至3月初，他四次批改《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抗旱防涝，抗灾保畜，争取丰收，为改变我国北方农业的落后面貌而斗争的决定》。3月2日至7日，他连续几天听取北方八省市抗旱情况汇报。在成立北方农业小组时，他担任组长并兼任何北北京组组长。3月8日、22日，河北邢台地区两次地震，他于3月9日、4月1日两次深入灾区部署救灾与恢复农业生产的工作。4月2日至5日，他跑了魏县、大名、临漳、磁县、成安丘个县的许多社队了解、研究与安排抗旱打井工作。6月上旬，他再一次主持召开北方八省市抗旱会议。当时，他对农业这个基础的重视及其为之操劳、奔波的精神，可由此见到一斑。

1966年下半年，“文化大革命”动乱开始后，周恩来苦口婆心他说，人民要吃饭，农业生产绝对不能停止。由他主持讨论修改的《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的《人民日报》社论指出：“在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和农村里搞文化大革命，必须在生产以外的时间进行，利用业余时间进行，而不能占用生产的时间，不能离开生产岗位”。1967年初上海“一月风暴”掀起“夺权”妖风之后，全国的经济形势急剧恶化。为尽量减轻因“夺权”对农业生产的破坏，周恩来于3月14日提出“迅速建立县一级的‘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动员一切力量狠抓农业及其增产措施，狠抓工业、交通、财贸、卫生、教育等方面工作及其对春耕生产的支援工作”。1968年以后，周恩来还亲自过问抗旱打井、防洪排涝、粮棉生产等工作，亲自抓化肥、农业机械等支农工业的建设。

“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恩来对农业是基础的认识同前17年对农业是基础的认识有着一贯性，同时也有着“文化大革命”条件下独具的特点。

“文化大革命”同“大跃进”在指导思想上有许多相同之处。相反，“文化大革命”对国民经济调整时期所形成的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则往往是相悖逆的。周恩来不可能脱离“文化大革命”的氛围，对“大跃进”采取否定的态度。但是，面对具体问题，如经济计划的平衡、工业与农业的协调发展等，他总是强调要吸取“大跃进”的经验教训。对经济调整时期明确提出并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和按农轻重次序安排经济计划的原则，他总是理直气壮地强调要在“文化大革命”经济工作中贯彻实行。1968年5月27日，周恩来会见尼泊尔副首相比斯塔时说，经济发展的一般途径是先从农业着手，再发展重工业。1969年3

月 24 日，他在全国计划座谈会上指出，贯彻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思想，就必须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人不能不吃粮，工业要支援农业。

“九·一三”事件后，特别是 1973 年，周恩来不再是复述国民经济调整时期明确提出的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以农轻重为序的方针、原则，而是对“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历史进行分析，对国情进行分析，进一步加深对农业是基础的认识。1973 年 3 月 26 日，周恩来指出，发展经济首先还是把农业摆在第一位，其次是轻工业，再其次是重工业，就是农轻重的次序。因为人首先是要吃东西、穿衣服。如果粮食国内不能自给，有求于人，那是很费事的。我国有 8 亿人口，进口粮食不仅要付现款，而且光运输也不得了。所以，如果我们不把农业搞好，靠什么都是靠不住的，谁也没办法来帮助我们。1973 年 5 月 29 日，周恩来要求驻外大使回国后到农村去蹲蹲，好好研究研究中国农村的问题，这是基本的东西。他说，中国的农业是一门大学问，要好好学习学习。我们现在所以能够经过“文化大革命”两次路线斗争，反复不大，经济上能够稳定，就因为是执行毛主席的农业政策，农村还是基本稳住的。这段分析虽然不可能脱离“文化大革命”的氛围，但瑕不掩瑜，它集中表达了农业稳定是全国稳定的基础的思想。

十年“文化大革命”，如果不是农村还是基本稳定的，如果不是农业基础还能维持全国人民有饭吃，那么全国的局面也就不可能维持下去，党和国家也就不可能通过自身调节去渡过危机、迎来新的局面。

1976 年 1 月 8 日，周恩来累死了。然而，农业是基础，中国的农业是一门大学问，研究中国农村问题是基本课题，这警世之句却时刻警醒着当代中国。

机械手工不能偏废——发挥手工业对现代工业的助手作用

我国手工业者中和手工艺界流传着周恩来和章水泉交往的故事。

建国初期，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赴国外访问。在参观中，周恩来发现有一床箴丝蚊帐，其丝如纱，其质如金，可叠，可开，十分柔和。他用手轻轻抚弄着，赞不绝口。陪同的外国政府首脑告诉周恩来，这是你们中国人做的！周恩来喜出望外。回国后，周恩来电询全国，寻找它的作者。终于在湖北省广济县找到了。它的作者是章水泉。

章水泉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穷蔑匠。他世居湖北武穴镇。自幼以竹器技艺为生。他制作的竹器结构严谨，式样美观，小巧玲珑。如驰名遐迩的武穴竹椅，椅靠上刻有落花兰草或花鸟虫鱼，竹节对衬，坚实不松架，料质处理好，虫不蛀蚀，经久耐用。他精心制作的百余种竹器工艺品，不仅继承了我国民间竹器工艺的优良传统，而且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为国内外人士称赞。

周恩来了解这一情况后，立即指示湖北省人民政府主席李先念，称章水泉是“了不起的人物”，要特别爱护。李先念立即派人将章水泉接到省城，关怀备至。在武汉，章水泉不遗余力地传艺带徒，使其技艺后继有人。党和人民政府对章水泉十分信任，选举他为湖北省政协委员、武汉市工艺美术专业联社理事会副主任等职务。此后，他的竹器作品曾刊登在《人民日报》《人民画报》及苏联的《真理报》、香港的《大公报》等近 20 种报刊上。他卓越的艺术造诣受到很高的评价，新华社曾报道说：“据有关美术工艺研究专家认为，被称之为竹器之王的章水泉把我国明代传统艺术用到竹工上来，给人感受端庄、典雅、大方。牢固不显粗笨，精巧不失单薄，具有实用和欣赏双重价值。”

每次周恩来到武汉，不是委托人看望章水泉，就是专门打电话慰问他。章水泉总是激动地回答：“我很好！总理好么？”直到 1962 年章水泉去世，周恩来一直与章水泉保持着纯朴的友谊。

周恩来与一个普通的竹器艺人交往的故事，不仅反映了他人民公仆的本色，而且反映了他对传统手工业及其手工艺的重视。周恩来指出，我国手工业很发达，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在为国家和人民的需要服务方面起着积极的作用，是现代工业的有力助手。他还认为，传统手工业反映着我国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其工艺成就具有很高的欣赏价值，这则是现代工业所无法替代的。周恩来曾多次过问手工业的生产与手工艺品的出口。

50 年代，在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周恩来指出，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不能影响手工业的生产和手工艺的发展。他说，手工业在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品种只许加多，不许减少！货色只许更好，不许变坏；技术只许提高，不许降低。他要求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必须根据手工业的特点，实行正确的政策：第一，在手工业劳动者组织起来以后，要充分利用地方原料，利用废品废料，增加产品品种，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生产更多更好符合国家和人民需要的产品。第二，注意保持过去手工业者十分关心他们自己的产品质量和市场销路的优点。凡是不宜于集体生产的，就应该保持分散生产的形式。其产品大部分应该由手工业合作社或者手工业者根据原有的市场联系和新的市场需要，自己推销。第三，注意某些手工业在手工艺方面所具有的特殊性质和历史传统，在合作化以后，必须使它的工艺水平更加提高，优良的历史传统能够保存下来并且得到发扬。有些特殊好的手工业和手

工艺业，如果一时不易组织合作，就让他们单干。上述思想，周恩来在 1956 年 1 月 30 日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9 月党的“八大”会议上，都作过详细的阐述。

上述思想，既体现了周恩来一贯的科学的求实精神，也反映了他对发展中国手工业及手工艺的胆识与智慧。

“文化大革命”动乱中，周恩来多次呼吁要保护和发展传统手工业和手工艺，要保持自己的特点，机械、手工不能偏废。1966 年夏秋，广州交易会展厅里展出了许多具有我国民族特色的工艺品，如山水风景、花鸟虫草、古装人物、古仕女图等。当时云集广州的全国许多地区造反派声言要到广交会展厅去“破四旧”。对此，周恩来指示，在广交会门前张贴国务院布告，保证广交会正常进行，不准冲击广交会。周恩来还派廖承志等来临广交会做造反派的工作。经过多方努力才制止住造反派冲进广交会。

1967 年春季广交会遇到了同样的麻烦，军管会控制不了局面。4 月 14 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林彪，指出：“考虑到目前各院校和机关造反派多忙于内争，因而影响了广州交易会各公司、各馆的内部领导，并与地方各造反派形成派别（这种情况，现在北京大中学校和机关亦已出现，中央文革正在讨论此事），如不立即劝阻，对明（十五）日开幕，极为不利。”为保证广交会顺利开幕，他飞赴广州作说服工作。

1972 年 4 月 9 日，他在接见交易会代表时，针对“文化大革命”对传统手工艺产品出口的破坏，十分痛心他说：“过去能搞的，现在为什么搞不出来？我对此非常难过。”中国人民有传统手工艺，时间长，要保持自己的特点，木刻，象牙划，这些好的传统很难学，带徒弟要好多年才能培养出来，这个东西没有人与我们竞争嘛！但是都被极左思潮打掉了。”他认为手工业都组织起来，不仅可以发展城市里弄家属工业，农村也可发展，生产发展了，收入也可增加。他说，手工艺反映着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杰出才能，不管多精密的产品，最后一道工序还是要手工，电子计算机、半导体、核试验、卫星上天，越是精细的，最后都要现场进行不止一次的检查。他要求尽快恢复与发展传统手工艺产品的生产与出口，“应该把土特产、手工艺搞上去”，“今年开始，每年都要提倡”。周恩来上述思想主张，不仅在“文化大革命”特殊条件下对保护和发展传统手工业和手工艺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而且对指导以后我国传统手工业和手工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胸中有数决策有方——办具体事要记具体数字

古代军事家孙子说：“多算胜，少算不谙，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古代政治家荀子说：“量地而立国，计利而言民，度人力而授事：使民必胜事，事必出利，利足以生民，皆使衣食百用出入相揜，必时藏余，谓之称数”。军事家只有多方计算、掌握具体数字、知己知彼，才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管理国家、建设国家，也只有掌握具体数字，成竹在胸，才能尽量避免决策失误。

周恩来抓经济建设十分重视掌握具体数字。他常说：“毛主席听汇报看文件只记几个大数就够了，我是办具体事的，要记一些具体数字。”

在资源方面，他用人多地少的数字说明建设国家的困难和珍惜资源的重要。1957年3月，他说：“我们这个国家有这么几个数目字，就说明不是轻易可以建设得好的。六万万人口的国家，这样多的人口，而我们现在可耕地只有十六万万亩。拿我去过的南亚的一些国家来比，只有东巴基斯坦那个地方人口密，耕地比较少，跟我们几乎相等。除那个地方以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比我们耕地少的，都比我们耕地多，有的多了一半，有的多了几倍。我国人口跟可耕地面积比，平均每人不到三亩。城市人口不算，三亩多一点。”他认为，我国这样一个农业的基础，来供养我们现有的人口，来建设工业，就有困难，如果不艰苦奋斗，那不是轻易可成的。1963年，他指出，我国资源有两个很大的弱点：一是耕地少，不到16亿亩，在全同土地总面积中不到12%；二是森林覆盖率低，不到全国土地总面积的10%。他以此教育大家珍惜资源、合理利用资源。

在人口方面，他用生产和消费的数字比较说明计划生育势在必行。他指出，人多给安排劳动就业带来若干困难和限制，如果充分就业则影响薪金有机构成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人多消费需要的量就大。衣食住行，首先是食，我国人口现在平均每年增长2%左右，每年增加1000多万人，这是一个可观的数目，而我们的粮食平均每年增长3%左右，增长量并不大。”1963年，周恩来指出，过去15年，出生的婴儿共有22500万人，每年都要安排就业升学。1岁到15岁的是已经存在的，就够我们为之奋斗的了，再发展下去，包袱越背越重。这就要大家计划生育，以控制人口过度增长。

在氏族关系方面，他用相对数说明了民族团结、共同发展的重要性。1956年5月，他指出，中国汉族占总人口的94%，其他民族占6%。但是，少数民族地区占我国总面积的60%，汉族居住的地区占40%。中国有两句话：人口众多，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指汉族，而地大和物博主要是指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因此，汉族和少数民族非要合作不可，不合作就不能发展中国。

在中外经济关系上，周恩来经常运用具体经济指标的中外比较说明中国经济落后的现实，强调发展中外经济交流、急起直追的迫切性与重要性。1957年11月8日，他同日本来宾谈话时指出，日本9000万人口，却生产1100万吨钢，700多万吨化肥，我们6亿人口现在只有520万吨钢，才产50多万吨化肥，日本每町步地产粮6吨多，我们才产2.2吨，日本是我们的三倍。“你们的工业和农业水平比我们高，我们应当向你们学习。”

由于周恩来重视数据、善于算帐，那些浮夸的数字，不切实际的“高指标”，是瞒不过他的眼睛的。1958年，他在某市郊区看了一块挂牌亩产十万斤的高产稻田。田亩上空，像灯光球场一样，电灯通明，加强光照，旁边用

鼓风机通风，实际上是几十亩的稻子移在一亩地里。周恩来看了以后心情沉重，虽然有外宾在场，没有直接批评。这一年“大办钢铁”，河南新乡市一天放出生铁 102 万吨的高产“卫星”。周恩来算了算帐说，我们在鞍钢，炼一吨生铁，贫矿石要三四吨，炼焦用煤要二三吨，加上石灰石、辅助材料等要十多吨。河南新乡一天生产 102 万吨生铁，要一千多万吨运输量，这怎么可能呢？周恩来根本不相信那些蒙人的“高指标”。

对于 1958 年大办公共食堂，周恩来也算了一笔帐。1959 年 5 月 28 日，周恩来在天津南开大学师生员工大会上说，过去农民在家里吃饭，人口小口、男女老少、人口多人口少、农忙农闲，要调顿着过日子，有时多吃，有时少吃。现在入公共食堂了，人人都吃饭不要钱，大家都一样，来个平均。好，你吃 1 斤，我也吃 1 斤；你吃 2 斤，我也吃 2 斤。大家算算，5 万万 4 千万的农村人口。如果每天吃 2 斤，吃了 5 个月，150 天，这样就变成吃掉多少粮食呢——1650 亿斤的细粮，粗粮就是 2000 亿斤。大家想想，这不是就紧张了？多吃一点，多吃几斤，用 6 万万 5 千万一乘，数目就大了。周恩来用具体数字证明了大办公共食堂会加剧粮食紧张状况的道理。

周恩来不仅自己记具体数字、指导建设工作，而且要求有关领导和工作人员也要胸中有数。财政部老部长戎子和回忆道：“周总理的记忆力非常好，对每年预算中各个大项目的开支，例如同防费、行政费、文教费、基本建设费、对外援助费是多少，他都记得很清楚，有时候还有意识地考考我们。周总理要求，搞财政工作的人，要训练自己对数字的记忆能力，国家财政预算的主要数字，一般都要能记住两三年的。”那些胸中无数的领导干部见到周恩来，往往过不了数字关。1966 年 4 月 3 日，他到河北省大名县杨桥公社前桑圈大队调查研究抗旱打井工作。他问在场的公社书记，打井多少？配套多少？公社书记答不上来。周恩来批评说：“我在北京不晓得，你在杨桥也不晓得？”这位书记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

有时，专业部门的领导和工作人员在汇报工作中或送报表时，往往搞错了百分比或搞错了绝对数，周恩来则及时予以纠正。1952 年在莫斯科，周恩来在审阅一份有关换聘延聘苏联专家的文稿时，发现工作人员统计的数字算重了一个人头，总共应该是 52，而不是 53。他问马列和李越然，“你们说说，49 加 3 等于多少？”一下子把马列、李越然问愣了。他批评道：“不能马虎，文件一旦送出，连算数都有误，人家岂不笑话。”在为与苏联政府谈判准备的材料中，林业方面有几个数字有差错。周恩来发现后严肃地对有关人员说：“像这样的差错和疏忽不能容许！”1959 年 8 月，周恩来审查修改即将向人大常委会所作的报告稿。附在报告稿中的那张计划表上，每一行计划数字的备注栏里，他都用红蓝两色铅笔计算了一个百分比数字，蓝色的表示数字无误，红色的表示算错了，他对国家计委和统计局的有关同志说：“你们工作这样粗心大意，百分比算错了也不核对，就往上送，只是划圈，不负责任，这样工作怎么行呢！”多少年过去了，这些同志仍然记着周总理亲自用笔算核对计划数字，纠正错误的情景。

“大跃进”期间，有些人强调算“政治帐”不重视算“经济帐”，开经济工作会议不让业务专家参加。但是，周恩来反对这样做，强调管理经济就要算帐，熟悉各种统计数字，开经济工作会议，要请业务专家参加，听取他们的意见。周恩来还要求身边工作的同志熟记各种统计数字，要求他们开会时要带上国内外统计手册，随时准备被询问。

掌握具体数字，不仅是形成正确决策的一个重要前提，也是检查决策是否正确的一个基本方法。学习周恩来重视掌握具体数字的决策方法和领导艺术，对如何提高领导者的领导水平是富有启发意义的。

数不能误错不能再——对中央贸易部一次浪费事件的处理

经济工作中，不仅要重视掌握具体数字，以避免决策的失误；而且要认真对待每一个数字，不能粗枝大叶把数字搞错，以避免造成直接的经济损失。

周恩来重视数据、重视算帐，对工作人员搞错数字，他总是进行严肃的批评。

1951年1月，新疆发生牛羊口蹄疫，西北军政委员会于24日电请政务院向苏联订购防疫药品古阿林三吨。中央贸易部同外贸司苏联处出口科科长陆红在接到关于这件事情的电话通知后，就向有关部门查询这份电报；但因政务院已经把电报直接批给外交部，所以没有查着，陆红因为感到事关紧急，经请示国外贸易司苏联处副处长杨金涛后，就前往外交部摘抄电报。陆红在抄电文时，将“三吨”误抄为“三百吨”，并即按此数向苏联商务代表处提出定货，到1951年2月至3月，这项药品三百吨全部运到新疆。这样就比原来需要量多买了297吨。虽然这项药品可逐年使用，但因差错太大，积压资金合计人民币40多亿元（1955年3月1日起，发行新的人民币1元等于旧币1万元），造成国家资财的严重浪费。

这一浪费事件发生后，中央贸易部部长叶季壮于1951年10月26日向政务院作了书面报告。11月5日，周恩来将此事批交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处理，并批示：“应加重处分，同时，应规定财经各部门凡属支付、订购和预算数字都须经过复核方得批发。”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根据周恩来的批示决定给陆红记大过一次，给贸易部领导干部以批评处分：规定：今后财政经济各部门在书写支付、订购、顶算及其他有关数字时，都要写清楚，并且要经过复核、校对等手续才能批发。

因陆红抄错数字而造成国家经济损失的事件，说明建国初期，我们的经济工作制度还不健全，经济工作人员对数字还不够细心、重视。在周恩来亲自过问下，对这一事件的严肃处理，不仅使当事人受到了深刻的教育，而且对健全经济工作制度，使经济工作者以如履薄冰、戒慎恐惧的态度去对待具体数字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增加供给抑制需求——缓解职工住房紧张的思路

1957年9月26日，在中国共产党八届三中全会上，周恩来作了《关于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的报告》，并口头作了一些重要的补充和说明。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探索职工住房问题。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对职工住宅基建投资44亿元，建设职工住宅共约8000万平方米（平均每平方米单价为53元）。职工住宅的建设速度这样快，仍感不足。到1956年底，还有约250万职工要求解决住房问题。造成职工住房紧张的原因何在？周恩来认为大致有四个方面：

第一，由于职工某些福利待遇过高和规定的不合理，影响职工家属，大量涌入城市。我国当时农村户口迁入城市不受限制。职工工资水平的安排，没有很好地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出发，而只单纯从工业生产的增长和工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出发，造成了部分职工工资水平偏高，特别是职工福利待遇过高。以北京为例，1956年38个中央企业的附加工资和各项福利费支出，平均为工资总额的24.8%，个别企业如石景山发电厂竟达到40%。这就影响了农民盲目流入城市。另外，某些福利待遇规定不合理，如职工的公费医疗也给农民进城以很大的吸引力。

第二，在工业企业和城市建设中大量拆除原有房屋，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仅1956年北京、武汉、太原、兰州等175个城市就拆除旧房248万平方米。

第三，一般房屋造价高了，影响建筑面积的增加。60年代初，周恩来在主张抑制社会集团消费的同时，仍然坚持降低房屋造价，扩大建筑面积。1961年12月28日，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1953、1959、1960这三年995亿元的投资里头，楼、堂、厅、院、馆的建筑面积占了整整3000万平方米。如果把22亿元用在建造职工宿舍，标准就可以降低，就不是建筑3000万平方米，就可以建6000多万平方米，可供1200万人住。

第四，城市房租政策和住宅管理制度很不合理，公房房租偏低，管理不善，制度不严。根据国务院统计局1956年职工家庭收支调查，住公房的职工平均每户每月负担房租2.1元，占家庭收入的2.4%，占本人工资的3.2%。国家收回的租金，一般只达应收租金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左右，这就造成了部分职工卖私房要公房，公房的供给总是满足不了职工的需求。周恩来非常气愤他说：现在公房收租低，甚至不收，住民房还要补贴。现在发展到什么情况呢？有的职员把他的房子卖掉，还要公家给他房子。计委就有这样一个人。因为公家给房子嘛！

八届三中全会上，周恩来通过对职工住房紧张的原因的分析，提出了一系列缓解职工住房紧张的具体办法：

一是根据可能适当地增建职工住宅。二是提倡职工自建一些标准低的住宅。为鼓励职工自建住宅，可以由本企业事业单位给以一定的数目贷款，分期扣还：三是整顿各种福利待遇和采取其他措施以加强控制城市人口的增长。四是对住民房的职工房租补贴，采取措施，逐步取消。五是适当提高职工住公房的收费标准。租金一般地应该包括折旧、维护、管理三项费用。一般平均每平方米应收租金为0.25元。按照每户16—20平方米的居住面积计算，每月房租4—5元，一般占职工工资收入6—10%，平均8%左右。提高房租要分步骤进行。第一步，未收租的一律收租，收租太少的应该提高。第

二步，达到应收租金的水平，什么时候开始实行，待第一步行之有效一年后再议。

周恩来提出缓解职工住房紧张的五项办法，是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双管齐下以解决住房供不应求的问题。一、二项是主张通过国家、企事业单位、职工个人的共同努力以增加住房的供给。三、四、五项是在抑制需求特别是通过抑制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来缩小住房的供求之间的缺口。在五项办法中，周恩来突出提高公房房租的办法。在供给和要求两个方面，周恩来更多地强调了抑制需求的作用。不抑制对住房的需求，住房供给再多也无济于事。所以，他最后强调：必须制定严格的房屋分配制度和管理制度，而且运用群众路线的办法，依靠群众力量来监督这些制度的贯彻执行。

50年代周恩来对住房问题的探索中，已经表达了这样的思想：贯彻商品经济等价交换的原则，任何人住房子都要交付租金，房租要同房屋的折旧、维护、管理费相等。尽管周恩来是从分配关系和消费关系上，指出住房问题上的等价交换原则，并没有提出生产商品性住房和公房的买卖问题，但他的思路却是通向住房商品化的一个纽结点。可以想象，如果八届三中全会以后就实行公房房租同房屋的折旧、维护、管理费相等的房租原则，就不至造成拖累至今、积重难返的住房问题。遗憾的是，八届三中全会以后，周恩来因反冒进不断受到指责和批评，并被迫在中央南宁会议、中央成都会议上多次检讨，周恩来在八届三中全会上及以前对住房问题的探索被中断了。

继承发展保护提高——北京城市建设与都江堰的两次改建

周恩来向来反对搞民族虚无主义，但也反对走向另一极端的崇古复古主义。他主张在建筑艺术上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正确对待继承和发展的关系。

1953年6月10日，周恩来说，我国建筑事业虽有古代许多优良的建筑成就，但目前来看还是落后的，应逐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究竟怎样才是合乎理想的民族形式，还需要研究摸索，同时要反对两种偏向：一种J 堑丕孔非竺拦鄣钠陶判问剑 砥恢质潜J 氏母垂判问健O 肽吁螭 苕骼丛诒*199次政务会议上针对文物保护问题进一步阐述了继承和发展的辩证关系。他认为在保存古物和民族遗产问题上首先要达成共识，如果在这一问题上思想认识不一致，北京的都市规划就会遇到问题。怎样才能达成共识？归结到一点是不要孤立、静止、片面地看问题，而要坚持辩证地看问题。周恩来说，保存古物和民族遗产，有发扬光大的一面。我不是说，我们要前进，要发展文化，就不保存古物，不要民族遗产。不是的，我是说要推陈出新。他还说，保存文物一定要跟我们的发展结合起来，完全孤立地去看一个东西，不去看发展前途，至少是一种局部的眼前的看法，不是全局的长远的看法。如果把文物当作古董，那就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要真正保存，要传得久远，就要发扬光大。讲继承、保存离不开发展；讲发展、创新也离不开继承。对于后者，周恩来在1957年5月31日曾指出，世界上很多大城市都是在旧的基础上建设起来的，北京的城市建设不要平地起家。

在北京城市建设中，周恩来多次亲临现场具体解决如何保护古代建筑、如何发展民族建筑艺术等问题。如北海大桥的建设，周恩来决定保留团城，让团城南面的中南海国务院的红墙后移，将桥和马路向南拓宽扩建。这样既保护了文物，又改建了大桥，解决了交通问题。

1956年6月3日，周恩来在观看北京规划草图时，针对有人主张把前门拆掉，指出，前门怎么拆？它又不挡路。有一条原则，凡是不忙的事，就不要办。他批评拆掉朝阳门、阜城门是主观主义。他说：城楼两边有了车行道，不影响交通，也不必一定要拆。

在人民大会堂的建筑设计上，有的工程师主张按西洋的建筑模式进行建设；有的主张仿中国古代的建筑，把大会堂搞成大屋顶的形式。对此，周恩来明确指出：“在建筑形式和艺术风格上，要古今中外，一切精华，皆为我用，”不要为任何除旧的程式所束缚，努力创作新的具有社会主义时代特点的建筑形式。

李冰父子在岷江上游与中游分界处的灌县修建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周恩来经常提到它，夸奖它经过了两千年历史的检验，是成功的；多次向外宾介绍都江堰，把它作为中国水利史、文明史的突出成就。1972年11月21日，周恩来最后一次主持葛洲坝水利卫程汇报时，意味深长他说，水利至少有三千年的经验，这是科学的事，都江堰总算个科学，有水平，有创造！两千年前有水平，两千年后我们应更高。这是周恩来对研究提高、继承发展都江堰的建筑成就与治水经验的重要嘱托。

“大跃进”期间，有关领导不经科学论证，贸然决定改建都江堰，修建综合利用的水电站，水电部派员检查后，认为设计方案对推移质、漂木等许多问题考虑不够，如盲目改建，不但不能达到设计意图，还会破坏原有工程的效能。最后，情况反映到国务院，周恩来亲自批准拆除那次改建的部分，

恢复都江堰工程的原貌。他多次指出要认真研究都江堰的经验，保护好都江堰工程，古为今用；多次批评那次改建的主观随意性。1961年7月4日，周恩来批评指出，四川灌县都江堰是秦汉时代依照水势修起来的，引岷江水灌溉很多地方。现在有个工程师要把它改造，这种创造精神可嘉，但要很好研究。1964年6月10日，他又批评那次改建都江堰违反了自然规律，造成了一些破坏。

以后，经过10多年的勘测、实验和研究工作，慎重提出都江堰的改建设计，经审批后于1973年开工，1974年完成，这次改建是成功的，在原有工程基础上，加上现代化的闸坝，提高和扩大了都江堰的效益。”

以人为主物为人用——万人大会堂水天一色的设计方案

在经济建设上，周恩来向来反对见物不见人的错误思想和做法。1956年，在国务院的一次常务会议上讨论关于职工伤亡事故报告规程时，有关部门汇报旅大有两只渔船沉没。原因是渔业公司、领导对群众的生命安全不负责任，气象部门发出大风预报，渔业公司压了24小时才发报通知渔船。而且电文开头不是让他们转移到安全地带，而是问鱼捕得怎么样。周恩来听后十分气愤他说，封建时代马厰饶了，孔子还问人不问马，“盖贵人贱畜”。我们今天，共产党的某些干部却问鱼不问人。他责令有关部门起草关于安全生产的指示，要以事例说明：关心工人，事故就少；不关心，事故就多；关心人、贵人，是每个干部的责任。

在城市建设上，周恩来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是“以人为主，物为人用”。

建设北京人民大会堂，其中的万人大礼堂是整个工程的主体。可是，万人大礼堂，空间这么大，如果处理手法不当，人坐在里面就会感到渺小和压抑。怎样处理这个矛盾？专家们意见纷坛，莫衷一是。周恩来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强调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人，我们的建筑必须“以人为主，物为人用”，使享用它的广大人民群众感到心情舒畅，感到自己就是建筑物的主人。根据“以人为主，物为人用”的指导思想，周恩来提出了“水天一色”的设计思路。他启发大家说：“人站在海边，看海不显得远，看天不显得高，人并不显得渺小，这是什么原因呢？”说罢，他随手用铅笔画了一个不规则的扁圆形的顶棚图，启发大家在设计上利用这个视错觉。周恩来的话如同黑夜拨亮一盏灯，使搞过几十年设计的老专家豁然开朗，倾身折服。

按照周恩来的设计思路，设计师们把礼堂的内部设计成“水天一色”的形状，顶棚与墙面圆角相交，成穹窿形象，从顶棚到墙面。上下圆曲浑然一体，使人感觉既不压抑又不空旷。

技通中外桥架南北——采用西林管柱钻孔法建长江大桥

长江自古称为“天堑”。江宽水深，风起浪作。“白浪如山那可渡，狂风愁杀峭帆人”。中国人民很早就希望在长江上架设桥梁。但是，使长江架桥的理想成为实践，并实现“天堑变通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周恩来具体过问了建设长江大桥的决策，他批准采用苏联专家康·谢·西林的管柱钻孔法，不仅对武汉长江大桥的顺利建成起了关键作用，而且对后来的南京长江大桥等大桥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53年周恩来批准成立武汉大桥工程局，具体负责武汉长江大桥的建设。1954年1月，政务院第203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建武汉长江大桥的决议”。但是，武汉长江大桥的初步设计是决定采用当时世界习用的“压气沉箱”法施工。在枯水季节也有三四十米深的长江江底用这种方法施工，最健壮的人每天也只能下去工作15分钟，而且一年只能施工三四个月。

1954年7月，苏联专家康·谢·西林提出武汉长江大桥的建设不采用压气沉箱法，建议用管柱钻孔法。管柱钻孔法有明显的优点，能在距水面37米以下施工，不受深水期的限制，而且不影响工人身体健康。周恩来获悉西林的管柱钻孔法后，又仔细地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采用管柱基础架设大桥在我国是第一次，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从稳妥、可靠起见，周恩来要求经过实验才能施工。有关部门对管柱钻孔法的设计方案经过三个月的讨论和半年的试验，证明确实可行，这样，周恩来同意报经中央批准。由于采用西林的管柱钻孔法的新技术，武汉长江大桥的建设比原来的预计缩短了工期，又节省了投资。

武汉长江大桥竣工后，为感谢西林创造性地提出并且具体地指导大家共同实现了新的桥梁工程技术，使大桥质量良好地提前建成，周恩来署名授予西林“感谢状”。

南京长江大桥的建设也采用了管柱钻孔法。

1971年6月，周恩来陪同外宾参观南京长江大桥。在桥上，他指出，南京长江大桥的建设是发展了武汉大桥建设的经验。他说，武汉大桥所用的管柱钻孔法，是苏联专家西林设计的，苏联没有采用，我们在武汉采用了，南京也用了，而且有发展。他认为，对我国的大桥建设西林是有功劳的，武汉大桥给管柱钻孔法立了一个碑，南京大桥可以挂西林的照片。

在“文化大革命”的氛围下，周恩来公开肯定苏联专家西林对长江大桥建设的功劳，肯定我国采用后并获得成功的管柱钻孔法是外国专家发明的，有着特殊的意义。它是对关门建设、盲目排外的极左思潮的否定，是对开门建设、技术引进的肯定。

车船互补相得益彰——发挥长江水运之长消除陆行障碍

长江素有“黄金水道”之称，干流横贯东西，支流辐辏南北，江阔水深，终年不冻，四季通航，在世界同类河流中，航运条件最为优越。有人估算过，一条长江可以顶40条铁路的运量。筹划三峡工程、兴修丹江口和葛洲坝水利枢纽不仅为了防洪和发电，改善航运条件，发挥“黄金水道”的作用，亦是其重要目的之一。在葛洲坝工程修建过程中，周恩来多次强调航运问题，提出不能顾此失彼，为了发电而影响航运。一次会议上，他十分严肃他说：“长江水断了还得了！”“航运中断是大罪呀！”他还嘱咐林一山：“我给你一个任务，如果船闸不通航或减少航运效益，葛洲坝工程要停下来。一条长江抵多少条铁路啊，一条铁路也不许中断，何况长江！”

“文化大革命”期间，武斗愈演愈烈，长江这条“黄金水道”也受到影响，轮船难以顺利通航，航运事故接连不断。为扭转铁路瘫痪、长江停航的危险局面，周恩来多次召集会议，采取措施；苦口婆心地向各派代表作说服工作。1968年5月12日，周恩来接见全国铁路、交通会议全体代表时说，交通的特点是近代化的组织，只要有一个站通不过，有一个港口压了船，就会因一点而影响全局。拿长江来说，从重庆那里看，因而派斗争非常激烈，把船打了，货卸不下来，因而很多东西不能出川入川。他要求各派要顾全大局，努力保证车船畅通。1971年12月31日，周恩来看长江航运公司“东方红104号”客轮触礁事故的电话记录后，立即批示：“先念、国锋同志阅。请苏静同志负责抓紧，彻查触礁原因，并作出适当结论，吸取其中的经验教训，以便教育交通战线上的领导和广大干部、群众。”

江河既给人类带来了舟楫航运之利，也给人类带来了陆路通行的障碍。长江自古就有“天堑”之说。为发展陆上交通，需要在长江上架桥，对武汉长江大桥，毛泽东曾描绘“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周恩来十分重视发挥水运与陆运相得益彰的作用，努力避免二者之间出现此长彼消。1958年黄河大水，他多次视察郑州黄河大桥和济南黄河大桥，亲自指挥被洪水冲坏的郑州黄河大桥的抢修，为的是保证京广和京浦两条铁路大动脉的畅通。南京长江大桥修建时，为了不影响长江“黄金水道”的作用，他亲自审查桥墩之间的距离和大桥净空高度。1962年7月10日，长江航运局201号拖轮顶推90个铁驳通过长江武汉大桥对，其中第103号铁驳撞了第5号桥墩两处。初查原因是：船长罗新雨对长江水性不了解，是第一次通过大桥航行；长江水涨，航标不准确。周恩来7月12日看了上述情况报告后立即批示：“即送邓（小平）、彭（真）、富春传阅。诸送吕正操同志阅办。最好会同交通部派人前往查明情况，做出结论，迅速修整，严禁再犯。”

权衡利弊当机立断——1958年黄河大水提出不分洪战胜洪水

1958年7月上旬山陕区间、渭河中下游和伊、洛、沁河流域降雨量均在50毫米以上。特别从7月14日开始，山陕区间、三门峡到花园口于流区间和伊、洛、沁河连日普降暴雨，暴雨中心5天累计雨量500毫米。7月17日，郑州花园口出现22300立方米每秒的大洪水。颠狂、暴烈的特大洪峰，把京汉黄河铁桥冲垮两孔，使南北铁路交通陷于中断，对黄河下游造成严重威胁。

抗洪抢险，千钧一发。当时正在上海开会的周恩来，接到黄河防汛总指挥部和中央防汛总指挥部的报告后，立即停下会议，于1日下午飞临黄河。周恩来在机舱里全神贯注，俯瞰长堤和波浪翻滚的洪水，特别察看了被冲断的黄河铁桥，然后在郑州降落。吴芝圃到机场迎接周恩来。周恩来到省委后立即听取了王化云等关于黄河防汛问题的汇报。

当时，迫在眉睫的问题，是分洪好，还是不分洪好？若要分洪，就必须使用北金堤滞洪区，这样固然可以保证山东位山一带窄狭的河道安全泄洪，但却要淹没一百万人口的地区，损失4亿多财产。若不分洪，又怕一旦下游决堤，人民生命财产将蒙受更大的损失。1933年洪水与这次洪水相似，当时就决堤60多处，被淹面积6592平方公里，受灾人口273万，其中12700人被洪水夺去了生命。在分洪与不分洪的两难选择中，使用滞洪区不担什么风险，不分洪却要担很大风险。王化云在汇报中“建议不使用北金堤滞洪区。”周恩来边听汇报边问王化云：“征求两省意见没有？”周恩来对洪峰到达下游的沿程水位和大堤险工在高水位下的情况作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他根据这次洪水的来源、当时的气象预报，以及上下游的各种情况、各种数据，全面地权衡利弊之后，当机立断作出了不分洪的决策。他说：“各方面的情况你们都考虑了，两省省委要全力加强防守，党政军民齐动员，战胜洪水，确保安全。”遵照周恩来的指示，河南、山东两省组织200万防汛大军上堤，经过10个昼夜的苦战，特大洪峰在没有分洪的情况下安然入海。

20多年后，张含英在回忆这段往事时十分激动他说：“究竟开不开分洪区，谁下这个决心啊！”“最后总理果断他说：‘不开分洪区’。这句话分量很重，它使100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免受水患。”

竖“铜墙”插“铁壁”——采用混凝土防渗墙处理坝基渗漏问题

密云水库建设中遇到了一个基础渗漏问题，这就是白河大坝坝底河床沉积了四五十米厚的砂砾卵石层，如何解决渗水问题。当时可以采取几种方案处理：一是挖掉；二是灌浆；三是做混凝土防渗墙。混凝土防渗墙的办法，专家们从有关材料上看到有的国家用过，但苏联和中国都未用过，经过优化比较，最后确定采用混凝土防渗墙办法。周恩来听取这一问题汇报后，支持采用混凝土防渗墙办法。他提出：对新技术在尚未安全掌握时，要首先摸索、消化。还说：“对于密云水库这样重大工程，应当特别慎重，必须一切通过试验，有把握再正式施工。”施工中，又遇到了防渗墙与主坝拦洪工程力量分散的矛盾。按原定计划，白河主坝的防渗墙应在1959年汛前与主坝的拦洪工程同时完成，但到1959年春，防渗墙的进度拖后，主坝的进度也很慢，两者同时完成原定计划已不可能。若齐头并进，主坝不能在汛前达到原定的拦洪标准，如果汛期发生较大洪水，将造成严重损失，经反复研究，决定将防渗墙的施工队伍立即撤退，汛后重新进入，以便汛前集中力量搞主坝施工。这一决策对保证战胜1959年密云水库汛期大洪水起了重要作用。汛后，继续采用混凝土防渗墙的办法切断渗流，面临的困难是施工期短，必须集中大量的设备和技术力量，以最大的密度来布置施工。为此，1959年9月18日，水电部党组写了《关于密云水库白河坝基处理问题的报告》，提出坝基处理所需器材设备和技术力量。除由水电部设法尽量解决外，要求各部支援的物资需请各有关部门大力支持。9月19日，周恩来逐字逐句审阅了水电部党组的报告，并批示：“请一波同志阅后指定孙志远同志邀集建委、水电部、北京市赵凡、国务院齐燕铭、地质部、冶金部、建工部商办。我原则同意水电部党组意见，并且应立即布置设备、器材和人员的供应，否则十一月初不易开工，将误明年汛期”。他还委派齐燕铭从全国各地调来206台钻机。在周恩来亲自过问和督促下保证了混凝土防渗墙所需要的大量设备和技术力量，保证了白河大坝基础的工程进度。同时，为今后砂卵石坝基处理开辟了一条新途径，培养出了一支基础处理的专业队伍。后来，中国援建阿尔巴尼亚的水利工程，也成功地运用了防渗墙技术。

现在水库已正常使用了30多年，最高蓄水位达到153米高程，然而大坝下游地上地下，找不出丝毫漏水痕迹，难怪有人称誉密云水库是地上竖“铜墙”，地下插“铁壁”。

引水东江接济香港——石马河供水工程的修建

深圳和香港地区，自 1962 年 9 月起，经历了 9 个月无雨期后。仅在 1963 年 6 月 8 日下了一场小到中雨，接下去又是无雨期，旱情十分严重。深圳水库和铁岗水库的水位降到死水位以下，连有限的死阵容水量也被抽上来使用。深圳一带的人民有每天晚上冲凉（洗澡）的习惯，但由于干旱缺水，连饮水邻有困难，冲凉之水就更难满足了。与此同时，香港供水告急，街头水龙头前，人和水桶排着长队，等候供水。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高中雄等知名人士联名，致函广东省长陈郁，请求协助解决香港水源闲难，克服旱灾。广东省人民政府一方面采取应急措施，让香港一艘艘万吨巨轮驶向珠江口汲取淡水；另一方面开始酝酿由东江引水到深圳的石马河供水工程。

周恩来及时过问了由东江引水到深圳的石马河供水工程并给予了极大的支持与关怀。

1963 年 12 月 8 日下午，周恩来在广州陶铸家中，听取广东省水电厅厅长刘兆伦关于石马河供水工程方案的汇报。参加人员有中南局书记陶铸，广东省省长陈郁、广东省委第二书记赵紫阳、广东省副省长曾生、广东省水电厅厅长刘兆伦、广州市建设局副局长戴机等。

石马河供水工程，取水于珠江三大支流之一的东江（东莞县境内的桥头），通过拦河筑坝和建立一系列大型抽水机站，逐步提升水位，改东江上流利马河由北向南倒流，使沿程水位逐级提升后流入深圳水库。深圳水库由此获得充足和可靠水源，最后通过坝下多条输水管道供水给香港地区。

周恩来听充汇报，作了一系列具体指示。他指出，向香港供水问题，与政治谈判要分开，不要连在一起。供水谈判由广东省负责，请港英当局派人进来谈。他赞成石马河供水方案，“采取石马河分级提水方案较好，时间较快，工程费用较少，并且可以结合农田灌溉，群众有积极性。”供水工程由港英当局举办还是由我们国家举办？对此，周恩来说：“供水工程，由我们国家举办，应当列入国家计划，作为援外专项项目，因为香港可分之九十五以上是自己的同胞。”他还就工程的设计、施工及工程费用的落实作了安排，“工程由广东省负责设计和施工，工程费用由广东省按基建程序上报国家计委审查批准。”周恩来认为工程应该实行经济核算，“工程建好后，采取收水费的办法，逐步收口工程建设投资费用”。在周恩来支持下，由广东省委和省府负责组织，广东省水利部门以极高的工作效率完成了石马河供水工程的设计。1964 年 2 月 20 日，石马河供水工程全线开工，从东江之滨，石马河畔，直到大坝上下、边界线上，千军万马，摆开了战场。陶铸等领导人亲临工地视察，极大地鼓舞了水利职工的斗志。经过一年施工，完成了上石方 200 多万立方米、混凝土及钢筋混凝土 10 万立方米、安装大型抽水机设备 33 台套、各种闸门和启闭机设备 100 多台套、架设高压输电线路 140 公里，并兴建了 2 座大型变电站。1965 年春，石马河供水工程胜利竣工。该工程自 1965 年投入运用后，年年都按照协议完成了对港供水计划，对深圳和工程沿线的城市用水、农业灌溉所发挥的效益也十分显著。

随着香港的经济发展和深圳特区经济建设的需要，1973 年与 1981 年，对石马河供水工程进行了两次扩建。现在除对深圳特区供水之外，对港年供水能力可达 6.2 亿立方米。石马河供水工程是一条温馨的纽带，传送着祖国，其中也饱含着已故总理周恩来的智慧和香港同胞的深情厚意。

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把香港作为对外经济交流的基地

1956年4月，毛泽东综论十大关系，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周恩来在不同场所、不同会议上多次阐释这一基本方针。他说，发展生产，建设国家，“需要我们动员一切力量、一切积极因素，甚至把消极因素化为积极因素”。在党的“八大”会议上，周恩来还说：“为了完成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我们除了调动国内的一切积极因素以外，还必须团结国际上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运用国际上的一切有利条件。”

香港在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以后，成了英国的租借地、国际性的自由港。1957年4月28日，周恩来在上海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就香港问题发表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说：“我们不是要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吗？香港应该化为经济上对我们有用的港口。”

1956年底，我国内地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对于香港，周恩来认为“香港的主权总有一天我们是要收回的”，但是香港现在还在英国统治下，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市场，不能社会主义化，也不应该社会主义化。“我们不能把香港看成内地。对香港的政策同对内地是不一样的，如果照抄，结果一定搞不好。”“香港要完全按资本主义制度办事，才能存在和发展，这对我们是有利的。”周恩来的这些认识，是邓小平80年代提出“一国两制”构想的理论先河。

为什么香港可以成为经济上对我们有用的港口？其一，“香港是自由港，原料来得容易，联系的范围很广，购置设备可以分期付款，成本低，有市场，技术人才容易训练出来。所以，香港发展生产具备很多有利条件。”其二，建国以来，美国政府一直对我国实行封锁、禁运的政策，香港与大陆相连，95%以上的人口是华人，“香港可作为我们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基地，可以通过它吸收外资，争取外汇”。还可以通过它了解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技术状况，扩大与发展中外经济交流。

怎样使香港成为我们对外经济交流的基地？归根到底是要掌握好政策，发挥香港企业家的作用。周恩来指出：“现在国内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私营企业已经全部公私合营，对其在香港的企业则不要去变动它。”否则在原料、市场、销路上反而吃亏。“香港的企业家是我们的朋友，他们搞的是资本主义，不是帝国主义。过去我们同民族资产阶级合作过，将来同香港的企业家还是可以合作的”。1952年，党和政府曾在国家机关、部队和国营企业等单位中开展过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斗争，在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中开展过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五反”斗争。香港企业家对“三反”、“五反”心有余悸、耿耿于怀，担心将来会再来个“三反”、“五反”。对此，周恩来说：“至于将来怎么办？我们不会来个七反八反的，不会像‘三反’、‘五反’那样的搞法。”“港澳的同胞不要担心前途”。周恩来还指出：同香港企业家合作，要使人有利可图，不要使人吃亏。我们对他们的政策要根据实际情况有所改变，要灵活，不能死板。香港企业中有些人“一时还不相信我们，对我们的政策有怀疑，可以让他们再看一看，看一二十年都可以。我们不要歧视他们，责怪他们”。

美国政府对中国的封锁禁运政策一直延续到1969年7月才稍有松动，长达20年之久。此间，由于我们对香港采取了正确而又灵活的政策，使香港在

扩大中外进出口贸易、发展中外经济交流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80 年代以来，我国做出了在与香港连接的深圳举办经济特区的决定，使香港自由港的作用进一步延伸到内地，使香港在发展与扩大我国的对外开放中发挥了更为积极的作用。

破封锁禁运反闭关自守——推行内外交流的基本国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周恩来在《关于和平谈判问题的报告》中阐述外交政策时指出：“在经济上，有买卖就做，国际贸易要开展，这是于双方都有利的。”他主持起草的《共同纲领》规定了内外交流的方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内政外交，大力贯彻内外交流的方针，争取同一切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往来。但是，由于美国政府对我国采取封锁禁运的政策，给我国发展内外交流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为打破美国的封锁禁运，周恩来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努力。首先，努力寻求苏联的帮助，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1952年8月至9月，他两次出访苏联，不仅商谈和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而且就中苏经济技术交流交换了意见，达成了协议，为“一五”计划期间苏联对我国援建156项重点工程作了精心的筹划。50年代从苏联引进的156项重点工程的先进技术奠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其次，积极发展同民族独立国家的经济贸易往来，在周恩来指导下，1952年9月间，我国同锡兰（现斯里兰卡）签订了用大米换橡胶的长期贸易协定，使我国获得了急需的物资。再次，设法同西方国家建立经济贸易关系。在周恩来具体过问下，1952年6月签订了第一个中日民间贸易协议，1953年9月第二次签订中日民间贸易协议，1955年5月第三次签订中日民间贸易协定，开辟了中日贸易通道。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在周恩来领导下，实现了中国贸易代表团首次访问英国，给美国的封锁禁运政策一个沉重的打击。另外，他十分重视发挥香港的作用，把香港作为我国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基地。

60年代初，周恩来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及时提出把对外贸易的重点和引进技术的对象转移到两方国家。他在二届人大四次会议上说，苏联撕毁合同，撤退专家以后，我们在设备器材方面不能再从苏联和东欧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进口了，而不得不转到国际市场上，这就需要在外贸工作上展开一个新的局面。尽管美国继续敌视和封锁我国，但在周恩来负责下，我国从1962—1966年同两方国家谈判成交签约的大小成套设备项目达20余项，合同金额约3亿美元，引进了一批急需的石油、化工、冶金、电子和精密机械等技术和设备。

周恩来还通过各种场合进行说理斗争，1955年10月25日，他对比利时来宾说：“我们现在还受到人为的禁运限制，如果没有这种限制，贸易前途是很大的。”1956年5月21日，他接见日本南乡三郎等来宾，认为日本政府允许在华展出禁运品是一个进步。他说：“日本现在虽然受到禁运的限制，但是不能永远这样限制下去，总不能永远限制中日的经济交流”。1958年7月25日，他对法国前总理孟戴斯·弗朗斯说：“在经济上双方总是有需要的。但现在有禁运货单的限制，使我们不能更多地做生意”。“知道中国不再需要的东西就从禁运单上取消，中国需要的仍在禁运单上，这样中国永远就得不到他所需要的东西。这是美国阻挠别国同中国贸易”。

美国政府从外面对我国实行封锁禁运，如果我们自己也搞闭关自守，那是很危险的。“文化大革命”动乱中，周恩来同闭关自守的极左思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周恩来曾说：“一年两次的广交会是在我们被封锁的情况下不得已搞的，我们只好请人家进来看。”可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造反派要冲击广交

会。1967年4月14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林彪，提出并确保广交会顺利开幕，并亲自飞抵广州向造反派作说服工作。

1970年6月21日，周恩来接见参加中日民间渔业谈判代表团有关省、市及外交部有关负责人时，针对他们对国际经济信息知之调甚少的情况，严肃指出：“我们国家成立20多年了，收集的资料太少了，成了闭关主义那还得了呀！”

1971年6月18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中国的手工艺有最好的传统。过去有极左思潮，说这个东西是资产阶级欣赏的东西，我们不出口。怪事了，资产阶级欣赏的东西，我们把钱拿来，为革命和建设服务，有什么不好？

1972年4月9日，他在接见交易会代表时，激烈地抨击了闭自守的思想，分析了它的危害，表明了迅速改变我国对外经济贸易落后状态的迫切心情。针对台湾对外贸易额达40亿美元的现实，他疾呼：“为什么台湾能搞，我们搞不了？”针对极左思潮，他气愤地说：“六七年什么都要砸，‘左’得出奇，极左嘛！去年‘九·一三’以后，问题清楚了，总根子挖出来了。”他要求尽快搞好进出口工作。

1973年初，外贸部某局在起草一个请示报告中，把“以我为主”的提法写了进去。报告送到周恩来那里，他一笔勾掉“以我为主”四字，改为“按照平等互利原则和我们的需要与可能，有来有往”，明确了对外贸易不能搞“以我为主”的思想。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中国需要世界，世界也需要中国。对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实行封锁禁运是行不通的，自我封闭同样是愚蠢的。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努力开拓下，70年代终于迎来了中美关系坚冰的融化，迎来了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迎来了中日建交……终于使中外经济技术交流有了正常的外部条件。

长期以来，周恩来十分重视以民促官，以外经、外贸促进外交的发展。这对发展新中国的外交关系，改善新中国的国际环境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1972年以后，周恩来根据我国国际环境的变化和外交关系的发展，提出了在正常的国际关系下外交工作要促进外经、外贸发展的重要思想。他说：“外交发展了，外贸也要发展”。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他取得毛泽东的同意，排除“四人帮”的干扰，批准了43亿美元的引进方案，即从西方国家进口13套大化肥、4套大乙烯和1套1.7米轧机等重大成套设备。此外，他还批准从英国引进了斯贝飞机发动机制造技术，从美国引进了我国急需的两个卫星地面接收站、飞机惯性导航设备等等。这些引进，不仅对当时我国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提高起了积极作用，而且对尔后我国对外开放条件下的大规模引进提供了经验。

1973年6月29日，身患绝症的周恩来会见戴维·洛克菲勒时，对台湾严家淦利用外资、开办特区表示赞赏。周恩来说，严家淦“知道一些国家市场的需要，然后他在台湾搞加工厂，出口商品。比如，他知道在加拿大、美国、拉美、日本、欧洲市场上需要一些什么商品，他可以加工，搞出来后花样更新、色彩更好。引进美国、日本和其他国家的外资。进口原材料，然后加工，专门供出口。他还在台湾高雄划了一个像香港一样的自由港，不收税。这样台湾的贸易额就大了。”他的这番意味深长的话语，对尔后我国的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开办特区，无疑有着重大的影响。

趋利避害保护国货——内外交流要保护国内工业的发展

众所周知，周恩来担任共和国总理期间，无论是出国访问、接见外宾。参加会议都戴的是上海牌国产手表。1957年，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周恩来把罗马牌手表列为高级消费品，并提出了抑制其消费的主张。周恩来在上海表与罗马表之间的所做所言，决不是一个单纯的消费问题，它反映了周恩来保护国货的思想。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以后，工作的重心从乡村转到了城市，经济建设的任务提了出来，要进行经济建设必须解决好城乡关系。怎样才能解决好城乡关系呢？1949年4月22日，周恩来讲了一段很重要的话。他说：我们捉们乡村增产粮食、棉花和花生，那就必须在城市很好地组织它的出口和外销，使农民得到利益，转过来增加他们的购买力，购买城市的工业品，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很好地把城市生产发展起来，也才能有销路和再生产。那么，城市工业就要照顾到农村的需要，外来的奢侈品我们要限制，只有对于关税贸易加以限制，才能制止外来奢侈品临市；并区组织合作社，使农民的生产产品和工人的工业品都有销路，这样，工农的利益就结合起来了，城乡关系就融洽了。周恩来这段话的思想内容是十分丰富、十分深刻的。工农关系、城乡关系的经济基础是农产品与工业品之间的等价交换，要组织好农产品的销售包括出口，以实现农产品的价值，使农民得到货币。农民用货币去购买城市工业品，实现工业品价值，就能保证工业品再生产的顺利进行。生产离不开市场，没有市场、生产就要萎缩。为保证国内工业品的市场，必须实行进口贸易管制政策，特别要制止外来奢侈品临市，以保证农民手里的钱、增加起来的乡村购买力能够购买国内工业品。如果放任进口贸易，外来奢侈品充斥市场，乡村购买力就不能实现国内工业品的价值，国内工业品的再生产就不能顺利进行，其发展亦不可能，城乡关系、工农关系的经济基础就会受到损害。

旧中国海关大权掌握在资本主义列强手里，市场上外货充斥，连火柴、元钉也冠之为“洋火”、“洋钉”，民族工业难以生存、发展。新中国要进行经济建设，在内外关系上必须实行对外贸易管制政策。1919年5月7日，周恩来在中华全国第一次青年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我们对外贸易要管制起来。进口的东西，我们要有检查，我们需要的东西就让进口，不需要的东西就限制它进口，有害的东西就禁止入口。出口的东西，如果能换取外汇，有利于我们的生产，就让它出口；如果出口损失我们的内部生产，就限制它出口。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保护我们这个低级的工业的发展。1950年，在第四十四次政务会议讨论全国进出口贸易会议总结报告时，周恩来说，今天处在独占资本主义时代，不是自由贸易时代。对外贸易要逐渐减少盲目性，加强计划性，不能盲目地出口，已不能盲目地进口。对外贸易历来就有自由政策与保护政策之争。周恩来明确指出，我们是保护政策。

必须指出，周恩来既强调对外贸易的管制，也强调国际间的互通有无。他多次指出，闭关锁国的政策是行不通的，一个国家不可能完全自给自足，需要出口，也需要进口，需要取长补短，互通有无。但是，周恩来的对外贸易管制思想与国际间的互通有无思想是统一的。二者都是为保证经济建设和国内工业的发展服务的。互通有无，可以解决我国建设所必需但很稀缺的某些资源，可以获得别国先进的技术装备，可以享受国际分工的好处。对外贸

易管制，可以限制紧缺物资的出口与奢侈品的进口，保证国内市场不受国际市场的影响，保护国内工业的发展。二者只有结合起来，才能在对外经济关系中趋利避害。

周恩来保护国内工业发展的思想，不仅表现在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交流方面，也表现在同苏联、东欧国家的经济交流方面。

建国前夕，捷提出以企业公司名义与我们进行贸易。1949年7月4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起草了一封给刘少奇、高岗、王稼祥的指示信。信中要求向捷说明：“我们全国经济机构方才开始成立，国家手中控制的出口货品甚少。故捷克与我们开始贸易时不能希望过大，数目亦不会很多，如五位代表中，有拔佳鞋厂代表，中国现在并不需要皮鞋入口，有纺织工业代表，中国现时的棉花尚不足国内市场需要，此两位代表是否可以不来。”这封信表明，中国不能出口国内紧缺的原料，也不能进口无关紧要的生活消费品。这是为了保证国内工业的原料供给和产品的销售市场，为了保护国内工业的发展。

1951年1月7日，周恩来就新疆汽车修理厂及医学院请苏联专家设计事，写信给王震、赛福鼎并告各大行政区负责同志及中财委。信中指出：“凡请苏联专家来设计的，须预先告知其设计范围及我们的物质基础、技术条件、生产能力和财政状况等，使其了解我们今天的可能条件。并规定凡我们自己已经有了的或能从其他地区调拨的机器、材料就不要再进口，凡我们自己能够找到的专门技术人员就不要再从苏联请人来，凡能够因陋就简地装备起来的工厂、房舍就不要另起炉灶或照最高的标准来修建。”对于进口，周恩来又补充说：“除非因边疆路远运输困难，进口机器、材料较从内地运往者又便又贱，则可以经过中财委核准后许其进口。”总之，在有国货的情况下应尽量使用国货，在进口货与国货相比“又便又贱”的情况下，要经过国家的审批核准后才能进口。但对于非生活必需又非紧缺的生活消费品特别是奢侈性消费品则禁止进口。

50年代和60年代，在对外经济关系方面，我国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打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禁运与经济封锁。70年代，随着中美建交和中日关系正常化，我国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交流日益增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改革开放的总方针下，我国扩大了同世界各国的经济交流，取得了一系列可喜的成就。但是，在保护国货，限制与禁止外来奢侈品方面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不仅高级豪华轿车大批进口，而且进口香蕉、进口苹果、进口香烟、进口香水等外来生活奢侈品也涌上了国内市场。当前，重温周恩来保护国货的思想，对指导对外经济交流活动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增加食油不占耕地——引种油橄榄树

民以食为天，“食”，不仅要食粮，而且要食油。中国农业没有过关，不仅全国人民的吃粮是一个大问题，吃油也是一个大问题。60年代初期的经济困难中，解决全国人民的吃粮、吃油问题，是周恩来工作日程上的一项重要内容。

1963年12月，周恩来访问地中海沿岸国家。1964年元旦，他是在阿尔巴尼亚度过的。访问中，“汽车几小时几小时地穿行在油橄榄林绿荫掩蔽的大道上，那四季常绿、青翠欲滴的橄榄枝给了周恩来深刻印象。他了解到，由于盛产橄榄油，西班牙、意大利和希腊的居民，每人每年平均食用橄榄油分别高达10至20公斤；当地的油橄榄出油率很高，对解决人民食用油很有好处。他想，我国许多省份山地多，山区种植油橄榄树，发展木本油料，既可以不减少粮食耕种面积，又可以增加人民的食用油。于是，周恩来表示要引种油橄榄材。阿尔巴尼亚方面当即赠送给我国一万株油橄榄树菌，并派专家专程护送到我国，进行技术指导。

周恩来结束其他国家的访问，回国到达昆明时，得知昆明海口林场正准备栽种油橄榄树，第二天便不辞疲劳赶到海口林场栽下了第一株油橄榄。他指示大家一定要像抚养小孩一样细心照管，使油橄榄在我国过好成活、生长、开花结实、丰产丰收、传种接代五道关。

周恩来要求有关部门，就油橄榄树在我国的增长情况，每过半年向他专门汇报一次。1974年底的棉油糖烟麻会议上，周恩来再次强调，南方山区多，木本油料不与粮食争地，可以多发展，并询问了油橄榄树的试种和发展情况。直到病危，他还向云南省问起油橄榄树。

如今我国已有油橄榄500多万株，油橄榄鲜果年产量已达30多万斤。周恩来种下的那第一株油橄榄，后来连年结果，至今枝繁叶茂。

临渊羡鱼进而结网——炼油厂比较与引进柑桔优良品种

1963年12月，周恩来在陈毅陪同下访问了地处北非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的美丽国家——摩洛哥王国。

一天，在王国首相陪同下，周恩来和陈毅参观了一座由意大利帮助兴建的炼油厂。周恩来非常重视国内石油工业建设。1962年6月21日、1963年6月19日，他曾两次视察大庆油田。他希望这次参观，能发现一些对我国石油工业建设有益的东西，以便借鉴。因此，他态度很高，询问得很详细。他给这个厂的题词中写道：“这是一个很好的现代化的炼油厂，建设得很快，管理得很好，并且锻炼出不少技术人员，值得我们学习。”他很赞赏这座炼油厂的现代化设备和现代管理。

返回住所后，周恩来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苏联帮我们在兰州建了一座与此厂生产能力相等的炼油厂，职工多达6000人，而这个厂包括技训班在内，总共才300人。相比之下，我们的人力浪费何惊人！他叮嘱道：记住，回国后一定要石油部派技术专家来看看这座炼油厂。

回国后，周恩来很快指示石油部派了一位总工程师来摩洛哥考察。据这位总工程师说，这个厂不但人员节省，而且由于管道局合理，占地面积也节省很多。他在那里取得了很重要的炼油厂建设的经验。

1966年5月3日，周恩来第三次视察大庆。他在大庆炼油厂询问了每个车间多少人，全厂多少人，设备仪表是哪里制造的等等。在了解技术和管理情况时，他再次提到摩洛哥的那家炼油厂。他说：“我们的炼油技术也有进步，这个炼油厂的人员在国内比不算多，但比国外就多了，我在非洲看过的炼油厂，他们的人很少，当然那也是别国搞的。”在看到本国炼油厂的技术与管理进步的时，周恩来没有忽视与国外先进水平的差距，实际上是再次强调了学习国外先进的技术、管理的必要性。

周恩来访问摩洛哥时，还作出了引进摩洛哥柑桔优良品种的决定。

一次，周恩来同陪访人员与中国驻摩洛哥大使馆工作人员共进晚餐后吃水果，大家盛赞摩洛哥蜜柑个人、皮薄、汁多、香甜口。周恩来则深有所思他说：全世界柑桔的老祖宗在中国，可是近几十年我们的柑桔退化了，原因是缺少科学技术人员对改良品种进行专门研究，而两方同家则有科技专家来研究，不断培育出优品种。这时，中国驻摩洛哥大使杨玖良对周恩来说：“据摩洛哥朋友说，世界上有两位最著名的柑桔专家，其中一位是法籍教授，就在摩洛哥植物研究所工作。此人对我很友好，使馆和他有交往，能否考虑请他来中国讲学。”周恩来说，我们先从国内派几位专家来看看，有些人不亲眼看看是不会相信的，然后再邀请这位专家去中国讲学。可能的话，你们先搞些优良品种的树苗运回国内。

周恩来回国后不久，就派了广州和西双版纳两个植物研究所的专家来摩洛哥考察，并在法籍专家的协助下，挑选了已嫁接好的30来种优良品种的树苗300株，于1965年初空运到广州。后来，这位法籍柑桔专家也应邀访问了中国，作了几次有价值的学术报告。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看到他国的长处，光是羡慕人家是没有用处的。应该去学习、拿过来，使其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开花、结果。周恩来对摩洛哥炼油厂、摩洛哥柑桔的做法，正是今天对外开放中需要发扬光大的。

天下下我高天下轻我重——以高于国际市场价进口锡兰橡胶

中国古代轻重论认为：粮食作为商品依照市场法则流通，总是要从价格低的地方流向价格高的地方。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在本国粮价低于他国的情况下，如果任其肉然，本国粮食就会流入他国，就有火国的危险；如果“天下高市高，天下下亦下”，使本国粮价不低于他国，则可以做到本国粮食不外泄；只有“天下下我高，天下轻我重”，使本国的粮价高于他国，他国的粮食才会“如原水之就下”，波吸引到本国。必须指出，轻重论者所说的“天下下我高，天下轻我重”不是针对一切商品，而是针对当时历史条件下的粮食这种“民之司命”的特殊商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朝鲜战争后，美国政府顽固地对中国实行孤立、封锁与禁运的政策，其制订的对中国禁运的项目竟达 500 余种之多。

当时，橡胶是我国急需的物资，也是国际市场的紧俏货。

1952 年秋，周恩来指导贸易部同锡兰（现斯里兰卡）进行贸易谈判，拟用我国的大米换锡兰的橡胶。周恩来指示贸易部：卖给锡兰的大米以国际市场价格售出；从锡兰进口橡胶则以高于国际市场价格百分之五至十买入。这样做，打破了美国政府对我国实行的封锁、禁运，使我国得到了急需的橡胶，同时也帮助锡兰政府以优惠价格得以解决国内急需的大米。中锡两国以大米换橡胶的贸易，不仅对建立中锡两国良好的贸易关系，而且对发展中国与亚非国家的经济贸易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当时，贸易部有些同志对从锡兰高价买橡胶的做法不太理解，后来从工作实践中才感到周恩来对橡胶的“天下下我高”的决策有着深远的意义，它不仅把我国急需的橡胶吸引了进来，也把美国阻拦下的外商吸引了进来。

自己动手填补缺门——发展我国自己的橡胶业

橡胶既是重要的战略物资，又是人民生活必不可少的物资，国计民生部少不了橡胶。为了打破封锁、解决国内急需，以高于国际市场价格进口橡胶，是明智之举。但是，中国人口众多，全国每人穿一双胶鞋就需要很大数量的橡胶。仅仅依靠 8 斤大米换 1 斤橡胶的办法是不能完全满足需要的，也不是长远可行的办法。为此。毛泽东、周恩来决定发展我国自己的橡胶业。

海南岛和西双版纳等祖国南方边疆，具有生产橡胶的条件。50 年代，周恩来就开始具体筹划在这些地方发展我国自己的橡胶业。

60 年代初，周恩来到海南岛和西双版纳视察，亲自到这些地方的橡胶园调查研究我国橡胶生产情况并解决具体问题。

1960 年 2 月 9 日，周恩来到海南岛西联农场橡胶园视察。他向工人详细地询问了橡胶品种、生产情况、产胶能力，以至一个工人一天能产多少胶等等情况。他亲切地对工人们说：“橡胶树，我自己有了，我们要多产胶，产好胶！我们国家很需要橡胶呀。”他还挥笔写下了“西联宝岛，南国珍珠”的题词。在参观橡胶加工厂时，周恩来得知包装浓缩胶乳的铁桶不够用，影响了生产。他当即与随行的省、区负责人商量，设法予以解决。一个星期后，大量的铁桶就陆续运到了，解决了积压几十吨的浓缩胶乳的包装问题。

1961 年 4 月，周恩来在两双版纳颊短的 3 天时间里，曾两次到热带作物研究所和景洪农场视察橡胶园。他走遍了五片胶林，详细询问和察看了橡胶树生长情况，看到一座蚂蚁包或一根断树桩都要问一问对橡胶生长是否有影响。他深情地对人家说：“我们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自力更生，发展我国年轻的橡胶事业。我国能种橡胶的地方不多，两双版纳这个地方土质好，同志们肩上的责任很重大。”“一定要管好、割好，为祖国生产橡胶”。当他听到与当地群众因为不习惯圈牛，牛群经常窜进胶林吃胶苗、啃橡胶树片造成损失时，指出，要帮助当地少数民族群众种植橡胶，这样既可使少数民族群众增加收益，同时让他们在种树实践中认识牛害问题。让群众从自己的切身利益上关心橡胶业的发展、解决牛害问题，这体现了周恩来解决经济问题的一贯的思路。此后，按照周恩来的思路，不仅两双版纳的同有橡胶业有了人发展，而且村寨少数民族的橡胶种植业也发展了起来。

本固邦强根在经济——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建国伊始，经济工作就一直是记载在周恩来工作台历上的一个中心内容。但在建国头三年，为了医治战争创伤，为了使今后的建设能有一个稳固的基础，在恢复生产与发展生产、经济恢复与经济建设的不关系上，周恩来把重心放在恢复生产，恢复经济上。1952年是经济恢复的最后一年，也是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建设作准备的一年。8月，周恩来主持起草了关于三年来中国国内主要情况及今后五年建设方针的报告提纲。8月下旬，以周恩来为团长，陈云、李富春为副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到莫斯科与苏联政府商谈援助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建设问题。9月中旬，斯大林会见周恩来、陈云、李富春，就援助中国“一五”计划问题谈了几点意见。9月底，周恩来回国。此后“一五”计划的经济建设已经是他思考的中心问题。

1953年初，他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上提出了经济建设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的思想。他说：1953年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动员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集中力量，克服困难，为完成和超额完成1953年度的建设计划而奋斗，是我们贯穿全年的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1954年，他在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上进一步指出：由于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开始执行，“经济建设在整个国家生活中已经居于首要的地位。”

何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其外延来说，相对于文化建设、国防建设以及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经济建设要处于中心的、首要的位置，周恩来认为经济建设需要文化建设与之配合，“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好像一辆车子的两个轮子，相辅而行。”“要进行经济建设，文教卫生就必须加强，决不能削弱”。但是，文化建设不能超越经济建设，不能挤占经济建设的人力、物力、财力；文化建设必须为经济建设服务。同样，经济建设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和安定的国内环境，需要国防建设与之配合。我们搞经济建设、搞社会主义，需要国防力量的保护，这是肯定的。但是，国防建设是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国防建设不能挤占经济建设的人力、物力，财力。他说：“把器材、资金统统集中搞国防工业，别的生产少了，人民的生活也不能改善，各方面紧张，而武器制造出来，仗又不打，炮不能吃，枪也不能吃，子弹生产多了还不利”。应该通过加强经济建设来加强国防力量。在生产上要注意军民两用，有些军工部门，和平时期要生产民用产品。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其内含来说是多方面、多层次的。从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相互关系来看，生产是中心。只有生产规模的扩大、生产效率的提高、生产水平的发展，才能推动其他方面各种问题的解决。周恩来：“最主要的事情，就是我们人人都要关心提高我们国家的生产力。我们必须了解，增加生产对于我们全体人民，对于我们国家，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只有生产不断地增加，不断地扩大，才能逐步地克服我们人民的贫困，才能巩固我们革命的胜利，才能有我们将来的幸福。”“生产是中心，三大改造也要以生产来推动。一切都要靠生产，生产是主要的环节。”从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商业、金融业等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来看，经济建设需要国民经济各部门按比例地协调发展。其间，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处于主导地位，农业处于基础的地位，交通运输、水利、地质勘测处于先行的地位，科技处于关键的地位。当时，突出强调重工业的建设，周恩来指出，“一

五”计划的经济建设，重点是苏联帮助我们的156项，“以及环绕它的还有几百项建设，这是我们要努力的主要方面。当然，现有的生产也要配合，农业也要跟它均衡地发展”。

为什么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一五”时期，周恩来对此进行了充分的论述。

首先，周恩来通过经济与政治、军事、文化之间关系的分析，认为“经济是基础，其他都是上层建筑”，如果经济基础不稳，“新中国的政治、军事、文化都立不住”。1953年9月29日，周恩来说：“我们的工作方面很多，为什么把经济作为总路线、总任务呢？因为它是基础。毛主席说：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军事是政治斗争的最高级的最尖锐的形式。所以，政治、军事和文化工作，它的基础都是经济，没有这个，就谈不到实现社会主义的基础”。

其次，周恩来从近百年来中国受帝国主义国家侵略、压迫和剥削的历史，说明社会制度腐败和经济落后是被动挨打、受人欺侮的根本原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旧中国腐败的社会制度的灭亡。但是，中华民族要想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人民要想在洋人面前扬眉吐气，还需要经济发达、国家富强。1953年9月11日，周恩来说：“我们的国家在政治上已经独立，但要做到完全独立，还必须实现国家工业化。如果工业不发展，已经独立了的国家甚至还有可能变成人家的附庸国”。“国家面貌的改变要从经济面貌的改变做起。这样，我们的国家才能永远站立起来。这是一百多年来多少志士仁人所追求并为之流血奋斗的宏伟事业。不实现工业化和经济改造，我们的国家就不能完全独立，就不能持久，就不能避免遭受挫折。”

再次，周恩来认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是伟大的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需要。人民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人民的衣食住行等各方面的不断增长的需要，必须通过经济建设去满足。革命的根本目的是解放我国的生产力，使我国国民经济能够得到迅速发展，以便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如果我们不兢兢业业地把经济建设搞好，“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1956年1月，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指出：“我们所以要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归根结底，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不断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必须在高度技术的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地增长，不断地改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之所在，这也是社会主义的前途之所在。周恩来在这方面的论述言简意赅、意味深长。

固本稳基理顺关系——怎样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一五”时期，周恩来对此进行了艰辛的探索。

第一，要正确处理政治运动与经济建设的关系，政治不能冲击业务，不能影响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从1949年到1952年，党和人民政府领导开展了一系列政治运动。1950年起新解放区陆续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全国广泛开展了抗美援朝运动和镇压反革命运动。此外，在工矿、码头等企业开展了民主改革运动；在国家机关、部队和国营企业单位中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在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中开展了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在知识分子中开展了思想改造学习运动。周恩来认为，这些运动对废除封建制度，对保卫和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对清除旧社会的思想影响、提高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对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他在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上指出，这些运动“为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和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准备了必要的条件。”但是，政治与业务必须统一起来，不能对立起来；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时，不能像头三年那样搞很多的政治运动。他说：“建国三年来，政治运动很多，工作很紧张，大家忙于运动，而把业务放松了。”现在进行经济建设，“这就要求每个人都要钻研业务”。钻研业务需要时间，他认为取消每天一个半小时的政治学习是“一大德政”，开会大多也要设法调整。“我们应该看到，业务里面也有政治。使业务有利于人民，这就是政治”。1953年全国财经会议之后，有人提出了这样的疑问：财经会议开了两个月之久，不知道做了什么文章，会不会搞“小五反”？对此，周恩来的回答是：偷税漏税可以通过别的途径去解决，“现在不需要搞‘小五反’”。1957年4月28日，在上海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周恩来再一次指出，“我们不会来个七反八反的，不会像‘三反’、‘五反’那样的搞法”。显然，周恩来不赞成通过政治运动去解决经济建设中的问题，也不赞成把政治运动放在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之上。1953年9月29日，周恩来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今天搞建设，光是政治觉悟就不够了，还必须要有较高的文化、技术水平，这样才能使用机器来发展工业生产。这就需要大批的建设人才——从技术工人、技术员、工程师一直到企业行政管理人才”。他指出，培养经济建设人才，是摆在组织工作面前的第一项任务，“你们要搞社会主义就是搞这个东西，别的是空论，这是实际，你们做到了这一点，就是掌握了一切。”这是多么精辟的议论、多么深刻的见解。

第二，要正确处理财政和经济的关系，集中人力、财力、物力搞经济建设，适当增加经济建设的投资比例。1954年9月，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指出，1954年预算中经济建设的支出等于1950年的六倍半；经济建设费占整个财政支出的比重也从1950年的25.5%增加到1954年预算的45.4%。同时，财政支出中的国家机构经费即国防费和行政管理费所占的比重已从1950年的60.8%降低到1954年的30.7%。他说：“这些情况充分说明了我国”家的预算是和平的、建设性的预算”。1955年2月3日，他强调：“我们国家大、人多，因此，需要支出的方面也就多。但是，我们总要集中我们的人力和财力，用在主要的建设方面”。1956年9月，在党的八大会议上，周恩来立足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阐明了财政的“取”与“用”的关系。“我们的财政收入必须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我们的财政支出也必须首

先保证经济的发展。因此，应该首先考虑经济、特别是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计划，然后根据它来制定财政计划，用财政计划保证经济计划的圆满执行。不根据经济发展的情况开辟财政来源，把财政收入计算得过少，或者单从节约财政开支着想，保留过多的后备力量，都将限制经济建设的充分发展，这是不对的。”

第三，要正确处理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积累和消费之间的关系，保证经济建设顺利地健康地进行。在国民收入是个既定的量的情况下，积累和消费存在着此多彼少的矛盾。积累增加一份，消费就减少一份。反之亦然。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源泉，是经济建设所需资金的保证；而消费基金所占国民收入比例的多少，则直接关系到人民的生活水平、关系着人民的当前利益。周恩来反对把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积累和消费对立起来的错误观点。他说：“经济建设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不能不是互相一致的，因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唯一目的，就在于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而为了充分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又必须不断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从任何一方面把这两件事对立起来都是错误的：或者不顾目前生产水平，把工资和福利提得过高过快，违反了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这是一种经济主义的表现；或者对于职工福利甚至职工安全漠不关心，不注意或者不愿意解决那些必需而又可能解决的问题，这是一种官僚主义的表现。我们应当同时反对这两种错误”。周恩来认为生活的提高不能脱离生产水平和经济建设的需要，“生产、技术的发展慢吞吞的，生活要求提得很高，那就错了；应该生产、技术的发展要求很高，生活提高还要慢慢来”。在集中力量建设重工业时，由于需要的资金比较多，建设时间比较长，赢利比较慢，产品大部分不能直接供给人民的消费，人民不能不暂时忍受生活上的某些困难和不便。但是，为了摆脱落后和贫困，为了人民的长远利益，为了子子孙孙的幸福，“我们不能不暂时把许多困难担当起来”。另一方面，积累率必须适中，经济建设规模必须与国力相适应、必须在人民生活所能忍受的限度之内，超过了，则会欲速不达，事与愿违。周恩来不赞成苏联在建设上忽视人民当前利益的做法。他说：“如果不关心人民的当前利益，要求人民过分地束紧裤带，他们的生活不能改善甚至还要降低水平，他们要购买的物品不能供应，那么，人民的积极性就不能很好地发挥，资金也不能积累，即使重工业发展起来也还得停下来。”

第四，要正确处理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的关系，保证国民经济各部门能够按比例地发展。“我们强调重点建设，并不是说可以孤立地发展重点，而不要全面安排”。重点建设过分突出，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结果会同有关方面脱节，而无法保证重点。“我们要求全面安排，也不是说可以齐头并进，而不要保证重点建设”。如果“天女散花”、到处铺开、百废俱兴，就会影响国家的重点建设，就会造成财政上的困难和人力、物力的浪费。早在1950年8月，周恩来就提出国家建设工作要分清轻重缓急，有步骤地进行，“不可能百废俱兴，要先从几件基本工作入手”。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相结合的思想已见端倪。在进行“一五”建设的1953年，周恩来一方面强调“我们要首先集中主要力量来发展重工业。不是说把一切力量都摆在重工业上，其他的都不搞了，农业不发展了，轻工业也不发展了。那是不行的，因为重工业还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广大人民不仅需要重工业的生产资料，而且还需要一些轻工业的生产资料。因此，国家对工业（又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的投资比例要恰当”。1956年9月，党的八大会议上，周

周恩来在总结“一五”建设的经验教训时，系统论述了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相结合的思想。他指出，“一五”建设的前三年，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采取了加速发展农业合作化的方针来促进农业的增产，并且相应地发展了轻工业的生产，这就使国民经济的几个主要部门在发展中避免了互相脱节的危险，但也曾经部分地犯过到处铺开、百废俱兴或者过分突出重点建设的错误，造成了一定的浪费和损失，今后必须把重点和全面很好地结合起来。

如果处理不好政治与经济建设的关系，人的精力放在政治运动方面，或者搞空头政治不抓业务，那么，经济建设中心就没有政治的保障而流于空谈。如果处理不好财政和经济建设的关系，不能开源节流，财政支出不能首先保证经济建设的需要，那么，经济建设中心就没有经济保证。如果处理不好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关系，超前消费、甚至吃老本，那就是吃祖宗饭，造子孙孽；不顾国力、不顾人民生活搞高积累，那就会挫伤人民参加经济建设的积极性。在经济建设内部，如果处理不好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的关系，就不能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地发展，就不能保证提高宏观经济效益。在开始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五”时期，周恩来就探索了以上四个方面的关系，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这是难能可贵的。

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一化三改”的速度上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

1953年9月8日，周恩来说：“现在开始五年计划经济建设，国际国内形势都是有利的；提出过渡时期的问题，也是适时的。但必须承认还有困难。我们的经济遗产落后，发展不平衡，还是一个农业国，工业大多在沿海。我们的文化也是落后的，科学水准、技术水准都很低。例如地质专家很少，自己不能设计大的工厂，文盲相当多。这些落后状况会使经济建设发生困难。我们还有五种经济并存，要使其能够均衡发展，并在新情况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关系非常复杂。不估计到这些困难，就会产生盲目冒进情绪；另一方面，如不估计到有利条件，就会产生保守倾向。”

这段话，首先告诉我们，从“一五”计划和过渡时期一开始，周恩来所讲的速度就不是专指社会主义建设速度，而是既指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也指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速度。“一化三改”的目标是“一化”和“三改”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整体目标，“一化”与“三改”的速度自然也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

其次，周恩来通过对国际国内形势的有利条件和经济文化落后的不利条件的分析，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提出这个方针是要求避免“过”与“不及”的两个极端，以求得“一化三改”适中可行的速度。周恩来认为中国从鸦片战争到解放战争，在建设方面一共耽误了一百年，在经济文化方面落后于西方国家一百年。面对落后怎么办？我们不能慢吞吞地走路，“我们必须急起直追，力求尽可能迅速地扩大和提高我国的科学文化力量，而在不太长的时间里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尽可能迅速地用世界最新的技术把我们国家的各方面装备起来。谁说周恩来不反对保守倾向，谁说周恩来不着急？谁说周恩来不想快？但也正因为经济文化落后，不可能一步登天，不能盲目图快。否则就会欲速不达，得不偿失。所以也要反对冒进。

周恩来不仅对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强调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对实现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也是这样。

1953年6月19日，他针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农村工作和农业生产问题指出：“我们国家总是要到达社会主义社会的，而且是在走着，社会主义经济成分是一天天在增加着。所以，我们既反对保守思想，也反对急躁情绪。在农村工作中我们主要的是反对急躁。农业机械化的前途是一定要实现的。不看见这个前途是盲目；另一面，不承认我们的落后和不平衡的现象，就是急躁。”这里是说实现国家工业化既不能保守也不能冒进；实现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也要既反对保守思想又反对急躁情绪。1953年9月8日，周恩来针对私人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指出，有两种现象必须引起注意：一种是有些工商业家对国家还保持着很大的距离，没有改变唯利是图的思想；一种是有些工人前进得太快了，他们不允许资本家有利可得。我们要对这两方面的人进行教育。他说：“一方面，我们反对把社会主义改造看成遥遥无期、停止不前。现在不动将来就要痛，现在向前将来就会愉快。另一方面，急躁冒进，想一步登天，也是错误的”。

“一五”计划的后两年，周恩来面对1955年下半年以来掀起的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仍然强调在实现社会主义改造方面、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方面既不能保守，也不能冒进。1956年2月8日，

在国务院第 24 次全体会议讨论《关于目前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若干事项的决定（草案）》时，周恩来指出：“商业部、手工业合作总社、供销合作总社等单位应重视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改造工作。不要光看到热火朝天的一面。热火朝天很好，但应小心谨慎。要多和快，还要好和省，要有利于提高劳动效率。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利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

“一五”计划的后两年，周恩来更多的、更突出的是在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在计划与预算方面强调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1956 年 2 月 8 日，周恩来指出：“工业建设可以加快，但不能说工业化提早完成”。“当然反对右倾保守是主要的，对群众的积极性不能泼冷水，但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6 月，一届人大三次会议召开之前，周恩来针对 3 月份通过的预算数字太大、基本建设投资 147 亿元很难完成，提出“右倾保守应该反对，急躁冒进现在也有了反映。这次人大会上要有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保守，也反对冒进。”9 月，党的“八大”会议上，周恩来说：“应该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他指出，1955 年计划保守了一点，把基本建设的规模定得比较小了一些，结果出现了物资积压；1956 年计划冒进了一点，把基本建设规模定得大了一些，结果出现了财政和物资相当紧张的局面，这两方面的教训都应该吸取。他认为编制长期计划时，应该按照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根本要求和国家物力、财力、人力的可能条件，实事求是地规定各项指标，使其比较可靠；编制年度计划时则要充分考虑积极地发挥潜在力量。他说：“在有利的情况下，必须注意到当前和以后还存在着某些不利的因素，不要急躁冒进；相反地，在不利的情况下，又必须注意到当前和以后还存在着许多有利的因素，不要裹足不前、”这是周恩来从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从编制长期计划和年度计划、从规定国民经济发展速度的角度上，对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所作的一次精彩的表述。

初级阶段理论先河——反对社会主义改造的冒进倾向

在一定时期内，保守倾向和冒进倾向总有一个是主要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不是平均使用力量，而是要重点反对主要的错误倾向。“一五”时期，为“一化三改”的目标奋斗时，虽然有裹足不前的保守倾向，但主要的错误倾向是急躁冒进。由于冒进从表面上看与目标趋于相同的方向，同时又与群众的热情、积极性相伴，并带有革命的色彩，因此，反冒进比反保守要复杂得多、困难得多，需要更冷静的头脑和更坚韧的毅力。实现国家工业化以及计划、预算问题，并不直接反映阶级利益和阶级斗争；而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内容，直接反映着不同阶级之间的利益和斗争。因此，反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的冒进倾向，需要更高的洞察力和更大的勇气。“一五”时期，周恩来在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斗争中，重点放在反对冒进倾向上。他对“一化”和，“三改”两个方面的冒进倾向都进行了坚韧不拔的说服工作。

1953年9月，周恩来阐述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对“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行了具体解释。他说，基本上实现，不是完全实现；基本上实现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相当长的时期究竟是多少年？他同意当时毛泽东的提法：“要经过几个五年计划”。

1953年，周恩来对反冒进主要是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阐述的。他认为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虽然是一场革命，但它是渐变过程，而不是突变，“可以采取逐步的和平转变的办法，而不是在一天早晨突然宣布实行社会主义”。他说：“社会主义改造”、“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些话，如果不讲清楚，很容易被误会为马上要实行社会主义。我们进行工作时，要稳步前进，不能急躁。”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3年9月7日，毛泽东说：“将全国私营工商业基本上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至少需要三年至五年的时间”。当时，周恩来在不同场合、不同会议上多次阐述和发挥毛泽东的这一观点。他说：至少需要三年至五年，就是说，不少于三年但可以多过五年，搞不成还可以推迟，不能急躁；基本上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就是说不是全部，而是把产品多、产值大的工厂纳入，不是把户数众多的中小工厂也一下子引进来。“总结起来说，至少要三年到五年，才能基本上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这并不是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还要几个五年计划，两者不可混同”。

对个体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当时毛泽东认为是比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更为繁重的工作。周恩来重视毛泽东的这一看法，并进一步指出：“个体农业、手工业，是两个大海，要做的工作还很多。因此，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走完过渡时期。”这个相当长的时间，具体他说，就是当时中共中央提出的“十年至十五年或更多些时间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周恩来十分重视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要有步骤地进行。他认为，所谓有步骤，“就是说互助合作运动要根据自愿两利的原则，逐步地由低级到高级，不能性急”。实现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所以要有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要使个体农业、手工业者自愿走合作化道路，必须使他们看到个体的农业、手工业生产不如集体、

合作社的劳动生产率就是高于单干。然而“照现在的情形看，还没有做得那样好”。这需要一个过程。

直到1955年11月16日，周恩来还坚持说：“在大约十五年左右的时间，用和平的方法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把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变成为全民所有制，把小生产者的个体所有制转变成为集体所有制。”

1955年下半年，由于激烈地批评“小脚女人”和“右倾机会主义”，农业合作化的步伐猛烈地加快了，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连带着加快了。1956年出现了三大改造的高潮。此时，“相当长的时间”、“十五年左右的时间”不可能再被提及。

在三大改造的高潮之下，对社会主义工业化也提出了“提早完成”和加快的要求，并出现了把计划指标订得过高、基建规模定得过多的倾向。这时，周恩来更多的是从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从计划与预算、从国民经济发展速度的角度上阐发了反冒进的思想。1956年1月20日，他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指出，要使我们的计划成为切实可行的、实事求是的，而不是盲目冒进的计划。2月8日，他说：“绝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冷静地算一算，确实不能提。”6月，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之前，在讨论《关于一九五五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六年国家预算的报告（草稿）》时，周恩来指出，对急躁冒进的错误倾向，现在已经不是预防而是需要反对了，“一九五六年的国家预算必须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9月，在党的“八大”会议上，他批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公布以后，“有些部门和有些地方，急于求成，企图把在七年或者十二年内才能够做完的事情，在三年、五年甚至一年、二年内做完”。11月，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他对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提出了“保证重点，适当收缩”的方针。1956年，周恩来更多的是从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方面对急躁冒进的倾向做了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

必须指出，1956年周恩来虽然更多的是从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从计划与预算的角度上阐明反冒进的思想，但在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方面；也仍然强调要稳步前进，不能操之过急。1956年1月30日，他指出，手工业“在合作化以后，凡是不宜于集体生产的，就应该保持分散生产的形式”。“有些特殊好的手工业和手工业，如果一时不易组织合作，就让他们单干”。对于数量极大、分布极广的小商店，在合营以后，应该继续实行代销拿手续费的办法。对于那些分散的肩挑小贩，不要急于改变他们的经营方式，应该在长时期内将它保留下来，2月8日，他又指出，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改造工作，“不要光看到热火朝天的一面”。1956年1月25日，毛泽东说：“从去年夏季以来，社会主义改造，也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就以极广阔的规模和极深刻的程度展开起来。大约再有三年时间，社会主义革命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对此，周恩来说：“这只是讲大体上完成，如少数民族地区，农业、手工业、私营工商业的改造都可能拖长一些。所以不论从地区或从部门看，都会有不少尾巴”，“条件不成熟的等一下不要紧”，“我们要使条件成熟，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联系到两个月以前，周恩来还坚持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可以看出，1956年出现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情况下，在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问题上，周恩来与毛泽东的认识是有一定差别的。1956年9月，在党的“八大”会议上，周恩来指出：“凡是不必要由合作社统一经营的农家副业，应该鼓励社员单

独经营。”“有些手工业可以在手工业合作组织的领导下，继续独立生产，也可以让他们完全自产自销，不必勉强组织起来。”1956年底，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此后，周恩来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不能搞清一色的纯而又纯的公有制，不能搞清一色的集中统一型的国营、公营，这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1957年4月，他指出：“一切东西都靠国家生产不行，各方面都应该有百分之几的自由活动，太死了不行。”他认为把私有制、私营全部封死、堵绝，实际上是“因噎废食”的愚蠢行为。他提出，大煤矿国家开办，小煤窑合作社、私人都是可以开，小盐场也应该开放。他说：“主流是社会主义，小的给些自由，这样可以帮助社会主义的发展。”“加入合作社的占总数的百分之九十六，其余的个体就让他个体”。“每一行都可以来一点自由，搞一点私营”。他甚至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搞一点私营的，活一点有好处”。还必须指出，1955年12月以来，周恩来从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速度上阐明反冒进的思想，是同他队社会主义改造的角度反冒进紧密相联的，并且进一步拓宽了对社会主义改造不能急于求成的认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要求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落后于生产力的生产关系，是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超越生产力的生产关系，同样是生产力发展的障碍。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我党提出的过渡时期“一化三改”的整体目标，正是对这一根本原理的自觉运用。在这一整体目标中，工业化是主体，对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两翼。主体没有完成，两翼不能超前发展。正如周恩来在1953年9月所强调的，“经济改造是一切改造的基础，而国家工业化又是实现经济改造的关键”。1955年12月以来，周恩来仍然坚持这一基本观点。他认为国家工业化还没有实现，还有一段很长的路程，不能提出提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在这种情况下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实现，难以达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他说：“如果没有工业化，农业即使合作化了，也不巩固。手工业也是如此”。这是对当时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急速发展的深刻而有力的批评。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五”时期，周恩来是从实现“一化三改”整体目标上全面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的，如果只从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及其计划、预算这一方面研究反冒进，是难以完整反映周恩来当时经济思想的全貌的。

“一五”时期，周恩来从“一化三改”两个方面阐明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思想，深含着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科学理解，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尤其是他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基点上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急躁冒进倾向的批评，字里行间闪耀着真理的光辉。虽然，1955年下半年以来，他的这一思想未能贯彻实行，但它却是党的“十三大”提出并被党的“十四大”所坚持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先河。奔向四化振兴中华——提出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战略目标中同有两句古语：“有志者事竟成”；“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长百岁”。“有志”即有追求的目标。有了追求的目标，奋力拼搏，年少者也能干出一番大事业。没有追求的目标，磋跎度日，即使活到百岁也是虚度一生。

国家的发展、民族的繁荣，也需要有一个全体人民为之奋斗的具体目标。“预则立，不预则废”。制定国家发展的战略目标，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周恩来的经济智慧之一是提出了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战略目标——实现

四个现代化。1964 年 12 月，周恩来说：“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总的说来，就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周恩来关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思想有着丰富的内容。

首先，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需要，是全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革命的根本目的是解放我国的生产力，使我国国民经济能够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得到迅速的发展，以便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并且巩固我们国家的独立和安全。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时代赋予中国人民的历史使命，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要求。“现在世界上各方面的事业都在飞跃发展，我们要迎头赶上，就要着重研究现代的问题，”“我们要发展，就要努力实现四个现代化，要一代胜于一代，做出比前人更大的贡献。”

其次，四个现代化是全面的现代化，其中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工业、农业、国防与科学技术四个方面，要同时并进，相互促进，不能等到工业现代化以后再进行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工业、农业、国防现代化的实现，必须运用最新的科学技术，“尽可能迅速地用世界最新的技术把我们国家的各方面装备起来。”

再次，四个现代化是全国的全方位的现代化。我们不能设想，只有汉族地区现代化，让少数民族地区长期落后下去。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是要所有的兄弟民族地区、区域自治的地区都现代化。个中国的现代化一定要全面地发展起来，一定要各民族共同繁荣富强。另一方面，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国家，不能单靠汉族，我们 50 多个民族必须大家合作，互相帮助，互相支持，共同发展。汉族人口多，经济、文化比较发展，但是可开垦的土地已经不多，地下资源也不如兄弟民族地区丰富。兄弟民族地区的资源开发是祖国现代化的有力后盾。但是，兄弟民族地区的资源还没有开发，劳动力少，技术不够，没有各民族特别是汉族的帮助，也不可能单独发展。

复次，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必须与具体步骤结合起来，通过一个一个的具体步骤去实现。第一步，以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用 15 年时间，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再用 15 年时间，即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化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两步走的步骤还不够具体；当时用 30 年的时间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设想也过于乐观了些，对用这样

短的时间赶上并超过世界经济发达国家的艰巨性、困难性估计得还不够充分。但无论怎样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又提出分两步走的战略步骤，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不仅具有必要性，而且有着现实可能性，具备各方面的有利条件。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和一切爱国人士，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团结一致，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所表现的积极性和热情；有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作指导，能更好地认识客观规律，更好地发挥主观能动性；

有广大的人力和丰富的资源做基础，我们的祖先有过许多发明，我们应该超过自己的祖先；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做保证，科学家有充分发挥自己才能的广大的自由天地；有了一支比建国前大许多倍的知识分子队伍和科学技术力量；有了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一般设备和原材料绝大部分自己能够制造或生产。

周恩来四个现代化的思想有一个发展过程。在周恩来主持起草的《共同纲领》中制定的战略目标是“发展新民主主义的人民经济，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实际上，建国头三年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经济恢复摆在第一位，经济建设尚属其次；与此相联系，在实现工业化的远大目标下，具体的现实的目标是努力实现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一五”计划和过渡时期，经济建设在整个国家生活中已经居于首要的地位，实现工业化成了具体的现实的目标。工业化的主要要求，就是要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基本上建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直到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讲中国工业化的道路还在探讨怎样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问题。3月，周恩来仍然说：“我们要争取十五年的时间，就是三个五年计划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建成社会主义工业国。”1951年9月23日，周恩来在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建设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并提出了“没有现代化的技术，就没有现代化的工业”的思想。但是，不能说这是我国建设以工业化为目标向现代化为目标的转变。现代化的概念，周恩来在1949年12月就提出过，他说：“必须把城市工业组织起来发挥领导作用，才能使农业现代化、机械化”。1954年，他所提的“四个现代比”，摆在首位的是“现代化的工业”；他所提的战略目标是“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工业国家”。几年后，周恩来曾把工业化、现代化并提，说：“工业化、现代化了，经济生活才能富裕。”60年代初，在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针对农业没过关的现实，改变了以工业化为目标战略，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1963年1月，周恩来在上海市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提出了沿用至今的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概念，农业现代化被放在首位，并强调了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关键作用。1964年底，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郑重宣布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和分两步走的设想。“文化大革命”动乱打断了原定的进程。但是，1975年1月，周恩来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重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再次给中国人民鼓舞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斗志。

目标远大步骤具体——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周恩来认为，在我国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第一步必须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就是要求在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指导下，建立起工业部门基本齐全，布局比较合理，基本上能满足扩大再生产和国民经济技术改造的需要、国防现代化的需要和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需要的工业体系。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是指不能只建成一个工业体系，不能光提工业把农业丢了，而要建成一个包括农业、工业、交通运输业、邮电业、商业、科学技术在内的国民经济体系，使其按比例、协调、均衡地发展。

二年经济恢复以后，周恩来领导制订第一个五年计划，针对我国当时还不能制造坦克、飞机、汽车、拖拉机的情况，开始酝酿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1953年9月29日，周恩来指出：没有动力工业、钢铁工业、机器工业和化学工业等这些重工业，国家的经济就不能完全独立，就谈不到国家工业化。如果说我们的兄弟国家重工业有基础，让他们搞重工业，我们搞轻工业，这样的分工是不可能的，这就等于让苏联背上一个比他更重的包袱。我国的人口比苏联多两倍，苏联怎么能担负得起呢？1956年党的八大会议和八届二中全会上，周恩来提出并阐明了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的思想：第一，我们的工业化，就是要使自己有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自己能够生产足够的主要的原材料；能够独立地制造机器，不仅能够制造一般的机器，还要能够制造重型机器和精密机器，能够制造新式的保卫自己的武器，像国防方面的原子弹、导弹、远程飞机；还要有相应的化学工业、动力工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等等。第二，我国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是可能的、必要的，专门靠国际援助的依赖思想是错误的。我国人口众多、资源丰富、需要量大。大小的国家，原料很缺，不可能不靠旁的国家。而我们这样的大国，就必须建立自己的完整的工业体系，不然一旦风吹草动，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支援我们完全解决问题。第三，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主要依靠自力更生，但不放弃争取外援。同时需要同世界各国发展经济、技术、文化交流，关门建设是错误的。即使建成了也是基本上完整，不可能一切都完全自足，仍然需要发展国际经济交流。

60年代，周恩来的上述思想有了重大发展：第一，针对60年代世界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指出我国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不应是30年代，40年代的工业水平，而应是60年代的工业水平，是原子、电子、喷气机这样的水平；不应片面追求数量，而要求质量、求品种、求规格、求技术的发展。第二，针对“大跃进”以钢为纲所造成的国民经济的严重失衡和农业没有过关的现实，指出不能只建成一个工业体系，而要建成一个包括农业、工业、科学技术等在内的国民经济体系。1964年12月，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正式提出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使我国建立起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严重干扰了这一部署。1975年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再次提出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第一步设想，并由此向四个现代化的第二步设想前进。周恩来的上述思想，给我国各族人民以巨大的鼓舞，到1980年底，我国基本上建成了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统战篇

联合战线率先垂范——开展第一次国共合作

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三大法宝”之一。这个法宝的形成，同周恩来的名字是分不开的。

胡耀邦曾说过：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以来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的第一个模范。这不只指的是他对党的统一战线工作贡献最大，而已也应该包含着周恩来从事统一战线工作最早。

周恩来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的时间，可以追溯到党成立后不久和大革命时期的第一次国共合作。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不久，中国革命民主派的领袖孙中山就同共产国际的代表有了联系。1921年7月，中国出现了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了。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出席了中共的成立大会。8月，孙中山在广州写了一封长信给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热情地表达了向列宁及其他苏俄友人的敬意，并殷切地希望与之取得联系。12月，马林和参与中共创建的张太雷到桂林同孙中山会谈。马林向孙中山建议：组织一个能联合各阶层尤其是工农群众的政党；建立革命的武装核心，应先创办军官学校以培养革命骨干。孙中山表示赞同。

中国共产党在它诞生一周岁的时候，即1922年7月，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会议通过了一个《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确定先邀请国民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代表开会商讨建立联合战线的各项具体问题，“我们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命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志”。

8月，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杭州西湖又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决定：只要国民党能够根据民主主义原则进行改组，共产党员可以加入国民党，以实现两党合作。会后，陈独秀、李大钊与马林很快就拜访了被广东军阀陈炯明赶出广东避居上海的孙中山，向他说明了中共的上述主张。孙中山表示接受中共的建议。不久，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太雷等即以个人名义加入了国民党，开始帮助孙中山筹备改组国民党。

这时，周恩来在法国，是中共旅欧支部的领导人。他坚决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在法国协助国民党总部代表王京岐筹组国民党旅欧支部。

1923年3月，以周恩来为书记的旅欧中同社会主义青年团也派代表到里昂和国民党代表进一步商讨，积极准备实现国共合作，建立国民党旅欧支部。

6月，周恩来与尹宽、林蔚等一起到里昂与王京岐商谈，双方达成协议，决定青年团员80余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随着国民党旅欧支部筹建工作的开展，是年秋，周恩来任国民党旅欧支部特派员。

11月25日，周恩来出席在里昂召开的国民党旅欧支部成立大会。在会上，他发表演讲，批评了原国民党中的腐败现象说：“挂名党籍不负责任者，此类人实居吾党最大多数”，“是真令人痛心疾首而不得不认为本党内部伏莽之患”。会上他当选为国民党旅欧支部执行部总务科主任。后来，在执行部部长王京岐回国期间，由他主持国民党驻欧支部工作。

这样，在国内国共合作的联合战线还未正式建立的时候，周恩来领导的国共合作联合战线的驻欧组织已率先垂范，首先建立了正式的合作关系。

在这期间，曾琦、李璜等国家主义派在巴黎成立中国青年党。他们在反共杂志《先声》上发表诸多文章，攻击中共的联合统一战线政策。周恩来率领旅欧党团组织，以《赤光》为阵地，发表了一系列战斗性极强的文章，同他们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捍卫了党的联合战线政策。

1924年秋初，周恩来奉党中央的指示回国，途径香港，到达了广州。在党内，他先后担任了中共广东区委员会委员长、常委兼军事部长的职务。广东区委的工作范围包括广东、广西、厦门、香港等地。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建议与中国共产党推动下，孙中山创办了以培养革命军队骨干为目的的黄埔军校，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到职后，他按照苏联创建红军的经验，健全政治工作制度和建立正常的工作秩序，部内增加了部员，分为指导、编纂、秘书三股，选调共产党员杨其纲、王逸常等到各股任职。政治部负责制定士兵政治训练计划；举行学生政治讨论，对学生进行政治教育；出刊物，办墙报，教歌曲。

1925年，周恩来参加了平定陈炯明的两次东征，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第一军副党代表、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东江各属行政委员等职。

这一时期，周恩来身处国共合作进行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对统一战线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思想继续深化。1924年10月，他指出革命政府必须依靠坚决革命的工农群众作为“革命的基本势力”。接着，12月他再次指出“工农群众为国民革命之中坚”，革命的工农阶级“其速自起！其速联合！其速组织起吾人自身唯一可持之革命力量！”次年7月，他在省港罢工工人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作报告，指出：“工人是国民革命的领袖”。

1926年，在国民党右派进攻，共产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对国民党右派步步退让的情况下，他在《人民周刊》上连续发表《国民革命及国民革命势力的团结》、《现财政治斗争中之我们》、《现时广东的政治斗争》等文章。”这些都是为抵制党内的投降主义和反击反对国共合作的逆流而写的。他说，国共合作“不是说中国共产党便失其独立性质而不应再有何种独立主张”，明确提出了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又强调：“只有无产阶级是最不妥协的革命阶级。要靠他携同农民，手工业工人督促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不妥协地与敌人争斗。”明确指出了联合中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

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周恩来的认识更加清楚，他开始把统一战线同武装斗争联系起来思考，要求中共中央立即组织武装力量讨伐蒋介石。他说：“故为全局计，政治不宜再缓和妥协。上海于暴动后，已铸此大错。再不前进，则彼进我退，我方亦将为所动摇，政权领导尽归之右派，是不仅使左派灰心，整个革命必根本失败无疑。”但由于陈独秀在革命的危急时刻无理地拒绝了周恩来等的正确意见，终于导致了那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的第一次失败。

第一次国共合作虽然失败了，但共产党积累了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经验教训。这一时期，包括毛泽东、周恩来等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一系列正确认识，却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统一战线理论已经开始形成。

共御强敌早开谈判——首倡第二次国共合作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在中国东北三省恣意践踏，中华民族的危机空前严重。这时，周恩来连写数篇有关“九·一八”事变的短文，分析民族矛盾已尖锐地摆到中国人民面前。

1932年伊始，日本帝国主义又在上海制造了“一·二八”事变，把妄图吞噬中华民族的血口张得更大。面对此严重形势，肩负着解放中华民族这一历史任务的中国共产党，必须制定新的方针、政策。此时，周恩来参与了党的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的制定。

1934年初，蒋介石不顾民族敌人的逼近，调集军队进攻要求一致对外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和十九路军。此时，周恩来起草了以毛泽东、朱德名义发出的《向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紧急提议》的电报，提出六条挽救危局的具体建议，体现了“反日反蒋联合战线的精神”。7月15日，他又和毛泽东、朱德联名发表《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重申愿“同全国武装队伍联合起来共同抗日”。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步步深入，1935年6月，当中央红军还艰苦跋涉在长征途中的草地上时，周恩来已清醒地意识到华北危急，便与毛泽东、项英、张国焘、朱德、王稼祥联名发布《为反对日本吞并华北和蒋介石卖国宣言》，号召全国工人、农民、海陆空军及一切爱国志士、革命民众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华北，反对蒋贼等卖国，坚决对日作战，恢复一切失地，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

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表明愿与一切参加抗日救国的党派、团体、军队和个人，共同组成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中央红军在艰苦跋涉完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后，周恩来参与中共中央发出《为目前反日讨蒋的秘密指示信》，强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要有下层统一战线，而且要有上层统一战线。所有这些，既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的认识上日趋一致，也为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党的政治路线提出来的瓦窑堡会议作了直接的思想准备。12月中、下旬，中央政治局瓦窑堡扩大会议以决议的庄重形式，明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会议规定中共共产党的策略路线是“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决定将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变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确定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的方针，主张成立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决定红军东征山西，以便对日直接作战。周恩来出席了这次重要会议，在会上几次发言，和毛泽东、张闻大等一起，为会议的成功作出了重要贡献。

瓦窑堡会议之后，为贯彻会议精神，周恩来以其主要精力，致力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并首先选准了东北军这个突破口，成立了以他为人民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于是，使有1936年4月同张学良的肤施会谈，且取得了重要成果——双方具体分析了逼迫蒋介石参加抗日的可能性，讨论商定了红军与东北军互不侵犯、互相帮助、互派代表以及帮助东北军部队进行抗日教育等具体协定。这次会谈，不仅对张学良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具有决定意义，而且对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也有极重要的收获。

几乎是在开展东北军工作的同时，周恩来又受中共中央的委托，统一主

持对东北军和西北十七路军的工作，且与蒋介石秘密谈判的渠道也逐渐打开。

针对国民党内部在抗日问题上的斗争更加尖锐化这一情况，在 8 月 10 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最先建议，应放弃“抗日必须反蒋”的口号。毛泽东作结论时，同意周恩来的意见。既然放弃反蒋，就意味着不排除联蒋，而联蒋则是实现国共再度合作的关键。显然，这比既主张国共合作同时又要反蒋的方针和口号深刻、实际了一大步。

8 月 31 日，周恩来复信曾养甫：9 月 1 日，他又致信陈果夫、陈立夫，均表明中国共产党“早已准备随时与贵方负责代表作具体谈判”。至此，周恩来就第一次代表中国共产党把国共再度合作明确提出来了。这表明，周恩来是共产党内“逼蒋抗日”的最早提出者，也是两党再度合作的最早倡导者之一。当然，其中也不排除国民党蒋介石在民族危亡日益严重的情况下，顺应历史潮流而对共产党关系作了自动的松动。但毕竟前者的努力才是最有诚意的。

也正是在 9 月 1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向党内发布《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这个指示写道：“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所以，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国民党中央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我们目前的中心口号，依然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全中国民主共和国建立时，苏区可成为统一民主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苏区代表将参加全中国的国会，红军将服从统一的军事指挥。”

这是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蒋介石方针的重大转变：正式完成了以“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的过程。正因为有了这个转变，所以在后来的西安事变时才能采取和平解决的方针，它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

当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作为党的方针确定下来之后，周恩来又是最强有力的推动者。在 9 月 16 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进一步阐明：联蒋抗日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他还强调说明，蒋要走到同我们合作，距离还很远，但我们不应放弃他，应逼蒋抗日。

9 月 22 日，他再次致书陈果夫、陈立夫，希望他们“力促蒋先生停止内战，早开谈判，俾得实现两党合作，共御强敌，则两党之幸，国家之幸也。”24 日，潘汉年携带周恩来的信件和中共中央起草的《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离开陕北，前往上海，去表达中国共产党人的这种良好愿望。

铁肩担义战古城——参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2日晨，在十一朝古都的西安，发生了一件震撼世界的大事变——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毅然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拒绝联共一致对外的蒋介石扣起来了。

捉住了蒋介石，如果杀了他，国民党内部的亲日派就会抓住借口，扩大内战，公然投降日本帝国主义。这对中国人民是不利的。

怎么办？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一时拿不定主意，他们立即打电报请共产党派代表来协商解决这一关系到祖国前途命运的大事。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远离西安的陕北黄土高原上得知这一消息，感到很突然。中共中央政治局随即召开会议，讨论事变的性质初中共对张杨、南京政府以及蒋介石的态度问题。

关于这次事变的性质，会议认为是革命的，抗日的，没有帝国主义的背景，应该给事变的发动者以支持，并决定派周恩来去完成这个艰巨而复杂的任务。当天深夜，毛泽东、周恩来即复电张学良，告知“恩来拟来兄处，协商大计”。

为了制定正确的解决这次突发事变的方针，中共中央政治局13日继续召开政治局会议。在会上，周恩来作长篇发言，分析南京政府内部各派系和地方军阀以及国际上各种力量对事变可能采取的态度，提出共产党应取的对策：在军事上应准备迎击南京方面对西安方面的夹击，在政治上不采取与南京对立，应努力争取蒋之大部，孤立何应钦，巩固我们的力量。

中共代表团赴西安参与解决事变，面临的政治局势将是错综复杂，瞬息万变，许多事物由周恩来当即立断，慎重处置。他勇敢而沉着地挑起了这副重担。

那时候，红军总部所在地保安（今志丹县）还没有飞机场，必须到延安去乘飞机。那天，大雪纷飞，积雪盖注了道路、山峦，北风呼啸着、狂吼着。在这风雪交加的日子，祖国的命运，民族的存亡，都到了危急关头，周恩来和红军参谋长叶剑英骑在马上，在飞雪和寒风中奔驰，两天走了100多公里，才赶到了延安。

周恩来一身风尘，于17日傍晚抵达西安，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工作。不，准确他说，是投入了紧张的战斗。

周恩来一到金家巷张公馆，席不暇暖，即与张学良进行通宵达旦的谈话。

张学良介绍了扣蒋的经过，六大来局势的变化以及各方面对事变的反应。首先是西安告急。何应钦已下令讨伐，由于西北军师卜冯钦哉叛变，潼关不攻自破，中央军直下华阴、渭南，并大肆轰炸。各地反应不尽人意；各实力派因不明真们或局势不明朗，多不表态，只有远在广西的桂系表示支持。其次是南京的动向。南京政府内的斗争焦点是如何救蒋，而对两安提出的抗日问题并不关切。宋氏兄妹、孔祥熙在英美支持下，力主和平解决；何应钦在日本支持下，主张武力解决，打着救蒋的旗号，企图炸死蒋介石，取而代之。另外，经端纳的斡旋，蒋介石的态度由强硬变得和缓，有答应抗日的意向。

在对蒋介石的处置问题上，事实很明显：蒋介石是南京政府的当然领袖，只有他能制止何应钦的讨伐，也只有他能够统率国民党内的抗日派、中间派，避免南京政府成为日本的傀儡。从全民族抗日图存的最高利益看问题，共产

党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是次要的。在蒋介石同意联共抗日的前提下释放他，对于推动抗日是有益的。因此，周恩来向张学良表明了共产党的态度：要保证蒋介石的安全。当然，在策略上可以声明如果南京挑起内战，则蒋的安全无望。这样，利用蒋、何的矛盾逼蒋抗日，借助蒋的地位压服南京实现和平。

在军事方面，有了稳定局势，周恩来与张学良当即商定：东北军、西北军集中于西安、潼关一线，红军南下延安、庆阳一线接替东北军，必要时侧击甘肃的胡宗南以及支援关中，红军加入抗日联军西北军委。这样，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组织上形成了东北军、西北军、红军三位一体的局面，巩固了西安的地位。

周恩来连夜又致电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通报西安方面的情况，建议中央在蒋介石处置的问题上采取“保蒋安全”的策略。第二天，中共中央发表致国民党中央电，呼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提出召开抗日救国代表大会。19日，中共中央发表通电，进一步将救国会议改为和平会议，将会址由西安改在南京，承认南京在全国的领导地位，放弃了原来以西安为抗日中心的设想。21日，中共中央提出和南京谈判条件，批准了周恩来的方案。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这一系列决策的制定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18日上午，周恩来拜访杨虎城，向他说明国内形势，反对法两斯、抗日已是大势所趋，现在蒋是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只要西北三方联合，力量强大，他想报复也报复不了。周恩来的一席话使对成蒋有所顾虑的杨虎城茅塞顿开，心悦诚服。

周恩来与代表团还通过多渠道和多种方式做张、杨两将军中其他高级将领、中下层军官及社会各界人士的工作，苦口婆心他说服持不同意见的朋友以民族利益为重，拥护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有一天，杨虎城部队中一些军官集合起来，强烈要求杀掉蒋介石，不然，他们就要闹事。他们说：“不能由共产党处理这件事，不能说放就放。”周恩来只身来到这伙军官中，耐心地劝导。

这群气势汹汹的军官见到周恩来，彼此推搡着，吵嚷着。一个军官人声叫喊：“不杀蒋介石后患无穷！”

周恩来平静地说：“杀他还不容易，一句话就行了。”大家一听，立刻安静下来。“可是杀了他，还怎么办呢？局势会怎样呢？各位想过吗？”周恩来又反问说。接着他启发大家：这次捉住蒋介石既不同于十月革命逮住克伦斯基，也不同于滑铁卢擒拿了拿破仑。前者是革命胜利的结果，后者是拿破仑军事失败的悲剧。现在虽然捉住了蒋介石，可并没有消灭他的实力，在全国人民抗日高潮的推动下，加上英美也主张和平解决事变，所以逼蒋抗日是可能的。我们要爱国，就要从国家民族的利益考虑，不计较个人的私仇。

周恩来的耐心解释和说服，终于说服了那群军官。刚才那位大叫大嚷的暴躁军官说：“要讲仇恨，共产党最恨蒋介石，十年内战，他杀了多少共产党！真是血海深仇！但共产党顾全大局，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大公无私，以德报怨，真令兄弟敬佩！”说完，他双脚跟“咔”地一碰，向周恩来敬了一个军礼。

有一天，周恩来在一所中学里演讲，听众越来越多，树上、墙头都站满了人。他那说理透彻、气势磅礴的演讲，不断被掌声和欢呼声打断，在场一些爱国的国民党人感动得流下了热泪。有一位过路人听了周恩来的讲演长舒一口气说：“呵，中国有救了，周恩来在西安！”

共产党不计前嫌，以民族大义为重，以国家根本利益为重，使张学良、杨虎城为之折服，同时也推动群众接受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而这一方针有利于支持南京主和派的斗争，迫使何应钦同意派宋子文、宋美龄以国民政府代表身份到西安谈判。

放蒋的方针确定了，如何促使蒋答应联共抗日呢？由于蒋被扣，扎祥熙已代理行政院长。经张学良与宋美龄协商，决定邀请宋子文来西安。17日晚，周恩来和张学良商定同宋谈判的五项条件。这五条和张、杨的八项主张基本相同，不同的是明确提出：“宋子文负责成立南京过渡政府，肃清一切亲日派”。宋是著名的英美派，和蒋的关系亦非同一般，与张私交也甚深。他是各方面都能接受的人物。西安提出由他组阁，成为促使蒋转变的契机。20日，宋子文以私人身份到了西安，知道这一提议，更加积极。22日，他同宋美龄再到西安，开始和平谈判。周恩来与宋美龄长谈，对蒋转变态度起了积极作用。

23日，周恩来以中共全权代表身份同张、杨一起，与南京方面的代表宋子文、宋美龄进行谈判。周恩来首先阐明中共关于和平解决事变的六项主张。南京方面救人心切，虽不免讨价还价，但基本上表示接受。24日便达成了改组政府、停止“剿共”、联共抗战等六项协议。当晚，周恩来又会见蒋介石，敦促他以民族利益为重，终于促使蒋择善而从，同意谈判达成的协议。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国共两党再度合作，团结抗日，起到了巨大的历史推动作用，成为从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转折点。

周恩来铁肩担道义，战斗在古城，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政治上的主宰者，是事实上的主谋。”事变的千占功臣张学良将军的这一评价，再客观不过他说明了周恩来于其中的历史贡献和作用。

机智勇敢沉着果断——平息“二·二”事件

凡是会见过周恩来的人，都为他温文尔雅的仪容、彬彬有礼的举止、口若悬河的谈吐、亲切谦逊的态度所倾倒。但中国革命的历史任务却使他多少回遇见急风险浪，多少次历经艰难险阻，然而他都从容不迫地闯过来了。他温和中有威严，谦逊中不妥协，危难中更镇定。这是他几十年革命生涯中的一贯作风，即便在处理统一战线中复杂而惊险的事变时，也不乏典型事例，平息“二·二”事件就是其中之一。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了，这是国共两党再度合作的一个转折点，周恩来是实现这一转折的“事实上的主谋”。然而，张学良将军在政治上未免有些天真、幼稚，他为了表示自己对蒋介石没有私人恩怨，没有与周恩来商量就主动送蒋回南京。周恩来听到后，立即赶到西郊机场劝阻。可惜，当他赶到机场的时候，飞机已经起飞了。实践证明了蒋介石在人格上是不地道的。张学良将军一到南京，就被蒋介石扣留了。这样一来，东北军广大官兵，尤其是少壮派的一些官兵被一下激怒了——他们对蒋介石的一腔恨怨无处发泄，恨不能全泼在周恩来身上，甚至要对他动“真格的”。当时，王炳内在西北军的杨虎城部做地下工作，听到他们已经暗杀了几名高级将领的惊人消息后，便连忙去报告周恩来。不料，在王炳南来到之前，一些东北军青年军官已经杀气腾腾地先一步闯进了周恩来的临时住所。

在这紧急关头，周恩来镇定自若，他猛地站起身来一拍桌子，既威严而又先发制人：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这是想救张副司令吗？你们的行动恰恰是帮了蒋介石的忙！是蒋介石所欢迎的！你们以为这样子就可以营救你们的张副司令回来吗？不！这恰恰是害了张副司令！因为你们的行动破坏了团结，分裂了东北军！你们在犯罪！

周恩来一番严词煞了他们的成风。无理闯进来的几个青年军官流着眼泪，立即跪下来向周恩来认错请罪。

1937年2月2日清晨，东北军主战的“少壮派”枪杀了主和的王以哲军长，恐怖笼罩着西安城，甚至有人还想嫁祸于中共代表团。

这天下午，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全体成员前往粉巷吊唁王以哲。

这时，王家忙着准备丧事。一个军官看见周恩来来到，急忙跑回巷里报信。

“报……报告，中共代表团来了！”

“什么？”有人以为自己的耳朵听错了。

“周先生来了”

“啊？……”

哭声嘎然而止。静了片刻，有人问：“他来干什么？”一言提醒了王以哲的表弟，这位青年军官轻信谣言，认定中共参与了刺杀的阴谋，从早晨起就叫嚷着要找中共报仇雪恨，只是被人劝住了。现在“仇人”上门来，他岂肯错过这个机会？“嗖”地拔出手枪，大喊一声，快步奔出屋门。

“给我站住！”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后堂内传出一声严厉的呼喊。

那个军官居然被镇住了，众人回头看时，只见两个姑娘扶着一位头发零乱、泪痕满面的人，她是王以哲的妻子。

“有礼不打上门客！……人家是头一批来吊唁的人，我绝不允许在我家里发生无理的事情。”

她说着泪水又如雨点般地滚落下来。王以哲的表弟不眼气地插好枪，退到后面去了。也就在这时，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怀着沉重的心情缓步走进灵堂，献上祭品，向王以哲的遗像深深地鞠了三个躬。

吊唁完毕，周恩来沉痛地对王以哲夫人说：“夫人，王将军不乍被害，我代表共产党和红军，表示沉痛的哀悼！上将军是东北军的元老功臣，也是我们忠实的朋友。他是最早沟通我们和张将军的将领，参加了我党和张将军的延安会谈，在西安事变前后他起了重要的作用，这种友情我们党是永远不会忘记的；他的功劳，中国人民也是永远不会忘记的。他为维护和谈成果而被害，这不仅是东北军的损失，也是全同老百姓的损失！那些不顾大局杀害王将军的人，不但应受到东北军广大将士的谴责，而且应该受到全国老百姓的谴责！夫人，希望您保重身体，和东北军兄弟，和我们一起为实现收复东北而努力！”

周恩来的脸色，由于极度的悲伤而变得惨白了，他的一番肺腑之言，感动了在场的每个人，一个个含着热泪，泣不成声。王夫人激动他说：“周先生，你们是以哲真正的朋友啊！”

灵堂背后事先躲着的那个人，他把子弹都推上膛了，随时准备射击。听了周恩来的话，他哭着出来，跪在周恩来面前，声声哀求恕罪，久久不肯起来……

东北军少壮派中的一些人原以为只要杀了王以哲等“主和派”，就可以堵住和谈的路，可以同中央军打仗，可以救回张学良。结果却事与愿违。王以哲在东北军中是很有威望的高级将领。他的被害激起了广大官兵的愤慨。消息传到前线，驻防在渭南的东北军立刻调转枪口向西安开拔，前锋到达临潼。他们提出：少壮派孙铭久等必须离开西安。3日，杨虎城同周恩来商量后，派人找孙铭久等问他们何以自处。孙铭久、应德田、苗剑秋等这时也慌了手脚，三人经过彻夜商量，在第二天提出三个方案：第一，他们三人引咎自戕；第二，自首投案，听凭处理；第三，将他们送到红军中去。周恩来在这样复杂而用难的局势下，经过权衡，考虑到少壮派在发动西安事变时是有功绩的，他们错误地刺杀王以哲的动机还是想拯救张学良，不能轻易牺牲他们，毅然地决定不避袒护少壮派的嫌疑，把他们送到云阳红军驻地，再转往平津。这些人一走，要替王以哲报仇的人便失去目标，从而避免了一场东北军内部大规模的自相残杀。

那些日子，可以说是周恩来在西安事变期间最困难的日子。在他周围就像堆满了火药桶。各种对立力量之间的大规模冲突已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而他们几乎都是共产党的朋友。情况的发展常常是风云突起，瞬息万变。稍微处理不慎，就可能前功尽弃，使已取得的初步胜利全部付诸东流。

这，几乎是常人难以承受的。当时在西安协助周恩来工作的罗瑜卿、吕正操、王炳南后来回忆说：“那些天，周恩来同志忙到不可再忙的程度。他顾不得吃饭，顾不得休息，几天几夜睡不上几个小时，夜以继日地工作。眼睛熬红了，人累瘦了，舌敝唇焦。然而，当他出现在会场上，出现在客人面前，仍然是那样神采奕奕，谈笑风生。周恩来同志平易近人，对和战两派平等相待，尽力说服大家团结合作。”他的态度是诚恳的，谈话是有说服力的，终于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使大局得到维持而不致崩溃，并且在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广大将上中赢得了信任，赢得了友谊。

“二·二”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十分关心周恩来、博古的安全，致电

要他们在紧急时立即移至三原。但周恩来很清楚：环境越危险，他就越不能离开西安。如果离开，正在建立的红军联络处就难以在西安正式存在，红军就难以在关中立足，国共正式谈判也难以进行。因此，他将大部分工作人员撤出了西安，要博古、叶剑英、李克农、刘鼎等转移到三原。他自己仍然坚持留在西安，在险象丛生中靠他的机智勇敢，沉着果断地平息了“二·二”事件。

东奔西走五次谈判——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

周恩来不仅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者，而且是其得以实现的强有力的推动者。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蒋介石虽然承诺了联共抗日的条件，但要使之变成现实，仍需付出极大努力。正如周恩来曾说过的，“蒋要走到同我们合作，距离还很远”。因此，为促成两党合作的正式建立，周恩来作为共产党代表团首席代表，不畏艰险，不辞劳苦，从1937年2月开始，历时七个月，东奔西走，往返于西安、杭州、庐山和南京之间，唇枪舌剑，陈辞恳切，同国民党进行了五次谈判。谈判的对手，最初是顾祝同、张冲等，后来是蒋介石本人；谈判的内容更涉及红军改编，边区政府改制、国共合作的组织形式和发表两党合作宣言等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蒋介石从其阶级利益考虑，总想把共产党、红军和边区控制起来，进而予以吞并；周恩来则从民族利益着眼，坚持“要他们承认我们的军队，承认我们的边区，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组织各党派的联盟，就是统一战线。”

第一次，二月西安谈判。西安事变过程中，是以东北军、十七路军和共产党联合的“三位一体”共同和南京谈判，由张学良主持。张送蒋离开西安后，由杨虎城主持。为了谋求和平，杨两次派代表到南京、奉化谈判。蒋介石为了防止在南京的何应钦插手其事，令在潼关的西安行营主任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和西安方面谈判。“二·二”事件前后，为了坚持和平，周恩来通过东北军军长何柱国向顾祝同提出，中共也派代表参加潼关的谈判。顾请示蒋介石，蒋回电顾：红军驻地陕北，南京每月给20万至30万元经费。周恩来派李克农到潼关后，又争取到顾祝同同意红军在西安设立办事处。

“二·二”事件后，西安三位一体不复存在，2月8日，顾祝同率兵进入西安。第二天，周恩来就与顾祝同、张冲开始谈判。不久，叶剑英也赶到西安参加谈判。

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四项保证。中旬，国民党三中全会通过《根绝赤祸案》，决定“必须彻底取消其所谓‘红军’”；“彻底取消所谓‘苏维埃政府’”，“根本停止其赤化宣传”，“根本停止其阶级斗争”。周恩来指出：“这个东西是双关的，因为红军改了名称，也可以说是取消红军，但红军还存在。所谓停止阶级斗争，停止赤化宣传，就是不许我们在国民党统治区有政治活动。”这四条同我们的五项要求、四项保证，实际上相当接近，国共合作的原则确定了。

政治上总的原则问题基本解决了，国共谈判的焦点集中在军改编后的编制、人数，是否设立总指挥部；苏区的地位、行政长官的人选；两党合作的形式及纲领等问题上。

2月26日，参加了国民党三中全会的张冲回到西安，就上述问题开始和周恩来谈判，而且谈得比较顺利。但是3月上旬贺衷寒到西安后，情况却大幅逆转。贺提出了许多无理要求，理所当然地遭到周恩来的拒绝。周恩来还向中共中央建议，关于民主政治与红军独立领导问题，不是与顾、贺可以解决得了的。中央同意了周恩来的意见。

第二次，三月杭州谈判。3月下旬，周恩来在潘汉年陪同下到达杭州，直接和蒋介石会谈。周恩来严正声明：中共为国家民族利益计，与蒋及国民党合作，但不能忍受投降、受骗之诬蔑。提出红军编为三个师，每师15000

人，共 45000 人。三个师上设某路军指挥部。陕甘宁边区作为整个行政区，不能分割。国民党不能派政训人员和辅佐。红军需要增加防地。

蒋介石在大敌当前、人民强烈要求抗日，共产党坚持斗争的形势下，不得不承认国共分家十年造成军阀割据和帝国主义入侵的局面，但不引咎自责。他说，你们不必提和国民党合作，只是与我合作。蒋表示，边区、红军改编都是小事，只要拥护他为领袖，一切好办。对合作的形式他也提不出具体的方案。

· 蒋介石对于没有能消灭红军和共产党一直耿耿于怀，现在要承认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平等地位，进行对等谈判，他确是不甘心的。因而提出与他个人合作，逼周恩来就范。

周恩来却巧妙地处理了这件事，他马上提出国共合作的形式可采用共同纲领的办法，实际上给了蒋介石一个软钉子。

4 月初，周恩来回到延安，中央对杭州谈判很满意，同意周恩来的具体方案，决定在中共抗日十大纲领和国民党一大宣言的基础上起草民族统一战线纲领，并具体研究两党合作的形式。

第三次，一上庐山谈判。为了推动蒋介石尽早抗战，6 月 4 日，周恩来携带中共中央起草的《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及准备讨论的 13 个问题（主要有：两党合作的形式，联盟或改组国民党，要求释放政治犯、允许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办报、红军改编、承认边区，中共不同意与蒋个人合作等），风尘仆仆登上庐山，同正在避暑的蒋介石再次谈判。

经过多次交涉谈判，蒋介石最后表示：两党合作的形式可成立国民革命联盟，两党各推相同人数的干部组成，蒋为主席，有最后决定权。对外行动的宣传由同盟会决定，然后执行。而且在关于纲领的形成与执行、红军改编后最高指挥机关的设置及陕甘宁边区主席的确定等一系列问题上，蒋介石都顽固坚持旨在将共产党溶化掉的立场。周恩来在原则问题上不让步，声明回延安再行讨论。

第四次，七月再上庐山继续谈判。6 月 18 日，周恩来回到延安，中共中央开会讨论，为了推进统一战线的建立，打破谈判僵局，又做了让步。首先，在合作形式上，同意组织国民革命同盟会，但是先确定共同纲领，这是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组织上，同意蒋依据共同纲领有最后之决定权，但保持共产党的独立组织和政治自由。对于具体问题，决定 7 月份发表宣言，指定由周恩来起草。7 月初中共通过了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7 月 14 日，周恩来和博古、林伯渠再次上庐山将宣言交给国民党，并准备与国民党讨论革命同盟会的纲领，同蒋介石切实商讨国防计划、召开国防会议的时间等抗日事宜。

这时，“七·七”事变已经爆发，虽然蒋介石在 17 日表示了坚决抗战的决心，但却不准中共代表出席他在庐山召开的全国教育、文化、社会贤达座谈会，也就是不准共产党公开活动。蒋介石对中共送来的宣言也不感兴趣，虽动手改了两句，却扣住不发。将革命同盟会一事搁置不提，纲领的问题更无从谈起。

18 日，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和蒋介石，邵力子、张冲会谈。蒋介石坚持，改编后的红军政治部上任只能转达南京的人事指挥，而三个师的管理教育，须直属行营，三个师的参谋长由南京指派。蒋答应中日开战，即发表中共起草的宣言。

中共坚决反对国民党派人到红军来。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力争无效，因抗战枪声已响，便采取如蒋不让步，不再与之谈判的方针，遂下山到上海等待时局的变化：并建议中共中央自行改编红军。随后，返回陕北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五次，南京会谈。7月底，北平、天津相继失守，华北危急，震动全国。抗战伊始，中央军就节节败退。为挽救局势，蒋介石急于要红军上前线。他要张冲致电毛泽东，邀请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速至南京共商国防问题。同时蒋准备在南京召开国防会议。中共为了推动抗日，争取合法地位，决定周恩来、朱德、叶剑英赴南京出席国防会议。

8月9日，周恩来、朱德、叶剑英飞抵南京参加会议，并与蒋介石进行第四次会谈，也是西安事变后周恩来同国民党进行的第五次谈判。蒋介石在谈判中再次提出向红军派参谋长、政治部副上任，周恩来仍不能接受这一无理要求。

8月13日，日本进攻上海，战火已经烧到了蒋介石的大本营，这时他才真正决心抗战，不再提及向红军派人。19日，在全国人民抗日高潮的压力下，蒋介石同意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担任正副总指挥。22日，南京政府正式宣布红军改编成八路军，设总指挥部，下辖三个师，每师1500人，东渡黄河；奔赴抗日前线。8月中旬，为参加洛川会议，朱德、周恩来回到陕北。随后为贯彻洛川会议精神，遂率八路军东渡黄河，到山西抗日前线，投身于民族解放事业，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叶剑英仍留在南京继续和国民党当局交涉具体事宜。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不断深入我华北腹地，各城纷纷失守，蒋介石需要中共和八路军的支持。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布了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了承认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合法地位的讲话：“中国共产党人既捐弃成见，确认国家独立与民族利益之重要，吾人惟望其真诚一致，实践其宣言所举诸点，更望其在御侮救亡统一指挥之下，人人贡献能力于国家，与全国同胞一致奋斗，以完成国民革命之使命。”

《宣言》的发表，蒋介石的讲话，标志着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为标志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到蒋介石庐山讲话为标志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周恩来东奔西走同国民党谈判五次，其中同蒋介石直接谈判四次，在他的不懈努力下，“抗战是逼成了，谈判也算逼成了，统一战线也算逼成了”。

对象不同方法各异——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统战对象极其广泛。周恩来在统战工作实践中，对不同类型的工作对象，总是采取灵活多样的方法，把他们争取到统一战线中来：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例：

对蒋介石的争取，我党承认他在全中国军队和政权中的领导地位，拥护他领导抗战，并在抗战困难时援助他；在其对中共蛮横时拒绝他、揭露他，对他及其特务机关之一切反共阴谋，据实揭发，适时抗议，必要时组织反击。例如，1939年国民党进一步确定军事反共为主、政治反共为辅的反动方针，以博山事件为起点，制造了许多磨擦事件。当时，周恩来先后致电陈诚、蒋介石，抗议蒋秘密颁发《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指出它是造成各地磨擦事件的根源，必须予以取消。他号召全党“对目前全国倒退的现象，必须给以严正的批评，适当的抗议与必要的压力，以促其进步”。正是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开展了有节制的反磨擦斗争，粉碎了蒋介石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以皖南事变为标志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爆发后，周恩来在《新华日报》发表“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的悼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以极大的愤慨及时揭露了蒋介石破坏抗战、破坏团结的罪行，团结了一批中间力量。由于党中央一系列针锋相对的措施，才使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又一次免遭破裂。当蒋介石抛出《中国之命运》，欲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时，周恩来在重庆约见蒋介石，当面予以揭露，对有效制止这次反共高潮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以看出，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周恩来对蒋介石采取了既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法。

对其他党派，周恩来总是积极扶植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分子。抗日战争时期的民主党派有中国民主同盟，它的前身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主要由救国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简称第三党，后改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华职教社、乡村建设协会、国社党、青年党等三党三派组织而成。抗战期间，在重庆基本形成的民主党派还有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主建国会、九三学社等。作为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并兼管统战工作的周恩来，不仅从组织上帮助促成这些民主党派的建立、联合，而且还从政治上对民主党派坚持抗战，维护团结，争取民主的正义斗争给予大力支持，从而进一步密切了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关系，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壮大了革命力量。比如，1939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团结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实施宪政号召的影响下，统一建国同志会在重庆成立。这个组织提出了对外抗战、对内建设，以三民主义为抗战建国的最高原则，要求实施宪政，各党派平等等主张。然而，皖南事变的发生却打破了他们的幻想，国民党坚持内战分裂政策使他们感到失望，于是，他们进一步认识到，团结起来，争取民主自由反对内战独裁之必要。在这种情况下，第三党的章伯钧、青年党的左舜生等拟发起成立民主联合会，以团结各党各派及国民党左派，进行民主与反内战运动。他们专门找周恩来会谈，要求中共给予合作。周恩来对此极为赞同、支持，并在他的直接支持和帮助下，原统一建国会的三党三派于1941年2月间开始筹备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3月19日在重庆上清寺特园秘密召开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大会。

民主政团成立的消息披露后，国民党当局十分恐慌。他们千方百计封锁民盟成立的消息，还诬蔑民盟在渝成立是造谣欺骗，“绝无其事”。中共中

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于10月28日发表社论，祝贺民主政团的成立，称赞它是中国民主运动的生力军。希望“参加民主政团同盟的各党派，在民主大旗下，更进一步的努力，愿其所负使命得迅速实现，以促进抗战胜利之到来，民主政治之真正实施。”中国共产党和周恩来的支持、鼓励、帮助，使民主政团的各党各派深受鼓舞。

周恩来不仅从组织上支持和帮助了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对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民主建国会、九三学社等组织的酝酿形成都起了重要作用。这些组织一经成立，周恩来又从政治上支持他们的正义斗争，从思想上关心他们的进步。重庆谈判期间，周恩来扶植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分子的卓绝努力，更是有口皆碑。这是广泛团结的方法。

对地方实力派，周恩来采取了领导出面，上下配合，各方促进的办法。以他在重庆争取西南地方实力派为例，周恩来根据党的“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这一策略总方针，不仅强调了争取地方实力派的重要性和可能性，而且提出了工作中的一个关键（就是要克服和纠正我们党内长期存在着的左倾关门主义，以及用那种固定不变的眼光看问题的形而上学观点）、两条原则（第一，促进地方实力派向左转，不跟蒋介石走，接受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第二，促进地方实力派之间的联合，共同抵抗蒋介石的强大反动势力，避免被各个击破）。周恩来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摸清了西南地方实力派头头的情况，决定重点做刘文辉、潘文华、邓锡侯、龙云等人的工作。1938年夏，董必武、林伯渠直接到成都刘文辉驻防地去看望他，并和他谈到如何团结地方力量，坚持抗日的问题。1942年2月，周恩来通过民盟朋友张志和联系，在重庆机房街吴晋航宅同刘文辉谈了一个多小时的话，就抗日问题向刘晓之以理，促其同共产党密切联系，具体配合。经过周恩来的教育帮助，刘文辉明确了政治方向，增强了抗战勇气，此后，刘与共产党的关系就由一般联系进入实际的配合阶段。接着周恩来又先后派华岗、张友渔、黄松林等到成都同刘文辉进行经常联系，在取得刘同意的情况下，1942年2月中共中央派王少春到雅安和刘联系，并设置一部秘密电台与延安直接通话。王少春每天把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和解放区的胜利消息向刘文辉通报，又把川康方面的军政动态向党中央汇报，从而沟通了延安与川康的联系。在重庆的八年抗战期间，周恩来在争取刘文辉的同时，又亲自对潘文华做了大量工作。通过潘手下一个师长彭光汉的关系，派田一平去担任了由彭出钱办的《华西晚报》的社长，又派黎澍去做总编辑，该报名义上是支持民盟的报纸，实际上成了共产党的宣传工具。周恩来还派邓锡侯的同乡共产党员杨伯凯去作邓的工作，向他宣传中共的路线、方针，分析国际国内形势。通过周恩来的努力，促进了地方实力派的头头向左转，先后接受了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孤立了蒋介石顽固派，为中国共产党在西南、在四川地区开展抗日民主运动提供了有利条件。

对民众运动，周恩来努力争取党的一切活动机会，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刚刚建立，周恩来就奉中央指示，奔赴山西抗战前线扩大统一战线，到太原后，他用一切机会，会见记者，给群众作报告，到大学演讲，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这是积极发动群众的方法。

另外，无论对民族、宗教首领，还是对哥老会的龙头大爷，周恩来在同他们协商统一战线事宜时，总是根据对方的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方法，最终都取得了发展、巩固统一战线的最佳效果。

千古奇冤大白天下——揭穿皖南事变的实质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和直属部队九千余人奉命北调。6日，当部队行经安徽泾县茂林地区时，突然遭到国民党军队七个师8万多人的包围袭击。经过七昼夜血战，终因弹尽粮绝，除两千余人突围外，大部壮烈牺牲。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7日，周恩来在重庆获悉新四军陷入重围时，立刻向张冲提出严重抗议，接着又向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顾祝同等分别提出抗议。他严正声明：如果不制止对新四军的包围、袭击，“新四军只有突围四出，散于民间，战于敌后”。

11日，《新华日报》举行创刊三周年庆祝活动，周恩来到会讲话。正当他讲话的时候，南方局机要员送来中共中央的急电。周恩来看完，紧皱眉头，立刻用沉痛的语调宣布新四军局势严重。

这时，饭厅里的电灯突然熄灭，四周一片漆黑，过了一会才亮起来。周恩来意味深长地激励大家：“黑暗是暂时的，光明一定会到来”。他接着说：“有革命斗争经验的人，都懂得在光明和黑暗中奋斗。不但遇着光明不骄傲，主要是遇见黑暗不灰心丧气。只要大家坚持信念，不顾艰难，向前奋斗，并且在黑暗中显示英勇卓绝的战斗精神，胜利是要到来的，黑暗是必然被冲破的。”

当晚，他召开南方局紧急会议，研究事变发生后的局势和斗争方针。组织力量，广泛地向国民党内主张团结抗战的人士以及社会各方面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罪行。周恩来还写信给蒋介石，要他命令国民党部队立即撤退，给北上的新四军让路。在这些极度紧张的日子里，周恩来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曾经连续三昼夜没有安枕。

这时，中共中央十分担心周恩来和南方局其他重要成员的安全，来电要求他们“短期间离渝”。周恩来断然说：我要坚持到最后。

17日晚，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布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通令，反诬新四军“叛变”，悍然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声称要把被扣的叶挺军长交付军法审判。至此，国民党就把第二次反共高潮推到了顶点。

周恩来得知后，立刻义愤填膺地打电话给何应钦，痛斥他：“你们的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千古罪人。”随即又驱车到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处，当面提出质问和抗议。

当晚，南方局在红岩八路军办事处召开会议，仔细分析国民党命令公布后的局势，研究如何向国统区人民和全世界揭露国民党顽固派这一破坏团结抗战、破坏国共合作的阴谋，决定在《新华日报》上刊登周恩来为皖南事变所写的题词。

那时，国民党有着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报纸稿件都需事先经过审查，有关皖南事变的记载全部被扣。就这，国民党还不放心，那天晚上十点多钟，新闻检查所派人来到《新华日报》社，坐等审查第二天报纸的大样。为了对付检查，报社准备了两种不同版面：一种是给检查所来人看的，上面没有周恩来的题词；另一种刊登有周恩来题词手迹。周恩来在红岩办事处把题词写好后，派副官立刻送往报社，并且指示：要报社加快编排和制版，组织好发行力量，务必抢在第二天各大报发行以前，将报纸送到广大读者手中。题词

共两条。在第二版占六栏地位的是：“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在第三版占五栏地位的冷首诗：“千古奇冤，江南一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这满含悲愤的25个字，产生了震撼人心的强大力量，一下子揭穿了皖南事变的实质，表达了对国民党顽固派最强烈的抗议。

第二天黎明前，报社就把印好的报纸包在铺盖卷里，装在箩筐里，从红岩后山偷运进城，送到读者手中。当国民党顽固派发现市面上出现印有周恩来题词手迹的报纸时，大批报纸早已冲破山城的浓雾传遍了全城，轰动了整个重庆，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反响。2月2日，毛泽东从延安致电周恩来：“收到来示，欣慰之至，报纸题字亦看到，为之神王。”

周恩来和南方局组织的反击是有力量的。更多的人看到：这次是国民党把事情做到如此绝情的地步，因此破裂的责任完全在蒋介石方面，人们把同情越来越多地转到中国共产党方面来。针对这种情况，周恩来、董必武联名致电中共中央，提议实行政治上的全面进攻，进一步打击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气焰。中央采纳了周恩来、董必武的建议。

为了实现政治上的全面进攻，广泛争取舆论的同情和支持，周恩来、董必武等南方局领导人频繁与黄炎培、沈钧儒、邹韬奋等知名人士接触、交谈；黄炎培等又召集其他民主人士举行座谈会，讨论时局与皖南事变问题。2月6日和21日，周恩来两次与冯玉祥见面，向他谈到时局问题，表示很难过。冯玉祥在日记中写道：“我说为国相忍的大道理。周先生这个人识大体，明大义，同时又很能忍耐。”冯还对左右说：新四军抗战有功，妇孺皆知，此次被政府消灭，政府方面实际有方法能挽救人民的反对。侯外庐、翦伯赞去看周恩来，问他：“国共会不会从此破裂？抗战会不会因此就被夭折？”周恩来微笑着说：“党的方针，就是争取时局的好转，但同时还要准备更坏的局面出现。至于抗战能不能继续下去，那决不是蒋介石一人所能决定的。”侯外庐和翦伯赞都表示：“如果离开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的解放事业就没有保证；无论局势如何困难，一定要跟着中国共产党走到底。”黄炎培表示：不论事情经过之是非，当局如此措置绝对错误，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连杂牌军和地方实力派中多数人也感到新四军的被解散即是解散地方势力之先声，因而表现恐慌并对共产党深表同情。对人心的这种变化，毛泽东在2月14日致电周恩来时作了这样的估计：“蒋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受内外责难之甚，我亦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获得如此广大的群众。”

在开展国际统一战线方面，周恩来也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他指示南方局工作人员和《新华日报》记者，同外国记者与外交官联系，尽快地把江南惨案的消息告诉他们。外国记者根据中国共产党方面提供的真实情况，向各国发出报道。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首先于1月21日自香港向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发出了关于皖南事变的新闻稿，不久，另一名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也在《美亚》杂志等报刊上发表了有关国共两党危机的通讯。无论蒋介石如何封锁消息，钳制舆论，他们围歼新四军的真实消息仍迅速在国内外传播开来，使蒋介石集团遭到海内外人士的同声谴责。周恩来亲自到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寓所，向卡尔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英国政府收到驻华大使报告后，告诉蒋介石：内战只会加强日军的攻击。2月中旬，周恩来又会见美国总统罗斯福代表居里，揭露皖南事变真相。居里向蒋介石声明：美国在国共纠纷未解决前，无法大量援华，中美间的经济、财政等各问题不可能有何进展。周恩来还向苏联驻华大使馆武官崔可夫转达中

共中央关于清苏联停止对国民党政府的军事接济的意见，崔即以驻华武官的身份先后拜会剿灭新四军命令的签署者、国民党军队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与白崇禧，当面谴责国民党军队在大敌当前，正在进行反侵略战争的时候，竟蓄意进攻抗日的新四军，屠杀自己的士兵和军官，真是咄咄怪事，表示要将这一情况向苏联政府报告，以此向蒋介石暗示，“他对共产党军队采取的敌对行动，并非没有引起苏联方面的注意”。由于苏、美、英等国对蒋介石集团施加了压力，遂迫使其反共和分裂的行径不得不有所收敛。

蒋介石集团原想以反共来停止日本的进攻或换取与日妥协。实现日蒋联合剿共。但是，在其发动皖南事变后，却引来了日本对河南的人举进攻。原来，日本帝国主义急于同希特勒德国遥相呼应，扩大法西斯侵略战争，加快实行“南进”，因而决定“不依赖国共纠纷，而是依靠自己力量解决中同事件”。再说，日本人也不愿意八路军、新四军进入华北，因为华北是其根据地，蒋介石驱逐共产党军队去华北，破坏日本利益。于是日本调集五个师团的兵力，在1月26日发动豫南战役，将国民党军队15万人包围于平汉路以东。这就给蒋介石集团泼了一瓢冷水，使之不得不撤回剿共大军而抵御日军进攻。蒋介石集团的剿共计划被打破了，也只好被迫同共产党谋求某种妥协。

为了争取主动，打破僵局，周恩来在政治攻势产生巨大影响的情况下，又给蒋介石集团一个台阶，提出了解决皖南事变的12条临时办法，包括：立即停止企图向我军进攻；立即停止全国的政治压迫，承认中共及各党派之合法地位；承认陕甘宁边区之合法地位；承认敌后之民主政权；释放叶挺，回任军职；成立各党派联合委员会。经过一番斗争，蒋介石理亏词穷，不得不于3月14日约见周恩来，作出缓和国共两党气氛的姿态。至此，国民党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被打退了。

这一次反共高潮，如果从它的酝酿算起，前后经历了将近半年的时间。这是充满着惊涛骇浪的日子，国共两党的关系发展到破裂的边缘，问题的处理稍有不慎就可能导致极严重的后果。

周恩来在这些风云险恶的日子里，始终屹立在斗争的第一线，并参与着中共中央的各项重大决策，多方面地展现了他的品格和才能。他置身于龙潭虎穴之中，全然置个人安危于度外，大义凛然，光明磊落，从容沉着，机智灵活地处理着各种复杂事态，以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巧妙而又恰到好处地击退国民党一次又一次的进攻，赢得了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群众、包括中间阶层的同情和信任，极富韧性地维系了国共合作的民族统一战线免遭破裂。

针锋相对争取主动——住助毛泽东参加重庆谈判

1945年8月15日，曾经穷凶极恶、不可一势的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这样，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八年浴血奋战，终于赢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取得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反侵略战争的完全胜利。

此时，饱尝了八年战争苦难的全国人民渴望和平、民主、团结。但是，国民党却想独吞抗战胜利果实，继续维持一党独裁的法西斯统治。他们慑于舆论的压力，也为了争取时间准备内战，又不得不采取政治欺骗的手段、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国民党当时估计毛泽东不会去重庆，因而他们施放谈判烟幕，企图把破坏和平的责任，强加于共产党的头上。

毛泽东洞察国民党的阴谋，为了争取和平，并在争取和平的过程中，揭露国民党破坏和平、挑动内战的真面目，以利于团结教育广大人民，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决定于8月28日，在周恩来陪同下，飞往重庆同国民党谈判。

毛泽东的这一行动，震动了个中国。当时重庆山城的群众奔走相告，心花怒放，把毛泽东的来到，看作“民主中国的曙光”。

28日下午3时，接中共谈判代表团的飞机返回九龙坡机场。据《大公报》记者于冈当时报道：“第一个出现在飞机门口的是周恩来，他的在渝朋友们鼓起掌来。他还是穿那一套浅蓝的布制服。到毛泽东、赫尔利、张治中一齐出现的时候，掌声与欢笑声齐作，延安来了九个人。”

正当前来欢迎的各党各派代表彬彬有礼地向毛泽东走去时，那些年富力强的中外记者一拥而上，把毛泽东团团围住。有的递名片，有的报姓名，有的提问题，有的抢着同毛泽东握手。而各党各派代表被挡在人墙之外，无法同毛泽东接近。周恩来一看这种情形，立刻把一个纸包高举在空中，说：“新闻界的朋友们，”我从延安为你们带来了礼物，请到这儿来拿吧！”这句话一下子把大群记者吸引过来。周恩来看到毛泽东已经同各党派代表握手交谈，才微笑着打开纸包，向记者——分发“礼物”，原来是从延安带来的毛泽东的书面谈话。谈话中说：“现在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中国即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当前时机极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

当晚8时，蒋介石在林园官邸举行欢迎宴会，重庆谈判开始了。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周恩来住在红岩办事处。毛泽东除会客和处理谈判问题外，还继续领导全党和解放区的工作。具体谈判，由周恩来、王若飞同国民党的张群、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进行。

在整个重庆谈判的43天中，周恩来夜以继日地辛勤操劳，根据毛泽东的决策，充分发挥他的谈判才能与艺术，积极推动谈判取得进展。他既表现了坚定的原则性，又在不损害人民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对一些具体问题采取了灵活的策略。

在谈判中，双方争论的焦点是军队问题和解放区政权问题。国民党企图在“统一军令”和“统一政令”的借口下，根本取消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政权。周恩来代表共产党予以严正驳斥，拒绝了国民党的无理要求，但是为了使谈判能取得成果，也作出了重大让步。在军队问题上，共产党同意在未实现政治民主化之前，先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军队，并愿将所领导的军队，按照五比一或七比一的比例缩编为24个师或至少20个师，在解放区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在坚持国民党必须承认解放区民选政府的原则下，同意

退出广东、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不包括豫北）八个解放区，将部队撤到陇海路以北，以及苏北和皖北解放区。但是，蒋介石仍顽固拒绝，以致三个星期的谈判，无法达成协议。9月21日会谈后，周恩来、王若飞不得不中断同国民党代表的谈判。

为了促使谈判有所协议，周恩来协助毛泽东，于谈判工作以外，同各界代表人物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和交谈。他们会见了当时国民党进步人士宋庆龄、冯玉祥、柳亚子等。柳亚子见了毛泽东非常激动，即席赋诗，称毛泽东为“弥天大勇”，赞扬他的功劳好比“霖雨苍生”。周恩来还向各党派、国民党内的民主派和文化界、新闻界、产业界、妇女界等广泛解释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说明导致谈判陷入僵局的真相，宣传了共产党争取和平与民主的真诚愿望，扩大了革命统一战线，使谈判期间的政治形势向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

国民党方面已经看到，一味施加高压是无法使中国共产党屈服的；而这次谈判已为举世所瞩目，如果谈判破裂或无结果而散，他们向国内外都难以作出交代。于是，在谈判中断刚三天，他们就坐不住了，主动找周恩来要求重开谈判。

重开谈判后，进展比前一段就顺利了。

在军事问题上，共产党重申了前面提到的缩编数目后，国民党方面表示：全国整编计划正在进行，此次提出商谈的各项问题果能全盘解决，则中共领导的抗日军队缩编为20个师的数目可以考虑。至于驻地问题，可由中共方面提出方案，讨论决定。双方还商定组成三人小组具体解决军队整编问题。

在解放区问题上，中共所提要求遭到拒绝后，中共方面又提议：在解放区重新进行县级民选，选出县长与县参议会；凡一省或一行政区有过半数县已实行民选者，由县参议会选举省参议会，省参议会选举省长与委员，呈请中央加委。国民党方面仍不肯同意。27日周恩来又提出一个新方案：“暂维现状，即现在各省政府所能治理之地，由省府治理之，省府不能治理者，由解放区治理之。此一办法如只等尚不能同意，则最后之途径，只有交由政治会议解决。”对此，双方仍未达成协议。最后，中共方面表示同意继续商谈。

在国民大会问题上，双方没有达成协议，周恩来声明：“中共不愿因此项问题之争论而破裂团结”。双方同意将此项问题提交政治会议解决。

对政治会议问题，双方意见虽略有出入，但基本接近。双方同意在结束训政，实施宪政以前设政治会议，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各派及社会贤达推荐代表出席，协议和平建国方案与召开国民代表大会。

鉴于谈判已取得进展，周恩来在10月2日会谈即将结束时建议：把一个月来的谈话记录整理出来，其中总的方针、军事问题、政治会议问题等，或已双方同意，或彼此意见接近，择其能发表者发表之，以解人民之渴望。国民党代表表示同意。10月5日，周恩来将他起草的《会谈纪要》提交讨论。

这份《会谈纪要》写得很有特色：不仅把双方已一致同意的内容在文字上确定下来，并且对没有取得一致的问题也分别说明双方各自的看法，在解放区地方政府问题上还说明了中共方面先后提出的四种解决方案和双方目前的争执所在，表明了继续商谈的愿望，双方就《会谈纪要》又进行了两次讨论，并作了修改。但对《会谈纪要》在什么时候发表，又发生争议。这时，进犯晋东南上党解放区的阎锡山部国民党军被解放区军民击败。毛泽东又提出要返回延安。这样，在10月7日以后，国民党的态度又不得不缓和了下来。

10月10日下午，《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终于在曾家岩桂园客厅内签字。当场签字的有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和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签字后，请正在桂园二楼的毛泽东下楼，和在场者一一握手。12日，《会谈纪要》由国共双方加以公布。

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献，经过艰难曲折的斗争，特别是经过周恩来的不懈努力，终于产生了。

这个文献的意义何在？毛泽东10月11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这个东西，第一个好处是采取平等的方式，双方正式签订协定，这是历史上未有过的。第二，有成议的六条，都是有益于人民的。”周恩来在第二年也说过：“我们并不因为蒋破坏了这些协定，就以为没有了收获。因为全中国人民都承认了这样的事实。认为中共的地位是不容抹杀的。国民党虽背叛了协议，但他还不敢放弃党派协商。”重庆谈判所达成的协议，也有力地推动了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

政治协商互谅互让——1946年1月出席政治协商会议

重庆谈判时，国共双方曾商定于1945年11月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然而，蒋介石未及《双十协定》的墨迹干净，就迫不急待地撕毁了它，在重庆谈判后继续调遣大批军队向华北、东北进兵，进犯解放区，挑起内战，致使政治协商会议根本没有条件召开。

及至1945年底，由于解放区军民坚决击退了国民党的军事进犯，取得了自卫战争的重大胜利；又由于国统区广大人民反内战、争民主、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运动走向高潮，这就使蒋介石在军事上处于不利，在政治上陷于异常孤立。与此同时，国际上也出现反对中国内战的强大舆论：12月1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表示赞成中国“召开全国主要政党代表会议，以谋早日解决目前的内争”；12月27日，莫斯科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发表公报，也指出“国民政府各级机构中民主党派之广泛参与以及内部冲突之停止，均属必要”。

中国共产党适应形势的发展，12月16日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出席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团到达重庆，并提出立即无条件停止内战，用政治协商办法解决国内一切问题的三项提议，受到国内外各方面的重视。

在这样的形势下，蒋介石不得不接受停战谈判，于1946年1月10日签订停战协定，颁布了停战令，并于当天上午在重庆正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出席会议的代表国民党8人，共产党7人，民主同盟9人，青年党5人，无党派社会贤达9人，共计38人。他们实际上代表了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左、中、右三种力量。

蒋介石在开幕辞中宣布了包括各政党有合法地位在内的四项诺言。周恩来在开幕式上致词。他说：这样的政治协商会议，在中国的政治历史上还是创举。政治协商会议，就是要请各党代表及社会贤达一起来订出如何实现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作的方案。要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之上，实现各党派、无党派代表人士合作的举国一致的政府。于此，人民权利和党派合作更是目前急迫待决的问题。中共代表团愿以极大的诚恳和容忍，与各党代表及社会贤达共商国事，努力合作。

怎样才能开好这次会议呢？周恩来在12日的会议上回顾国共会谈经过，总结了四条值得今后重视的经验教训：“第一点，要互相承认，不要互相敌视”；“第二点，要互相商量，不要独断”；“第三点，互相让步，不要独霸”；“第四点，要互相竞赛，不要互相抵消”。周恩来语重心长、入情入理地对这四条进行了具体的阐释。接着他以加重的语气说道：“以上四点，是从九年来双方商谈中得来的痛苦经验与教训。虽似泛论，但很希望各位先生和全国人民了解。这是一种由衷之言，我们诚恳希望在这次政治协商会议上，能够认识到这方面。”

从14日起，大会依照改组政府、施政纲领、军事问题、国民大会问题和宪法草案问题进行讨论。

讨论改组政府和施政纲领时，董必武系统地阐明包括和平建国、结束训政、制定宪法等在内的十项主张。周恩来在发言中，谈到保障人民基本自由权利问题时说：“蒋主席在本会宣布的四项主张，我们非常拥护，全国人民迫切希望全部实现。有些事情当然要有步骤，但放人这件事立即可做。”他特别提到要立即释放张学良、杨虎城，指出九年前的西安事变“为民族产生

了惊天动地的团结抗战。若没有他俩人的赞成，也不会有民族复兴节那天的欢欣。”“要是张、杨两先生释放了，西北与东北父老乃至全国人民，谁不欢欣？何必不做？给人民自由，只有对国家有好处、望政府当即立断。”经过同国民党多次交涉，并以中共释放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为条件，1月22日廖承志获释，周恩来前往迎接。3月4日，失去自由长达五年的叶挺也被释放，他在第二天就致电中共中央要求入党，中共中央立即批准了他的要求。

讨论军事问题时，周恩来提出了12条建议。他说：政治民主化与军队国家化要同时实行，不能认为先有军队国家化，然后才能政治民主化。“军队是从人民来的，只有军队能真正保护人民利益，才能保护国家，才能保护民族。”他表示：同意成立一个委员会，执行整编全国军队的任务；同意全国整编与大量裁兵的原则，凡是抗日有功的军队，应该一面承认，一面整编；要改革军队的制度与教育；地方治安应由地方的保安队或自卫队负责维持。

讨论国民大会问题时，邓颖超报告了中共的基本主张：“（甲）改组后的国民政府应负责协同政治协商会议商定中国民主宪法草案及国民大会选举法、组织法，并立即根据新的选举法，进行选举。（乙）确定在本年内召开有各党派参加的自由的普选的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并依据宪法成立正式的民主联合的国民政府。”周恩来在第二天的发言中指出了国大旧代表的不合法性，我们当然不能承认，他又说“但如果一切问题都已解决了，只剩下这个问题未得解决，是否为了这一个问题我们就要与政府党分裂呢？当然不能。”“又不承认旧代表，又不要分裂，那么这不是很困难么？当然是困难的。既是难题，就要找出路，就要在许多问题上找政治民主化的出路。”“如果在苦干别的问题上都有好的民主的出路，那末，对于这一件违背民主的事情，人民或者还能谅解。”当时民盟的代表在这个问题上坚持不肯让步，周恩来又劝他们不要为着这个问题，而把当前为和平、民主和统一而召开的协商会议弄破裂了。

讨论宪法问题时，吴玉章代表中共说明了对宪法原则的看法，着重提出了保障人民权利、中央与地方权限、地方制度和确定国策。

这五个问题，经过大会广泛交换意见后，交付小组讨论。尽管各方的意见很不一致，曾引起激烈的争论，但经过10多天分组研讨，终于先后在不同程度上获得了协议。1月27日，周恩来从重庆飞回延安。在当天参加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他介绍说，这次到重庆有三件事：停战、开政协会议、解决东北问题。停战已做到，政协会议已开得差不多，只有东北问题还没有谈起，书记处会议认为：我们从抗战结束就是和平方针，但前一段的自卫斗争是完全必要的；代表团取得的成绩很大，方针都是正确的。28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汇报了政治协商会议的情况。中央同意代表团商定的政协会议文件，委托代表团在文件上签字。

为了赶回重庆出席31日举行的政协闭幕会议，周恩来于29日启程返渝。由于途中气候恶劣，飞机只得在西安降落，滞留了一夜。30日上午，他们再次登上飞机。同机的除工作人员外，还有叶挺的女儿杨眉。当飞机经过秦岭上空时，突然遇到一般强大的冷气团，使机身蒙上一层厚厚的冰甲，飞机沉甸甸地向下坠落。就是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出现了那段脍炙人口而感人肺腑的周恩来让伞给小杨眉的动人故事。

也非常庆幸，正是在这十万危急的时刻，飞机冲出了冷气团，沉重的冰

甲溶化了，人们脱险了！飞机折回西安。下午，再次起飞，飞抵山城，周恩来按时参加了 31 日的政协闭幕会。

这天晚间举行的政治协商会议第十次大会，根据各分组委员会的报告，全体一致通过政府组织案、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案、国民大会案和宪法草案五项决议。接着举行大会闭幕式。

周恩来在闭幕式上致词。他对这次政协会议的成功作了很高的评价：“政治协商会议今天通过的各项协议，证明了这次会议得到很大的成功。”“这些问题的解决，是为中国政治开辟了一条民主建设的康庄大道。而这种解决的方式，也是替民主政治树立了楷模。”他坦率他说：“虽然这些问题的协议和中共历来的主张还有一些距离，虽然各方面的见解和认识也有一些距离，但是我们愿意承认，这些协议是好的，是由于各方面在互让互谅的精神之下得到的一致结果。我们中国共产党愿意拥护这些协议，并保证为这些协议的全部实现，不分地区、不分党派地努力奋斗。”

显而易见，正是周恩来总结的四条经验，实际指导了这次政治协商会议的进程，推动了会议取得协议。

尊重知识爱惜人才——筹备和主持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

革命需要知识分子，建设尤其需要知识分子——作为新中国经济建设的直接领导者、政府总理——周恩来对这两句话的认识最为深刻。

新中国成立伊始，周恩来就强调指出，我们国家的方向和目标是要“建设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要把中国由一个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似是，“人才缺乏，已成为我们各项建设中的一个最出难的问题。”“只要我们的工作开展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就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从1952年7月开始，周恩来以很大的精力参加研究和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一搞五年计划，他更加感到建设人才的缺乏。周恩来告诫全党，“我们现在所进行的各项建设，正在愈来愈多地需要知识分子的参加”，“必须依靠知识分子的积极带动”。而在这一时期，广大知识分子通过积极参与各项政治运动的实际锻炼和政治理论的学习，他们的政治面貌“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们从新中国建设事业的迅猛发展中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光明前途，产生了强烈的为把贫穷落后的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服务的内在动力。在这种情况下，怎样最充分地发挥知识分子在国家建设中的作用，就成为十分重要而紧迫的问题。

然而，不幸的是这时中共党内仍严重存在着不尊重知识分子的“左”的宗派主义倾向。主要表现在对知识分子估计不足、信任不够、安排不妥、使用不当、待遇不公，帮助不够，甚或有些人对知识分子还抱有一种盲目的排斥和嫉妒心理，把他们当作异己分子，利用种种机会加以压制和打击。面对这种情况，1955年初，周恩来就设想召开一次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以便纠正党内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而调动和激发知识分子投身建设事业的积极性。

11月22日，周恩来郑重地向刚从外地回到北京的毛泽东汇报了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情况，陈述了自己的设想与意见。次日，毛泽东召集中央书记处全体成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和中央有关方面负责人会议，进行商讨。会议决定应不失时机地在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即将到来的这一历史转变关头作出果断的战略抉择——在1956年1月召开一次大型会议，全面解决知识分子问题；同时决定成立由周恩来负总责的有彭真、陈毅、李维汉、徐冰、张际春、安子文、周扬、胡乔木、钱俊瑞参加的中共中央研究知识分子问题10人领导小组，下设强有力的办公室进行会议的筹备工作。

筹备工作一开始，周恩来首先抓了全面调查知识分子情况的工作。他邀请了中国科学院、北京地区部分大学等具有代表性的一些单位的有关人员座谈，进行调查研究，并详细研究了北京地区26所大学中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各方面情况。同时，他指导10人领导小组对统战部、北京市已经上送的调查材料加以分类、整理和分析研究，并写出解决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较差、社会活动与兼职过多、待遇偏低与发展党员问题等11个专题报告。为了开好会议，他还要求务地在12月下半月先召开一次同类会议，以便广泛收集材料，研究问题。

在充分而周密的调查研究基础上，周恩来主持讨论并初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草案）》下发征求意见后，他在12月17日，19日又两次约胡乔木商谈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的起草问题，就起草报告的指导思想、结构、基本内容和重点提出了系统的意见。

1956年1月6日，周恩来召集中央10人领导小组会议讨论修改报告稿。在讨论的基础上，他一遍又一遍、一丝不苟地，逐段、逐句、逐字地对稿子进行推敲和修改，并增写了一些重要的思想理论观点。修改一直持续到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召开这天凌晨。

1956年1月14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出席会议的有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27个省辖市市委书记或副书记，以及这些省、市、自治区党委所属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的负责人；全国重要高等院校、科研机构、设计院、厂矿、医院、文艺团体和军事机关党组织的负责人共1279人。真是规模宏大，济济一堂。这天的会议主席刘少奇宣布大会正式开幕后，周恩来即代表中共中央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他在报告中第一次把知识分子问题、发展科学技术问题作为全党上下都要关注的一项基本工作郑重地提到了全党面前，并围绕这两个问题进行了阐释和论证。

周恩来以雄辩的事实阐明了“我国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六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明确而郑重地宣布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认识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周恩来强调要坚决摒弃对知识分子的“左”的宗派主义倾向，消除让他们学非所用和闲得发慌的“浪费国家最宝贵的财产”的现象，并提出了“最充分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力量”的三项措施：第一，应该改善对于他们的使用和安排，使他们能够发挥他们对于国家有益的专长；第二，应该对他们有充分的了解，给他们以应得的信任和支持，第三，应该给他们以必要的工作条件和适当的待遇，其中包括改善生活待遇和政治待遇，确定和修改升级制度，拟定关于学位、学衔、发明创造和优秀著作奖励等制度。在这些措施中，周恩来尤其重视对知识分子的信任和支持。而“信任的中心问题，就是我们尊重这些知识分子。”所谓尊重，“是要尊重他们那个知识”，“尤其是向他们学习”，使他们能够心情舒畅地运用其知识，哪怕是一技之长。

在报告快要结束的时候，周恩来满怀信心他说：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坚定地依靠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事业中所形成的这个联盟，“我们一定可以在不很长的时间内，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完全现代化的、富强的社会主义工业大国，一定可以在不很长的时间内，实现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号召——‘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他这铿锵有力、掷地有声且极富鼓动性的结束语，赢得了与会者经久不息的雷鸣般的掌声。

周恩来在《报告》中所阐述的知识分子政策和科学技术政策，是对会议的重要贡献，与会代表经过热烈地讨论，一致同意他的报告，普遍认识到知识分子将在迅速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中发挥愈来愈重要的作用，应努力按周恩来《报告》中的要求来落实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在1月20日的闭幕会上，毛泽东称赞“这个会议开得很好”。

这次会议，作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召开的解决知识分子问题和发展科学技术问题的一次历史性会议载入了史册。但在周恩来看来，会议的圆满结束，并不意味着这方面问题的真正或全部解决，只是表明问题的解决有了一个好开端。这次会议以后，他继续以很大的精力，开始了贯彻执行会议精神的韧性战斗。首先，他抓了有关具体贯彻执行会议精神的指示、决定等文件与

材料的修改定稿、下发实施和检查落实工作。其次，他抓了制定科学技术发展的远景规划。于是，一个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风气蔚然形成，“向现代科学进军”的高潮迅速掀起。

再次出现不幸的是，由于受旧意识惯性和当时国际风波的影响，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判断，在党内未能获得稳定而持久的支持，党的八大以后对知识分子的估计又发生逆转，1957年起对待知识分子问题和学术问题的“左”的错误更随之蔓延开来。此后，周恩来又不得不下大力气再次纠正对知识分子的“左”的错误，于是有了1962年在广州召开的科技工作会议上，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从而在一定时间内和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在知识分子政策上的“左”倾错误。

由于周恩来一直理解，信任和支持知识分子，即使在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发生某些偏差后，他又能继续采取某些实际措施来维护和坚持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加之我国知识分子通情达理、艰辛努力，从而才大大缩小了我国科学技术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促进了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文化事业的繁荣。

借重“酌处”开列名单——“文化大革命”中对爱国民主人士的保护

1966年下半年起，“文化大革命”的狂潮在中国大地上汹涌翻滚，林彪、江青这两个反革命集团系于同一战车，出于同样的罪恶目的，煽起了一股打、砸、抢、揪、斗、抄、抓的妖风巨浪，不仅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陷于困境，而且众多党外爱国民主人士也被卷进这场灾难的旋涡。

8月29日夜，大约30名北京大学的红卫兵查抄了若名民主人士，原人大常委、政协常委章士钊的住宅，开始了所谓的“革命行动”。

30日清晨，章士钊在红卫兵离去后，写信给毛泽东，汇报了红卫兵抄家时的蛮横行动，请求毛泽东在“可能范围内稍稍转圆一下，当有解铃之望”。当天，毛泽东收到了这封信，阅后立即在信上作了重要指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

还是在同一天，章士钊的信和毛泽东的批示就送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手中，周恩来看后，严厉地批评了有关人员，并当即部署了对章士钊采取的三条保护性措施：一、把抄走的东西全部送还给章士钊；二、派两名警卫部队的解放军到章士钊家，负责保卫工作，阻止红卫兵再来抄家；三、要秘密地将章士钊送到解放军301医院，以保人身安全。

在布置这些任务的同时，周恩来已经想到了大批与章士钊处境相同的党内外干部和朋友，他们同样需要刻不容缓地采取相应措施加以保护。

8月30日，周恩来亲自动笔开列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保护的人员包括：

宋庆龄 郭沫若 章士钊 程潜 何香凝 傅作义 张治中
邵力子 蒋光鼐 蔡廷锴 沙千里 张奚若

(1) 副委员长、人大常委、副主席（按：指人大副委员长；国副主席）

(2) 部长、副部长

(3) 政副（按：指全国政协副主席）

(4) 国副（按：指国务院副总理）

(5) 各民主党派负责人

(6) 两高（按：指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李宗仁）

从这份保护的名单上看，包括了13位高级民主人士和大批高级领导干部。

围绕对这些人的保护工作，周恩来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胸怀和勇气，怀着对朋友和同志的深厚情谊，与林彪、江青一伙展开了一场特殊的搏斗。

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周恩来就密切关注着局势的发展，并着手进行对这批民主人士的保护工作。

当时，正是酷暑时节，张治中等几位老先生正在北戴河避暑疗养。周恩来马上派中央统战部的一位负责人赶到那里。向几位老先生通报情况，对被保护人实行多种行之有效的保护措施。周恩来考虑，这些人大都年事已高，体弱多病，且性格倔强，不肯低头受辱，若呆在家中目标太大，不好保护。万一照顾不到，就会发生意外，从而给党带来恶劣的影响，严重伤害这些党外朋友的感情。因此，周恩来委派可靠同志去做思想工作，说服、动员他们服从总理的安排。

9月1日，周恩来特地给解放军301医院下达命令，要他们准备接收一

批特殊“病人”。总理办公室的同志到被保护人家中接人时，遵照周恩来指示，不告诉家属到什么地方去，只允许一名秘书随同前往照顾，还嘱咐被保护人要用假姓名，周恩来还再三叮咛要秘密护送。到医院后，由部队负责警卫工作，安排医护人员特别照顾他们的饮食起居。

张治中先生的亲属回忆了这段历史：张治中先生从北戴河返回北京的当天，红卫兵就来到了家中，当时只是观察了一下，没有立即动手抄家。周恩来知道后对当时的总参谋长说：“张治中将军是我们党难得的朋友，你要绝对保证他的安全”。总长从北京卫戍区调了一个排驻守在张家周围。红卫兵来了几次，都被警卫战士挡了回去。就这样，林彪、江青一伙仍不肯放过，形势越来越吃紧。周恩来挺身而出，在红卫兵集会上说：“张治中是我们党的朋友，他曾三到延安。重庆谈判时亲自接送毛主席，保证了毛主席的安全。”随后，指示周荣鑫将张治中护送到301医院加以保护，并常常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前去看望。张治中看到国家这个样子，非常忧虑，几次向总理吐露肺腑之言，周恩来总是安慰他：“这种日子不会长久的。”

章士钊、程潜、傅作义、蔡廷锴、李宗仁都是用这种办法保护起来的。对郭沫若是将他护送到外地，直至形势有所好转才将他接回北京。

对思想不通或因其它原因不能离家的人，周恩来则变换方式加以保护。他派解放军战士和公安人员身穿便服，臂缠红卫兵袖章，到被保护人家中阻止前来抄家的红卫兵，同时让当地派出所和所在机关联系，请他们予以大力配合。邵力子、蒋光鼐、沙千里等人都受到了这种措施的保护。

周恩来还特别关照了对宋庆龄的保护工作。建国以后，宋庆龄大部分时间住在上海。只是每年回北京参加国庆活动。周恩来考虑到上海是林彪、江青一伙进行动乱活动的据点，形势更加混乱、因此，一再恳请宋庆龄来北京居住，宋到北京后，为了确保她的安全，总理特别指示杨德中主管宋宅的各项工作，在部队执行警卫任务的同时，由公安部、市公安局、当地派出所三方面协同警卫。周恩来还亲自找红卫兵谈话，做说服教育工作。9月1日，他对首都红卫兵发表讲话，强调要尊重担任国家副主席要职的宋庆龄，并态度坚决他说：“她的房子是国家拨给她住的。有人说‘我敢说敢闯，就要去’。这是不对的，我们无论如何要劝阻。”就这样，几经周折，终于平息了上海、北京两地红卫兵冲击宋庆龄住宅的风波。

在周恩来尽心竭力地关怀和保护下，名单上的13位高级民主人士都安全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

受到周恩来保护的不仅仅是名单上的人，许多著名的民主人士同样感受到了他的关怀。

前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副主席钱昌照曾回忆说，在他家。所在的居委会范围内，还有蔡廷锴、熊克武、李书诚（中共一大就在李家召开）三家。1968年底的一天，公安局的同志对钱老讲：“总理交代我们，这四家人不允许红卫兵闯进去。白天我们还好办，每天晚上就特别担心，只好扮成便衣整夜巡逻。”这时，他们才明白为什么红卫兵始终未冲进过他们这四家。

在那动乱的岁月中，发生的一桩桩、一件件怪事，使得这些饱经风霜的老人们心惊胆战，他们中的一些人终日不语，积郁成疾终为不治，怀着不解和痛苦的心情离别了人世。周恩来将这一切看在眼里，挂在心上。因此，他的工作不但没有停留在安全保上，而且在多方面关怀他们，邀请他们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在政上给予信任，对于下落不明的人士多方打听，加以营救。

他直病危躺在床上时，还在询问：“朱学范哪儿去了？”当他得知朱在京秦城监狱关押7年，又被强制送到武汉郊区农村劳动的情况后非常愤怒，指示身边的同志：“赶紧把朱学范请回来！”这样，朱学才回到了北京。对于那些患病的老先生他安排组织力量治疗和抢救；这些人去世后，又妥善安排后事，对亲属关怀备至。党的温暖总是通过周恩来送到这些人家中。

诸如此类的事例真是举不胜举。

在“文化大革命”那段人妖颠倒、黑白混淆的岁月里，正是周恩来竭尽全力保护了一大批民主人士，才使这些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理解和谅解了我们党所出现的过失，同共产党和衷共济，初衷不变。

抓住根本把握关键——争取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

坚持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是统一战线理论和实践中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作为长期领导统一战线工作的周恩来，在这方面有着系统而深刻的思想理论贡献。

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内认识无产阶级领导权重要性较早的领导人之一。他的领导权思想随着革命实践的发展，逐步深化和成熟。

早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酝酿与建立时期，周恩来就强调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的原则立场。为推进中国革命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在初创时期就主张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阵线。1922年8月，党的西湖会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作出了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的决定。当时，领导旅欧党团组织的周恩来立即行动起来，协助国民党代表筹组国民党旅欧支部。党的三大后，关于实行国共合作，共产国际的决议正确指出，合作是必要的，但不应与国民党合并，也不应隐藏自己特殊的旗帜。这实质是指导中国共产党要保持无产阶级的独立性，坚持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和要求。周恩来领导旅欧党团在建立统一战线的过程中，坚持不渝地贯彻了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强调共产主义者参加国民党，既要遵循共同纲领，又要坚持无产阶级的原则立场，不能“抛弃共产主义”，不能忘了“国民革命后还有无产阶级向有产阶级的‘阶级革命’的事实存在”。说明从统一战线形成的最初阶段，周恩来就自觉地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原则，虽然当时还没有提出这个概念。而独立自主的思想同领导权思想是紧密相关的，其中已经孕育着领导权思想的重要因素。

在第一次大革命的洪流中，周恩来明确提出了领导权的思想。1924年1月，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国民革命开始高涨。2月，周恩来在《革命救国论》一文，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力量，认为工人阶级“终将为国民革命中一派最可靠的主力”。

1924年7月，周恩来奉党的指示离开欧洲回国，9月初返抵广州，投身到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的洪流之中。次年，他在省港大罢工的斗争实践中，明确提出了“工人是国民革命的领袖”这一光辉思想，号召无产阶级“要领导农人兵士而为工农兵的大联合，共同来打倒帝国主义。”1926年10月，他进一步强调：“只有无产阶级是最不妥协的革命阶级。要靠他携同农民、手工业工人督促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不妥协地与敌人争斗，才能达到国民革命的真正目的——民族解放和民主政治的实现。”显而易见，周恩来的这些论述较之党的四大决议案关于无产阶级“有力参加”、“并取得领导地位”是更加深刻了，置工人阶级于“领袖”地位，使得领导权思想更加明确。这充分表明周恩来为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理论的形成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抗日战争爆发后，经共产党的多方努力，国共两党再度合作，中国历史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时期。在这一时期，周恩来入虎穴，进龙潭，激流勇进于各种复杂的矛盾漩涡之中，始终战斗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沿阵地，积累了丰富的统一战线领导工作经验，他的领导权思想也进一步升华。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夜，他在党的七大上就统一战线问题的专题发言，全面总结了自第一次国共合作以来统一战线工作的经验教训，突出强调了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问题。他指出：“领导权的问题是统一战线中最集中

的一个问题。”

为什么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呢？周恩来分析了无产阶级的性质和特殊的优点指出，这是因为“无产阶级的觉悟高，本事大”；“无产阶级比别的阶级先进，是应当领导别的阶级的”；“无产阶级在这个队伍里是带队的”。但是，“无产阶级也不是天然的司令官，不是从农民一直到大资产阶级都公推你、公认你为司令官”。这样，就遇到了怎样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周恩来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领导权要用力量来争”。这个论断的实践依据是有入和无产阶级争领导权，“不但大资产阶级争，自由资产阶级争，小资产阶级也争”。他特别强调，“和我们争领导权最主要的力量，还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这个统治集团。”那么，采取什么方法争夺领导权呢？周恩来指出，我们同国民党的方法不同，“国民党是采取压迫的方法，不但压迫工农，也压迫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我们的方法是同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合作。”当然，对和我们争夺领导权的阶级、集团还有斗争的一面，即又团结又斗争。

争得了领导权，能不能充分发挥实际领导作用呢？周恩来认为，无产阶级不但应该争得领导权，而且能够很好地发挥领导作用。他分析说，我们同农民的关系搞得很好，和小资产阶级的关系也很好。至于对自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方法有所不同，就像和友军的关系一样。问题在于自由资产阶级并不那样听话，常常闹独立性。所以，对他们的领导，只能是主要问题上的领导，而不可能是完全的领导。同时，他还分析了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时的或者一个问题上的领导也是可能的，一般他说，当他们力量小的时候是可以受我们的领导的。

为了进一步阐明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领导权的重要性，周恩来还对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这个问题上的教训进行了总结。他指出，党在历史上几个时期的成功，都是因为执行了毛泽东同志关于领导权问题的思想和路线。而“左”右倾机会主义在领导权问题上翻的跟头最厉害。周恩来形象地比喻说：“右的是放弃领导权，‘左’的是把自己孤立起来，成了‘无兵司令’、‘空军司令’。可以说右倾是把整个队伍送出去，‘左’倾是把整个队伍推出去。”这就告诫全党，在统一战线中不但要坚持和争得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而且还要保持清醒的头脑，经常提防和排除来自自身“左”右倾错误的干扰而丧失领导权。

从正反两方面总结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极端重要性，标志着周恩来关于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思想随着统一战线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到抗日战争时期达到成熟。

周恩来的领导权思想内容十分丰富，他不仅阐明了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极端重要性，而且对实现领导权的原则、条件及其方法，都有充分的论述和阐发，从而构成了他的领导权思想的严密体系。

先后有序高低有别——处理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

1924年即第一次国共合作初期，旅欧学生中的国家主义派机关刊物《先声报》第三十二、三十四、三十六期，先后登载了胡瑞图、吴樵甫、威重三人攻击我党统一战线政策，反对中国共产主义者加入国民党的文章。对此，周恩来作为中共旅欧总支部书记和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旅欧组织的实际领导者，为了回击国家主义派对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诬蔑，撰写了《再论中国共产主义者之加入国民党问题》，发表在1924年6月1日出版的《赤光》第九期上。

周恩来在文中对诬蔑、挑衅者进行了观点鲜明，笔锋犀利的批驳。针对胡瑞图、吴樵甫、威重三人共同反对的所谓：“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奋斗，而他们同时又保持着他那不明不白半共产主义者的丑态，便未免过于滑稽”。周恩来严正指出：“共产主义者为做他共产主义所能解释，亦正三民主义所解释的国民革命工作而加入国民党，滑稽何谓？共产主义者是兼信合于共产运动在中国的第一步革命工作的三民主义，有何不明不白，有何‘半’字可加？瑞图君真是‘甘心盲目’、‘发昏’、‘骂人’！你还是主张‘全民革命’的人，试问‘全民革命’能离开无产阶级么？因为觉悟成的无产阶级革命分子，必然要信仰共产主义，便拒绝他们加入‘全民革命’队中，则你只有专找那必然要信资本主义而口中讳言资本主义的有产阶级为伍了。”

针对威重所攻击：“共产主义的主张明明是‘阶级革命’，明明是‘打破私有制’，明明是‘无产阶级专政’，怎么周君是共产主义者，也主张‘国民革命’呢”？周恩来予以严正的驳斥指出：“不错，我们共产主义者是主张，‘阶级革命’的，是认定国民革命后还有无产阶级向有产阶级的‘阶级革命’的事实存在。但我们现在做的国民革命却是三民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合作，以推翻当权的封建阶级的‘阶级革命’，这何以而说到‘国民革命’是‘阶级妥协’？且非如此，共产主义革命不能发生，‘打破私有制度’‘无产阶级专政’自也不能发生。不走到第一步，何能走到第二步。虽说走到第一步，无产阶级尚未能得到真正生路。”

这样，周恩来就阐明了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实现共产主义这个远大目标，这个坚定的信念是不应当也不会动摇的。

1926年底，面对国民党右派加紧反革命活动并掀起了一股反对国共合作的逆流，在中共内部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被这股反动潮流所吓倒，对国民党右派一再迁就退让，周恩来又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共分子必须加入国民党共同奋斗，“但这不是说中国共产党便失其独立性而不应再有何种独立主张。”他还引用马克思的话“共产党最鄙薄隐蔽自己的主义和政见”，强调“我们除宣传主义外，还时时有将政见宣布的必要。”

为推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完全实现，就同国民党的谈判方针问题，周恩来曾致电洛甫、毛泽东，提出“可以服从三民主义，但放弃共产主义信仰绝无谈判余地。”表示了他对共产主义信仰的原则性立场和坚定态度。

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初期，周恩来虽然一再申明共产党承认“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但是，他同时强调并不能把三民主义等同于共产主义。

为此，1939年8月4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中，周恩来专门以《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为题，阐明了在统一战线中应如何认识和处理

二者的关系。

周恩来指出：“共产主义是我们的信仰，三民主义是统一战线的政治纲领。”“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不仅在世界观、人生观、社会观及哲学方法论上有基本的不同，即在民族、民主及社会政策上也有许多差异。”报告在严格区分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汪精卫、戴季陶的三民主义之不同后，指出：“我们应该赞助真正了解和实行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的人去发展三民主义，同时也指出要将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差别分别清楚。就是说，共产党员既要在当前实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要想到将来的共产主义。在此，表明了共产党人在统一战线中最根本的原则立场与坚定不移的信念；我们组织和参加统一战线并非降低自己的要求，而是为实现共产主义所走出的第一步，反之，如果丧失了原则立场，动摇了这个根本信念，则统一战线就失去了任何实际意义。总之，我们应该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不能动摇，同时应脚踏实地地遵循三民主义发展统一战线。”

策略灵活方法具体——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

在长期领导统一战线工作的实践中，周恩来为统一战线工作者制定了一整套科学的工作方法。

当抗日战争进行了一年半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对国民党加紧诱降。于是，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严重分裂，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于1938年底公开投敌，代表英美利益的蒋介石集团对抗日亦发生动摇，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又把其政策的重点由对外转向对内，由积极抗日变为消极抗日。与此错误方针相适应，反共的军事摩擦此起彼伏，接二连三。

面对这严重形势，周恩来对摩擦事件总是给以及时的揭露，尤其是他从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相统一出发，从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着眼，于同年8月为党制定了《关于统一战线的策略、方法和守则（提纲）》。这个《提纲》简明扼要，但内容丰富。

策略共十条，集中讲了两层意思，就是党在当时要实现的目标。首先是要巩固统一战线。策略十条的第一条指出：“开展反对汪逆汉奸及其党羽的斗争，使国内阶级得到适当的分划，以巩固统一战线。”第二至第五条提出了为实现巩固统一战线要具体做的四份工作。诸如，帮助友党、友军进步；坚持我军在敌后游击战争的胜利与发展；坚持民主政治；坚持全民动员，等等。其次，是要扩大统一战线。策略十条第六条指出：“积极扶持同情分子，努力争取中间分子，尤其是知识分子及公正绅商参加抗战，以扩大统一战线。”第七至第十条提出要做的具体工作。诸如：坚决进行反顽固分子的斗争；对目前全国倒退的现象，必须给以严正的批评、适当的抗议与必要的压力，以促其进步；在国际上要联合各国朝野的同情人士，扩大国际影响，以集中火力反对国际法西斯及民主国家中的妥协派；正确地解释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实质与关系，宣传科学思想、民族解放思想、社会主义思想以及民族美德与优良传统，以反对复古的向后倒退的思想，等等。总之，策略十条其中心是围绕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而展开。固然，策略十条是针对国民党的反共摩擦提出来的，但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这个中心在统一战线的各个历史时期或阶段都是必须坚持的。

周恩来制定的统一战线的方法四条：在斗争上，要不失立场，但不争名位与形式；要坚持原则，但方法要机动灵活，以求达到成功；要争取时机，但不要操之过切，咄咄逼人。在组织上，要不暴露，不威胁，不刺激，以求实际的发展，但不要走向死路，也不要自投陷阱。在工作上，要使竞争互助让步相互为用，但竞争不应损人，克己互助不要舍己耘人，让步不能损害主力。在方式上，要讲手续，重实际，勤报告，重信义，守时间，以扩大影响，便利工作。上述方法不仅对粉碎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共摩擦，维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免遭破裂起到了直接的指导作用，而且对包括后来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都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可以看出，周恩来概括的十条策略和方法，是非常全面的，既体现了他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懈努力的高度党性，也反映了他无私无畏、鄙屑政治权术的高尚情操。在1939年3月7日的报告中，他曾说：所谓不失掉立场，不是要时时刻刻挂在嘴上，摆在脸上，身上挂红袖章，头顶上嵌共产党三个字。这反会使人讨厌，接近不了群众，影响不了友党。坚持原则要讲究方法。有人说共产党不择手段，我们反对这句话。只要不违背我们的原则，不违背

我们的目的，只要采用的方法能得到社会的同情，那么这种方法就可采取，这就不是不择手段。这里，周恩来讲的虽然是统一战线的方法，但却具有一般的方法论意义。他以通俗的语言把原则立场与策略方法的基本关系讲透彻了。

周恩来规定的统一战线守则六条是：坚定的立场；谦诚的态度；学习的精神；勤勉的工作；刻苦的生活；高度的警觉性。这既是他作为统一战线工作的直接领导者对所有参加这一工作的人员的规范要求，也是他终生身体力行的准则和座右铭，更是他献身革命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自我修养的信条。这些言简意赅的格言，凝聚了他的宏图大志。他在 1939 年 3 月 7 日的报告中说，我们的统一战线是长期的，不但现在打仗要它，将来建国还要它。我们不但要做党的领导者，还要做一个治国的人才。如果参加中国的治国，不懂科学，不懂中国的社会历史，那怎样治国呢？只是过去苏维埃的一套就不够了，我们要看到友党和广大群众，还要看到我们自己的许多弱点，这就要虚心学习。到处学习，既要向书本学习，还要在大众里学习。正是从“治国”的战略眼光出发，周恩来非常强调统一战线守则。《守则》不仅为统一战线工作人员，也为全党干部提供了加强党纪、增强党性的准绳。许多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的同志，正是按这个要求，使自己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中坚持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团结了朋友，锻炼了自己，孤立了顽固派，巩固和扩大了统一战线。

和平统一合作建设——倡导第三次国共合作

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基点，是以武力解放台湾来实现统一祖国的大业，这个决策基点在当时无疑是正确的，因为美国帝国主义在朝鲜战争前后始终坚持侵略台湾的政策，把协助国民党防卫台湾作为基本国策。

到了 50 年代中期，由于“吴国桢事件”、“孙立人事件”的发生，以及在美、日支持下，“独立运动”的发展，使美、台之间的矛盾有所发展，并日趋尖锐。正是从这个时候起，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政府总理、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对实现包括争取和平统一祖国和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付诸了很大的努力。

1956 年 1 月 30 日，他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中提出了“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而奋斗”的号召。他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宣布：“凡是愿意回到大陆省亲会友的，都可以回到大陆上来，凡是愿意回到大陆来参观和学习的，也都可以到大陆上来。凡是愿意走和平解放台湾道路的，不管任何人，也不管他们过去犯过多大罪过，中国人民都将宽大对待，不究既往。凡是在和平解放台湾这个行动中立了功的，中国人民都将按照立功大小给以应得的奖励。凡是通过和平途径投向祖国的，中国人民都将在工作上给以适当的安置”。

5 月 12 日，周恩来会见原国民党中央委员程恩远先生，在谈到国家对国民党人的希望时指出：“我们主张爱国一家，团结对外，以诚相见。过去，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曾经两度并肩作战，反对帝国主义。我们希望将来有第三次国共合作。”

6 月 28 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的报告》中，周恩来在精辟地分析国内外形势的基础上，进一步阐明了解放台湾的方式、具体步骤和对去台国民党军政人员的若干具体政策。他指出：“我国政府曾经再三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毫无疑问，如果台湾能够和平解放，那么，对于我们国家，对于我们全体中国人民，对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都将是最为有利的。”同时，他还表示：“我们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他适当的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谈判”。“为了团结一切爱国力量早日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我愿意在这里再一次宣布，我们对于一切爱国的人们，不论他们参加爱国行列的先后，也不论他们过去犯了多大罪过，都本着‘爱国一家’的原则，采取既往不咎的态度，欢迎他们为和平解放台湾建立功勋”。周恩来还表示，祖国的大门对于所有爱国分子都永远是敞开着的，任何一个中国人对于祖国统一的神圣事业都有权利和义务作出自己的贡献。

7 月 16 日，周恩来在接见原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记者曹聚仁时再次表达了对第三次国共合作的愿望。他说：“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过两次，第一次合作有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战的胜利，这都是事实。为什么不可以第三次合作呢？台湾是内政问题，爱国一家，为什么不可以来合作建设呢？我们对台湾，决不是招降，而是要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的。”

周恩来在代表中央人民政府提出通过第三次国共合作，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这一方针的同时，于 1956 年春和毛泽东共同制定，并通过有关渠道向台湾当局转达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具体办法：台湾必须回归祖国；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当地军政大权、人事安排悉委于蒋介石管理，对于陈诚、蒋经国等人亦悉听蒋意重用；台湾所有军政及经济建设一切费用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须条件成熟并尊重蒋介石的意见，和台湾各界代表协商决定后进行；国共双方要保证不做破坏对方之事，以利两党重新合作。

周恩来的这些讲话、谈话也确实起到了一定程度的作用。对周恩来的这一系列表示，蒋介石经过较长时间的考虑，于 1957 年初决定派原国民党候补委员、时任台湾立法委员的宋宜山作为私人代表到北京实际了解有关情况。宋宜山于 1957 年 4 月从香港经广州到北京，先与周恩来会晤后，再与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商谈具体问题。李维汉等人根据周恩来的意见，代表中国共产党方面向宋提出：国共两党通过对等谈判，实现和平统一；台湾为中国政府统辖下的自治区，实行高度自治；台湾地区的政府仍归蒋介石领导，共产党不派人前往干预，而国民党可以派人到北京参加对全国政务的领导；美国军事力量撤离台湾和台湾海峡，不容许外国干涉中国内政。5 月，宋宜山将他与周恩来、李维汉商谈的详细情况及其在大陆上的见闻与成一份 1.5 万字的报告呈送蒋介石。但是，又因蒋介石毫无诚意，终于使这个良好接触的开端未能继续下去。

在周恩来、李维汉等人与宋宜山进行试探性接触的同时，中共中央已经确定李维汉、屈武等人作为和谈代表，准备赴香港与国民党台湾当局进行和平谈判。似是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和平解放台湾的政策决心对抗到底，在 1957 年 10 月召开的国民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再次强调“反攻大陆，光复国土，消灭匪寇，完成革命大计”，完全拒绝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国共两党对等谈判，实现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致使海峡两岸继续处于对峙中。

可以看出，对于解决台湾问题早在 50 年代中期虽然还没有、也不可能明确提出“一国两制”这个概念，但这一构想的思想含义已经相当明确了，这就为党的十一届二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社会主义统一战线的政策，发扬这方面的优良传统，发展包括近 2000 万台湾同胞，500 多万香港同胞和 3000 多万海外侨胞在内的更加广泛的爱同统一战线奠定了思想基础。也为“一国两制”的构想奠定了思想基础。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坚持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

统一战线究竟是个战略问题还是策略问题，长期以来多被人们误解为策略问题，而且一切敌对势力总是以此来攻击党的统一战线方针，企图分化和破坏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其实，研究和学习周恩来的统战思想，就不难认识到统一战线是个战略问题。

还在建国前夕，周恩来在论述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时就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一个包含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一切爱国民主人士的统一战线组织。既然是这样一个组织，就不应该开一次会就结束，而应该长期存在。1957年，他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一文中论述了“我们党的寿命有多长，民主党派的寿命就有多长，一直要共存到将来社会的发展不需要政党的时候为止。”

1962年，他在《论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中又强调“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是无产阶级同非劳动者的联盟。坚持这种联盟是我们的战略方针和长期的历史任务，在我国统一战线中将长期起作用。”1963年元月，他在《春节祝词》中再次说明：“我们和各民主党派已经结下了不懈之缘，不仅现阶段需要长期共存，而且一直要共存到共产主义。”

周恩来不只是从理论上阐明统一战线存在的长期性，而且特别强调并要求全党要做统一战线工作。

50年代初，在中共中央统战部举行的茶话会上，周恩来发表讲话说：“毛泽东同志常说：做统战工作是少数派。这是幽默的说法，实际不是少数派，应该是多数派，应该全党来进行统战工作。”为此，他还要求：“组织部要训练党员，宣传部要教育党员，统战部要组织党员去做这个工作。青年团也要领导团员，妇女会也要领导妇女去做这个工作。各方面都要共同配合做好这个工作。”他尤其把“统战工作做得好”提到“是有党性”的高度来认识。同时，周恩来也批评那些认为做统战工作太麻烦的人，不愿同党外人士打交道的人，“是不对的”。他希望，“我们应该养成同党外人士经常接触的习惯”。因为这对于研究中国社会，吸取党外人士的好意见，改进工作，都是有益的。

周恩来的这些论述充分说明，我们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及其出发点并非为争一党之利而施行的权宜之计或策略，而是实实在在的战略问题，这就是统一战线的地位之所在。至于统一战线在其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的策略方针，那只是为长期共存到共产主义这个总战略、这个终极目标服务的，而不是相你的。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依靠人民联系群众——实现统一战线的根本途径

统一战线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点是什么？周恩来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总结自己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的实践，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对这个极端重要的问题作了马克思主义的回答。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是历史的主人。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决定了包括统一战线在内的我们党的一切活动都是为着人民的根本利益，包括统一战线在内的一切活动又必须紧紧地依靠人民。人民的支持和拥护，是革命胜利的力量源泉和根本保证。然而，当周恩来还是一位爱国青年的时候，已经产生了朦胧而朴素的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即“人民国家之主人也”，“共和国之统治权在国民全体”等论点。随着他世界观完全转到马克思主义，并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这方面的思想日臻成熟。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总结了包括统一战线在内的一切成功的根本经验是“全党依靠人民的力量得到的。”解放战争时期，他进一步指出：“因为中共为人民服务，二十六年如一日，一切依靠人民，才有今天的威信。”所以，他一贯要求全党同志“必须坚决站在保护人民利益的立场上”，“要向人民说真话”。“对人民，我们要如对孺子一样地为他们做牛的。要诚诚恳恳、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1943年，国民党趁共产国际解散之机，欲挑起第三次反共高潮，并在舆论上大肆造谣，说什么中国共产党失掉了靠山，叫嚣要取消共产党。为了制止这次反共高潮，周恩来予以严词驳斥，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失掉靠山了么？不错，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及其发展，是得到了共产国际不少的指导和帮助的，但是共产党的靠山却不是共产国际，而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是从中国劳动人民中生长起来的，它是存在在中国人民中间。”周恩来历来强调人心向背。抗日战争爆发不久，他在山西临汾一次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讲指出，“不怕战争失利，最怕战争失了人心！失掉民众，这是万劫不复的。”就是说，得人心，得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尽管在战争中一时失利，但最后仍然会取胜；失人心，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就要成为孤立主义者，空架子，即使战争中一时打胜仗，但最后仍逃脱不了失败的结局。无论是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还是后来的人民解放战争，都应验了周恩来的结论。

实践一再证明群众是我们事业成败的关键。因此，周恩来也总是要求做统战工作必须面向群众，联系群众，向群众学习。

抗日战争时期，战斗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共产党员，实际上普遍都在做统一战线工作，首先是争取群众的工作。周恩来要求他们做到“凡有群众的地方一定要进去工作。这种工作是以社会的、方式进行的。首先要解决的便是进入国民党、三青团、工人团体、学校中的合法组织、农村中的合作社以及一切重要行政机关中去工作，去实现党的抗战、民主、进步的方针。”他要求所有党员都成为隐蔽的、坚强得力的、与群众有联系并善于影响和推动群众的干部。这些干部应当广泛地结交朋友，面向群众，汲取群众的经验，不仅要教育群众，还要向群众学习。他具体地要求在国统区工作的同志：一、与群众接近和联系；二、倾听群众意见；三、向群众学习；四、教育群众，不做群众的尾巴。周恩来特别要求“‘领导群众和结交朋友，领导者自己要起模范作用。’”

可以看出，贯穿周恩来上述论述中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一切为了人民；为着人民的根本利益，还必须面向群众，联系群众，学习群众；争取人民心

向党，取得人民的支持和拥护。这既是他历史唯物论世界观的标志，也是他关于统一战线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之所在，换言之，坚持群众路线则是实现统一战线的根本途径。

互相尊重和睦相处——要与宗教界朋友长期合作

中国是一个多宗教的国家。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以及各少数民族宗教，都拥有自己的信仰者。1956年周恩来在一次谈话中曾说：“中国宗教徒有几千万，如果加上在家里信教而不到寺庙去的就更多，差不多有一亿了。”这说明宗教问题不是无足轻重的小事，能否正确对待宗教，是能否正确对待群众的问题，它关系到团结千百万信教群众共同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事。

建国初期，在周恩来的主持下，中国共产党和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有关宗教的方针政策，包括：确定宗教信仰一般地属于人民内部思想意识问题，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切实保障公民信教的自由权利，坚决摒弃用行政命令或其他强制手段消灭宗教的错误想法和作法；清除宗教内帝国主义和其他反动政治势力，支持天主教和基督教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反帝爱国行动，支持佛教、道教和伊斯兰教废除封建剥削制度等民主改革行动；等等。周恩来热情地赞同和支持宗教界的爱国民主的运动。

1950年5月，吴耀宗等基督教人士会同北京、天津基督教人士谒见周恩来，反映当时基督教面临的矛盾和困难。周恩来在百忙中约吴耀宗等人谈过三个整夜。在谈话中，基督教人士认为，中国基督教长期受帝国主义势力影响，这是它与新中国难以协调的症结所在。他们根据中国爱国教徒多年来提倡的自治、自养、自传的主张，决定发起“三自”革新运动。当即得到周恩来的支持。他说：“要把民族反帝的决心坚持下去，割断同帝国主义的联系，让宗教还它个宗教的本来面目。今天宗教界自己发起了一个民族自治运动，把近百年同帝同主义的关系清算一下。”他还赞扬说：“宗教团体本身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要建立自治、自养、自传的教会。这样，基督教会就变成中国的基督教会了。”

周恩来在谈话中对我国宗教界寄以殷切的希望。他指出：“宗教界（包括基何教青年会在内）要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各宗教之间和各教派之间就应该加强团结，联合起来，研究怎样服务于中国人民；就应该在民主与爱国的立场上，健全自己，使宗教活动有益于新民主主义社会。一个宗教团体，对新中国有无益处，要以爱国与民主两个条件来鉴别。如果这个宗教团体在政治上是拥护《共同纲领》的，是爱国与民主的，那么这个宗教团体便是对新中国有益的。”这些谈话对我国宗教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周恩来的关怀和支持下，经过宗教界爱国人士的努力革新，我国宗教伴随着深刻的社会改造，发生了巨大变化。比如，废除了宗教压迫和宗教剥削，建立了宗教爱国组织，宗教已经同国家政权、法律和教育相分离，宗教界人士和各种宗教职业人员的绝大多数是爱国守法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等等。

周恩来还论述过宗教现象的长期性。1951年他谈到有人以为天主教徒“一分到土地就不信教了，天主教的基础就没有了。”他说：“这句话好像很有道理似的，其实问题并不那么简单。别说分了地的农民，就是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也还会有信教的。”1957年，当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他又指出：“信仰宗教的人，不仅现在社会主义的国家里有，就是将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是不是就完全没有了？现在还不能说得那么死。”他列举共产党内有的农民党员怕鬼的例子说：“宗教是会长期

存在的，至于将来发展如何，要看将来的情况。但是，只要人们还有一些不能从思想上解释和解决的问题，就难以避免会有宗教信仰现象。有的信仰具有宗教形式，有的信仰没有宗教形式。”周恩来还指出：“按照唯物论的观点，当社会还没有发展到使宗教赖以存在的条件完全消失的时候，宗教是会存在的。”显然，对宗教长期性的估计，是把它作为一种范围广泛和根源深厚的社会现象来考虑的。

既然宗教的存在具有长期性，那么制定正确的宗教政策，就显得非常重要。早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主张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根据信教肉由的原则，中国解放区容许各派宗教存在。不论是基督教、天主教、回教、佛教及其他宗教，只要教徒们遵守人民政府法律，人民政府就给予保护。信教的和不信教的各有他们的自由，不许加以强迫或歧视。”在社会主义时期，继续坚持“共产党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信这种教的或信别种教的，一律加以保护，尊重其信仰，今天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将来也仍然采取保护政策。”中国共产党的这些主张，建国后在《共同纲领》和宪法上相继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我国宪法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周恩来在社会主义时期反反复复地阐明：“中国的宗教信仰政策是在实实在在地执行着的。”

周恩来认为：“我们同宗教界朋友的长期合作是有基础的，这一点我们毫不怀疑。”他希望宗教界朋友要有这个信心。“这便是所谓‘共信不立，互信不生’。当然，我们也不隐讳我们之间的不同点。但是，我们可以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上实行合作，这是我们一致同意的。《共同纲领》是四个阶级合作的基础。从各界来说，宗教界也是合作者之一。”因此，周恩来一再号召：“我们要造成这样一种习惯：不信教的尊重信教的，信教的尊重不信教的，和睦相处，团结一致。”“信仰不同宗教的人也可以合作”。因为“这对我们民族大家庭的团结互助合作是有利的。”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周恩来根据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互相尊重，和睦相处”的原则，还引申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不管是无神论者，还是有神论者，不管是唯物论者，还是唯心论者，大家一样地能够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唯物论者同唯心论者，在政治上可以合作，可以共存，应该相互尊重。”

无疑，制定和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目的是，为了团结广大信教群众和宗教界人士，并促使全体信教和不信教的群众联合起来，共同建设社会主义。

平等友爱共同发民——坦诚热情地与少数民族交往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实现民族平等，加强民族团结，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维护祖国团结统一，是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民族观。

周恩来不仅是我国民族问题的主要决策者、民族政策的精心制定者、阐释者，而且是推动这些政策付诸实施的组织者。他坦诚、热情地与各民族人民广泛交往，在交往中加深感情，了解民情，启发、教育、感化各民族的各阶层人士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

周恩来在民族交往中，灵活运用各种沟通方式，排除交往中的社会障碍和心理障碍。他在这方面的艺术堪称一绝。

首先他以平等求沟通。周恩来自青少年时代就是一个没有民族偏见，热爱中华各民族，立誓振兴中华而不懈奋斗的革命青年。他的亲密战友马骏、郭隆贞、向警予就是少数民族的优秀代表，回族女革命者刘清扬则是他的入党介绍人之一。

周恩来认为，“所有的民族都是优秀的、勤劳的、智慧的，只要给他们发展的机会；所有的民族都是勇敢的、有力量的，只要给他们锻炼的机会”，因此，“各民族是完全平等的，不能有任何歧视”，因为中国“人口众多”是汉族，“地大物博”则在兄弟民族区，所以，“各民族不分大小应互相依存，互相团结才有利”。在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上，由于历史上汉族长期处于优势地位，汉族统治阶级要么把少数民族同化，要么就把少数民族挤到边疆和生产条件差的地区，处于劣势地位的少数民族得不到发展因而落后了。周恩来认为要承认历史上是“汉族对不起少数民族，今后我们汉族同志要代为受过，向他们赔不是。要多作解释工作，说明今天的中国和过去不同，不会再去压迫少数民族了”。在如何处理民族关系上，周恩来强调汉族要主动替少数民族着想，相互间要以对方为重，“凡事都‘求其在我’，不要只说人家的错处”，以自我批评的精神反对两种民族主义，求得各民族在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基础上建立起各民族真正平等友爱的大家庭。

周恩来的民族平等思想还体现在他非常重视各民族的心理感情，他特别要求担任领导工作的同志应注意了解兄弟民族的心理感情，学习研究兄弟民族的历史、文化和风俗习惯。他说：“风俗习惯常是一个民族一个，因此，风俗习惯也同样应该受到尊重，如果不尊重，就很容易刺激感情”。因此，要研究、了解少数民族，“就要同他们建立强烈的感情”，“要下去，到实际工作中去了解少数民族的历史和现状”。显而易见，这种平等合作，互助互爱，互相依存，共同繁荣的民族平等团结的思想是周恩来重视民族工作，关怀各民族同胞，以一种亲情态度与广大少数民族人民交往求得相互沟通的思想根基和行动准则。

其次，注重语言沟通。语言文字是人类相互沟通的主要特征。口头语言交流则是最经常最直接的沟通方式，其优点在于迅速表达思想、感情并获得反馈。因此，如何使语言达到最佳沟通效果是一门艺术。特别是少数民族，因其语言、文字障碍在社会交往中受到一定限制。周恩来对此十分重视和关心。他不仅坚决贯彻少数民族有使用自己语言文字自由的政策，组织调查研究我网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使用情况，关怀民族广播事业发展和书报发行工作，而且大力提倡各族人民，特别是在民族地区工作的干部要互相学习民族

语言、文字，同时他还要求自己学习民族语言，并在与少数民族的交往中视情况尽量使用，促进相互间的情感交流。1959年10月，他亲赴包钢为一号高炉建成出铁剪彩。剪完彩，他指着高炉问当地同志“高炉”用蒙语怎么说？翻译告诉他叫“乌恩德尔召合”后，他立即高声对在场的同志们说：“现在内蒙古大草原有了这么大的‘乌恩德尔召合’是开天辟地第一回，很了不起啊！”

1962年6月，周恩来视察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与群众见面的时候，用朝语向群众热情问候：“东木得尔，安宁哈西木尼呷！”（同志们，你们好）这个同语比较复杂，汉族人不易讲清，但周恩来却讲清楚了。望着欢腾雀跃的人群，周恩来感动他说，这是毛主席的威望，党的威望。临别，他又用朝语向群众挥手高呼“塔希玛纳希达！”（再见）

1965年，周恩来视察新疆时，每到一地见了汉族干部就问学会维语没有，见了民族干部就问会不会汉语。他总说：“不能通话，怎么能交心，谈问题呢？短短几天他学会了好几句维语。见了维族同志就用维语问候：“亚克西木？”（你好）一次，他接见西藏军区文工团藏族学员时，多次称赞他们汉语说得好，并表示：“我以后也要学藏语”。简短的语言，凝聚着周恩来对少数民族人民赤忱的爱，深厚的情。

再次，善于非语言沟通。除了言语沟通，人类在社会交往中还有非言语沟通的许多方式，其中以手势、表情、运动体态等方式来加强沟通效果。周恩来在民族交往中也经常使用非言语沟通的方式来克服语言不通，民族习俗不同所造成的交往障碍，表达对少数民族的友爱与尊重。最典型的事例要算1961年3月，他在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首府景洪城与傣族、布依族、拉祜族等少数民族群众共度傣族新年——泼水节的生动情景。

泼水节期间，周恩来曾三次穿起傣族服装与群众一起欢度节日。到景洪的第二天，他先找当地干部了解傣族的风俗习惯，然后换上对襟布扣的白衣衫和大腰身的咖啡色裤子，头上扎一条水红色头巾，穿起一身地地道道的傣族服装在澜沧江岸边和群众观看赛龙般和放高升。望着傣家装束的人民总理，各族群众热泪盈眶，连呼毛主席万岁，周总理好。泼水节早晨，周恩来又身着傣装先到曼厅寨视察。当看到傣族农民在荔枝树下跳象脚鼓舞时，他接过一只象脚鼓挂在身上与群众一起跳起来。开始泼水时，周恩来到达景洪街头。开始群众都用柏枝蘸着银碗里的清水礼节性地洒在总理身上，周恩来也照此向群众泼洒。当总理看见有些群众用大盆泼水时，也拿起一个大盆泼起来，各族群众一下消除了拘束，纷纷用大盆向自己的总理泼来。依照傣族习俗，泼水节时，水泼得越多越热烈就表示彼此越亲近、越尊重。警卫人员要用伞给周恩来遮挡，他让把伞收起来，说：“不要紧的，要到群众中去和大家一样”。他对当地干部说：“傣族群众的每滴水都是热呼呼的，我一点都不感到寒冷”，“只有尊重民族风俗习惯才能和各族人民心连心啊！”水花飞溅，映出道道彩虹，把身着傣装的国家总理与普通少数民族群众亲密无间欢度民族节日的感人场面映在历史画卷之中。各族人民每回忆起这一天都激动万分，他们说：“周总理泼的不是一般水啊，而是甘泉，甘泉落在我们身上，甜在我们心里！”

穿一身民族服装，跳一段民族舞蹈，泼出一盆盆象征友谊的银水，映出一张张笑脸，这些热烈感人的画面，这些动态的沟通效果，是再多的语言也难以表达的心灵感应和情感交流。适时而自然地运用非言语的动姿沟通方

式，是缩短交往主客体之间距离，排除因历史的因素造成的沟通障碍的有效途径。作为一位全国各民族的总理，能这样由衷地去作，是非常可贵的，它一下子拉近了总理人民之间的距离，这种精神的吸引力、凝聚力是无法估量的。

总之，周恩来善于运用语言和非语言方式与少数民族群众相互沟通思想感情的娴熟艺术，达到了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团结各族人民维护国家团结统一，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社会功能和交往目的。

以诚相待感动盟友——加强统一战线的凝聚力

周恩来一生全方位、多层次地结交了无数“畏友”、“净友”，成为他们最尊重和信任的共产党人。这是因为周恩来一贯尊重盟友，对他们以诚相待，真正做到了与他们肝胆相照。

周恩来统一战线思想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具有真诚性，而真诚性就是指对盟友态度诚恳，不留水分不掺假。

他为统一战线工作制定的工作《守则》第二条就是“：谦诚的态度”。他历来强调对盟友“宜采取严格的态度，批评宜真诚”；应当照顾中间派，“不要剑拔弩张，而要仁至义尽”。他在《论统一战线》这篇发言中还说：“有人说我们只争取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这是不对的。我们还要争取自由资产阶级。”他着重说明了争取他们的方法我们同国民党不同，“国民党是采取压迫的方法”，“我们的方法是同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合作”。“压迫”与“合作”形成鲜明的对比。“合作”显然是与同盟者平等相处，进而达到感化和率领他们一道前进的目的。用周恩来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使他们不感觉我们是在领导。”1946年初，他总结国共会谈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四要四不要”的原则，每条都反映出中国共产党的态度诚恳。建国后，他多次强调各党派朋友间要相互商量，“彼此要推心置腹，要有基本的信任。”仍然讲的是对盟友要真诚，他还曾对夏衍说过：“对过去不认识、不了解的人，第一件事就是要解除他们对共产党的疑惧。只有把对方当作朋友，人家才会把你当作朋友”。周恩来不仅要求所有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的同志这样做，而且他自己首先身体力行。对民主党派的批评建议，周恩来总是虚心倾听，从善如流。盟友的话“只要有一点是对的”，他都非常重视。黄鼎臣曾回忆他1949年作为致公党选派的代表，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的情况：“我们在中南海勤政殿开会，由周恩来主持会议并主持起草‘共同纲领’。在整个会议过程中，他非常重视民主党派代表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的意见。”

周恩来统一战线工作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他总结自己长期的工作经验，提出了“勤学、勤业、勤交友”的“三勤”方针。在交友上他更强调要交诤友、畏友。所谓“畏友”与“净友”，就是说，“他敢于提出不同意见，敢于批评对方的短处，习惯了就不是畏友而是净友了”。他还要求“党内外应该相互多交朋友，特别是共产党员应该主动多交党外朋友。每个共产党员都得有几个党外朋友来往，可以多交新朋友，也可以有些固定的朋友，能够反映一些意见，敢于提出意见的。”而周恩来本人在这方面的典范事例更是不胜枚举，坚持一生，乐此不倦。交友的目的在于广泛地团结盟友。在这方面周恩来表现了共产党人的赤胆忠心，与朋友真正做到了肝胆相照。他不仅认真听取各种朋友的批评建议，还要求党外人士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使他们在各种会议上敢于说话，还要求对盟友的意见“哪怕只有一分是对的都应接受，然后再对不正确的部分加以分析批评。这就是以斗争求团结的方法。”正因为这样，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的朋友，在共同战斗的几十年中能够做到甘苦共尝，并肩前进。

周恩来对盟友以诚相待，还特别表现在他对盟友政治上关心，生活上关怀，抗战胜利后，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因反对内战，要求和平民主，于1946年7月中旬在昆明先后被国民党特务杀害。周恩来闻讯后，立即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严重抗议，要求国民党惩办凶手，安葬死者，通令全国追

悼，抚恤死难者家属。接着又在上海记者招待会上，含愤发表声明，谴责国民党杀害李、闻的罪行，指出这，赤裸裸地暴露了国民党特务残暴的法西斯本质”。稍后，他又发起在上海、重庆等地为李、闻举行追悼会，并亲自为二位烈士写了悼词。7月25日，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因躲避国民党迫害而受刺激太深，劳累过度，也突然去世。周恩来得知后，痛心疾首当晚就向党中央发出了《对进步朋友应多加关照》的电报，提出“今后对进步朋友的安全、健康我们必须负责保护”。他还面示潘汉年、伍云甫，对进步朋友“要多给以经济和物资的帮助，政治方面亦需时时照顾”。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教授因抨击官僚资本被蒋介石下令逮捕，周恩来积极奔走，多方营救。马寅初获释后因经济拮据，生活困难，周恩来又指示《新华日报》全文刊登其《中国工业化与民主》一文，并付以最高稿酬。1941年在重庆，著名戏剧家洪深因政治黑暗，生活困难，对前途悲观，举家服毒自杀，被人发现，经抢救脱险。周恩来得知后，立即派人前往探访慰问，并资助其生活和医疗费用。诸如此类关心盟友疾苦，急盟友之所急，帮盟友之所需的事例，真是不胜枚举。

正因为周恩来对盟友以诚相待，关怀备至，体贴入微，才使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和巨大的凝聚力，使各方面的盟友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共产党的主张。周恩来曾要求“领导群众的方式和态度要使他们不感觉到我们是在领导。”这也是他在领导统一战线中高超领导艺术的经验之谈。许多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都发过这样的感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虽然程度不同的受到迫害、摧残，但同共产党合作共事的初衷不变，在很大程度上是看在周恩来的份上。

值得指出的是，即便对国民党这个阶段性的同盟者，周恩来仍主张同他们以合作的真诚态度相处。华北事变后，民族危亡加深，共产党首先发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倡导。但经过十年内战的国共两党毕竟有过血海深仇，要建立包括蒋介石在内的统一战线，其困难之大是可以想象的。周恩来却能在这十分困难的条件下毅然向蒋介石通函寄语，向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共产党与红军则亟望先生从过去之误国政策抽身而出，进入于重新合作共同抗日之域”。“天下汹汹，为先生一人。先生如决心变更自己的政策，则苏维埃与红军准备随时派遣负责代表与先生协定抗日大计。”这封信是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之前数月写的，当时根本未料将要发生事变。嗣后，西安事变爆发，把周恩来参与和平解决事变的实践同这封政治书信对照起来看，充分说明共产党、周恩来态度诚恳，说话算数，信义昭昭，可表天日。尽管如此，由于蒋介石国民党其阶级意识和民族意识的此强彼弱是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而不断转化，其一党独裁专制的统治政策始终不肯改变，致使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的反共摩擦此起彼伏，接二连三，造成统一战线的发展更加曲折，抗日战争的进行更加艰辛。然而，终究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坚定性、一贯性、灵活性和真诚性的合力作用下，经过这次统一战线，最终赢得了民族解放的真正实现。

特别重要的是，由于周恩来对盟友以诚相待，感动盟友，能把各方面的进步人士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实现最大限度的孤立顽固派。这一点，不仅为中国人民称颂乐道，而且在国际上也受到了很高的赞誉。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从内心发出感慨，“周恩来是我深感敬慕的人物”。日本友人称誉他“具有毫无私心、诚实而又有容人雅量的罕见的品格”。

以理服人打动盟友——使统战对象在不知不觉中为之折服

在统一战线中处理内部事务及多党派相互关系的重要方式只能是政治协商，而在政治协商中必须以理服人，不能强加于人。

在1946年1月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第三次会议上周恩来作报告，总结了阿共两党在抗战开始之前和抗战胜利之后两个时期举行会谈的经验教训，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要互相商量，不要独断，这就体现着以理服人的思想。周恩来说，既然是政治解决，就是要互相协议，而不是一方面决定了，通知别方面去做，这样是无法求得解决的。“此次政治协商会议开会，对于这一点若能处理得更好，一定可以树立起一个协商的楷模。过去许多纠纷，常因不能互相协商，徒然引起隔阂，树立更多障碍，朋友间处理一件事尚不能如此，何况两党的事，关系国家人民的事！”他强调：“我们希望，在政治协商会议中，对于国家人民的大事，能在协商的空气中求得解决。”

周恩来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就是“领导群众的基本方法是说服，决不是命令”，同时靠“领导者起模范作用”。领导群众应该这样，那么，领导统一战线同样应该这样。周恩来自己正是这样做的，并且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许多爱国民主人士常常是在不知不觉之中，跟着周恩来走，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著名爱国民主人士胡厥文，在回忆与周恩来的交往时说：他“给人以教益，却又不自居人师。他思想极为敏捷，但毫不锋芒毕露。……从没有听到他对朋友指手划脚，说‘你应该干什么’，他的讲话朴实无华，总是给人以启迪，使人不愿离席。即使对方一时想不通，他也不强加于人，而是耐心地不断地做团结教育工作……，使人在不知不觉之中为之折服”。

周恩来这种以理服人的高超艺术，也深为国际友人所佩服。在重庆的美国驻华大使馆外交官谢伟思曾回忆道：周恩来“试图使我们赞同他（和他的党）对中国和世界的看法，——他对这些看法是深信无疑的。但是，他这样做靠的是冷静的说理，清晰的措词，温和的谈话，广博的历史和世界知识，以及对事实和细节的深入的了解，人们会被说服（或受到教育），但不会被压迫，也不会因为持不同意见而受到责怪。”

依靠这种平等待人、以理服人的工作，周恩来常常使许多党外人士不顾个人安危；克服各种困难，为革命事业做出重要贡献。党外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救国会领袖“七君子”之一的邹韬奋，抗战初期在大后方开办了数十家“生活书店”，宣传抗日民主思想。国民党中央多次用威胁利诱办法，要生活书店与国民党官办书店“合营”，都遭到邹韬奋的断然拒绝。而周恩来要邹韬奋派生活书店人员去解放区创办“华北书店”和“大众书店”，邹韬奋却认真实行。1941年，邹韬奋还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将生活书店的资金和人员转移到香港，开辟新的文化阵地，进行抗日民主斗争。

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周恩来为了扩大我党在学术界的影响，经常参加有许涤新，胡绳、杜国庠、翦伯赞、侯外庐等组织的进步学术工作者组织——读书会的活动。当时，读书会把宣传唯心主义的哲学家冯友兰、贺麟视为对立面。一次，大家正热烈地谈论这个话题时，周恩来来了。他听了一会儿发言后便平静他说：“民族大敌当前，在千千万万种矛盾中间，学术理论界也面临着错综复杂的矛盾。我们和冯友兰、贺麟在阶级立场上矛盾固然是尖锐的，但毕竟不是主要矛盾。当前学术理论上最危险的敌人，是国民党右派的妥协投降理论，我们斗争的锋芒应该对准陈立夫的《唯生论》。”一席

活，大处着眼，小处入手，把大家说服了。他还强调，学术上的是非真伪，要通过深入研究，充分讨论，详尽说理来解决，切不要强加于人。强加于人不仅达不到目的，相反还会失去群众。

建国后，周恩来特别强调，由于我们党处于执政地位，党员干部在许多统一战线组织中担任领导，所以，更应注意这个问题。

关于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周恩来主张“有关改革问题，要根据群众的意愿，经过和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协商，取得上层人同意后再去进行。在协商过程中，必须用道理说服人，不要强加于人”。这段话虽然是针对少数民族地区改革问题讲的，但其基本精神，完全适用于对其它重大问题的政治协商。似理服人的好处就在于理愈辩愈明，真理总要在几种不同意见的比较中得到补充和完善，在不断的斗争中得到发展，那么，无论是解决东南亚诸国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还是处理国内事务，周恩来总是深入浅出地讲清道理，以理服人。

积极引导帮助盟友——在统一战线内部集中各党派的进步性

在统一战线这个队伍里，各方面成员的立场、觉悟和水平差异较大，在协商人政方针时也难免出现不一致的意见，可能产生一些矛盾。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周恩来特别注意维护团结，引导进步。他曾教导做统一战线上作的同志：“对统一战线内部暗藏的敌人和敌对阶级的思想影响，排除出去也是必要的。但排他性不能用在合作的方面。在统一战线内部则要把各党派的进步性集中起来，要发展他的联合性，使之成为统一的力量，团结起来，共同对敌。”一旦统一战线的盟友出了差错，周恩来总是积极引导，耐心帮助，恰如其分地开展批评，立足于推动他们前进，避免粗暴地伤害他们。

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前夕，苏联与日本在4月13日签订了《中立条约》，国民党CC派头子通过一位民主人士起草了一个声明，攻击苏联和斯大林。几位救国会的领导人不明真相，也在声明上签了字并公开发表在报纸上，造成了很不好的国际影响。周恩来和董必武第二天就约请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钧到黄炎培的寓所，再三向他们说明苏、日签约是苏联的一贯政策，不影响对华关系；中国抗战主要靠自己，苏日条约并不影响我们抗战；要谅解苏联的难处，不能因此损人损中苏关系。周恩来的一席话使这几位民主人士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尽可能挽回了影响。在此后的合作中，他们很注意大局，特别尊重共产党的意见。

周恩来历来主张“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对党内严格，对党外宽厚；对党外朋友既要推动他们进步，又要从实际出发，不能勉强。他曾说过：“我觉得一个人的进步要等他自觉地认识以后才最可靠。”1945年，中共南方局准备领导大后方文化人整风，这将是比较尖锐的思想斗争。当时周恩来在延安，便同董必武联名致电在重庆主持工作的王若飞，认为大后方整风只能限于党内，不能扩大到党外文化人，电报指出，积极引导党外文化界人士参加和推动人后方的民主运动，就是很好的整风：不能以在延安的要求来作为衡量大后方文化人工作的标准。这是周恩来和董必武从当时当地的条件出发，对大后方党外文化界人士的帮助与爱护。

周恩来经常强调对中间党派和团体的统战工作要坚持经常性、长期性和计划性；交朋友要认真和真诚，不是泛泛之交；要同甘苦，共患难，争取长期合作；对于进步力量，要帮助他们发展，把他们的发展看做是统一战线力量的发展；既要照顾他们的利益和要求，也要对他们的妥协行为予以批评帮助。例如，皖南事变之后，蒋介石为了压迫中共参政员出席会议，采取拉拢其他党派的办法，企图孤立中国共产党。2月20日，蒋介石宴请各党派参政员，表示同意成立各党派委员会，并提出增加委员的人数，企图拉拢中间党派。于是一些中间党派产生了幻想。黄炎培等会见周恩来和董必武，希望中共再做一次让步，出席本届参政会。周恩来耐心地向他们解释了中共的立场，并提醒他们要认清蒋介石的政策，不要上当受骗。

在各个党派中，有的党派是右翼的，有的党派上层不好，有一些党派提出了一些错误主张，周恩来和中共南方局针对不同的情况予以批评帮助。右翼党派只要有某一点和中共主张相同，就支持某一点；有些派别上层不好，就批评上层，影响下层；有些派别主张的办法是进步的，但其政治方针是错误的，就赞许其进步措施，批评其错误方针。总之，批评的目的，是为了使

这些派别或团体能得到进步和发展。周恩来对统一战线的盟友敢于批评、积极引导，的确达到了这个目的。

著名爱国老人沈钧儒被誉为“民主人士中左派的旗帜”。他的儿子沈叔羊在《爱国老人沈钧儒》一书中有《父亲与周恩来》一篇。书中写道：“父亲在长期的政治生活中，所以能坚定不移地走革命道路，他的思想所以能跟着时代的步伐前进，这是与中国共产党对他的关怀和帮助分不开的。其中尤以周恩来同志对他的影响最为重要最为深刻。”著名工商界人士胡子昂说：“各方面人士一和他接触就敬服他……他与工商界接触，开一次会，谈一次话，都令人感动，令人流泪。”“听周恩来一席话，有胜读十年书之感。”另一位工商界领袖古耕虞也深有感触他说：“像我这样一个可以说是垄断企业的资本家，能够逐步地靠拢中国共产党，进而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上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为社会主义新中国服务，这同周总理对我的教导是分不开的。”这充分说明，正是由于周恩来的积极引导，热情帮助，才使一大批民主人士走上了革命或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道路。

求同存异广结盟友——在共同点上把矛盾的各方统一起来

统一战线是不同阶级、阶层、党派、集团、以至个人，从各自利益出发，在一定条件下，为了实现共同利益在一定的政治基础上自愿结成的政治联盟。在阶级社会中，古今中外各阶级、各党派，都在力图建立统一战线，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都在统一战线中争夺领导权，不管是否公开这样说，或者用别的什么说法。就无产阶级政党来说，统一战线是实现和扩大革命的同盟军问题。正如邓小平所说“统一战线的本质是团结大多数，孤立敌人。”只要中国共产党存在，就必须有它领导的广泛的统一战线。

“共同的利益”、“自愿”结成联盟，规定了“同”，因为联盟的利益是共同的，所以是谓“大同”；“各自的利益”，规定了“异”，各自的利益对共同利益来说是从属的，所以是“小异”。这是统一战线的要求和特点。不然，它就建立不起来，即使建立起来也会破裂。

“同”和“异”是对立统一、相互依存的，又随着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大”和“小”，是相对的，不是指事物本身的性质而说的。

“求同存异”是周恩来处理统一战线内部关系的一贯思想；“求同存异”这个概念的提出是周恩来的一大贡献。

关于这一重要思想的红线早在大革命前后就勾画出来了。1923年7月，周恩来在他起草的《旅法各团体敬告国人书》中号召：凡是，“不甘为列强奴隶军阀鹰犬的人，不论其属于何种派别，具有何种信仰，都应立即联合起来”，推翻帝国主义和军阀卵翼下的北京政府。这条反帝反封建统一战线只求反北京军阀政府之“同”，而存各自派别、信仰之“异”。之后，孙中山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国共建立了革命统一战线。国家主义派却攻击这是“阶级妥协”。周恩来批驳他们，现在，“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合作”，是为进行“国民革命”，走完这第一步，将来共产党还要走第二步——“打破私有制度”，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从而指明了国共合作的“同”和“异”。

1926年底，他在《现时政治斗争中之我们》一文中指出：“国民革命原是中国各被压迫阶级共同的出路”；而“各阶级却有他们各自的出发点”，“更有各自所欲获得的利益。”在这里，周恩来用阶级的观点分析了结成统一战线的各阶级的“同”和“异”。

1938年底，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蒋介石对周恩来说，“中共既实行三民主义，最好合成一个组织”，“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而不跨党。”周恩来明确地回答，“中共实行三民主义，不仅因为这是抗战的出路，而且因为这是达到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加入国民党，退出共产党”，“不仅失节失信，而且于国家有害无益。”这样，不仅坚持了国共合作中政治上的“求同存异”，而且强调了在组织上、思想上的根本区别，从而把蒋介石的“溶共”图谋打了回去。如果说前面这些论述只是有了“求同存异”的思想，那么把这一思想作为一个明确的概念表述出来，是在40年代初。在粉碎蒋介石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复杂而艰巨的斗争中，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周恩来强调指出：“于革命，人越多越好，为了团结更多的人，思想上可以‘求同存异’。”这是“求同存异”的第一次表述。

建国初期周恩来又指出：“我们同党外人士合作就是在共同的大前提下，接受他们的好意见，丰富我们的主张，只要大的方面有了共同性，小的方面

存在差别是允许的。”这是对“求同存异”的具体阐释。他还进一步阐明：“人心不同，各为其面。人们的智慧、才能、性格各有不同，相互之间有时是有矛盾的。团结就是在共同点上把矛盾的各方统一起来。善于团结的人，就是善于在共同点上统一矛盾的人。……统一矛盾并不妨碍个性的发展。”这就从唯物辩证法的高度告诉我们，在事物的统一体内，“同”和“异”不仅是对立的，而且也是互补的，“同”是基本的，“异”又不妨碍同，而且在“同”能够更好发展的情况下，二者都是必须的。那么，处理二者之间的矛盾，必须是而且只能是采取求大同存小异的方针。周恩来把这个方针贯彻于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的始终，不仅求大同存小异，甚或为了大同也存大异。只要统一战线的各方，在基本点上同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取得某种程度的一致，尽管还存在很大分歧，周恩来都尽力联合这些政治上的代表人物，以对付共同的敌人。

周恩来“求同存异”的思想内容是极其丰富的。其基本点至少应包括：无产阶级为了孤立、打击当前的主要敌人，就应该尽可能多的寻找同盟者，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为了求得“大同”，在必要时，还须作出不损害人民根本利益的让步；按照“求同存异”的要求，无产阶级政党在领导统一战线中，必须尊重、照顾同盟者的利益；统一战线中有各种不同的同盟者，在政治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同”和“异”是有区别的。因此，在统一战线中有不同程度的同盟军，即既有战略同盟军，又有策略同盟军，既有直接同盟军，又有间接同盟军。如果放弃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领导权而牺牲自己原则之“异”、同化于人家，或者脱离实际地要求人家自己都一样，这都是取消统一战线；统一战线的“同”和“异”是随着条件的变化而转化的，不是一成不变的；要掌握变化、转化的“度”，对于统一战线中的朋友，哪怕是不太可靠的朋友，在政治上出现损害、破坏统一战线团结的问题时，只要还不是已根本转到敌对方面，仍然要采取又联合又斗争，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尽可能维系团结与合作。至于已变为敌，则坚决决裂；随着形势和革命任务的发展，无产阶级领导统一战线的任务、要求也在不断发展。

周恩来不仅运用“求同存异”发展，壮大了国内统一战线，赢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而且建国后，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和1955年的亚非会议上，又成功地运用“求同存异”的政治协商艺术，提出了现在已经举世闻名、影响深远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发展双边关系开辟了现实途径，扩大了国际统一战线，从而使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使我国的国际地位大大提高。

1954年8月，周恩来在阐明同英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关系时就提出，“我们的态度是求同而不是存异”。1955年第一次既明确而又准确地表述了“求同存异”这一方针在“生气勃勃的反帝国际统一战线”中的含义。所谓“求同存异”就是把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的不同和相互间的个别争端“放在一边”，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找共同点”，以求得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周恩来认为国家关系应该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并说：“世界各国治制度、意识形态各有不同，很难一致起来，我们要找共同点。”“们应该撇开不同的思想意识、不同的国家制度和过去、现在由于加过这一面或那一面而承担的国际义务”，“争取和平合作”。反在对外交往中，就是我们既不放弃原则接受别人的观点，也不要我们的观点强加于人、而是在相互可能接受的范围内，按和平共五项原则解决双边或多边的关系问题。在以后

大量的双边或多关系发展中，进一步证明了这一方针是唯一正确的。正是这种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来处理国家之间相互关系的方针，促进我国同各种国家建立和发展了良好关系，赢得了越来越多的朋友。

日内瓦会议后，朝鲜代表说：中国同志使外交变成艺术。美国著名黑人学者杜波依斯夫妇也说过：“非洲大陆人民的解放事业受到了国际广泛注意，正是周总理在万隆会议上的精辟讲话所引起的。”美国杜鲁门时代的国务卿艾奇逊也赞扬周恩来“是当今世界上最能干的外交家”。一位日本记者也曾说过：“‘求大同存小异’这一引人的警句，也许是如实地概括了周恩来外交的独特风格”。不仅如此，周恩来还善于在求同存异中根据不同情况和对象，尽量争取异中求同，扬同抑异，存异待同，通过各种方法，发展和壮大国际统一战线，广泛结交朋友。

文教篇

善比中西情韵可通——日内瓦电影招待会为《梁祝哀史》更名

在 1954 年的日内瓦会议上，中国代表团为外国记者举行电影招待会，其目的是让世界了解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周恩来特别交待有关同志要选好放映日期，不要在开会的日子，也不要周末，把请柬分成两种，一种指名邀请，一种不写名字，就放在“新闻之家”，准备让台湾、南越，南朝鲜以及不便邀请的美国记者自取。放映时根据中文解说词，用英文通过扩音器作简单说明。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代表团的同志放映了《1952 年国庆节》，能容纳 350 人的电影院座无虚席，还有人站着看。放映过程中，不时响起掌声，放完后，观众纷纷向中国代表团握手道贺。但是，也有一个美国记者说，这部影片说明，中国在搞军国主义。周总理说，即使是个别人这样说，也值得注意。再给他们演一部《梁祝哀史》。

《梁祝哀史》是根据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编拍的彩色戏曲片，当时刚刚拍出，代表团中许多人还没有看过，于是，在旅馆中进行了试映，但放映不久，观看的一些瑞士职工就走掉了，显然是看不懂。于是，代表团的同志打算搞一个 15 页左右英文说明书，将片名译为《梁与祝的悲剧》，发给外国记者。

周恩来听到汇报后，立即指出：十几页的说明书，谁看？我要是记者，我就不看。然后，他出了一个主意：在请柬上写一句话：“请你欣赏一部彩色歌剧电影——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放映前用英语作个三分钟的说明，概括地介绍一下剧情，用词要带点诗意，带点悲剧气氛，把观众的思路引入电影，不再作其他解释。你就这样试试，我保证不会失败。不信，可以打赌，如果失败了，送你一瓶茅台酒，我出钱。”

周恩来的这个主意是为了消除民族文化的差异和语言的隔阂，从人类共同的情感出发来沟通情韵，从而获得效果。此举果然奏效，放映之前 10 分钟，席位全部坐满。放映过程中，全场肃静，大家都在聚精会神地观看，演到“哭坟”、“化蝶”时，场中传出啜泣声。放映结束，观众还如醉如痴，掌声热烈，不肯离去，纷纷发表观感，普遍认为太美了，比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更感人，说这是“东方式的细腻的演出”。一位美国教授不请自来，看后要求购买拷贝，他说，应当把这部电影拿到美国去，让好莱坞那些只会拍大腿片的人看看。周总理还让有关人员把影片拿到卓别林家里放映，这位电影大师也称赞不已。

文化交流尊重对方——请蒙哥马利看口技和《抢椅子》

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 1958 年退出现役。1960 年，他曾访问中国 5 天，毛泽东，周恩来、陈毅会见了他们。

1961 年 9 月，他再次来中国，并要求访问几个不对西方开放的城市。周恩来原则同意了他的要求。9 月 9 日至 9 月 20 日，经过周恩来安排，在国防体育协会主任李达上将、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熊向晖等陪同下，蒙哥马利先后访问了包头、太原、西安、延安、三门峡、洛阳、郑州、武汉。

9 月 20 日傍晚回到北京，9 月 21 日凌晨，周恩来找熊向晖到西花厅询问访问情况，熊向晖汇报了两个多小时后，正准备起身告辞。但是，周恩来不让走，又问熊向晖：蒙哥马利在各地看了些什么文艺节目。

熊向晖从包头谈起，谈到在洛阳时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当地为蒙哥马利准备了专场文艺演出，他不看，晚饭后到街上散步，走过一个小剧场，他闯了进去，演的是豫剧《穆桂英挂帅》，翻译向他简介了剧情。

中间休息时，他走了，回到宾馆他说：“这出戏不好，怎么让女人当元帅。”

熊向晖说：“这是中国的民间传奇，群众很爱看。”

蒙哥马利说：“爱看女人当元帅的男人不是真正的男人，爱看女人当元帅的女人不是真正的女人。”

熊向晖说：“中国红军就有女战士，现在解放军有位女少将”。

蒙哥马利说：“我对红军、解放军一向很敬佩，不知道还有女少将，这有损解放军的声誉”。

熊向晖说：“英国的女王也是女的，按照你们的体制，女王是英国国家元首和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这一来，蒙哥马利不吭声了。

听完这件事的介绍，周恩来严肃地对熊向晖说：“你讲得太过分。你说这是民间传奇就够了。他有看法，何必驳他。”“你搞了这些年外交工作，还不晓得求同存异？弄得人家无话可说，就算你胜利了？鲁迅讲过，‘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引申一下，讽刺和挖苦决不是我们的外交”。

周恩来批评很尖锐，但熊向晖心悦诚服，还想听他多批评几句，但周恩来却改了语气和话题。问熊向晖：“蒙哥马利最喜欢什么文艺节目？”熊向晖答：“杂技，特别是口技。”周恩来问：“他看了杂技《抢椅子》没有？”熊向晖说：“没有”。周恩来从柜里取出为蒙哥马利安排的文艺晚会的节目单，其中没有杂技和口技，却有一出折子戏《木兰从军》。周恩来说：“又是一个女元帅，幸亏问了你，不然他会以为我们故意刺他”。周恩来马上打电话给俞沛文，要他从节目中撤掉《木兰从军》，加上口技、《抢椅子》和中国戏法，并指定了演员。

1962 年，英国出版了蒙哥马利所著的《三大洲》，书中详述了他访华的见闻和观感，强调指出：“从长远看来，世界和平的关键在中国，中国作为一大强国的兴起是必然的，这符合人类总的利益，有助于缔造一切国家的普通人民深切期望的和平世界”。在这本书中，他还描述了在北京看到的口技和《枪椅子》的演出情况。

天下大乱保护文物——关闭故宫与制止炸毁少林寺

1966年8月1日至12日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以后，“文化大革命”掀起了新的浪潮，形势急剧地向全国大乱、全面内战的方向发展。8月13日，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凶狠地提出了“三条罢官原则”，开始组织全面夺权。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首次接见来京进行大串连的全各地的红卫兵、学生和教师。林彪在庆祝大会上宣称“我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我们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我们要扫除一切害人虫，搬掉一切绊脚石！”而周恩来则在群众大会上强调“一切革命者应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无论是北京市的革命师生，还是各地的革命师生，主要的任务都是把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搞好”。同在一个讲台上，两篇讲话同经毛泽东审阅，立场和方针截然不同。

山雨欲来风满楼。周恩来料知林彪的煽动性讲话必然会引起很大的破坏性后果，他情急之中，立即主持召开一个会议，并迅速作出关闭故宫的决定，要求马上执行，与林彪的讲话对着干，做出防范措施。深夜，紧急的电话铃声惊醒了故宫博物院的值班人员，电话里传达了关闭故宫的指示。随之，紫禁城东南西北四面的几重宫门隆隆的关上了。故宫内的国宝安然无恙。

不出周恩来所料，第二天一早，神武门下便冲出来几大群红卫兵，他们个个怒气冲冲，大叫“开门”，“开门”，但工作人员告诉他们，奉中央指示，故宫已经关闭，任何人不得入内，“革命小将”们虽然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但无奈故宫的宫墙和沉重的宫门不可逾越，只得乱呼一些口号离去。事过几日，周恩来恐故宫有失，又派来军队，守护在紫禁城的四周。这样，在“破四旧”的巨涛之中，故宫这座“头号封建堡垒”却安然无恙，未曾伤损一草一木。

在北京一片“破四旧”的打砸抢之中，河南省少林寺也未曾幸免。少林寺自1928年被军阀石友三放火焚烧后，只剩下《五百罗汉朝毗卢》、《十三棍僧救唐王》，《锤谱》这三件珍贵文物。但红卫兵造反派们不仅要毁掉这些珍贵文物，而且要炸毁塔林。他们叫嚷：“和尚死了，竟敢建塔，明目张胆地为自己树碑立传，是可忍，孰不可忍！”他们将少林寺中的建筑能破坏的全部破坏了，最后运来一车炸药，埋满塔林，就要炸毁这些历代留下的遗迹。

面对红卫兵第一次大砸少林寺的举动，人们连夜报告封登县委，封登县委见有中央“破四旧”精神，不敢正面制止，只得上报给河南省委。省委又不敢决断，只得直接报告周恩来总理。此时周恩来正在开会，听说后立即指示制止炸毁少林寺的行动，通知河南省委立即执行。

于是，河南省公安局负责人立即带领一批武装警察赶赴少林寺，制止了这桩破坏文物的罪行。事后，少林寺高僧们众口齐道：“总理功德无量，功德无量！”

古老文化有其负面——吸取古代文化发展毁坏森林的教训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悠久的历史、浩瀚的古籍、灿烂的文化，使每一个中华儿女引为自豪。周恩来充分肯定古老文化留下的丰富遗产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有着重要的积极作用。1957年11月4日，周恩来接见埃及文化代表团时指出，古老民族一旦兴盛进步就极快，因为有底子。但是，周恩来也一再提醒：古老文化有好的一面，也有其缺点的一面。美国没有古东西，工业发展起来就快。古老文化太多了，会把我们拖住，妨碍学习新的东西。古老文化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明显的拖累之一是破坏了森林资源。周恩来说，古老文化损伤了大自然，中国有林的山只有1%，好多都是荒山，古代人只知建设不知保护森林，后代子孙深受其害。“黄土高原是我们祖宗的摇篮地，是民族文化的发源地，但是这个地方的森林被破坏了”。

周恩来认为不仅中国独然，其它文明古国也有森林资源受到破坏的问题。1959年9月5日，周恩来接见阿富汗首相纳伊姆时说，我在贵国住过几天，看到你们山多，你们和我们一样，因为文化古老，历史悠久，树砍得多了些，你们也极需水利，这点给我以很深的印象。1963年11月，阿富汗王国内务大臣阿布杜·卡尤姆来访，周恩来旧话重提：我们共同的问题是，两国都砍伐掉很多森林，都是古老的文化地区，也是森林砍伐较多的地区。1964年6月21日，周恩来对外宾说，文化越古，不知保护，树本越少，我去过的地方，如从尼罗河经过中东，中亚细亚到中国这片都如此。1957年12月8日，周恩来在报告我国建设远景时曾冷静地指出：我国的木材资源不够丰富。我发现越是文化古老的國家，树砍得越多。

周恩来认为，文化发展较晚是森林资源丰富的原因之一，而森林资源丰富是经济建设的一个有利条件。1958年4月2日，周恩来接见罗马尼亚政府代表团时说，你们的森林多。我们只10%的土地上有森林。你们在飞机上可以看到西北大都是荒山。我们的文化古老，但是树都被砍掉了，北方最古，砍得也最多。1960年5月，周恩来出访越南，同范文同会谈时说，你们森林的覆盖面积占全部土地1/3，而中国只有1/10。周恩来认为森林多是经济建设的一个好条件。1964年6月21日，周恩来说，西北欧文化开始晚些，但保住了较多的森林，有好处。美国发展最晚，森林最多。

中国历史上几乎每代都有反对滥伐林木、呼吁保护森林资源的有识之士。仅先秦古籍上就有许多这方面的记载。《管子》说：“山林虽广，草木虽美，禁发必有时”。《孟子》说：“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荀子》说：“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他们都主张在不影响森林资源永续存在的基础上去采伐利用。但是，几千年来林木一直是人们住、行、用的主要资源，伐林多于育林，森林覆盖面积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不断呈下降趋势。过去的学者都未能揭出古老文化与森林资源减少的关系，周恩来则用简洁明了的语言揭示了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

知酒懂酒保护名酒——茅台卫冕与保护水源

人们都知道周恩来饮酒有量，其实周恩来对中国的酒文化也颇有研究。

贵州茅台是国宴用酒，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国宴上用茅台酒是周恩来亲自决定的。茅台酒虽然早在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就已获得了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名扬四海，但在国内却反响平平，甚至没有多少人知道茅台酒还曾获此殊荣。50年代，每瓶茅台酒不过2元多，与汾酒、竹叶青等属同一等级。

1950年国庆前夕，举国上下都在为迎接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国庆节的到来忙碌着。开国总理周恩来更是毫不例外。在国庆节盛大的宴会上用什么样的酒来招待中外来宾呢？当时意见不一。周恩来毫不犹豫地确定用贵州茅台酒。

可是偌大个北京却连一瓶茅台酒也没有。由此可见当时茅台的知名度极其有限。但是，周恩来却深知茅台是中国第一佳酿。他亲自电告贵州省委书记迅速调运一批茅台酒进京。这一年国庆节的盛大宴会上，茅台酒堂而皇之地摆上了宴会桌。

此后，茅台酒名声大振，身价百倍。全国第一次评酒时，茅台酒登上了“酒皇”的宝座。

然而在1963年全国第二次评酒时，五粮液跃居第一，茅台从冠军宝座上栽了下来——茅台未能卫冕。

这时，周恩来刚出访归来。他从《人民日报》上看到全国第二次评酒名次的消息后，便调来样品，亲自品尝。周恩来断定样品是新酒，绝非老窖，不能代表茅台参加评比。他说，只有老窖经过勾兑检验合格的茅台酒才称得上是标准的茅台酒。

周恩来喜欢茅台酒，有时宴会上有冰淇淋，周恩来就在冰淇淋上滴几滴茅台酒再吃。有人见了也学着周恩来的样子在冰淇淋上滴几滴茅台酒再吃，果然味道不错。

周恩来还相信茅台酒能治伤风感冒。寒冷的冬季稍不注意，就会有点伤风感冒，鼻子不通。每到这时，周恩来就常常叫卫士拿点茅台酒来，喝上一小杯，过不了多久，鼻子就通了，伤风也好多了。

1954年5月的一天，以周恩来为首的出席日内瓦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在湖滨旅馆大厅放映袁雪芬、范瑞娟主演的越剧彩色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招待各国记者。招待会上还备有茅台酒，供大家品尝。记者们被剧情和优美的音乐深深地吸引了。时近午夜，记者们还边品尝茅台酒边议论着影片，对影片和茅台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周恩来回国后见到袁雪芬时高兴他说：“雪芬啊，向你恭喜！我们‘两台’（指《梁山伯与祝英台》和茅台酒）在那里很受称赞呀！”周恩来对茅台酒的钟爱可见一斑。

在一次招待日本乒坛朋友的宴会上，周恩来把两瓶茅台酒送给了日本乒坛名将松崎君代，亲切他说：“听说你父亲酿过几十年的酒。请你把这两瓶酒带给他，让他尝尝我们中国的茅台酒。这酒度数虽然高一些，但不伤人，味道很不错。”松崎非常感动，一再表示感谢。

另一位日本乒坛名将荻村见状忙说：“周总理，您上次送我的那瓶茅台，我一直珍藏着舍不得喝。一次朋友们来我家聚会，听说这是中国总理送的酒，都争着要尝一尝，不小心把酒瓶打碎了。为此我难过了好几天。巧的是当时

半瓶酒洒在了我的乒乓球拍上。以后每当我比赛处于劣势时，只要闻一闻球拍上的酒香，就会信心倍增，常常反败为胜。”

周恩来听了荻村的一番话，忍不住笑着说：“我可没有那么大的神通。不然，我就会把茅台酒洒在中国小将们的球拍上了。荻村先生，看来你不但球打得好，而且还是位了不起的外交家呢。我给你和长谷川先生（日本乒乓球领队）每人也准备了一瓶茅台酒。”在座的人都被周恩来的话逗笑了。

为了确保茅台酒的质量，周恩来对茅台酒的水质十分关心，他常说，茅台之美，不仅在于它的工艺独特，气候、水质更是不可替代的条件。他多次指示要保护好茅台酒厂一带的自然环境，以确保水质的自然成分不受污染。1972年，周恩来在国务院召开的全国工业会议上强调指出，为确保茅台酒的质量，维护国家民族的荣誉，茅台酒厂水源上游数十里不准建化工厂，不准污染水源。今天的茅台酒能够继续保持其良好的质量是与周恩来的关怀分不开的。

人分老中少少者占其一——尊重一个中学生对芭蕾舞的意见

周恩来对别人提的意见向来很尊重，即便是一个中学生的意见也不例外。

1964年国庆15周年前夕的北京文艺舞台十分繁忙，为了选出一批优秀节目向国庆节献礼，许多节目要在这时进行彩排。

中央芭蕾舞团演出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彩排那天，周恩来来到了剧场。按照周恩来的吩咐，周恩来的军事秘书雷英夫带着妻子和正上中学的女儿也来到剧场和总理一起观看《红色娘子军》的彩排。

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描写了十年内战时期，海南岛一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红色娘子军连，在党代表洪常青的带领下，遵照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伟大教导，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巩固的红色根据地的过程。舞剧通过对洪常青、贫农女儿吴清华形象的塑造，表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如火如荼的伟大斗争。

演出结束后，周恩来请剧组编导、主要演员和有关方面负责人一起开座谈会，征求大家对舞剧能否公演的意见。

雷英夫见在座的都是专家，便起身准备携夫人、女儿离开。周恩来叫住了他。周恩来笑着说：“雷英夫，你别走呀，你也可以谈谈你的意见嘛。”

雷英夫觉得此剧已经过周恩来多次指导修改了，在座的又大多是文艺界的行家，自己是门外汉，能提什么意见呢。于是就随口说：“舞剧很好，舞蹈也不错，我看可以上演了。”

这时，雷英夫的女儿突然说：“周爷爷，我想提个意见，可以吗？”

周恩来把视线移向这位十几岁的小姑娘，鼓励地说：“当然可以。”

受到周恩来的鼓励，小姑娘的胆子大了起来，说：“有的地方，演员老在舞台上转圈子，我看不懂。比如，吴清华从恶霸地主南霸天阴森的地牢里逃出来后，一大群南霸天的狗腿子在后面如狼似虎地追她，她不赶快跑，却在原地转圈圈，这是为什么？”

雷英夫一听女儿的话，很生气，心想，当着总理和这么多行家，一个小孩子提什么意见。他嗅怪地训斥女儿：“你小孩子家懂什么，竟敢在总理、专家们面前胡说八道。”小姑娘委屈地撅嘴。

周恩来见此情形，就对雷英夫说：“哎，雷英夫，你这是干什么。你怎么能随便阻止孩子说话呢？”

雷英夫解释道：“今天是听您的指示和专家们的意见，小孩子不懂规矩，胡乱插话，太不礼貌了。小孩子懂什么芭蕾舞。”

周恩来认真地说：“孩子说她看不懂，自有她的道理。她有她的代表性，人类有三分之一是孩子，难道我们的芭蕾舞出去后，不跟他们见面，不让他们看？”

是呀，人分老中少，少者占其一。周恩来能够这样尊重一个中学生提的意见，使雷英夫深受教育。

大力发展稳步前进——处理教育数量与质量的关系

周恩来在主张大力发展教育的同时，屡屡强调教育发展要重视质量，反对不顾质量而片面追求数量。他认为，衡量教育发展不应单纯地看数量标准，更重要的是要看质量。

与经济建设一样，建国后我国的教育发展在处理速度与效益、数量与质量、红与专的关系上常常失衡，导致教育质量频频出现问题。

1953年，根据我国教育的实际状况和国家建设的需要，我国高等院校进行了一次院系调整。调整中，出现了一些不顾客观实际盲目冒进的现象。有些院校不顾实际师资和力量，一味扩大建校规模和招生规模，一度出现了全面铺开、齐头并进的现象。这样，虽然在学校以及学生数量上较以前都有提高，但在质量上实际是有所下降。1953年5月29日，周恩来在政务院第180次会议上批评了院系调整中这种“好大喜功，不求质量”的做法，他强调“要有重点地稳步前进，不是不进或冒进，也不是齐头并进。”12月21日，他署名发布的《关于改进和发展高等师范教育的指示》又指出：“为了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今后高等师范教育必须大力发展，同时，也必须注意巩固，提高质量。”他还说：“不顾国家建设的需要，不积极发挥潜力，不努力创造条件克服困难以求发展的保守思想是不对的；单从主观愿望出发，不考虑可能条件，单纯追求数量而忽视质量，盲目冒进的做法也是不对的。”

1955年底，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经济建设速度一再加快，出现了盲目冒进的急躁情绪。教育部门也受到影响。1956年9月16日，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指出：“要做好人才的培养工作，必须正确处理数量和质量的关系。过去几年，我们有片面强调数量、忽视质量的偏向，这是必须纠正的。从教育部门说，应该积极地发挥力量，在保证一定质量的条件下尽可能地增加学生的数量。从用人部门说，应该考虑到真正需要和实际可能，不要提出过多过高的要求，以免由于盲目地增加数量而降低学生质量。”1958年后，我国教育质量的下降显得更为突出。这其中有两个方面的主要原因。一是受“大跃进”的影响。1958年2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我们的行动口号——反对浪费，勤俭建国》的社论，提出了国民经济“全面大跃进”的口号，“文教卫生事业也要大跃进。”这样，各种学校一哄而起，在建校规模和招生数量上也搞“大跃进”。这样一种不顾实际的片面追求数量造成了教学质量的下降，有些学校缺乏师资和起码的教学设备，有名无实。第二个原因是1958年，我国提出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这一方针本是针对过去教育脱离实际、脱离生产实践的弊端而提出的，强调学校教育要密切联系社会实际。但是，由于在理解和执行这一方针的过程中，出现了“左”的偏差，片面强调学生参加生产劳动而忽视教学，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简单地理解为学生参加一般的工农生产。这样，老师和学生过多地参加生产劳动影响了学校的教学质量。

针对上述两种现象，周恩来在许多场合都提出过批评。1959年5月28日，他在天津大学给师生们作报告时指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是主导方面，因为学生来学校就是为了学习。我们一定要认清主导方面，认不清主导就没有方向。他还针对天津大学在招生数量上的“大跃进”指出，天津大学是全国知名的大学，现在将近有1万学生。万人大学在世界上能有几个？我劝你们要控制，不要老在数量上高速发展，学生人数再增加就不好办

了。当然，我们的大学生还要增加，但那主要是增加学校的问题。一个学校的人数有它一定的限度，你们达到一万就不少了。你们要保证教育质量，提高教育质量，如果你们再不断地增加数量，那就会得到相反的结果，会降低质量，那就不是正确的教育方针。

1961年4月3日，周恩来在一次人大会议上又指出，这几年的教育发展是相当快的。问题是要提高，要从数量的大跃进转向质量的大跃进。

在处理红与专的关系上，受极左政治的影响，片面强调政治上的“红”，不要学习上的专，强调教学质量被诬为“白专道路”，遭受批判。对教育界的这样一种极左思潮，周恩来进行了尖锐的批判。1965年3月，他在一次谈话中就指出：“现在有一种‘红而不专’的倾向，这是不对的。红，一定要体现在完成党交给我们的学习任务上。外语是一种工具，我们出国留学的，首先要学好它，掌握了它，才能学好专业，才能为祖国建设作出贡献。不然，就加毛主席说的‘空喊口号’，什么搞革命，搞建设，都是一句空话。”1970年11月20日，周恩来在接见北京大学、北京外语学院等校师生代表时，对那种硬性规定每天练习外语只能一个小时的做法提出了批评。他说：“学外语要天天练。天天练的时间不要仅限于一个小时。如果硬性规定一小时，其他时间就不许练，这种办法一定要脱离群众的。”“外语教师也好，外事工作人员也好，总是要练，要允许人家抽空练。人家挤点时间练，不要去干涉！”他鼓励在场的老师，一定要提高教学质量，要抱着对学生负责的态度，否则，会误人子弟的。

办好共大科技兴农——支持和关心共产主义劳动大学

建国后，一向重视农业的周恩来非常关注农业科学技术教育的发展。他自始至终支持和关心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简称“共大”）就是一例。

“共大”创办于1958年8月，校址在江西，是一所半工半读的高等农林职业院校。学校没有农学、林学、园林、畜牧、兽医等专业，侧重学习中等农业技术，为农村培养科技人才。

“共大”创办初始，就得到周恩来的关怀、鼓励和支持。1959年夏天，党中央在庐山召开八届八中全会。会议期间，周恩来专门抽空把江西省的省长邵式平找去，详细地询问了共大创办的情况及今后的打算。周恩来说：“我国科学文化落后，农村更加落后，文盲还很多。我们的青年农民应该掌握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这样，不仅现在可以增加生产，而且将来还能够运用更新的技术，解决我国农业机械化、现代化的问题。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为农村培养科技人才，很好也很重要，一定要办好啊！”谈话结束时，周恩来亲笔题写了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校名。

还是在八届八中全会期间。一天傍晚，周恩来吃过晚饭，出来散步，遇见江西省委负责人刘俊秀。周恩来立即迎上前去，说：“俊秀同志，邵大哥（指邵式平）说你兼任共大总校校长，这很好嘛！我给共大题了校名，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把共产主义和劳动结合起来，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结合起来，为农业培养一支科学技术队伍，这件事很重要啊！”

刘俊秀汇报说：“我省将近20万个生产队，每个生产队按两个农业科技人员计算，就得有40万人的一支大队伍啊，这么多的科技人员，光靠农学院培养跟不上需要，还是靠共大来得快。”

“对！农学院和共大总校培养农业科技的骨干队伍，共大分校培养一般的农业技术人员，这样人数多，也来得快。”

刘俊秀又说：“总理，共大刚创办不久，经验还不够。而且，还有人反对，说共大是私生子！”

“就是私生子，法律还保护嘛！”周恩来笑了笑，又接着说：“搞教育，办事业还会没有人反对？反对也不是坏事，可以从反面促进我们把共大办好。”

1961年9月，周恩来到庐山参加中央工作会议。9月17日，会议刚结束，周恩来就亲自来共大庐山分校视察。他站在山坡上，眺望着师生开发的一块块平整的梯田和一片片绿油油的茶园，高兴地说：“生产基地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就是既要学习好农业科学技术，又要搞好劳动生产和科学实验。”周恩来还和师生们一起座谈，听取大家关于学习和劳动情况的汇报。最后，他鼓励大家说：“学校办得不错，还要继续办好。同学们要努力学习。”

9月18日上午，从庐山下来到南昌的周恩来又在南昌宾馆接见了“共大”总校的师生代表。他用宏亮的声音说：“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毛主席非常关心共大，非常支持共大，这次在庐山还给你们写了一封信。”话音一落，大厅里顿时一片欢腾，掌声经久不息。师生们满怀信心，表示一定不辜负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期望，把“共大”办好。

三年困难时期，由于各种原因，社会上一度对“共大”产生了种种非议。“共大”的日子很不好过。1963年秋，江西省委派“共大”总校的三位同志赴北京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在百忙之中接见了他们，听取了汇报，并详细

地询问了“共大”总校各系的课程设置、学习和劳动情况。针对存在的问题，周恩来都一一作了具体指示，为进一步办好“共大”指明了方向。

1965年，“共大”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作了一些系科调整，增设了农业机械等系科。

1966年夏天，全国农业机械化现场会议在武汉召开，周恩来由于工作繁忙，不能亲赴参加会议。8月上旬，现场会进入讨论阶段，周恩来把全体会议代表召到北京继续开会。他对代表们说：“只有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才能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会议期间，他还找到刘俊秀嘱咐说：“实现农业机械化，就要培养科学技术人才，共大是培养农业科学技术人才的学校，有农机系很好，一定要办好啊！”

在周恩来的支持和关怀下，“共大”为农业战线培养了一批科学技术人才。1977年，“共大”总校被列为全国重点高等院校，改为全日制，1980年改名为江西农业大学。

关注现代国防筹建军事院校——四商建立解放军最高学府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的任务除继续完成肃清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残余，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外，主要担负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重要使命。而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的时间里，我国周边国际环境一直处于十分紧张的状态。对新中国持敌视态度的美帝国主义极力插手我周边国家事务，企图四面包围封锁我国。1950年6月，美国出兵入侵朝鲜，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同时公然以武力阻挠我军解放台湾。我国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在这样一种新的历史环境下，迅速发展军事教育，建设一支现代化、正规化的国防军，就成为我国国防建设的首要任务。

对我军干部军事素质有深入了解的周恩来更是感觉到发展军事教育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他深知，我军大部分军事指挥干部来自农村，文化程度低，虽然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但对军事理论，特别是对像诸兵种大规模协同作战等现代军事战争知识还缺乏了解。1950年6月，周恩来以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身份，主持召开中央军委会议，研究创办全军军事院校的有关事宜，以解决教育和训练全军掌握现代军事科学技术，学会诸兵种协同作战的问题。朱德总司令、聂荣臻代总参谋长等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商定：在战争年代原有学校的基础上，改造和新建适应现代化战争条件的各类正规院校，各军兵种都要着手建立自己的专业院校；全军首先创办一所教育和训练中高级干部的最高学府——陆军大学。

远在四川重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得知创办陆军大学的决定后，心情非常激动。他立即致信党中央，请求辞去现职，去参与筹建陆军大学的工作。党中央考虑到他早年曾是苏联最高军事学府的优等生，一向注重并长于军事理论研究，便批准了他的请求，派这位身经百战、威震中外的军事家去办陆军大学。

11月初的一天上午，周恩来邀请刚刚奉命到京的刘伯承和原华东军区参谋长兼第八兵团司令陈士榘等陆军大学筹委会的成员，到中南海西花厅商谈学校的筹建问题。

会议开始后，刘伯承说：“总理，我来是来了，就是怕搞不好。”

周恩来用笑声鼓励说：“你搞得好，搞得好。你有几个特长：一有学问，二又非常严格。严师出高徒嘛！”

随后，周恩来、刘伯承和其他成员一起研究讨论了陆军大学临时党委的组成方案和学校的组织机构及有关领导干部的人选问题。

几天后，周恩来又约刘伯承等人谈话。首先，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办好陆军大学的指示，并告诉说，为办好陆军大学，已决定从苏联聘请一批顾问来学校帮助工作。

在请苏联人当顾问的问题上，我党有过教训。中央苏区革命时，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不了解我国具体国情，却以共产国际代表自居，搞瞎指挥，结果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损失。鉴于这样的教训，刘伯承坦诚地提出：“总理，我考虑了很长时间，叫顾问不如叫专家好。顾问顾问，就是要顾我们的问。可是，叫专家就超脱了。他当他的专家，我们干我们的工作。我请你，你就讲；我不请你，你就不要顾我的问嘛！”

周恩来略加思索，当即赞同刘伯承的意见：“对，对，叫专家好。”此后，国务院专门发出通知，规定除过去按顾问名义聘请来中国的苏联专家仍

称顾问外，以后新聘者和过去未按顾问名义所聘的苏联方面的人员，一律称专家。

接着，周恩来就陆军大学的正式校名、校址、干部人选等问题，与大家一起磋商。刘伯承建议：今后空军、海军还要发展，叫陆军学院太局限，可考虑叫军事学院。周恩来综合刘伯承等人的意见，最后确定：（一）为了便于学校今后增设海军系和空军系，将原拟陆军大学正式定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二）校址暂设南京华东军政大学所在地，待条件成熟后再迁北京。（三）以华北、华东军政大学一部分干部作基础，依靠华东军区组织军事学院各级机构。

两三天后，周恩来第三次邀请刘伯承等人继续商谈军事学院的建校问题。

在谈到教学方针时，周恩来说：“就是要在人民军队现有的军事素质的基础上，熟悉并能指挥各技术兵种和陆军步兵的协同动作，同时熟悉参谋、勤务和通信联络，以适应现代化战争的要求。”在谈到军队文化课教学问题时，周恩来又指出：“由于历史的原因，军队学员的文化水准低，但只有具备了相当的文化、科学知识，才能掌握现代军事科学技术。因此，一定要搞好文化和科学知识的教学。”

鉴于在军队中选调合适的教员有困难，刘伯承建议：有一些起义、解放过来的国民党军官可以利用。他们当中有黄埔军校毕业生，还有国民党陆军大学的教官，既有相当的文化水平，也懂一些军事。周恩来当即拍板肯定了这一建议。他说：“行啊，可以让这些人当教员，团结、教育他们为新中国的国防建设事业服务。以后，再陆续从学校每期的毕业生中选留一些任教。”他还说：“搞现代化的军事建设，搞现代化的军事学院，我们都没有经验。要认真研究现代战争的特点，把人民军队丰富的作战经验加以总结提高。同时需要不断地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学习外国现代军事科学。”

会议结束时，周恩来提议由刘伯承召集筹委会成员根据这二次会议商谈的精神，尽快地搞出一个办校的书面综合意见，然后再开一次会讨论定案，报中央军委批准。

1950年11月13日晚，周恩来在西花厅召开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军训部和军事学院筹委会负责人会议，讨论刘伯承、陈士榘拟出的《关于创办军事学院的意见》，对《意见》的部分条款进行了补充和修改。

三天后，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朱德，汇报座谈修改《关于创办军事学院的意见》的情况，建议予以批准。当天，毛泽东、朱德批准了这个《意见》。

1951年1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在南京宣告成立，刘伯承任院长兼政治委员。此后，军事学院为我军的正规化、现代化和革命化建设，培养了大批的军事指挥人才。

经济文化一车两轮——处理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关系

1952年10月，周恩来在政务院第156次政务会议上说：“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好像一辆车子的两个轮子，相辅而行。”这是对正确处理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关系的科学表述。文化建设离不开经济建设，经济建设也离不开文化建设，二者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关系。

周恩来认为革命和建设归结到一点都是为了人民能过上好日子，建设更是直接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人民的生活水平包括物质生活水平和文化生活水平，人民的需要包括物质的需要和精神的需要。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必须同步地协调发展。无论是经济建设还是文化建设，如果脱离对方片面、孤立地发展，都会带来不利后果，不仅不能满足人民的全面需要，并使自身的发展受到局限。

在国家建设中，周恩来指出经济建设要处于中心的、首要的位置，文化建设不能挤占经济建设的人力、财力、物力，不能超越经济建设的发展而发展。人们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教育、科学、文学艺术等精神劳动。对于那种脱离实际、急躁冒进的“大办教育”、“大办文化”，他曾多次提出批评。

但是，周恩来也一贯重视文化建设对经济建设的促进作用，文化建设搞不好，必然会拖经济建设的后腿。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文化建设中，除了教育，还包括文化艺术、科学、卫生、新闻、出版等。这些都与经济建设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要进行经济建设，文教工作就必须加强，决不能削弱”，也“不应该把文化建设看作是将来的事，不能等待，现在就应着手。”

文化建设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对人才的培养。新中国建立之初，面临着恢复和发展生产，巩固和建设革命政权，改善人民生活，准备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等十分艰巨的任务。周恩来及时指出，要完成这些任务，需要许多条件，但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条件是人才、干部。他说：“我国要建设，干部、人才就成为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其他条件都具备，缺乏干部、人才，也是不行的”。“培养技术人才是国家经济建设的必要条件”。周恩来从战略的高度，一再提醒全党要认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他认为：今天我们国家“最大的不足是知识分子不足”，国家“需要人‘急’，需要才‘专’。”1951年，周恩来在政务院各部门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上，反复强调要大力培养建设人才。因为“人才缺乏已成为我们各项建设中的一个最困难的问题。不论在经济建设，国防建设，还是在巩固政权方面，我们都需要人才。这两年我们常说，只要我们的工作开展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就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任何了一个部门工作一开展，马上就会提出专门人才、技术人才不够的问题。水利部只治一道淮河，就感到工程技术人才不够”。

怎样培养国家建设所需的人才？周恩来强调，培养国家建设所需要的人才，不能单靠某个方面或领域的工作，必须通过全社会和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他主张，必须从全局出发，统筹规划各部门的人才培养。除正规的小学、中学、大学以外，“要重视工农速成学校和各种业余补习学校，把工农速成学校和业余补习学校放在与其他学校同样重要的地位”，企业部门也可举办短期的训练班。对训练内容周恩来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在1952年7月25日第146次政务会议讨论劳动就业问题时说：“过去我们举办的训练班一般

都是进行政治训练，讲‘猴子变人’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常识。今后的任何训练班，都应该有业务训练，像革大一类的政治学校，今年下半年也应加强业务与技术训练”。这一切的最终目的，也就是培养国家建设所需要的各方面人才。

周恩来关于经济文化一车两轮的思想，关于发展教育培养人才以适应国家建设发展需要的思想，在当时的国家建设中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产生了重大的积极影响，今天仍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外交篇

当行则行当止则止——处理朝鲜停战谈判问题

1950年10月3日我出兵朝鲜之前，周恩来同印度大使谈话时指出：如果美国军队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并重申，“我们主张和平解决，使朝鲜事件地方化”。但是狂妄的美国军政领导人无视我国的严重警告，悍然令其军队越过三八线。我志愿军才不得不出动。可以说，我参战的目的就是为了争取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也就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所以，在12月7日，即在第二次战役后，周恩来就手拟了停止朝鲜冲突的条件。这说明他的深谋远虑。

1951年1月11日，美国突然向我提出了停战谈判的建议，要求在朝鲜立即安排停火。周恩来敏锐地分析了当时的战争形势：志愿军已经连续进行了三次战役反攻，将美军赶到了“三七线”，解放了汉城。美国的战略重点在欧洲，不愿也无力向朝鲜投入更多的兵力，并且担心再打下去，不仅可能失败，而且可能被撵出朝鲜半岛。为避免彻底覆灭，美国急于停火谈判。他认为，尽管这时谈判对我方有利，但还不到火候。周恩来一是考虑到美军和谈并非有诚意，是一种缓兵之计，二是想争取更大的战果。他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并征得同意后，调去了大批部队，又组织了大的反击，经与敌人在“三八线”上反复争夺，最后把战线稳定在了“三八线”附近。

1951年6月30日，第五次战役刚刚打完不久，“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奉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之命向我方发表声明，表示愿意同我方举行停战谈判。

周恩来认为时机成熟了。在当时的情况下，我军速胜是不可能的，因此当客观上出现了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可能性时，我们应抓住这个时机，一方面准备持久作战，一方面与敌人举行停战谈判，争取和平解决朝鲜问题。

作为帝国主义的头号大国，美国是很傲慢的。谈判一开始，它就横生枝节，不断挑衅。面对这样的对手，周恩来要求我方坚定地顶住，坚持原则，力争停战条件公平合理，符合国际公法，有利于朝鲜问题最终的和平解决；同时又从全局出发，在不损害根本原则的前提下，在具体问题上作一定的妥协，以避免谈判破裂，推动达成协议，实现停战。

当时，停战谈判主要围绕四个问题。一、确定军事分界线。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主张维持反映双方军事力量基本平衡的状态，挫败了美方蛮横索取朝鲜北部大片领土的野心。二、停战的安排与监督。在这个问题上，我方坚决拒绝了美方借机干涉我内政的图谋。三、关于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等问题。我坚持停战协定中应规定召开高级政治会议加以讨论，美方最后勉强接受了。在上述三个问题上，我方也作了一定的妥协。四、战俘遣返问题。这是谈判中斗争最复杂最激烈的问题。

停战后双方交换全部战俘乃国际惯例。1949年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也有明确规定（即实际战事停止后，战俘应即予释放并遣返，不得迟延）。因此，交换战俘本应是个简单的次要的问题。但美方与李承晚集团公然践踏国际公法，强扣战俘，并假手这个问题阻挠停战协定的签订达一年半之久。其实质是美方是否下决心停战的问题。

美方从四个方面向我施加压力：一、在会场上炮制“一对一”交换。“平

民顶战俘”等谬论，拒绝全部遣返我方被俘人员。为迫使我方接受其极端无理的要求，动辄单方面休会，十分无礼。二、操纵联合国通过相应的决议，以壮声势，欺骗舆论。三、在战俘营中制造多起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并对我战俘人员进行“甄别”，强迫刺字、按手印、写“血书”、转移营地、谁要求遣返即遭毒打、截肢或杀害，甚至挖心割肉，以恫吓其他战俘。四、在上甘岭地区发动攻势，继续进行细菌战，加紧轰炸中国边境城市，扬言要扩大战争。

我方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上甘岭战役，我一个半月歼敌 2.5 万，美方大惊。我方宣布准备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时为止。对美方进行细菌战、轰炸我领土的强盗行径，周恩来提出强烈抗议。对美方叫嚷要蒋介石集团出兵在朝鲜后方两栖登陆，我作了准备。对美方强扣和虐杀我被俘人员的暴行，周恩来和我代表团发表声明详加揭露，并以我广大被俘人员可歌可泣的反抗和斗争证明美方所谓的“强迫遣返”是站不住脚的，是彻头彻尾的谎言。联合国大会在 1952 年 12 月 3 日通过关于朝鲜问题的决议，企图迫我接受。周恩来致电联大主席，指出这是在战俘问题上以强迫扣留的“原则”为基础的决议，支持了美国的错误立场，是在中朝没有参加的情况下通过的，因此是非法无效的，中国人民坚决反对。

周恩来和我方代表团的坚定立场使美方骑虎难下。“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的谈判顾问、美驻日大使穆菲惊呼，战俘问题是美国的“弗兰肯斯坦因”（在一部有名的英国小说中，一位生理学家制造了一个怪物，名叫做“弗兰肯斯坦因”，最后自己被这个怪物所毁灭）。这正像当时周恩来分析的，艾森豪威尔本欲做出强硬姿态吓人，殊不知人未吓倒反吓倒了自己。因此，艾森豪威尔新政府上台后不久，从总的战略出发，不得不改变那种破坏和拖延谈判的政策，开始实行转弯。1953 年 3 月 28 日美方提出先交换伤病战俘就是一个信号。

具有非凡政治头脑和外交眼光的周恩来敏锐地抓住了美方的新动向，同意交换伤病战俘，并建议恢复谈判。以此为契机，为推动停战的实现，周恩来指示我方采取了自谈判以来最关键的步骤，也是最大的让步。

1953 年 3 月 30 日，周恩来提出了“分两步走”的建议，即停战后立即遣返一切坚持回归的战俘，而将其余的转交中立国，并经过有关方面的解释，以保证他们的遣返权利能得到尊重。他指出，这一建议并非放弃《日内瓦公约》的遣返原则，也非承认有美国所说的“拒绝遣返”的战俘，而是为终止我方被俘人员继续流血而采取的新步骤，以便使在对方恐吓和压迫下心有疑惧、不敢回家的我方被俘人员的遣返问题能得到公正的解决。周恩来的这一建议在国际上受到广泛欢迎。

对周恩来提出的把暂时不遣返的战俘交给中立国的建议，美方以存在实际困难为由加以反对。周恩来又指示我方作出让步，遂同意将他们交由设在朝鲜非军事区的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看管一定时期，以便他们在不受威胁的情况下行使被遣返的权利。6 月 8 日，双方终于达成最后协议。这一协议虽采纳了原先印度向联大提出的有关提案中的某些步骤，但与该提案也有很大的不同。印度提案要把最后剩下的战俘交联合国处理，而联合国当时是交战的一方，这是我方所不能接受的。况且，当时美方气焰尚高，还不想真正作战，只是要逼我就范。周恩来认为，如果我们那时让步而接受印度提案，就等于在压力下示弱，正中美国下怀，这是不可取的。

停战后，战俘问题仍是斗争最尖锐的问题。美方出于反共和给中国与朝鲜抹黑的方针，伙同李承晚，蒋介石公然违背停战协定的有关规定，把我被俘人员交给李、蒋集团编入军队。对这种强盗行径，周恩来提出了最强硬的抗议，表示一定要追究到底。他提出，鉴于美国的侵略政策所造成的国际紧张局势，召开政治解决朝鲜问题的五大国会议更加必要。后来，这一会议于1954年4月在日内瓦举行，新中国首次以大国身份参加，由周恩来总理兼外长亲任代表团团长。

总之，在战俘问题上，我方同美方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坚持了应予全部遣返的原则，但从实现停战的全局利益出发，在遣返的步骤，时间和方法上作出了必要的让步。可以说，在整个停战谈判中，周恩来做到了该争的据理力争，可让的或不能不让的，看准时机让。对如何掌握让步的程度和时机，周恩来明确指出：美国蛮横无理时不能让步，虚张声势时不能让步，不起作用时不能让步，让步必须能扭转局势。当行则行，当止则止。

宣传自己结交朋友——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接待各方记者

1954年日内瓦会议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中、苏、美、英、法都派代表团参加，引起广泛注意。周恩来规定，除新闻发布会外，外国记者同中国代表团接触，一律通过新闻办公室。

周恩来对接待外国记者的工作，作了五条原则指示：（1）来者不拒，区别对待；（2）谨慎而不拘谨，保密而不神秘，主动而不盲动；（3）记者提问，不要滥用“无可奉告”，凡是已经决定的，已经公布的，经过授权的事，都可以讲，但要言简意赅，一时回答不了的，记下来，研究后再回答；（4）对于挑衅，据理反驳，但不要疾言厉色；（5）接待中，要有答有问，有意识地了解情况，有选择有重点地结交朋友。

首次举行新闻发布会时，台湾国民党中央社驻巴黎记者王家松要求参加，被我有有关人员拒绝了，并准备同“新闻之家”交涉，追回王家松的记者证。理由是中央社是台湾的官方机构，要警惕他在日内瓦制造“两个中国”的假象。周恩来事后得知此事，他说，不能抽象地讲警惕，警惕要有事实根据，没有事实根据的警惕是主观主义，就会变成自己制造紧张，给工作造成损失。蒋介石的基本政策，也是坚持一个中国，但他所坚持的是只有一个“中华民国”。美国顽固支持蒋介石，一直否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现在怎么样：瑞士早就同我们建交，杜勒斯不得不同我们一起开会，这里哪有“两个中国”的影子？来了一个中央社记者，怎么就会造成“两个中国”的假象呢？对于蒋介石来说，他对这次会议很不安，美国当然会向他通气，但他信不过。他派个记者来，显然是为了便于进行现场观察，观察我们，也观察美国。让他了解一些第一手的真实情况，这对我们很有好处。把人拒之门外，这于情理不合。

事后，周恩来还关照我有有关人员，在我们的记者中找一位便于同王家松接触的同志，向他作些解释，告诉他，今后如愿参加我们的新闻发布会，我们欢迎，有什么困难，我们可以酌情帮助。但要注意，同他接触，一定要掌握好分寸，不能过头，要顾及他的处境，不要使他为难，更不能让他丢掉饭碗。

当时的新闻办公室设在宝瑞华旅馆，来访的外国记者很多，有时应接不暇。他们着重询问中国各方面的情况。周恩来对此早有预见，事先就让有关部门编写了介绍中国情况的材料。此外，还带去了国内出版的外文书刊。有了这些材料做依据，对外国记者提出的问题，基本上都能回答。周恩来指定人进行了检查，认为没有差错。同时认为我方接待外国记者的方式还太呆板，还只是“守株待兔”式的，效果还不很大。他提出可以为友好的记者举行小型宴会，为一般的记者举行大型冷餐招待会，请他们吸中国烟，喝中国酒，吃中国菜，边吃边谈，让人感到无拘无束，轻松活泼。这不是吃吃喝喝，是为了便于你们宣传“自己”，了解对方，结交朋友。这三者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执行我们的外交政策。

不久越来越多的西方记者询问中国的外贸情况，我们准备的材料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周恩来说，让雷任民（外贸部副部长）当代表团的顾问，就是为了这一点。周恩来要新闻办公室为外国记者举行一次中国外贸问题的座谈会，由雷任民主讲并答问。这些方式是其他国家的代表团所来采取的。外国记者反映很好。有的说，中国人熟悉西方记者的心理，事先准备周密，易

于使人了解中国。有的说，雷任民的介绍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中国并不拒绝外资，任何国家都没有同中国贸易的优先权。有的说，从周恩来和他的助手身上，可以看出中国人的自信、乐观和组织能力，他们具有没有大国架子的大国风度。有的说，严肃和热情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性格，可是在周恩来和他的助手们身上，这两种性格融洽地结合在一起，这真是奇迹。

合情合理以诚释疑——1955年万隆会议上即席发言

1955年4月18日至24日在印尼避暑胜地万隆举行的第一次亚非国家首脑会议，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国际会议。周恩来在会议进行的关键时刻，以其卓越的外交才能和杰出的智慧，为新中国赢得了受人崇敬的国际地位。

由于美国势力的幕后操纵，会议的第一天和第二天上午的一些代表团团长的发言毫无根据地把共产主义说成是一种“新式殖民主义”，认为亚非人民当前的任务不是去向殖民主义斗争以取得独立，而是要同美国那样的帝国主义国家联合起来反对共产主义。下午，叙利亚的阿泽姆，泰国的旺亲王、土耳其的佐鲁三人的发言仍表现出对五项共处原则中最后一项“和平共处”所怀有的“怀疑和忧虑”。旺亲王甚至认为中国的傣族自治区使“泰国不得不面对渗入和颠覆活动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看到周恩来急速地在写着什么，周恩来很快判断出形势给中国代表团的压力，他在极短的时间里作出了更换发言内容的决定。

当大会主席宣布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发言时，周恩来健步地登上了讲台，他字字千钧地说道：“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这一句话，使会议的气氛陡变，人们原以为中国这样的大国会厉言反驳，想不到中国代表竟如此争取和平。

周恩来完全了解各国对中国共产党政府所抱的陌生心理和疑虑心情，他说：“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

周恩来在坦率地说出会议的性质之后，鲜明地提出了会议的目标，他指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为了寻找目标的基础，周恩来提示道：“在我们中间有无求同的基础呢？有的。那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顾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

当会场上越来越多的人凝神注视着周恩来的发言时，周恩来进一步深入地说下去：“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同时，会议应将这些共同愿望和要求肯定下来。这是我们中间的主要问题。我们并不要求各人放弃自己的见解，因为这是实际存在的反映。但是不应该使它妨碍我们在主要问题上达成共同的协议。我们还应在共同的基础上来互相了解和重视彼此的不同见解。”

这就是周恩来对实现大会宗旨所提出的求同方式，所确认的存异限度。这是一流外交家的杰出智慧，这是一个关注亚非国家命运的政府行政首脑的主张。

接着，周恩来简明扼要地阐述了思想意识与社会制度、宗教信仰自由与颠覆活动，对这三个国际社会争论最多的敏感问题，周恩来坦然公正地阐述了中国政府的主张，他以坦荡的胸怀，向世界人民敞开新中国的姿态，他以一个和平的使者，欢迎所有对中国感到陌生的国家参观新中国。

他的话，简短、明快而有份量，像地球中的引力一样吸引着会场上的每一个听众。他的发言使世界各国一下子缩短了与新中国在认识上的距离，使世界直接从周恩来身上看到了中国。

为了节约时间，也为了迅速改变会场的气氛，周恩来的发言，除第一段外都由翻译浦寿昌用英文宣读。

周恩来成功了，中国代表团不负使命，他用 18 分钟的发言就驱散了两天的乌云，使会议绕过了前进中的暗礁，它使全世界都认识到新中国的真诚、善意和聪明、力量。

随着周恩来走下讲台，无数记者冲出会场，用最快的方法发布这一重大新闻，“求同存异”已经成为公认的术语，大会的主题词。

事后，印度总理尼赫鲁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演说。”缅甸的吴努说：这个发言“对抨击中国的人一个很好的答复。”就连当日上午在发言中与中国大唱反调的马尼拉罗慕洛也说：“这个演说是出色的，和解的，表现了民主精神。”

正是周恩来杰出的智慧扭转了大会的方向，促进了会议的成功，因此，亚非国家公认中国总理说的话是有权威的。这种权威代表了绝大多数代表团和所有亚非国家的意志与愿望。

互谅互让公正合理——解决中缅边界问题

周恩来 1954 年访问印度和缅甸，与两国共同倡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接着又在万隆会议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在亚非地区的影响显著扩大。但由于中缅边界问题迟迟未能解决，东南亚某些国家对中国的疑虑仍然存在，加上帝国主义的挑拨宣传，使这些国家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士有些惶惑不安。这些国家同中国之间有的也存在边界问题，有的有其他历史遗留问题，它们都希望中国能根据和平共处的原则，尽快解决这些问题。1957 年，周恩来审时度势，确定首先尽快解决为多方所关注的中缅边界问题，使有关邻国消除疑虑，安定下来；同时，通过对帝国主义侵略政策造成的中缅边界问题的合理解决，打击帝国主义的挑拨离间，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争取一个和平的周边环境。

缅甸是我们的友好邻邦。然而历史遗留下来的中缅边界问题，却极为复杂，主要问题是：1941 年线的处理，片马、古浪、岗房地区主权的收回，对猛卯三角地永租局面的处置以及北段未定界的划法。当时，我方舆论普遍强烈要求改变帝国主义侵略政策造成的恶果，而缅方有些人却强调继承英国统治时期留下的既成事实。为避免在关键问题上陷入僵局，周恩来决定分两步走。

第一步先提出一个和缓气氛的方案，即我方从有争议的 1941 年线以西地区撤回所驻军队，但缅方军队不得进入；缅方则从英国也承认主权属于中国的片马一带撤出驻军，而中方军队也不进入。由于缅方接受了这一对等的建议，遂导致了边境上和解局面的出现。

第二步是本着互谅互让的精神，就边界问题提出一个双方有取有予公正合理的连锁方案。其内容要点为：

（一）北段未定界的片马、古浪、岗房地区一向属于中国，后被英国强占，曾激起云南人民的爱国示威运动。1911 年 4 月 10 日，英国政府照会当时的中国政府，明确承认上述三地是中国的属地，但企图出钱收买，遭中方拒绝。而今中缅划界，这三个地方理应归还，以平息中国人民多年的积怨。其余北段未定界，可按传统习惯线划界，直到底富山口。（二）南段未定界的 1914 年线，是英国利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迫切需要开通滇缅公路而迫使中国政府接受的。事关我佤族所属班洪、班老部落辖区被割去一块，我佤族头人和群众强烈要求收回。中方拟用猛卯三角地与缅方交换。（三）猛卯三角地向属中国，在英国吞并缅甸后，为修建缅北八莫到南坎的公路，强要当时的中国政府将其让出作为“永租”地，这是恃强欺弱的历史陈迹。而今缅中两国均已取得独立，双方又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倡议者，如再保持“永租”关系，是与时代不相称的。但中方考虑到，如断然收回猛卯三角地，势将使缅甸北部交通面临严重困难，故愿把它留给缅方，用以交换前述 1941 年线以西的班洪、班老部落辖区。

缅甸经过反复斟酌：认为这是切合实际、公平合理的方案，表示同意接受。这就为解决中缅边界问题解开了主要症结。

周恩来曾指出，缅甸同中国一样也是长期受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对新独立的民族国家应给予同情和支持，多理解其处境和要求。在同缅方领导人会谈发生分歧时，周恩来始终坚持摆事实讲道理，进行疏导，耐心协调双方的思路，促使对方进一步考虑，从不流露火气，以免伤

害对方的民族自尊心。最后每每做到统一见解，使紧张气氛趋于缓和，从而赢得了对方的尊敬。正如奈温总统所说：周恩来总理虽然是一个大国的领导人，但与小国领导人交往时，总是平等对待。在与小国处理包括复杂问题在内的各种问题时，他总是本着最大的同情和谅解作出让步。

对边境居民的民族感情，周恩来也是十分尊重的。中缅边界是若干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两边的部落关系、家庭关系、亲戚关系，盘根错节。所以他一再强调：有的民族被边界多年分割，这是历史所造成的，想加以改变，是极为困难的，但在实际情况允许的条件下，尽量照顾其合理的愿望，设法做一定的调整，也是必要的，如佤族班洪、班老辖区的收回，即其一例。此外，在 1941 年线上还有不少骑线寨，一个村寨同一家族的人，由于住宅的位置不同，竟被划属两个国家，不仅日常生活不便，也给双方的行政管理造成了不少困难，这是帝国主义埋下的纠纷祸根。1960 年中缅边界联合委员会开会前，周恩来在上海向有关领导人当面指示：对骑线寨必须进行合理的调整，保持每个村寨的完整，分别划给中方或缅方，力求平衡，主要看大家方便，搞友谊。对大量边民过界耕地的处理，他于 1960 年 8 月 7 日在北戴河提出，可采取交换或补贴的办法，注意切不可伤害少数民族的利益和关系。

周恩来还提出，要重视促进双方边境人民间的和睦相处。于是，随着勘界工作的推进，展开了各种友好活动。两国政府分别向对方边民赠送礼物。双方边民组织不同形式的联欢。两国还各自在云南的芒市和缅甸的八莫举行了有双方边民代表参加的活动，庆祝边界问题的解决，两国总理和有关领导人也出席了。这些活动为争取边民的配合，为增进双方民族间的友好情谊做出了贡献。

周恩来还强调，我勘界人员要同缅方勘界人员友好协作，互相传授技术，共同总结经验，切不可有大国沙文主义情绪。要通过联合勘察搞联欢，搞友好。由于贯彻了这一指导思想，双方勘界人员始终在和谐的气氛中互相帮助、合作、勘界、划界、树桩等任务都完成得很圆满。

在解决中缅边界问题中，周恩来不但高屋建瓴，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和建议，他还常常及时就具体环节向有关同志咨询并给予实际指导，许多难题往往因此迎刃而解。例如关于北段未定界，周恩来曾经询问：从尖高山到伊素拉希山口一段，除片马、古浪、岗房地区外，按怒江和恩梅开江之间的分水岭为界，从伊素拉希山口到西端终点底富山口一段按传统习惯线为界，缅方是否完全赞同？我方代表回答说，缅方对该段的上述划法没有提出异议。缅方曾表示，底富山口在缅甸的传统说法即是中国山口的意思，就缅方而言，以它为终点是合适的；不过，此点涉及到同印度的边界关系，所以双方可认定这是临时终点，以等待中方同印度谈判边界时再确定最后的终点位置。周恩来认为缅方的意见是合理的，以底富山口作为临时终点是切合实际的。他提出，该点可定为北段 47 号界桩点，一定要派双方勘察人员去勘察，行动限制在中缅境内，切勿授人以柄。后来缅方受到外来压力，处境有困难，吴努来信诉说了始末，要求在议定书中不出现底富山口的名称。周恩来当即表示可只提“47 号界桩点”，并在其后加上“两端终点最后确定前的临时终点”字样。这一解决办法深为缅方所赞许。

对南段甲、乙、丙三段已定界，周恩来也作了具体指示，树立新界桩以代替过去的垒石和以小溪、小路、田埂为界的旧章，以解决边界线不易辨认的问题。

周恩来的一系列指示，对中缅边界问题的顺利解决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最后，他还适时地就中缅边界条约的写法，提出了画龙点睛、具有深远意义的构想。他指出：用新条约代替 1894 年和 1897 年的旧条约，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序言要写得鲜明，中心思想是谴责帝国主义在历史上对中缅边界所制造的纠纷。而今中缅双方本着互谅互让的精神，已将帝国主义长期遗留下来的问题一扫而光，对原来某些不合理的界线找到了合理的解决办法。双方贯彻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精神。周恩来所以强调这一主题，是为了努力推广国际关系新准则，使之发扬光大。奈温将军也认为中方的写法符合历史的事实和发展，应当受到尊重。

1960 年 10 月 1 日，周恩来总理和吴努总理在北京签署了新的中缅边界条约。中缅关系从此更加亲密，胞波情谊深入人心。

中缅边界问题的顺利解决对周围其他邻国特别是东南亚国家来说无疑是一个晴雨表。大家一致认为中国的睦邻政策取得了杰出成就；认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显示了生命力，不可低估。在这种情况下，有关邻国的情绪趋向安定，同中国发展友好关系的愿望随之上升，出现了令人鼓舞的趋势。周恩来抓住时机，因势利导，运用解决中缅边界的成功经验又接连顺利地解决了同尼泊尔、蒙古、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等国的边界问题。

耐心等候坦诚相待——敦促巴基斯坦退出军事条约集团

早在1953年12月，中国政府便向巴政府提交备忘录，对巴美谈判军事协定和巴将参加中东军事集团一事表示异常关切，因为两者都涉及亚洲稳定的问题。尤其是直接关联着中国的安全。1954年2月13日，巴驻华使馆照会答复我国政府，说明巴美签订《共同防御援助协定》是因为巴基斯坦需要得到各国包括美国的援助，以维护自己的独立和主权，巴绝对没有敌视中国的意图。同日，巴驻华大使罗查将军奉命就此事当面向周恩来作了类似的澄清。周恩来坦诚指出：巴美军事协定严重损害巴基斯坦本国人民的基本权利，并对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的安全构成新的威胁，加深了国际紧张局势。

两国总理第一次接触是在1955年4月万隆亚非会议期间。周恩来在同阿里总理的晤谈中开门见山地提出几个问题。其一是巴参加美国拼凑的矛头指向中国的东南亚条约组织。周恩来说，中国对此是不满意的。但是为了友好，我们没有公开指责巴基斯坦。其二是巴跟着又参加了受英美支配的巴格达条约组织。巴参加这两个条约组织使自己在亚洲处于难堪的地位。巴是亚洲大国，被西方殖民主义国家这样左右牵制，对巴人民是很不利的。其三是巴还同美国签订军事协定。这不仅对巴不利，也使我们感到不安。美国不仅要利用巴领土来挑拨巴同印度的关系。也会以巴为基地来包围甚至进攻中国，对中国的安全构成很大的威胁。阿里总理表示，巴人民曾长期受西方殖民主义的侵害，是反对西方殖民主义的。巴怀有同中国发展友好关系的愿望。他郑重声明，巴参加两个条约组织和它同美国签订的军事协定完全是为了防御邻国的侵略，并不是针对中国的。他还庄严保证，如果发生美国的侵略战争，巴决不参加，例如对朝鲜战争，巴就没有参加。周恩来随后在万隆会议一次全体会议上宣布了阿里总理的上述保证，阿里当场欣然予以确认。

周恩来事后曾对巴新闻工作者访华代表团说，在万隆会议上同阿里总理的接触是很有益的。双方都坦率地说出了不同意见，并找到了共同点。共同点就是彼此没有伤害或侵略的意图。友好的基础就是和平共处。他还向巴驻华大使阿哈默德说：我们是根据巴领导人所表示的这种良好的愿望来谈共同认识的，我们这个共同点是在万隆精神的基础上找到的。阿哈默德大使声明，巴不属于西方集团，一旦时机成熟，巴希望能摆脱这两个条约组织。周恩来强调说，目前要摆脱它们是困难的，但是必须摆脱。巴应把自己看作是亚洲的成员，不要做导致东南亚国家和阿拉伯世界分裂的事。

巴基斯坦同印度之间由于种种原因而长期不和。双方都竭力寻求国际支持，中国自然也是它们争取的对象。当时，中印关系非常友好，但周恩来和中国政府对巴印分歧始终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并力劝双方通过友好协商来改善关系。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说，像我们这些东方国家，过去都受殖民主义压迫，现在独立了，我们之间的問題，只要本着互谅互让的精神，应该是容易解决的。即使有分歧，也不要让它成为发展友好关系的障碍。阿哈默德大使代表巴政府对中国报纸和中国领导人严守中立未偏袒任何一方表示感谢，对周恩来真诚希望巴印友好的态度表示赞赏。

1956年10月，苏拉瓦底总理应邀访华。这是巴基斯坦政府首脑首次来访。周恩来同他进行了四次长谈。苏表示，巴对中国没有恐惧，两国间没有利害冲突。巴没有侵略野心，希望同中国友好，愿意同中国建立更多的联系，不怕英美因此生气。周恩来再次提出巴参加两个军事条约组织的问题。他说，

中国对巴没有恐惧，只是担心巴参加这两个条约组织会被美国利用来制造紧张局势，甚至在巴建立军事基地来威胁中国。周恩来说：民族主义国家想同社会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同时保持友好关系，要求独立的经济发展而不受任何一方的控制，对此我们是赞成的。但是，美国并不这样。杜勒斯公开说中立是不道德的。巴参加两个条约组织，我们还是对巴友好，因为相信你们的善意。你们愿意同双方都做朋友，也许你们在这方面能做更多的工作，可以劝说双方和缓局势、和平共处。我们希望巴基斯坦能起这样的作用，使巴参加的条约的侵略性质逐步消失。我们在思想意识上有所不同，但在政策上可以找到共同点，共同为和平和正义而努力。谈到巴印关系时，周恩来向苏拉瓦底总理转告了毛主席的意见：我们愿意劝说印巴和好，互相协商，互相妥协，我们也希望巴劝劝美国，不要同中国为敌，那样对美国不利。苏拉瓦底显然受了感动。他说他非常高兴发现能与周恩来总理像真正的朋友一样交谈，以友好谅解的精神交换意见。周恩来说，只要巴同意没有侵略的意图，决不参加侵略战争，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就取得了一致意见。苏拉瓦底主动承担义务说，一定要劝说美国同你们交换意见，和缓紧张局势。

1962年1月，我政府又要求巴方就其参加这两个军事组织同中国的关系问题有个书面谅解，并澄清以前的保证。3月19日，巴使馆送来了其政府前后一致的书面澄清。1963年3月，布托外长专程来北京签订中巴边界协定。他在同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外长的会谈中说，由于巴采取不介入反华的立场，东南亚条约组织已经失灵了，而且这种状况还将继续下去。他还说，巴格达条约组织也在起着类似的变化。1964年2月，周恩来第二次访问巴基斯坦。他由阿尤布总统陪同在达卡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公开宣布：阿尤布总统多次向他说明，巴参加东南亚条约组织和中央条约组织是为了自身的安全，巴不参加侵略战争，阿尤布总统执政以来所参加的许多国际活动和他所执行的对华友好的政策证明了他的解释是真诚的、可信的。同年4月，周恩来和布托外长同时访问印尼，同苏加诺总统会商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问题。布托对周恩来说，由于巴的反对，东南亚条约组织基本上已失去作用。美国对此十分恼火，推迟了阿尤布总统对华盛顿的访问。1966年6月，周恩来出访路过巴基斯坦。他在同阿尤布总统的会谈中指出，由于巴不参加美国对越南的战争，不积极参加东南亚条约组织和中央条约组织的活动，巴基斯坦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敬。周恩来重申，中国政府不反对巴同美国和苏联发展友好关系。他还以客人的身份到机场为东道主阿尤布总统出访苏联送行。这种不拘泥于礼宾规格的行动和坦荡无私的胸怀，使阿尤布总统深为感动。

1968年4月，巴政府决定，不再延续美在巴设立通讯基地的协议，以示对美国当时重印轻巴政策的不满。美国设在白沙瓦的这个基地遂于1970年初关闭。1972年12月，巴又宣布退出东南亚条约组织。1979年3月，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同时退出巴格达条约组织的后身中央条约组织，该组织旋于9月间宣布解散。巴先后退出这两个以美国为首的军事集团，有国际局势变化的原因，有它自身的需要，还有美国政策上的失误。但是，中国的原则立场，尤其是周恩来坚持不懈的富有说服力的工作中巴友好关系的长足发展，无疑起了重大的作用。

尊重理解不拘一格——意外事件后的特殊访问

1960年4月至6月，周恩来出访亚洲六国。1963年12月至1964年2月，周恩来出访亚非欧十四国。这两次出访留下了许多动人的故事。其中，1960年5月访问柬埔寨，1964年1月访问加纳，周恩来处处尊重东道国的安排，事事为东道国着想，圆满完成了意外事件后的特殊访问。

1960年4月，周恩来出访柬埔寨之前，忽然得到柬埔寨老国王、西哈努克的父亲苏拉玛里特陛下病逝的消息。柬埔寨在国丧期间要降半旗、举国哀悼，此时接受访问，主人担心欢迎礼仪不能尽善。当时正在印度访问的周恩来和陈毅商量后，指示外交部通知柬方，他们将率代表团专程前往吊唁老国王，同西哈努克亲王会谈，并希望柬方在接待方面从简。周恩来还指示外交部要为代表团访柬赶制素服，以示庄严隆重。柬方得知以上决定后，深为感动。

5月5日，周恩来、陈毅率代表团全体人员穿上素白礼服，登上专机。上午9时专机徐徐降落在金边波成东机场。周恩来和陈毅走出舱门，双手合十，高高举起，向热情的主人行柬埔寨礼。西哈努克在专机前带头鼓掌欢迎。他十分感激周恩来、陈毅在他和他的国家沉浸悲哀时，给予了最真诚、最难忘、胜似兄弟的友情。当天下午，周恩来和陈毅就穿着吊唁的服装到苏拉玛里特先王灵前献了花圈，举行了吊唁礼仪。

尊重、理解、不拘一格。这使西哈努克在以后几十年执政生涯里，无论太平盛世还是流离失所，始终对中国一往情深，把周恩来看成最可信赖的朋友。

1964年新年刚过，周恩来正准备从阿尔巴尼亚出发前往非洲加纳访问。1月2日，加纳发生了谋刺恩克鲁玛总统的意外事件。面临这突如其来的情况，周恩来是否还去加纳访问呢？中共中央鉴于当时刺杀事件发生不久，情况尚未完全摸清，十分关心周恩来的安全，不时来电报询问情况。恩克鲁玛则估计，在加纳这么动乱的情况下，周恩来是不会来的。

然而，周恩来从政治大局着眼，置个人安危于度外，仍旧决定去加纳访问。他派黄镇坐飞机先到加纳首都阿克拉向恩克鲁玛转告自己的建议：这次访问免去一切礼节，总统不要到机场迎接，也不要到城堡外面举行会议和宴会。黄镇还向恩克鲁玛转达了周恩来的问候。住在克里斯兴城堡里的恩克鲁玛脸上贴着纱布，缠着绷带，他听了周恩来的问候和建议，内心充满了感激之情。他没想到一个泱泱大国的总理如此尊重一个小国，如此照顾别人的困难处境。

周恩来到加纳来了。他是冒着风险来的，在困难的时候支持了恩克鲁玛。尊重、理解、不拘一格，周恩来这次对加纳的特殊访问是世界政治史上所罕见的。这次访问效果非常好，影响非常大，大大提高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非洲的形象。

反击卫边疆绿旗示友好——1962 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与战后交回缴获物资

中国和印度是相邻的两个亚洲大国和古国。两国人民在长期的交往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近代，两国人民都曾深受殖民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因而一直相互同情和支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印度获得了独立，中国得到了解放。印度是最早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国一直把建立和发展中印两同长期友好合作关系作为奉行睦邻政策的重点。但不幸的是，由于边界问题，中印关系从 50 年代末走上了曲折的道路。

中印边界问题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中印两国之间存在着传统的习惯边界线，但是两国的边界从未正式划定。所谓的“麦克马洪线”是 1911 年西姆拉会议期间，英国代表在会外，背着旧中国的中央政府的代表，同西藏地方的代表用秘密换文的方式画出的。这是英帝国主义利用当时中印两国人民处于无权状态强加给中国的，是非法的，历届中国政府从不承认。印度独立以后，特别是在中国西藏地方和平解放前后，印度把它在东段的实际控制范围从传统习惯线逐步地向北推进到所谓“麦克马洪线”附近；在中段和西段，直到 1959 年以前，除个别地点外，中印双方的实际控制范围基本上是符合传统习惯线的。1960 年 4 月，周恩来访问印度，在机场发表讲话说：“目前，我们中印两国都在进行着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我们都需要和平。我们都需要朋友。和平友好是我们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共同倡导了关于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我们之间的一切问题没有理由不可以根据这些原则，通过友好协商，取得合理的解决。中国政府一贯主张两国总理会谈，谋求合理解决边界问题和其他问题的途径。这一次我是抱着解决问题的真诚愿望来的，我衷心希望我们的会晤在我们共同努力之下，能够产生积极的和有益的效果。”在印度，周恩来与尼赫鲁总理就中印边界问题举行了七次会谈。周恩来提出，为避免冲突，保持边境安宁，双方边境部队可以自双方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一定的距离，在边界上建立一个非武装区。印度方面没有接受。周恩来又提出，双方的边境部队在全线停止巡逻。印度方面表示，在东段可以不巡逻，但是在西段不提停止巡逻，而提尽力避免接触。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数次建议成立中印边界问题联合委员会，但被印度方面拒绝。

周恩来访问印度后，中国政府本着睦邻友好和中央关于处理与邻国边界问题的方针，与印度政府外交方面的交涉与斗争一直在进行着。同时，为了避免边境纠纷的扩大，中国政府单方面执行在实际控制线本侧 30 公里地区内，不打枪、不巡逻、不狩猎，不越出边界活动警戒线的规定。

印度政府视中国政府的一切做法于不顾。从 1961 年起，印度军队频繁地发动武装进攻，不断向中国境内入侵，在东段已越过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在西段也陆续设立了 43 个侵略据点。这些据点有的接近到中国哨所只有几米的地方，有的甚至设立到中国哨所的后面，切断了中国哨所的后路。中国的边防哨所与印度的侵略据点形成犬牙交错的局面，边界已不是一条线了。印度的气焰非常嚣张，想通过这种方式入侵西藏，迫使中国承认印度所谓的中印边界线和“麦克马洪线”。

对印度政府在中印边境挑起的武装冲突，中国政府一忍再忍，命令我边防战士不开枪，不与印度发生军事冲突，印度军队向我们进逼时，我们退让，以期望印度政府能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本着互谅互让的精神来解决两国

的边界问题。但是印度政府置若罔闻。1962年9月20日，盘踞在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北中国领土地区的印度侵略军，不断向中国边防部队发动武装攻击，打死、打伤几十名中国边防人员。为此，中国政府先后向印度政府提出了7次严重的抗议，并要求其军队立即停止进攻。印度政府把中国政府的克制忍让视为软弱可欺，无视中国的多次抗议和警告，恣意扩大侵略。10月12日，尼赫鲁宣布，他已下令要把中国军队从他所谓的入侵地区“清除掉”。17日，印度军队在中印边界东、西两段开始猛烈炮击，中国边防部队遭到严重伤亡。这就触发了中印边境的大规模武装冲突。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10月20日，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了自卫反击。

周恩来于10月24日致函尼赫鲁总理，向他提出中国政府关于停止边境冲突、重开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三项建议。中国的这三项建议被印度政府拒绝，并采取了一系列严重挑衅步骤。11月14日，印度军队再次发动大规模进攻。中国边防部队坚决自卫反击。自卫反击战在党中央、毛泽东、周恩来的领导下，很快就取得了胜利，中国边防部队粉碎了印度军队的入侵，清除其设立的侵略据点，并追击到传统习惯线附近。

为了再一次用实际行动表示中国主张通过和平谈判而不是通过武力来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诚意，并出于保持中印友好关系的愿望，中国政府于11月21日发表声明宣布：从次日零时起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从1962年12月1日起，中国边防部队将从1959年11月7日存在于中印双方之间的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在东段，中国边防部队虽然至今是在传统习惯线以北的中国领土上进行自卫反击，但仍准备从目前的驻地撤回到实际控制线，即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北，并且从这条线再后撤20公里；在中段和西段，中国边防部队从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为了保证中印边境地区人民的正常往来，防止坏分子的活动和维持边境的秩序，中国将在实际控制线本侧的若干地点设立检查站。

声明发表后，周恩来即命令前线部队将缴获的印军武器、弹药和其他军事物资一一造册登记，并讲明，让印军打着绿旗前来领回。

为什么战败者不打白旗，而是打绿旗呢？周恩来自有他的考虑。打白旗意味着投降，打绿旗则意味着和平。这场战争是印军入侵我国领土挑起的，最终以我方自卫反击成功而告结束，让对方打着绿旗领回被缴物资，既是给对方一个台阶，也是表明我们追求和平，愿与印度友好相处的诚意。由此可见，中国始终以两国友好睦邻的长远利益为重。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1963年2月28日，中国边防部队完成了主动后撤的计划。这样，中印边境事实上不但实现了停火，而且实现了双方武装部队的脱离接触。周恩来还指示，对死亡的印度军队官兵均按印度的礼仪进行火化；对战争中负伤印军官兵给予医治；对被俘人员给予人道主义的优待，发给路费、日用品、衣服；组织被俘的印军高级军官到内地参观、游览，让他们亲眼目睹中国人民热爱和平、反对战争的愿望。1963年4月，中国方面宣布释放和遣返全部被俘的印度军事人员，并归还冲突中所缴获的武器、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

这样做，最初有些同志想不通，思想上结了疙瘩。是呀，为什么打了胜仗，部队要回撤，为什么把已收复的被占领土又退回去，为什么缴获的武器又还给印方？为什么……

见此情形，周恩来就耐心地启发大家，要大家从全局、长远的战略上考

虑问题，要大家认真贯彻毛主席、党中央的战略方针和政策，要大家以两国友好睦邻的长远利益为重。他还多次在各种会议上讲解停战、撤军、交还武器弹药的道理，并责成前线作战部队做好下层官兵的宣传教育工作。在周恩来的循循善诱下，思想上有疙瘩的同志解开了疙瘩，提高了认识。

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的胜利，保卫了中国的领土完整和边境安全。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政府为争取和平所作的种种努力，也得到了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的同情和称赞。反击卫边疆，绿旗示友好，体现了周恩来高瞻远瞩、一切从大局出发的战略眼光。

判清形势胸有成竹——1962 年处理卢绪章访英受阻问题

进入 60 年代以后，中英两国关系渐渐开始修好。1962 年，发生了中英两国政府处理中国外贸部副部长卢绪章访英一事的外交纠葛。周恩来在这件事情的处理过程中统筹全局，胸有成竹，显示了非常练达的外交谋略。

1962 年 9 月，英国贸易大臣埃儒尔通知中国驻英代办熊向晖：英国政府邀请中同外贸部副部长卢绪章于当年 12 月访英。熊代办马上请示国内，然后告知埃儒尔：中国政府感谢英国政府对卢的邀请，卢将如期访英。埃儒尔听后非常高兴，他说：“这是英中关系中的一件大事，英国政府将于 3 天内发布消息，希望中国政府也同时发表消息。熊向晖表示，中国将按本国惯例行事，英国如何处理此事由英方决定。很快，英国政府于第二天即宣布了此事。

不料，事过一月不到，即同年 10 月，《苏格兰人报》称英国政府对中同外贸部副部长访英事将另作考虑。熊向晖获知后马上往见埃儒尔，要他澄清此事。埃儒尔说：这完全不是事实。英国政府对卢副部长的邀请以及访英的日期不会改变。但过了几天，埃儒尔紧急约见熊向晖：英国政府决定无限期推迟卢的访问，半小时后就正式宣布。他个人认为，这不是由于政治原因。这时，熊向晖压住愤怒，向埃儒尔指出：英国政府出尔反尔，使我惊讶。卢的访问日期是英国政府提出，中国同意的。现在英国政府不同中国政府商量，单方面决定无限期推迟，而且马上就要宣布，对这种不正常的作法，我个人表示遗憾。我将报告本国政府，并保留进一步评论的权利。

熊向晖回到代办处以后，召集主要外交官开会，然后急电外交部和外贸部说明情况，并提出三点建议：（1）向英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2）主动宣布取消卢绪章的访问；（3）削减从英国的进口。很快，外交部复电如下：同意熊的表态，并再以中国政府名义向英方重申，但不提保留进一步评论的权利；三点建议不妥，不予采纳，要熊联系我国总的外交政策和对英工作方针进行研究考虑并复。当时，熊向晖感到不能接受，在给外交部的复电中表示服从部里决定，今后将在实际工作中加深对我同外交政策和对英方针的理解。但是，熊向晖尚不清楚，外交部的这个复电是根据周恩来的意思拟的，而“联系我国总的外交政策和对英工作方针”这句话含义根深，除了包括争取欧洲的策略外，还隐含着一个重要事件：即同月中印边境武装冲突加剧，中国开始反击，而印度又是英联邦中的一个重要成员。

1963 年春，卢绪章应邀访英取得成功，这年秋，熊向晖回国休假，周恩来找他谈话，提到此事。周恩来说，去年你提出三点建议，当时外交部和外贸部基本同意，到我这里挡住了，我让外交部给你泼了冷水，希望你考虑考虑。从你的电报看，你思想不通；我没有再跟你打“电报官司”，现在我问你，当时提出这三点建议，出于什么考虑？

当熊向晖对总理汇报了当时的想法时，周恩来回答说：针锋相对要看全局，美国对我们封锁禁运，英国却邀请我们外贸部副部长访英，这就有区别，有矛盾，先要抓住这一点。印度是英联邦的重要成员。中印发生武装冲突，英国要是按原计划邀卢绪章访英，就不好向印度交代。他们的态度有反复，说明内部有争论，他们决定无限期推迟，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中印冲突会持续多久。它只是推迟，留有余地，你为什么取消，把文章做绝呢？当然，英国的做法不大对头，你向埃儒尔指出来，表示遗憾，这很好，再用政府的名义口头重申一下就够了，何必小题大作提抗议？我们的建设以自力更生为

主，也要在平等互利的原则基础上发展对外贸易。这在开国的时候就宣布了。进口的东西都是我们需要的。突然削减进口，首先对我们不利。英国同我们做生意的都是私营企业，对我们的态度比较友好，削减订货，受损失的是他们，还会落下一个不遵守合同的坏名声，你想到这些没有？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我还是提一提，你有什么意见？……

熊向晖一听，豁然开朗，说明是原来的想法和建议错了。最后，周恩来又语重心长地说：我记得你是 1919 年出生的，已经不是少年，有时还那么“气盛”。外交工作不能意气用事，要有全局观点，从多方面考虑。我这样讲讲，是希望你成熟一些，但不要因此就不勇于提出建议。

一席话说得有情有理，其中包蕴着丰富的策略思想，这件事情处理得非常圆满。

民间先行以民促官——推动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

1951年9月，在旧金山召开的和会公然排斥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订了片面的对日和约。当时的日本政府违背人民意愿，采用错误的对华政策，同台湾当局建立与保持“邦交”，致使中日关系处于极不正常的状态。

在此背景和形势之下，要打开两国关系的僵局，只能先从民间做起，运用人民友好的伟大力量，逐步积累和创造条件，进而推动官方关系前进，即采取“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方针。对于这一方针，周恩来作了精辟的论述：从展开中日两国经济、文化交流开始，从增加人民交往开始，从增进民间团体协商开始来打开中日关系。只要人民互相来往通商、友好合作，日本人民的大多数就会认识到中日之间恢复邦交首先对日本人民有益，对中国人民也有益，从而推动日本政府改变政策。他还指出：尽管中日两国还没有恢复正常关系，而且按照国际法还存在着战争状态，但是这些并没有妨碍两国人民的友好活动和签订民间协议。这样先从民间的频繁来往并且达成协议开始，把两国关系大大地发展，最后就剩下在外交上宣布结束战争状态、恢复正常关系了。稍后，他又满怀信心地预言：“照国民外交方式搞下去，日本团体来得更多，我们的团体也多去，把两国要做的事情都做了，最后就只剩下两国总理外长签字喝香槟酒了。”针对人民友好运动中的一些认识问题，他反复强调“两个区分”的思想，即“要把帝国主义的政府和这些国家的人民区别开来，要把政府中决定政策的人和一般官员区别开来”，以此增强我国干部和广大群众从事人民外交的自觉性，消除日本人士中的某些疑虑。这就使双方的民间友好往来有了比较牢固的思想基础而逐步开展起来。

1952年5月，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日本客人国会议员帆足计、高良富和宫腰喜助绕道欧洲来华访问，签署了第一个民间贸易协定。此后，在两国人民共同努力下，第二、三、四次民间贸易协定又相继产生（第四次民间协定后来遭到日本政府阻挠，未能执行）。从1953年起，中国方面本着人道主义精神分批护送近4万名日侨回国。1955年，中日之间签订了民间渔业协定，使大批日本渔民和中小渔业企业能来我国东海、黄海捕鱼，得以维持生计。1956、1957年，中方又先后宽大处理并释放了1062名日本战犯。在此期间，双方民间代表团来往频繁，人数日增，交流面涉及经贸、文化、体育及工、青、妇等众多领域。所有这一切大大促进了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和感情联系，尤其在日本涌现了一批致力于重建日中关系的志士仁人，形成了一支包括各阶层人士的极其广泛的对华友好力量。这些民间活动、民间力量总是同官方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因而也对官方关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周恩来对此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人民外交大大推进了两国关系的发展。我们这样的做法在国际关系上创造了新的范例。我们是抱着这样愉快的有希望的心情来进行国民外交的。”

在大力开展国民外交的同时，周恩来也十分重视与日本官方的联系及对他们的争取工作，并为此倾注了大量心血。早在50年代初，他就明确宣告：“我们主张恢复与世界各国的正常关系，特别是与日本的正常关系。”在我们民间代表团访日或双方谈判、签署民间贸易协定时，周恩来都曾指示，要贯彻“民间来往，官方挂钩”的方针。他说：“因为谈判民间贸易已经触及互设贸易代表处乃至政府贸易协定等问题，没有政府的支持、保证是不可能的。归根到底，解决两国关系问题还是要由政府来办。”按照周恩来的指示，

我赴日谈判第三次民间贸易协定的代表团成员都在名片上写明官方和民间双重身份，而且把官方头衔摆在前面。代表团在日期间会见了鸠山内阁的大臣和执政党的负责人，主动邀请政府人士参加我招待会，从而开创了官方接触的先例。

在主动争取官方的过程中，周恩来反复强调，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对中日都是有利的，应请双方来做，而不应该只看作一方面的事情，以此敦促日方采取行动。1954年12月，他在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郑重宣布：“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在遵守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一切国家建立正常关系。我国是愿意同日本建立正常关系的。如果日本政府也能抱有同样的愿望并采取相应的措施，中国政府准备采取步骤来使中国同日本的关系正常化。”1956年1月，他在政协二届二次会议报告中进一步建议两国政府就中日关系正常化问题进行商谈。报告提到，我国政府曾两次通过外交途径向日方表示，“中日两国政府就促进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进行谈判的时机已经成熟”，“如日本政府也具有同样的愿望，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途径是可以找到的”，“中国政府欢迎日本派遣的代表团在北京就促进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进行商谈”。遗憾的是，当时的日本政府对中方的一再呼吁并未作出响应。

在争取官方的过程中，周恩来坚持对日本政府错误的对华政策及行为进行针锋相对而又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认为这是促进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必要手段。1958年，我一赴日展览会展厅的国旗被日本暴徒撕毁，我国尊严遭到损害。此即后来所称的“长崎国旗事件”。日本官方处理此事时轻描淡写，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为此，陈毅外长受周恩来之命迅即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谴责岸信介内阁的错误态度，并宣布采取一系列必要的反击措施。其中包括废除中日之间关于钢铁贸易等长期协定，不再延长到期的渔业协定，中断和取消多批访日代表团的安排，停止接待民间或与官方关系不大的代表团之外的任何日本访华团，等等。中国方面的坚定立场和有力措施在日本朝野引起极大震动。一些有远见的政治家和贸易界人士挺身而出，为扭转两国关系的险恶状况而奔走呼号。在此情况下，我方因势利导，提出了打开僵局的“政治三原则”，要求日方：不执行敌视中国的政策，不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不阻碍两国关系正常化。其后，周恩来在会见贸易界人士铃木一雄等日本朋友时又提出“贸易三原则”（即政府协定、民间合同、个别照顾）和政经不可分的思想，强调贸易三原则必须与政治三原则相联系。与此同时，他还亲自邀请自民党的有识之士石桥湛三、松村谦三等元老访华，经过坦诚而深入的讨论，双方同意按上述原则和精神，以渐进积累的方式努力改善两国关系。周恩来着重指出，“两国关系应建立在政治三原则基础上。政治关系、经济关系既要能结合起来发展，也要能平行发展，而且这两方面要能够相互影响、相互促进，而不是相反。”正是周恩来这种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加上日方友好人士的配合，两国关系得以克服障碍、向前发展。岸内阁之后的池田内阁时期，两国签署了备忘录贸易协议、双方互设了贸易办事处，有了半官半民的联系渠道。中日关系由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进入70年代，随着整个国际局势的演变，日本各界和广大人民要求恢复中日邦交的运动愈加高涨，规模更加浩大，汇成了不可阻挡的潮流。周恩来抓住时机，积极推动愿为日中复交而努力的田中首相访华。1972年9月29日，两位领导人经过谈判签署了邦交正常化的联合声明。至此，周恩来在50

年代所设计的由人民外交做起推动官方关系不断改善，最后由总理和外长签字，喝香槟酒的蓝图终于成为现实。

邦交正常化后，有人一度认为“民间外交业已完成历史任务”。周恩来针对这一倾向又及时提出了“官民并举”和“不忘老朋友、广交新朋友”的方针。他指出，民间外交与官方外交是相辅相成的，“民间外交继续发展可以使官方外交基础更加牢固；反之，官方外交开展了，又可以为民间外交提供更为有利的方便条件。”他指示有关部门有计划地邀请那些长期以来为日中友好而尽力的日本老朋友来北京，由他亲自做工作。他真诚表示，“饮水不忘掘井人”，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老朋友，永远感激老朋友，鼓励他们为巩固和发展两国友好关系而继续努力。

源远流长的人民传统友谊是推动中日关系前进的巨大内在动力，而周恩来率先倡导并身体力行的人民外交以及多渠道、多层次的民间交流，则在其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历史性重要作用。

见机而行鼎立推动——1969年9月在北京机场会晤柯西金

当我们的人民共和国跨入建国20周年的时候，由于各种复杂的因素，中国与苏联两国之间的关系已处于极为紧张的状态，1969年3月发生了严重的边界武装冲突。乌苏里江的枪炮声告诉人们：两个社会主义大国的关系恶化到了战争的边缘，进入了历史最低谷。

边界上的流血事件是很容易激起民族感情的，然而对负责的政治家来说，这时需要的不是感情冲动，而是冷静的思考。经过权衡利弊，中苏两国政府终于在3月29日和5月24日先后发表声明，表示希望通过谈判解决冲突。

1969年9月11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赴越吊唁胡志明主席之后“途经”北京，同中国政府总理周恩来在机场进行了一次不同寻常的会晤。在这次历时3个半小时的会晤中，两位政府首脑集中就双边关系中一些带有紧迫性的重大问题交换了意见。

中苏边界武装冲突后两国关系更趋紧张。就在这次会晤前的一个月里，苏联方面已经在向美国进行如果苏联对中国的核设施发动袭击，美国会作何反应的试探了。国家安全受到如此严重的威胁，中国不能不认真对待。周恩来在会晤中开门见山地向柯西金指出：“你们说，你们要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来摧毁我们的核基地，如果你们这样做，我们就宣布，这是战争，这是侵略，我们就要坚决抵抗，抵抗到底。”

谈到战争，中国历来愿意同所有国家，首先是邻国其中包括苏联睦邻友好、和平共处，更何况中苏发生边界冲突时正值中苏内部动乱。国内的不安定迫切要求有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以便集中精力首先解决好内部问题。所以，周恩来直言相告：“我们现在自己国内的事还搞不过来，为什么要打仗呢？”他恳切地再一次阐明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即中苏之间的争论不应该妨碍两国国家关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正常化。中苏两国不应该为边界问题而打仗。边界问题应该通过和谈求得公正合理的解决。

至于边界问题，鉴于已经发生了流血事件，周恩来指出：当务之急是在谈判解决问题以前首先采取临时措施，使双方武装力量在争议地区脱离接触，避免武装冲突，维持边界现状。他建议双方首先就此签订一个协议，并进而恢复解决边界问题的谈判。

显然，中国的“冷处理”建议是有助于缓和边界局势的。对这一合理合情的建议，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明确表示同意，并同中国总理达成了谅解。在这种气氛下，两位领导人还就恢复互派大使（从1966年起两国在双方首都只保留代办）、扩大贸易、改善两国间的通车通航及界河航运等缓和国关系的措施交换了意见并取得了一致。最后周恩来提议，以两国总理互致信件的形式作为双方政府间的换文，对这次会晤中达成的谅解予以确认，即把会晤的成果肯定下来。对此，柯西金主席当场表示同意。这样，在会晤结束时，双方对取得的结果都感到满意。

1969年9月18日，按照事先商定的办法，周恩来致信柯西金，归纳和概括了中国政府的有关立场及9月11日会晤时双方一致达成的谅解。不久，柯西金复信通告中国方面：苏联政府已采取措施，向边防部队下达了4点指示，以缓和边界局势。

由于双方都采取了措施，边界上不再打枪，紧张局势相对缓和下来。接

着，中苏边界谈判在北京恢复。这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中国既要在南边抗美援朝，又不得不对北方加强防备的双重压力。

在国家关系方面，根据两国总理达成的协议，1970年10月至11月间苏中两国新任大使分别到任，从而结束了一段时间内中苏关系事实上降格为代办级的局面。

在双边贸易方面，中苏于1970年11月恢复了已经中断两年的签订年度贸易协定的做法，从而使1971年的贸易额以比前一年增长两倍半的幅度开始回升。与此同时，两国间的空中与界河航运，经过谈判也开始得到改善。

由此可见，当1969年中苏紧张关系大大加剧的严重时刻，是周恩来同柯西金的会晤及其达成的谅解，把两国关系从战争的边缘拉了回来。尽管那以后两国关系在紧张方面仍表现出相当大的惯性，然而毕竟开始了一个虽然缓慢，但却是朝着走出谷底方向发展的过程。除了双边关系外，这次会晤的影响所及，对推动苏美中大三角关系的确立也产生了明显的作用。

1969年9月12日，中国新华社播发的中苏政府首脑在北京会晤的消息，在世界上引起了震动。大洋彼岸的中国对手——美国的某些人乍获得这一信息即感到非同小可，紧接着10月中苏边界谈判的恢复更使他们感到了问题的紧迫性。原来，为了早日从越南战争的泥潭中脱身，为了在全球争夺中处于有利地位，美国总统尼克松上任后不久即在调整对华关系方面开始有所考虑，9月9日，这位不常接见本国驻外大使的总统难得会见了驻波兰大使小沃尔特·斯托塞尔，并把建立接触和恢复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提出来。正当此时，中苏政府首脑在北京会晤及中苏边界谈判恢复的消息传来，顿使尼克松总统感到良机坐失的危险，随即下令基辛格给已在任上的美国驻波兰大使接连发去三封电报，促其加快行动。1969年12月3日，中美两国外交官一起出现在华沙文化宫举行的南斯拉夫时装表演会上。当美国大使见中国代办雷阳同翻译离席时，便马上跟了出来。由于代办已坐进轿车，这位大使一把拉住中国翻译，急切地用波兰语作了自我介绍后说，他最近刚从华盛顿回来，得到了同中国大使馆建立接触的指示。中国翻译有礼貌地答应代为转达后便匆匆离去了。两天后，斯托塞尔大使接到中国大使馆的正式邀请。1969年12月11日，他来到中国驻波兰大使馆，成为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第一位进入我驻外大使馆的美国使节。不久，中美大使级会谈恢复了。从中国方面来说，尼克松总统入主白宫前后向中国发出的一系列信息已经引起毛泽东、周恩来的注意。一个新的战略构想正在酝酿中。可以说，从此以后，中国对苏关系的每一个动作，都同时具有对美关系的意义。边界冲突后同意举行中苏政府首脑会晤是这样；当察觉到苏方从政府首脑会晤的立场后退时，周恩来在1969年10月6日致柯西金的信中仍然同意恢复边界谈判也是这样。当时在外界看来，这意味着中国“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务实派控制着外交政策”。在周恩来看来，这样做的结果是，既可减轻中苏紧张关系对中国的压力，又可为打破中美关系的僵局创造条件。这一战略构想充分显示了中国领导人的外交艺术，而既是决策人又是执行者的周恩来在其间纵观风云、运筹帷幄的重大功绩是不言而喻的。由于当时明确这一外交战略的尚限于最高决策层，一般的外交人员还没有必要的思想准备，所以华沙那戏剧性的一幕虽曾使那位美国大使急出了一身汗，可他何曾想到他的举动，用后来周恩来对基辛格讲的风趣话说，差一点使中国代办得了心脏病。

1969年3月，中苏矛盾的激化成为触发美国调整对华政策的重要因素之

一。4月，美国便以委婉的外交辞令向苏联作了暗示。7月，又宣布了自朝鲜战争以来的第一次放宽对华贸易限制。美国的举措促使苏联在对中国发出核袭击威胁的同时，提出了同中同领导人接触的建议。如所预料，中苏政府首脑的会晤及边界谈判的恢复又加快了美国走向中国的脚步，导致了中美接触的恢复和美国宣布进一步放宽对华贸易限制。

应当指出，当年的苏美都由接近中国，三国之间关系的相互影响已表现得十分充分。无怪乎连基辛格也感到：“到了1961年底，美国同共产党世界的关系就慢慢地演变成三角关系了。”

从70年代初起，随着中美关系大门的打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新中国进一步增强了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并迎来了对外关系全面发展的时期。大三角关系的形成则在世界局势中增加了新的稳定因素。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总理周恩来被看作是“开创了今天的全球平衡”的“关键性外交事件的中心参加者”。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处理中日两国间的历史问题

无论邦交正常化之前还是之后，如何对待两国间的历史问题，即如何评价与处理历史上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及其后果的问题，一直是中日关系中的重要问题。这个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不断前进，反之就会出现波折。周恩来以其深邃的历史感，运用“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句富于哲理的中国古训，为双方正确处理这一问题提供了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并在实践中反复阐述、贯彻始终，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周恩来 1972 年在欢迎田中首相的宴会上特别指出，“自 1894 年以来的半个世纪中，由于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使得中国人民遭受重大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样的经验教训，我们应该牢牢记住。”

根据周恩来的论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中心思想是中日人民都应从过去那场战争中吸取惨痛的经验教训，共同努力来防止历史重演，以保证两国今后世代友好相处。为此，首先要如实承认那是一场由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它给两国人民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损失。正如周恩来对日本朋友所说，“过去的事实还是事实，历史是存在的”，决不能掩盖和否认。其次要明确，那场战争“是日本军国主义的责任，不是日本人民的责任”，广大日本人民是愿意和平、热爱和平的。把日本人民与军国主义区分开来。再次应看到，虽然两国间有过长达半个世纪的不幸时期，但与 2000 多年的友好交往历史相比还是短暂的，因而坚信中日双方是“能够友好的”。最后，为了重建中日友好，关键是要牢牢记住历史的经验教训，采取向前看的态度，举一反三，恰当地处理相互之间的各种问题。

宽大处理已有悔改表现的日本战犯和战俘，主动邀请日方旧军人访华，就是周恩来按“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精神处理两国间历史问题并取得成功的突出事例。

50 年代初，我国关押着 1100 多名日本战犯和战俘，其中大部分是新中国成立后苏联政府移交我方的，其余则是抗战胜利后残留在阎锡山军队中被我方俘获的日本官兵。如何处理这批人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这些人在战争中大多犯有不同程度的罪行，中国人民对他们深恶痛绝，切望政府严惩，这是完全正当的。周恩来深深理解中国人民的情绪，同时根据“责任不在人民”和“两个区分”的精神，从中日关系的长远利益考虑，多次指示并亲自组织有关部门反复研究，最后确定了区别对待、分两步走的方案。即对其中职位较低、已有悔改表现的人免于起诉，予以遣返；对少数职位高、罪行大而又坚持反动立场的人则进行公审并依然判刑以后又根据他们的悔改表现及身体情况，分批提前释放。这种做法既确认了日本军国主义和当事者的侵略罪行，又体现了中国人民宽大为怀、不念旧恶的气度，高瞻远瞩、通情达理，赢得了日本各界的普遍好感、对增进中日人民的友情起了积极作用。在此前后，有一批曾参加侵华战争的日本旧军人希望访问中国。周恩来获悉后，即于 1955 年底指示廖承志向正随前首相片山访华的前陆军中将远藤三郎发出邀请。1956 年 8 月，远藤冲破重重阻挠率 14 名前日本高中级军官来访，并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接见。这些人来华前虽有某种悔罪之情，但我仍有较大的疑虑和偏见。由于周恩来等领导人亲自做工作，加上访问中亲眼目睹新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亲身感受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宽宏气度，他们深为感

动，纷纷表示要为促进日中友好而努力。其中不少人后来一直活跃在日中友好运动的第一线，有的还成了坚定的骨干。昔日的侵略军人变成了友好使者，这一事实显示了周恩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巨大精神力量。

如果说周恩来在处理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时总是从大局出发，向前看的话，那么，他对日本方面任何企图抹杀或减轻侵华历史及其罪责的言行也是毫不姑息的。因为只有不忘前事，才能以之为师，正确处理后事。他对田中首相一段话的批评就是这种态度的典型表现。当时，田中正为谈判两国关系正常化而访华。他在周恩来的欢迎宴会上致辞时就日本侵华的历史说道：“遗憾的是过去几十年之间，日中关系经历了不幸的过程。其间，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麻烦，我对此再次表示深切的反省之意。”周恩来在同田中会谈时针对这段话坦诚指出：“田中首相表示对过去的过程感到遗憾，并表示要深深的反省，这是我们能够接受的。但是‘添了很大的麻烦’这一句话，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感。因为普通的事情也可以说是‘添麻烦’，‘麻烦’在汉语里意思很轻。”田中解释道，“可能是日文和中文的表达不一样。从日本来说，‘添麻烦’是诚心诚意地表示谢罪之意，而且包含着保证以后不重犯，请求原谅的意思。”他表示，“如这样的表达不合适，可以按中方的习惯改。”最后，中日联合声明对这个问题作了如下表述：“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这就较好地体现了愿以前事为师的精神。现在，由于双方共同努力，中日间历史问题的处理已基本告一段落，但尚未完全解决。日方不能正确对待过去军国主义侵华那段不幸历史的情况仍时有发生，常常影响着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因此，如何继续本着周恩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精神处理好这些问题仍然是对日工作的重要任务。

如今，中日友好的高楼已经矗起，两国之间的关系正在继续发展。我们缅怀周恩来为此所作的历史性贡献，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学习、继承、发扬他的外交思想、风格和艺术，努力工作，使中日关系沿着正确的航道不断前进，以利两国人民的世代友好，以利亚洲与世界的和平。

战略侦察摸清底细——赫鲁晓夫下台后访问苏联

周恩来同赫鲁晓夫有过多次接触。一次，毛泽东向赫鲁晓夫介绍说：“周恩来很有才干，在大的国际活动方面，他比我强，很善于处理各方面的关系，灵活地解决问题。”赫鲁晓夫听后很钦佩地说：“周恩来是世界闻名的大外交家。”

50年代后期，周恩来同赫鲁晓夫有过多次面对面的争论。1957年1月，周恩来在莫斯科就苏联兵临华沙，对当时的波兰施加军事压力，向赫鲁晓夫提出了批评，指出，“这是行不通的，不符合兄弟国家之间的关系准则。”赫鲁晓夫听不进批评，反而说周恩来是“教训”他们。1959年9月底，赫鲁晓夫访美后来北京。在谈及当时中印边境冲突时，赫鲁晓夫指责中国“是为了一块不毛之地把尼赫鲁推向西方。”周恩来据理进行了反驳。

1960年，赫鲁晓夫下令撤走全部在华苏联专家，使许多苏联援建的工程被迫中断，给中国造成了严重的困难。此后，中苏两党、两国关系进一步冷淡下去。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中共中央决定借庆祝十月革命47周年的机会派团去苏联看看。事先和几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打了招呼，他们也都同意派人去。11月5日至13日，应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邀请，周恩来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作了一次不同寻常的莫斯科之行。周恩来把此行的任务叫做“战略侦察”，一个是看看赫鲁晓夫是怎么下台的，但更重要的是看看苏共新领导今后会推行什么路线，中苏两党两国关系能不能得到改善。

在莫斯科期间，周恩来会晤了勃列日涅夫和苏共其他领导人，同他们交换了意见。苏共新领导表示他们和赫鲁晓夫的分歧是在内政方面，不是在外交方面。周恩来很快得出了结论：苏共是换汤不换药，大国沙文主义的立场没有改变。在这期间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在一次酒会上对贺龙元帅说：“我们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的毛泽东呢？苏中关系不好就是他们两个人搞的！”贺龙通过翻译立即把他顶了回去，并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就此事向苏方表示了不满，指出这是苏方在挑衅，同时马上报告了毛泽东。

此次莫斯科之行，就改善中苏关系来说，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就“战略侦察”来说，则做到了不虚此行。

以小见大由彼及此——运用“乒乓外交”推动中美往来

周恩来是一位重视全民体育运动的国家总理，1969年10月的一个晚上，周恩来在宴请刚果总理的宴会上，用充满信心和关切的声音向体育工作者敬酒：“请同志们加紧训练，恢复技术水平！”接着，1971年春，中国乒乓球队参加了在日本名古屋的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临行前，周恩来意味深长地对代表团说：“这次如果我们派乒乓球队出去，是代表国家的，也是代表人民的，在比赛中就要接触许多国家的代表队，其中也包括美国队，我们总是要和他们接触的。”这段话，离毛泽东与斯诺谈话刚过三个月。

巧得很，1971年4月2日，在日本三重半岛的海湾上，中美两国代表团在游艇上相遇了。这时，热情开朗的美国选手毫无拘束地开口了：“嗨！你们中国队的球打得真漂亮，找个机会，也和我们打几盘吧！”“好，好。”中国青年含笑答应。“听说你们已经邀请我们的朋友（指加拿大和英国队）去你们国家访问了，什么时候轮到我们去呀？”“会去的，总有一天你们会去的。”

美国青年听了答复非常高兴，连声说：“Good！Good！”中国青年也应之以“好！好！”

这次接触立即被报知北京。两天后，又发生了一件更新鲜的事：美国队员格伦·科恩跳上了满载中国队员的大轿车，这时，庄则栋送给科恩一幅杭州织锦——黄山风景画。此举使中国领队深感不安，哪知他向国内请示后，得到的答复是：周总理不仅批准了这种友好交往，而且要中国领队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

小小乒乓球“乒”的一声，震动了地球对面的美国，也震惊了全世界。美国总统尼克松当天晚上就召开了特别会议。然后，16名美国运动员组成的代表队通过香港的罗湖桥，担负起“先遣队”的特殊使命。

4月14日，即美国代表队来访4日之后，周恩来高兴地接见了美国运动员们，他说：“你们为中美两国人民的关系揭开了新的篇章，我相信，我们友谊的这个新开端必将受到两国大多数人民的支持！”他停了一下，然后问道：“难道你们不同意我的话吗？”美国客人立即报之以热烈的掌声。其间，周恩来还回答了一位美国青年所提出的“嬉皮士”问题。

就在周恩来接见美国乒乓球队的同时，美国白宫也在密切注视着这一重要活动。周恩来讲话后不到几个小时，白宫就宣布了旨在缩小两国间鸿沟的一系列开禁措施：放松美国对中国实行了21年的禁运，对愿意访问美国的中国人可以加快发给签证，放宽货币管制，……尼克松还高兴地宣布：“美国的对华政策已经打开了坚冰，现在就要测水有多深了！我希望，其实我是期待着，有一天我将以某种身份访问大陆中国。”

小球推动大球获得成功。3个月后的7月9日清晨，尼克松总统的特使——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秘密抵达北京，同周恩来进行了高级会谈。

抓住时机实现对话——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尽人皆知的历史原因，中美两国的关系和人民交往隔断了20多年。在此期间，美国政府对华采取封锁、孤立、遏制和敌视的政策。随着世界局势的变化和美国上述政策的日益破产，70年代初出现了打开两国关系的历史性机会。当时身为我国外交政策主要制定者和执行者的周恩来，敏锐地抓住时机，协助毛泽东主席作出了打开对美关系的战略决策，并亲自付诸实践，使两国进入了一个逐步加强接触和实现关系正常化的新时期。

早在1969年初，周恩来就看到了美国调整对华政策的苗头，提示有关部门加强研究美国的政策动向，摸清美国的战略意图，探讨同美同接触的可能性。事态的发展完全证实了周恩来的预见。

尼克松入主白宫后多次表示要与中国接触，示意把改善中美关系作为美国政府的外交目标之一。1969年2月1日，他要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研究对华政策，“试探直接同中国人接触的可能性”。中苏珍宝岛事件后，尼克松于1969年7月批准了放宽对美国公民来中国旅行的限制，允许六类公民（议员、记者、教员、学者、科学家和医生、红十字会代表）到中国旅行，还允许在国外工作的美国人可以购买一百美元的中国货物。法国首任驻华大使艾蒂安·马纳克到任会见周恩来时，奉戴高乐总统的指示将尼克松总统的口信转给中国最高级的领导人。他说，3月底戴高乐到华盛顿参加前总统艾森豪威尔的葬礼时，尼克松正式请法国总统把美国有意改善同中国关系的口信捎给中国领导人。不久，尼克松和基辛格利用出访亚洲、欧洲一些国家的机会，请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和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向中国领导人传话：美国不同意苏联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建议，不参加孤立中国的安排，希望同中国对话。为了表明美国同中国打开关系是有诚意的，美国通知中国，美国政府打算采取一个象征性的步骤——撤走自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在台湾海峡奉命巡逻以表明美国对蒋介石承担义务的两艘驱逐舰，以示美国愿意同中国缓和，通过谈判解决两国关系问题。为了答复美国撤走军舰的表示，周恩来通过巴基斯坦渠道转告美国领导人，中国决定释放7月16日进入广东海面而一直被拘留的两个美国人鲍德温和唐德纳女士（后查明这两人是误入我境内）。12月3日，在波兰华沙文化宫举办的南斯拉夫时装展览会上，美国驻波兰大使向中国使馆人员表示愿意同中国驻波兰代办会晤。

每当美同政府放出这些试探气球，中国方面都不失时机地作出了反应。在这个过程中，周恩来始终处于第一线。在当时要做到这一点并不是容易的，中美两国国内以及国际上存在着种种反对中美接触的势力。由于多年的隔绝状态，双方互不了解。每天出现在两国报纸上的言论和政界人士的谈话仍然是互相敌对的，但周恩来却凭着他特有的政治敏感，从美国政府的大量反共老调中看出了某些细微的变化，并以一个伟大政治家的魄力，同毛泽东主席一起，紧紧抓住这个历史性的机遇，冲破障碍，推动历史的前进。作为恢复接触的第一步，中国政府同意美国大使会见中国驻波兰代办，中断了两年多的中美华沙大使级谈判于1970年1月20日宣告恢复。美方在当日会谈中表示美国政府准备派代表去北京或接受中国政府的代表到华盛顿直接讨论一些问题，中方表示：中国愿意考虑和讨论美国政府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指出的任何意见和建议、从而切实有助于缓和中美之间的紧张局势，并从根本上

改善两国关系：这些会谈可以在大使一级进行，也可以在更高一级或通过双方同意的其他渠道进行。此后不久，周恩来又利用接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之机亲自表达了上述意见。

正当中美双方通过传递信息逐步走向高级接触时，发生了1970年3月美国入侵柬埔寨的事件。中方基于一贯反对侵略扩张政策的立场，中止了同美国的联系。直到美军撤出柬埔寨并再次发出愿意打破中美关系僵局的信号时，双方的联系才又恢复。同年10月下旬，尼克松分别向正在访美的叶海亚总统和齐奥塞斯库总统表示，中美和解十分重要，美国绝不会与苏联共谋反对中国，愿意派一个高级使节秘密访华。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中国也作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姿态：是年国庆节，周恩来请美国记者斯诺夫妇上天安门城楼，站在毛泽东主席身边，检阅国庆游行队伍。

第二天的《人民日报》，周恩来不仅亲自过问，而且对版面作了精心安排。毛泽东与斯诺夫妇在天安门庆祝国庆典礼上的照片，发表在《人民日报》头版的显著位置上。照片经过了特别处理，只有毛泽东、斯诺夫妇与站在身后的翻译四个人，他们身后或是身旁别的人物的身影已经按照周恩来的意见作过技术处理了。这张毛泽东跟美国人斯诺在天安门上的照片，是周恩来向美国发出的含蓄而饶有深意的信息。想不到竟被尼克松和精干分析的基辛格忽略了。

事后，基辛格在回忆录里写道：周恩来“不幸对我们敏锐地观察事物的能力估计过高。他们传过来的信息是那么拐弯抹角，以致我们这些粗心大意的西方人完全不解其中的真意。十月一日，中国国庆节那天，周恩来把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和他的妻子领到天安门城楼上站在毛主席旁边检阅一年一度的国庆节游行，而且照了相。这是史无前例的：哪一个美国人也没有享受过那么大的荣誉。这位高深莫测的主席是想传达点什么？斯诺自己后来谈论这一事件时指出：‘凡是中国领导人公开做的事情都是有目的的。’事情过后我才终于理解到，毛泽东、周恩来是想以此作为象征，表示现在他俩亲自掌握对美关系；但是，这在当时真是一种远见卓识。”

1971年4月，周恩来又根据毛泽东主席的决策，指示我有关部门主动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并亲自会见美国运动员和随行记者。同年4月21日，周恩来给美国政府一个口信，表示愿意接待美国特使例如基辛格博士或美国国务卿甚至美国总统本人来北京交谈。尼克松于5月中旬答复说，他准备在北京同我领导人进行直接交谈，并建议由基辛格同周恩来或另一位适当的中国高级官员举行一次秘密的预备会议。中国同意这一建议的信件于6月2日传到白宫，基辛格立即送交尼克松。尼克松兴奋地说：“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总统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两人当即决定把基辛格的中国之行称为“波罗行动”，以几百年前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来华“探险”的壮举作比拟。1971年7月周恩来同基辛格在北京举行会谈；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毛泽东会见了尼克松，周恩来同尼克松就中美关系正常化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认真和坦率的讨论，实现了中美最高领导人的直接对话。

约法三章维护主权——1972 年处理美国租用中国卫星地面站

周恩来在外事工作中，能够见微知著，处处维护主权，体现着杰出的外交智慧。

1972 年：月，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黑格一行（包括白宫发言人齐格勒）18 人继基辛格首次来华后再次来华，为尼克松总统以私人名义访华作技术安排，其中之一是有关电视转播问题。白宫发言人齐格勒向中方提出：在尼克松总统访华期间，随行的大批记者将通过通讯卫星播发电视、图片、电讯等，请中国政府给予方便。美国人民渴望通过电视看到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实况，尼克松本人对此极为重视。

接到请求，周恩来指示由外交部熊向晖约请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开会讨论此事。会上，“四人帮”的爪牙于会泳抢先发言，他摆出极“左”的腔调说，我们绝对不能在中国向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为尼克松进行电视宣传，这也是“首长”的意见。这个“首长”指的是江青一伙，当时，江青一伙把持着中共中央组织宣传工作的大权，与会的其他同志听后，只好一言不发。

此事中断后，熊向晖向周恩来总理汇报了情况。周恩来说：岂有此理！过去美同政府一直敌视中国，现在美国总统要来中国访问，这是历史性的转变。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亿万人民通过电视看到尼克松访华的情况，就会引起思考，增加对中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这是为尼克松做宣传，还是为新中国做宣传？一席话，句句有理，无可辩驳。

周恩来决定原则同意美方要求，并要美国方面帮助租用一个通讯卫星，在转播技术方面也请美方协助。

熊向晖向齐格勒转达了周恩来的决定。齐格勒听了，认为租用通讯卫星的经费可能有 100 万美元，中国政府不必花钱租用，因为美国政府已经准备了供美国记者使用的通讯卫星，因此只要求中方在北京、上海、杭州修建地面站即可，费用由美国承担。熊向晖听后，立即表示修建地面站的费用由中国政府支付，只要美方技术协助，至于是否租用通讯卫星一事，再作考虑。熊向晖之所以表示，是想为中方节省 100 万美元租金。

不想周恩来听了汇报后，马上批评熊向晖一听 100 万美元租金就想缩头的做法，他说：这不是花多少钱的问题，这是涉及我们主权的问题，在主权问题上绝不能有丝毫含糊。为了维护主权，同时又圆满地解决卫星租用的问题，周总理让熊向晖向美方转告三点：第一，请他负责为中国政府租用一颗通讯卫星，租用期是北京时间 1972 年 2 月 21 日上午 1 时至 2 月 28 日 24 时；第二，在租用期间，这颗卫星的所有权属于中国政府，美国方面事先向中国政府申请使用权，中国政府将予同意，中国政府向使用者收取使用费；第三，租用费和使用费都要合理，要齐格勒提出具体数目。我们通过其他途径了解国际上的一般价格，不做“冤大头”。

三点“约法”环环相扣，既维护了主权，又精明合理。齐格勒听了很惊讶，想了一会儿说，我第一次遇到这样的谈判对手。我完全接受中国政府提出的前两点办法。请放心，租用费一定很合理。我知道，租用费和使用费是互相关联的。我现在提不出具体数目，但我可以设想，这两项费用之间将会划个“等号”。我很佩服你们的精明，我更佩服你们处处注意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尊严。我将把这一深刻印象报告尼克松总统，并告诉我的同事和亲友。我还要坦率地说，现在我完全同意基辛格博士的看法：周恩来总理是世

界上罕见的、令人衷心敬佩的、伟大的政治家和外交家。

据理力争如实行文——与美方论台湾问题以及发表《上海公报》

1972年2月，尼克松和基辛格访华期间，大部分时间是与周恩来讨论国际重大问题和中美两国关系，由于双方立场各异，在很多问题上有过激烈交锋，但周恩来总是以高度的谈判艺术，寓论辩于说理之中，使对方感到尽管意见不同，中方的立场是有道理的，中国领导人的话是可以信赖的，进而双方最后达成共识。

关于台湾问题的讨论，一开始就使中美双方会谈陷入了僵局。这是一个对双方来说都属于极端敏感的问题。双方都作了充分准备，周恩来首先摆明立场：“台湾问题是中美两国之间的老问题了。华沙会谈十五年也一直僵持在台湾问题上。我必须申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政府：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美国军队必须撤出台湾。这三条立场，是不变的。”

基辛格在会谈中则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不能在开始我们之间的新关系时背弃我们的老朋友。我们绝不能放弃对台湾的义务，我们决不会与台湾断交。”

对此，周恩来严正指出：“台湾是中国领土。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这是你们历届政府都承认的。而现在，是哪国军队占领着台湾？是你们美利坚合众国。中国人有句俗话，‘解铃还需系铃人’。如果说有什么复杂原因，那也是你们美国政府一手造成的。你们不但对这一现实没有任何改变，而且还继续从各方面封锁、孤立我们。”

这时，基辛格有点着急：“总理先生，我希望你们能了解我国的国情，因为这将牵扯到我们两院以及两党的问题。我们将失去盟友。我们的总统希望在他第二任时彻底决定这个问题。”

周恩来语气缓和下来：“我理解尼克松总统为此作出努力。但请问，你们怕失去的是一些什么样的朋友？是一些腐朽的，即将垮台的‘老朋友’。美国在南越和柬埔寨支持的阮文绍、施里玛达等老朋友总是要被人民赶下去的。如果当年杜鲁门不用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不以武力援助蒋介石，22年来的中美关系可能不同得多。问题是争取一代和平是寄希望于前进方面，还是寄希望于这些‘老朋友’。把缓和远东紧张局势的希望放在这些人身上是不可能的。这一点，你们总统不是在堪萨斯城的演说中已经提到了吗？世界正在发生变化，但是这种变化总不能让中国人民再受损害了吧？”

周恩来还进一步以时代精神向美方晓以利害，指出：既然中美要进入一个新时代，必然要改变一些关系。中国有句俗话说，会掌舵的人引导航船迎着浪头上，不然将会被浪潮淹没。有远见的人会懂得如何掌舵。如果把所有的老关系一无更改，一切照旧，那怎么能迎接新时代呢？总之，时代在前进，懂得时代精神的人，会促使世界情况的改进，否则就要被时代的潮流所淹没。基辛格听后表示，相信我们经过目前的谨慎时期后，一切关系都必然会发生变化。尼克松也表示，正如总理所说的，舵手一定要顺应潮流。世界变了，中美关系也必须改变。

关于总的国际形势，尼克松认为，如果美国退出，某些地区就会出现“真空”，就会为苏联提供钻空子的机会。这是战后美国推行扩张政策的一个重要借口。周恩来批驳说，世界上不存在“真空”。早年美国有人曾说杜鲁门的政策丢了中国的六亿人口，历史证明，中国并没有成为“真空”，美国势力、苏联势力和蒋介石都走了，中国人民自己填补了这个“真空”。这同200

年前美国人民在英国退走后自己填补了“真空”是一样的。这一席话说得对方只有连连点头。

就这样，经过双方反复讨论，决定发表一个联合公报。美方本来想发表一个只强调共同点、不提双方分歧的公报，以显示其中国之行的成果。周恩来不同意这样做，并提出了一个建议草案，既列出双方的共同点，也摆明双方的分歧所在，这使美方大感意外，认为这种公报是外交史上前所未有的，也是美国国内无法接受的。对此，周恩来作了大量的耐心说明工作。他指出，中美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国际重大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20多年的隔阂不可能消失于一旦，如果在此情况下双方签署那种不讲真话、也不打算遵守的陈词滥调式的文件，那是不可取的。掩盖分歧的做法会给两国人民和全世界一些幻想，也将会使他们失望，反而不利于两国关系。周恩来建议，公报允许双方阐明各自的原则立场。这种实事求是的真诚态度使美方难以拒绝。尼克松承认，一个星期之内不可能建立一座跨越16000英里和22年隔阂的桥梁。

中美双方1972年2月28日达成的《上海公报》，形式独特，别具风格。公报首先列出了各自的立场和态度，包括对国际问题的各项原则主张。在台湾问题上，中方重申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军必须从台湾撤走，坚决反对任何制造“一中一台”、“两个中国”的活动。美方则声明，它认识到海峡两边的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对于基辛格巧思所得的上述表达方式，周恩来是很欣赏的。双方较快地取得了一致。但接下去谈到美确认从台湾逐步减少甚至全部撤走美军的一段，用词颇费周折，最后的表述方式基本上肯定了美军全部撤走的最后目标，驳倒了台湾地位“未定论”，承认了“一个中国”的原则。这为我在台湾问题上的斗争造成了有利的条件，为下一步实现关系正常化打下了原则基础。但为了照顾美方国内的政治困难，我也作了一定妥协，没有要求美方立即承诺废除美蒋共同防御条约，没有要求美军立即全部撤出台湾，而是先确定全部撤军的目标，允许美军在一定时期内逐步撤离。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是一个长期艰巨的任务，不可能一次会谈就解决一切问题，毕其功于一役。周恩来正是根据上述策略思想，促使美方同意了公报的内容，我方的预想基本上实现了。

公报列举了双方的共同点，包括：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太地区谋求霸权；各国不论社会制度如何，都应根据五项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国际争端不应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双方准备在相互关系中实行上述原则等。把上述共同点写入公报，既照顾到美方的需要，也对美方具有约束力。双方在公报中还声明：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是符合所有国家利益的，即不是针对第三国的；任何一方不拟代表第三方进行谈判等等。这些表明了我光明磊落的立场，对消除有关国家的疑虑是有益的。

公报也写入了扩大双方在经贸、科技、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与联系等内容，这对发展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交往和合作起了推动作用。

周恩来在会谈中所表现的坚定的原则性和充分说理的谈话方式，使尼克松和基辛格十分钦佩。他们在回忆录中称道，周恩来有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但讲话彬彬有礼，入情入理，对形势和谈判对象了若指掌，对问题反应敏捷。中国人说话算数，这是周恩来给他们留下的另一深刻印象，正如基辛格所说，“中国外交家证明是完全可靠的”，是“信守协议的”。基辛格还说，周恩

来“对哲学的论证，历史的分析，策略的试探和轻快的巧辩无不运用自如”，
“对事实的掌握，特别是对美国情况的了解，十分惊人”。尼克松也说，周恩来留给他的鲜明印象，是无与伦比的品格和献身精神。

求同存异和平共处——倡导和推行和平外交

新中国成立时，周恩来以其政治家和外交家的远见卓识，明确提出，外交是国家和国家的关系，外交的对象是国家，外交工作就是通过国家关系的这个形式来进行的。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与之打交道的有民族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世界各国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各有不同，很难一致起来”，但这不应该影响我国同一切国家建立和发展正常的外交关系。为了我国同世界各国能够友好合作，平等相处，维护自身的独立和安全，保障地区和世界和平，“应该撇开不同的思想意识、不同的国家制度”去“找共同点”，求同存异。正是周恩来找到了这样的共同点，他提出了处理国家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这就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且巧妙地运用到我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实践中去，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周恩来从和平外交政策的思想出发，认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联系的整体。他指出：“国家不分大小强弱，在国际关系中都应该享有平等的权利，它们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都应该得到尊重，而不应该受到侵犯。”“只有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和平才有保障。”对于任何一个国家主权和领土的侵犯和内政的干涉，“都不可避免地要危及和平”。如果各国保证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就可以在各国的关系中创造和平共处的条件”，“各国人民就有可能按照他们自己的意志选择他们自己的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反映着当代国际社会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这同世界上那种“弱肉强食”的行径和侵略扩张政策形成鲜明的对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是中国同世界各国相互关系的共同基础，也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同强权政治、霸权主义进行斗争的强有力的思想武器。

1953年12月中印两国开始就印度同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举行谈判时，为了建立中印这两个亚洲最大的邻国的友好关系，周恩来在同印度政府代表团的谈话中首先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正式写入双方达成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的序言中。1954年6月下旬，周恩来应邀访问了印度和缅甸，在中印和中缅会谈联合声明中，两国总理正式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中国、印度、缅甸等亚洲国家关系的基础，并且认为这应该成为整个国际关系的普遍准则。

在1955年的亚非会议上，周恩来进一步阐明在国际关系中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必要性。特别是他在会议的补充发言中着重阐述的“求同存异”思想，就是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放在一边，在和平共处原则的基础上找共同点。这种共同点最主要地表现在亚非国家绝大多数都经历过殖民主义的灾难和痛苦；在反对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独立与和平、发展民族经济和文化等方面，有着共同的愿望和要求，在这些共同点的基础上就存在着互相了解、互相尊重、互相同情和互相支持的可能性。他指出：“在亚非国家中是存在有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求同存异和团结。五项原则完全可以成为我们中间建立友好合作和亲善睦邻关系的基础。”“我们准备在坚守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亚非各国，乃至世界各国首先是我们的邻邦，建立正常关系。”周恩来的“求同存异”思想，为实现国与国之间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开辟了切实可行的途径。亚非会议所取得的圆满成功，会议通过对五项原则加以引申和发展的十项原则，都凝聚着周恩来的大量

心血。

在解决中国同邻国历史遗留下来的悬而未决的问题上，周恩来着眼于中国同邻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睦邻友好关系，提出这些问题应该通过和平协商的途径，互谅互让，求得公平合理的解决。这种通过谈判解决国际争端的做法，已为当前国际社会所公认，并日益广泛地为世界各国所采用。

为了使外国了解中国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真诚愿望，周恩来以其坦荡的胸怀，多次阐明我国对别国不进行颠覆活动，不搞革命输出的严正立场。如果中国将来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世界人民就应当起来揭露它，反对它，并且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

正是在上述周恩来的和平共处外交思想的指导下，在亚非会议后，中国同一系列周边国家建立了十分友好的睦邻关系，先后同缅甸等大多数邻国解决了历史遗留下来的复杂的边界问题，同印尼达成了关于解决双重国籍问题的协议，并为进一步开展中国和亚非各国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创造了条件。对于侵略过中国的日本，周恩来同样表示愿意在严格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促进两国邦交的正常化。

自 1956 年底到 1964 年初，周恩来不辞辛劳，对亚非国家进行了三次规模较大的友好访问，他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思想与亚非国家关系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为加强中国同亚非国家的团结合作，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努力。

周恩来不但主张同亚非国家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友好合作关系，而且也愿意在同一基础上与西方发达国家建立关系。即使对于当时敌视中国的美国，他在 1954 年也表示中国“愿意同美国和平共处”，但美国必须“具有同样的愿望和诚意”。在参加亚非会议时，他发表声明，宣布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这就导致了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开始。在中美关系的对抗时期，周恩来就是运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美国武装侵占台及制造“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的图谋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周恩来开始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时，主要是着眼于处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关系。1956 年波匈事件的发生，暴露了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也有忽视平等原则、干预别国内政的大国主义现象。中国认为社会主义国家都是独立的主权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就更应该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在这期间，周恩来在他访问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所发表的公报或声明中都明确强调中国的这一立场。这就表明，周恩来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适用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相互关系，而且也适用于社会制度相同国家的相互关系。这是对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和平共处思想的一个重大发展。

抗美援朝斗争的胜利，日内瓦会议解决印支问题协议的达成，“万隆精神”的诞生，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注入的和平共处思想的活力，以及周恩来对亚非国家的三次出访等重大外交成就，标志着我国不畏强暴，坚持和平，广交朋友，寻求友谊的和平外交政策的胜利，标志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经在国际社会的大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为我国进一步推进和平外交开拓了广阔的良好前景。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恩来自己虽置身于非常困难的境地，但他以惊人的毅力，忍辱负重，挺身而出，同林彪、“四人帮”破坏和平外交政策

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言行进行坚决斗争，并对他们所造成的损失做了大量的弥补工作。他严肃批评外交部到处提抗议，几乎破坏了原来所有的外交关系：他还耐心地向有关国家做解释工作，甚至一再向他们表示道歉。经过艰苦的努力，最终才把我国的外交拉回到正常的轨道。在此期间，周恩来本着反对霸权主义、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立场，为中苏、中美关系从对抗走向对话，为促成中日邦交正常化，作出了突出贡献。

实践反复证明：周恩来倡导和实践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对当代国际关系的重大贡献，如果各国都能恪守这些原则，它就能净化国际政治气候，化疑虑为信任，化恐惧为安全，化对抗为对话，化于戈为玉帛。

谈吐幽默回答巧妙——在外交场合处理疑难和诘难

周恩来是一位能言善辩的语言大师。他常常以其精辟、准确、幽默而又富有思辨性和战斗力的语言，使复杂的问题得到解决，使紧张的气氛得到和缓；他常常在谈笑间使对方的诘难尴尬难堪。

50年代中期，一次招待外宾的国宴上，服务员端上了一道大菜，这道菜由冬笋、蘑菇，红菜组成，形成一种图案。

这道菜上席后，有人用筷子夹翻了一转，大家一看：竟是一个“卍”形图案！友人们一看，吓了一跳，不知此时出现此种“卍”形图案是什么道理。原来二战期间，“卍”形图案成了法西斯的象征；这时，周恩来手疾眼快，神态自若，他一边劝酒一边解释道：“这不是法西斯的标志，这是我们中国传统的万字图案，象征‘万事如意’，是对远方客人最良好的祝愿。”话音刚落，整个宴会的气氛又活跃起来。接着，周恩来又幽默地说：“就算是法西斯，也没有关系，来，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它消灭就是了。”逗得客人哈哈大笑。于是，所有的筷子一齐指向这道菜，来了个“全面进攻”，很快，这幅“法西斯图案”就被全部消灭了。

1963年12月，周恩来和陈毅访问非洲摩洛哥王国。哈桑国王在接待周恩来时，破例地举办了极为丰盛的“烤全羊”，“巴斯提拉”、“古斯古斯”等传统名菜国宴。国王陪主宾围着一张矮脚长方桌席地盘膝而坐。直径长达八九十厘米的瓷盘中盛着一只烤好的整羊。席间，好客的主人首先用手选一块最好的肉放在周恩来的食盘里。每上一道菜都是如此，以示对客人的尊重。周恩来也照样回敬。宴罢，哈桑邀周恩来。陈毅到会客室饮茶。宾主边饮边谈，无拘无束，十分融洽。蓦然，哈桑国王提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问题。他笑着说：“当今世界上像我们这样的国王、皇帝已为数不多了，不知以后会怎么样？”周恩来和陈毅听后都笑了起来。周恩来风趣地说：“你们可以组织一个委员会，开个会商量商量嘛！”陈毅接着说：“亚洲有个西哈努克亲王，我们是好朋友，可邀请他参加。”周恩来又说：“陛下可以担任这个委员会的委员长嘛！”说毕，三人皆哈哈大笑。哈桑的问题提得十分巧妙，而周恩来和陈毅回答得也十分巧妙。

1960年4月下旬，周恩来为解决中印边界问题访问印度。在一次谈判中，印方提出这样一个挑衅性问题：西藏什么时候成为中国的领土的？周恩来当即答道：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远的不讲，至少在元代，它已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了。

印方耍赖说：时间太短了。

周恩来说：中国的元代离现在已有700来年的历史了，如果700来年都被认为是时间短的活，那么，美国建国到现在只有100多年的历史，是不是美国不成为一个国家呢？这显然是荒谬的。周恩来通过700年与100年的数字比较，驳得印方哑口无言，尴尬之极。这时，坐在会谈席上的印度副总统情不自禁地钦佩说：中国总理是雄辩的！

1959年3月，西藏反动农奴主勾结帝国主义发动武装叛乱，残害西藏人民。西藏一小撮反动派和妄图侵略我国西藏的帝国主义分子说什么这是因为他们同情西藏人民，要帮助西藏人民获得幸福。周恩来严正地批驳了这种虚伪反动的滥调：“西藏，包括昌部、前藏、后藏三部分地方，共有人口120万，参加叛乱的人只有2万左右，其中多数是被欺骗裹胁参加的。……在西

藏要求改革的劳动人民和赞成改革的上层进步分子以及可以说服的中间分子，就有 110 多万人。现在世界上有一些人，口口声声说他们同情西藏人，他们却没有区别自己所同情的究竟是哪一部分人，是同情 110 多万要求和赞成改革的劳动人民、进步分子以及可以说服的中间分子呢，还是同情极少数的反动分子呢？我们希望一切好心的朋友（这里我们所说的好心的朋友，是指那些愿意坚持同我国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声明不干涉中国内政的人们），对于这种明显的绝大多数和极少数的划分，应当首先弄清楚。”周恩来通过 120 万比 2 万的数字，说明同情和支持西藏广大要求和赞成改革的人才是正义的。

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有一位西方记者问周恩来：“请问总理先生，中国现在有没有妓女？”

对于这一不怀好意的问话，周恩来坦然自若，两眼盯着这位记者正色答道：“有！”这一问一答，顿使气氛紧张，引起全场的骚动。周恩来接着说：“在中国的台湾省”。话音刚落，全场响起了一片声。

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评价周恩来时说：“没有什么比对外谈判更能真正考验他的本领。”周恩来在外交活动中，在猝不及防的诘难下，在别有用心的挑衅前，面临难以预料的突发事件时，总是以其博深的知识、丰富的经验、清晰的思路、敏捷的反应、准确的言词，自如地应付各种意外情况。

处世篇

处变不惊沉着冷静——1928年在大连遇险脱险

周恩来一生多次深入龙潭虎穴，多次遇险脱险。他既胆略过人，敢于挑大梁，又机智过人，善于处变不惊。

1928年，中国共产党准备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由于当时中国的环境不可能在国内召开，所以决定在苏联莫斯科召开。周恩来当选为代表，邓颖超列席会议，两人于5月初乘日本轮船离开上海。船过青岛时，周恩来与邓颖超上岸进市区吃了午饭，并买了青岛市的各种报纸带回船上。由于买许多报纸，引起了日方侦探的注意，轮船停靠大连码头，两人正准备上岸时，面前出现了日本水上警察厅的几个人，挡住去路，对周恩来、邓颖超进行盘问。“你的，什么的干活？”一个警官用生硬的中国话首先问周恩来。

“做古玩生意的。”周恩来毫不迟疑地回答。尽管他携带的箱子里一件古玩也没有，但自幼受家庭熏陶，懂得不少古玩，完全可以和对方周旋下去。“你们做古玩生意，为什么买那么多报纸？”另一个警察用流利的中国话抢问。

“我们在船上没事，可以看看消遣。”

“你们到哪里去？”

“去吉林。”

“到东北干什么？”

“去看舅舅。”

盘问了这些以后，这几个人交换了一下眼色，又要周恩来跟他们去水上警察厅。

这时邓颖超不放心周恩来一个人去，对周恩来说：“我跟你一起去。”周恩来大怒说：“你不要去，你去干什么！”这怒声、这神态顺乎自然地向日本人表明了符合当时中国习俗的夫妻关系——妻子必须服从丈人。同时，也给邓颖超一种暗示，暂时分开更有利于应付敌人。

周恩来对邓颖超发完火之后，转过脸来对那个警官说：“我可以跟你们去。不过，你们先帮我找个旅馆，把我夫人送到旅馆住下，回来我也好找她。”周恩来的话语、动作、神态，自然、沉着、利索、镇定，具有很大的震撼力，虽然还没有完全消除敌人的怀疑，但却使他们松了一些劲、泄了一些气。

等邓颖超找到旅馆住下后，周恩来跟几个警察去了水上警察厅。他们又详细询问周恩来出生年月日、学历、职业等，周恩来坦然而答，对方找不到一丝一毫的破绽。

“你舅舅姓什么？”一个警察冷不防问道。

“姓周。”

“叫什么？”

“叫曼青。”

“他是干什么的？”

“在省政府财政厅任科员。”

“你大概忘记了你姓什么？”“姓王，开始我说过。”

这个警官陡然口气凶了起来：“你舅舅姓周，你怎么姓王？”周恩来苦笑着说：“先生，在中国舅舅和叔叔是有区别的，姓氏是不一致的，不像外

国人舅舅、叔叔都叫 UNCLE，因此，我舅舅姓周，我姓王。”

对方又逼问周恩来：“我看你不是姓王而是姓周，你不是做古董生意的，你是当兵的。”

周恩来迅速伸出两只手说：“你看我像当兵的吗？”几个警察仔细端详周恩来双手，那是双写字的手。

那个警官拉开抽屉看卡片，然后眼睛盯着周恩来说：“周恩来！你就是周恩来。”

周恩来皱起眉头反问道：“你们有什么根据说我是周，周恩来？”

敌人讲不出所以然，他们从周恩来的对答如流中进一步松下劲来，态凌缓和地说：“对不起，误会了，王先生，你可以走了。”可是，周恩来却没有急着走。他在日本人势力下活动，走出警察厅容易，再被请回来也容易。为了不再被请回来，必须使敌人彻底松下劲来。于是，周恩来面有难色地请求道，“先生，我还得麻烦你们一下，帮我买两张下午去长春的火车票。”说完把钱递上去，对方点头答应了。

两小时过后，周恩来平安回到邓颖超的住处。进来之后，他没有说什么话，仍然是安然无事的样子。只是在喝水时低声交待一句：“把接头证件立即销毁。”邓颖超不慌不忙地去上卫生间，接头证件撕碎后投入马桶冲掉了。

过了一会，两人若无其事、有说有笑地到餐厅用餐。下午，周恩来和邓颖超拿了日本水上警察厅代买的火车票，从容不迫地离开了大连。

无言之言为救而“咎”——把廖承志从张国焘监禁下解救出来

红军长征途中，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使红四方面军的不少同志无辜牺牲，使革命遭到重大损失。廖承志、罗世文、朱光等也被张国焘监禁起来。

红四方面军同红二方面军进入甘肃、宁夏，到了黄河边，周恩来一路上打听廖承志等人的消息。最后，在往预旺堡的路上，周恩来碰到了廖承志。

廖承志想起了他第一次见到周恩来的情景：

1924年初秋的一天晚上，16岁的廖承志看见一个双眸炯炯、浓眉刚毅身穿白帆布西服的人走进他的家，同父亲廖仲恺低声交谈了很久。廖承志好奇地问父亲：“这人是谁？”廖仲恺说：“你还不认识他？”廖承志说：“不认识。”廖仲恺带着敬意告诉儿子：“他就是共产党的大将周恩来！”

廖承志忘不了1925年8月20日父亲遭同国民党反动派暗杀，当天周恩来就赶到医院探望。为了彻底追查幕后策划者，周恩来参加了“廖案检察委员会”，和杨匏安一起积极认真地追查廖案凶手。周恩来还亲自审讯凶手，并写了一篇《勿忘党仇》的纪念文章，断定暗杀是一个“很大的黑幕阴谋”。

这次见到周恩来，廖承志心情非常激动。自广州一别，他们俩人10年没有见过面。10年前廖承志见到周恩来时还是个中学生，10年后廖承志已经是共产党员了，但此时却是个被张国焘“开除”了党籍的人！此时此刻、此情此景，使廖承志见到周恩来不知道怎么办好。廖承志心里想：是躲开还是不躲开呢？如果躲开，旁边还有人押着他，这不可能。如果直接和周恩来打招呼、说话，廖承志怕会给周恩来带来麻烦，他知道张国焘是个心狠手毒的家伙。廖承志正在踌躇的时候，周恩来走过来了。他看见廖承志被押送着，脸上没有任何表情，若无其事，也没有说话，但同廖承志紧紧地握了手。这无言之言胜过了任何言语，这无声之声胜过了任何声音，这无表情的表情深含着生死之情，这无其事之事深藏着至要玄机。两双手紧紧相握的一刹那，心灵已经沟通，万语已经交流。当天晚上，周恩来派通讯员找廖承志到司令部去。廖承志一进屋，就看见张国焘也在那里，屋子里坐满了人。

张国焘明明知道周恩来认识廖承志，却阴阳怪气地问：“你们早就认识吗？”

周恩来没有直接回答张国焘，却转而厉声地问廖承志：“你认识错误了没有？”

“认识深刻不深刻？”

“改不改？”

廖承志一一作了回答。然后，周恩来留廖承志一同吃饭。吃饭时，周恩来只和张国焘说话，也不再理会廖承志。吃过饭就叫廖承志回去。廖承志敬了一个礼就走了。

将欲取之，必先予之。同阴险毒辣、军权在握的野心家张国焘处事、周旋，须先给他一定的满足，使其麻痹。这就是周恩来为什么要解救廖承志，却又要厉声“追咎”廖承志的“错误”！如果周恩来不这样做，当天晚上廖承志的脑袋就可能搬家。

自从周恩来把廖承志叫去“追咎”了一番以后，廖承志的待遇明显改善。不久，廖承志就被释放了。

横眉冷对英勇无畏——处理张国焘叛逃事件

1938年初，张国焘几次跑到毛泽东那里，要求去祭黄帝陵。他的要求受到了毛泽东的拒绝和严肃的批评。可是，张国焘竟对抗毛泽东，于4月2日擅自离开延安，跑到宗蒲，和早已等候在那里的国民党西北行营主任蒋鼎文勾结，一同到了西安，在国民党西京招待所住了一晚上，便改乘火车：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保护下，直奔武汉。

张国焘此行，特务员（警卫员）张海是一直跟着的。起初，张海不知张国焘要搞什么名堂，到了西安后，发现张国焘不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而住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住的西京招待所，才产生了怀疑。第二天，张国焘上火车前，张海曾报告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负责人、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告诉他张国焘搞不好要走的。要他到车站来一下，林伯渠到车站后，对张国焘反复进行了劝说，要张国焘不要走，但张国焘执意不肯，一定要到武汉去。武汉当时是蒋介石的住地，张国焘要到那里去干什么？

车子到了武汉，周恩来、李克农、钱之光正在车站迎候。原来周恩来接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电话，知道了张国焘的行踪。张国焘下车后，周恩来使迎上去，责令张国焘立即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去住。可是，张国焘就是不肯，非要到资本家开的大华饭店去住不可。周恩来看在车站说服不了，就随张国焘到了大华饭店，在那里同张国焘进行了严肃的斗争。周恩来指出，张国焘对抗毛泽东，擅自离开延安是十分错误的，给张国焘提了三条要求，一，立即回延安；二、到苏联学习；三、休息，不许乱跑。张国焘支支吾吾，说他要回江西老家去，并诬蔑中央在延安会议上对他的结论和批判是错误的。对此，周恩来一一进行了驳斥，指出：中央对你的批评是对的，当时你已表示服从，怎么能出尔反尔？即使你对中央有意见，也应对中央提出，不能背离中央，自由行动。这场斗争，一直进行到午夜2点左右。第二天，张国焘提出要看看市容，周恩来决定亲自陪他去，并悄悄地让李克农转告张海，要张海把张国焘的行李搬到八路军办事处去。张国焘回来后，看到没了行李，只好到办事处住了一夜。翌日，张国焘又提出要去看看蒋介石。在蒋介石那里，张国焘无耻地说：“兄弟在外糊涂多年。”对于张国焘这种摇尾乞怜。奴颜婢膝的丑态，周恩来表示极大的蔑视，针锋相对地说：“你糊涂我可不糊涂。”次日早晨天刚亮，张国焘要张海上楼去看一下周恩来起床了没有，张海上楼后，把情况向周恩来报告了，周恩来立刻着急地说：“你快下去看一下，他可能会跑的。”张海下楼一看，张国焘果然不见了！

这一天，办事处的同志几乎全部出动了，跑了许多地方，都没有找到张国焘，大家非常焦急。晚上10点左右，地下党的同志来了电话，说在一条偏僻的小巷里找到了张国焘。周恩来立即派他的副官到那里去看张国焘。可是第二天张国焘又耍了一个手腕，跑下楼去，坐上停在门口的国民党反动派派来的小汽车，无耻地投靠国民党反动派去了。后来，张国焘从国民党那边传信，要他的行李，并叫张海也跟他去。对此，周恩来曾征询过张海的意见，张海表示坚决不去。

张国焘叛逃后，周恩来立即报告了毛泽东。4月18日，党中央作出了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的党员会议上，周恩来宣布了党中央的这个决定，并用这件事来教育大家。他说：“张国焘事件不是偶然的，他是一贯的右倾，一直跟中央闹分裂，长征中，中央北上，他南下，

到陕北后，中央还是挽救他，并给他安排了重要工作。他当面说得好听，表示承认错误，实际上准备最后叛党。现在，终于单枪独马跑到敌人那里去。”会上，周恩来让张海给大家讲了一下事情的经过，并且表扬了张海，说：“张国焘叛逃，连一个特务员也没有带走。”

巧借敬酒论道说理——在西安出席胡宗南举办的酒会

1943年6月下旬，周恩来、邓颖超、林彪等一百余人乘汽车由重庆返延安。在西安的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宗南获悉周恩来等即将到达西安，指定其政治部主任王超凡在小雁塔安排酒会，招待周恩来。从西安黄埔六期以上将级军官中30人各偕夫人出席作陪，对周恩来以师礼相待，制造友好气氛；并企图通过多敬酒把周恩来灌醉。

7月9日，周恩来到达西安。7月10日下午招待周恩来的酒会在小雁塔胡宗南官邸举行。胡宗南在会场外等候，向周恩来敬礼，陪周恩来进会场。落座后，王超凡致欢迎词。

王在临结尾时说：“在座的黄埔同志先敬周先生三杯酒，欢迎周先生光临西安。请周先生和我们一起，祝领导全国抗战的蒋委员长身体健康，请干第一杯。”

周恩来举起酒杯微笑着说：“王主任提到全国抗战，我很欣赏。全国抗战的基础是国共两党的合作。常委员长是国民党的总裁，为了表示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诚意，我作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愿意为蒋委员长的健康干杯。各位都是国民党党员，也请各位为毛泽东主席的健康干杯！”听了这番应答，胡宗南、王超凡和其他作陪者都楞了。还是周恩来环顾四周，笑着同与会者一起下了“台阶”：“看来各位有为难之处，我不强人所难，这杯敬酒免了罢”。

王超凡败下阵来之后，第二个回合是十几位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夫人举杯走向周恩来。其中一位说：“我们虽然没进过黄埔军校，都知道周先生在黄埔军校倡导黄埔精神。为了发扬黄埔精神。我们每人向周先生敬一杯。”

周恩来风趣地说：“各位夫人很漂亮，这位夫人的讲后更漂亮。我想问：我倡导的黄埔精神是什么？谁答得对，我就同谁干杯。”夫人们顿时张口结舌。胡宗南忙说：“今天只叙旧谊，不谈政治。”周恩来转向夫人们说：“我们就谈点别的。”周恩来同她们分别寒暄几句，把她们送回原座。夫人们败下阵来，但却笑逐颜开。

接着是第三个回合，十几位将军排成一行，举杯向周恩来走来。领头的说：“刚才胡宗南同志指示我们，今天只叙旧谊。当年我们在黄埔军校学习，周先生是政治部主任，同我们有师生之谊。作为周先生的弟子，我们每人向老师敬一杯。”

对于这一“敬酒”理由，周恩来又很快找出了破绽：“胡副长官讲，今天不谈政治。这位将军提到我当过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政治部主任不能不谈政治，请问胡副长官，这杯酒该喝不该喝？”胡宗南说：“他们都是军人，没有政治头脑，酒让他们喝，算是罚酒。”十几位将军遵命干杯。周恩来同他们一一握手，问姓名、职务。将军们虽然也败下阵来，但转身回座时却个个面露喜色。

第四个回合是又一批夫人走来，有一位看着稿子说：“我们久仰周夫人，原以为今天能看到她的风采，想不到她因身体不适没有光临。我们各敬周夫人一杯酒，表示对她的敬意，祝她康复，回延安一路顺风。我们请求周先生代周夫人分别和我们干一杯。周先生一向尊重妇女，一定会尊重我们的请求。”

话音刚落，周恩来严肃地说：“这位夫人提到延安，我要顺便说几句，

前几年，延安人民这小米都吃不上。经过自力更生，发展生产，日子比过去好，仍然很艰难。如果让邓颖超同志喝这样好的酒，她会感到于心不安。我尊重妇女，也尊重邓颖超同志的心情。请各位喝酒，我代她喝茶。我们彼此都尊重。”周恩来举杯碰她们的酒杯，她们喝了酒，周恩来喝了茶。

四个回合过去了，主角；配角、将军、夫人纷纷落马。他们的交往能力和辩才根本难不倒博闻广识、通权达变、能言善辩的周恩来。他们无法灌醉周恩来，反倒是自己灌醉了自己。

酒还是要喝的。周恩来知酒懂酒又有酒量，何况这还是专门迎接周恩来的酒会，滴酒不饮，“来而不往非礼也”，周恩来最重礼数，决不会“非礼”。但是，酒要喝得明白、痛快，决不能允许人家借酒会搞阴谋诡计，要喝团结抗日酒。

告辞时，周恩来举杯说：“感谢胡副长官盛情款待。我昨天到西安，看到朱德总司令7月4日给胡副长官的电报。里头说，胡副长官已将河防大军向西调动，内战危机有一触即发之势。今天我问胡副长官，这是怎么回事？胡副长官告诉我，那都是谣传。胡副长官说，他没有进攻陕甘宁边区的意图，他指挥的部队不会采取这样的行动。我听了很高兴，我相信，大家听了都会很高兴。我借这个机会，向胡副长官，向各位将军和夫人，敬一杯酒。希望我们一起努力，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打败日本侵略者，收复南京、上海，收复北平、天津，收复东三省，收复所有被日寇侵占的中国的山河大地，彻底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独立、自由、幸福的强大国家！同意的，请干杯。不同意的，不勉强。”说完，周恩来一饮而尽。胡宗南也一饮而尽。所有作陪的人都跟着干了杯。

随着周恩来光明磊落、正义凛然的敬酒词，酒会上出现了第一次也是最后一同干共饮，这也是胡宗南所始料未及的。

开诚相见顾全大局——西安事变前后与张学良的交往

在民族危亡的严重关头，周恩来肩负着历史的重托，前往西安解决“双十二”事变。17日下午，当周恩来赶赴金家巷张公馆时，张学良已在门口迎候多时。

当两人的右手紧紧握在一起时，张学良没有问候旅途的劳累，第一句话就问：“美髯公，你的胡子呢？”周恩来用手比划一下说：“刚刚剪掉了。”张学良不无惋惜，连说：“太可惜了，长那么长了。”周恩来笑着说：“做统战工作了，要讲点礼貌。”（周恩来自1931年底进入中央苏区后开始蓄须，人们习惯以“大胡子”、“胡公”相称）

参与恭迎周恩来的人很惊讶，有人说：“原来周先生与副司令认识呀！”周恩来微笑着说：“我们是老朋友了。”

说是老朋友，也不过是8个月前才相识。然而，就是那个初次相会，同样是一见如故。

1935年10月2日，张学良就任西北“剿匪”副司令，代行总司令职务，任务是打红军。当中央红军历经艰难险阻，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张学良的部队同红军较量了一番，企图消灭红军，结果被红军打败。从此，他和他所统率的东北军再不愿打红军而是要求抗日。张学良说：“我不想与共产党军队作战”。“为什么中国人之间要流血呢？”因此，1936年1月和3月张学良两次同中共中央联络局长李克农会谈，达成了东北军与红军局部停战的协定。为了达成红军与东北军的全面合作，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到延安与张学良会谈。

4月9日晚上11点左右，周恩来和李克农来到延安城内天主教堂的小楼上。昨天还是交成双方的将帅，今夜却要促膝长谈。当时的安排是李克农和东北军67军军长王以哲在外间，周恩来和张学良在里间分别交谈。

为了活跃会谈的气氛，周恩来首先说：“我是在东北长大的。”

“我知道，听我的老师张伯苓讲过。”张学良紧接话茬说。

周恩来从未听说张学良在南开读过书，很奇怪，便问：“何以说张伯苓是你的老师？”

张学良坦率地回答：“我原来抽大烟，打吗啡，后来听了张伯苓的规劝，完全戒了，因此拜张伯苓为师。”他又说：“我和你是同师。”

张学良这么敢于作自我批评，周恩来欣赏他的痛快、直率；张学良也敬佩周恩来的勇气，心想：周恩来真算大胆，敢只身与我会面，如果我把他扣下怎么办？因此，他们都开诚相见，真是一见如故。

俩人长谈5个小时，气氛非常融洽。

张学良完全同意中共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他说：“红军是真抗日，抗日与剿共不能并存。”他希望进一步与周恩来商讨解决联共抗日的几个大问题和最棘手的问题。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张学良主张联蒋抗日，认为抗日力量越大越好，蒋介石是国内最大的实力派，如果抗日统一战线不包括他，他以中央政府名义反对，就不好办了。以前他与李克农会谈则曾提出过这个问题，但是因为中共瓦窑堡会议上决定的政策是反蒋抗日，所以当时李克农就回避了。这时，张学良又向周恩来提出了这个问题。

周恩来说，中共过去主张反蒋抗日，是因为蒋介石是大地主、大资产阶

级的头子，视人民为死敌，其基本政策是“攘外必先安内”。现在愿听张先生的意见。张说：“蒋介石有民族情绪，据我回国后两年的观察，他可能抗日。”接着，张又逐一分析了南京方面各派对日本的态度。最后说：“蒋是在歧路上，他错在‘安内攘外’。把这个错误扭过来就可以一致抗日。你们在外面逼，我在里面劝，内外夹攻，定能扭转过来。”

周恩来听后说：“这个问题很重要，我回去报告中央。”张学良见周恩来没有批驳他，亦没有回避这个问题，而且回答恳切，感到他的意见可能被接受，心情愉快极了。联蒋抗日是张学良企求解决的最大问题，他企望抗日不反共，联共不反蒋。

这天晚上，他们对双方各派代表联苏、停战、通商、合作等问题都达成了协议。在谈到互派代表时，张学良说：“你们派多少人来我都欢迎，但我一个部不派。”周恩来说：“我们一是穷，二是人少，文化水平低，很多人不识字。所以我们才不得不随时随地注意培养干部，这样，才稍稍解决目前干部缺乏的问题。”张学良又诚恳地希望中共派更多的干部到东北军工作。

10日凌晨会谈结束后，张学良拿出一本为纪念申报60年而印制的大地图送给周恩来，并说：“让我们共同保卫中国”。同时，张学良还赠送给红军3万银元。

事后，周恩来对李克农等说：“谈得真好呀。想不到张学良是这样爽快的人，是这样有决心有志气的人。出乎意料，真是出乎意料！”

这次会谈使张学良坚定地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并影响了他的一生。张学良所提联蒋抗日的建议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重视，不久就变成了它的工作方针。

从此，周恩来和张学良成为知己朋友。

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有邀，周恩来前往；两人再次彻夜长谈，交换看法，商量对策，终使事变和平解决。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就其二人的地位与作用：周誉张是“千古功臣”，张赞周为“事实上的主谋”。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逼成了，但蒋介石却食言了，把张学良囚禁了，而且长达几十年。

然而，不管风云怎样变化，周恩来对张学良的评价是一贯的，他曾“挽救国家民族一大危机”“为民族产生了惊天动地的大团结”……对张学良的安危周恩来更是索怀不已，一有机会，就向社会呼吁，要求蒋介石释放他。

1956年11月26日，西安事变20周年纪念会在政协礼堂举行。周恩来在会上首先说明，为了争取台湾和平解放，这次纪念会只是小规模地座谈，接着说：“汉卿多年来表现很好，始终如一，是值得人们怀念和尊敬的。将来能援救出汉卿最好，但无论如何，他是千古不朽的人物，是名垂千古的了。”他在会上还交待：凡涉及张学良的宣传、报道及记述首先要顾及他的安全；凡东北军和张学良旧部有困难均要照顾。

周恩来对张学良的亲属更是关怀备至。张学良的四弟张学思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周恩来一直关心他的成长和使用。新中国成立后，调张学思到海军任副参谋长，1956年又被选送到苏联列宁格勒伏罗希洛夫海军学院学习深造，张学良的二弟张学铭夫妇被安排为全国政协委员，二妹、四妹及患病的八弟均受到照顾，就连服侍张夫人于风至的王奶奶和她的寡女也由全国政协发生活费，款额与文史专员工资等同。

周恩来不仅关心着张学良在大陆的亲属，而且也无时无刻不在惦念着在台湾的张学良本人，并想方设法托人给张学良捎去口信。

一天，住在香港的原西安绥靖公署高参郭增恺的夫人专程到台北，借在教堂做礼拜的机会见到了张学良夫妇，郭夫人信手将一支口红给了赵媿。口红里面夹着一张小纸条，是周恩来写给张学良的。纸条上共 16 个字，后 8 个字是：“善自珍重，后会有期”。

十年动乱，为了这个国家，为了自己的党，周恩来殚精竭虑，心力交瘁。1975 年秋，他的最后岁月已是病体沉痾，卧床不起。当他得知张学良患眼疾几乎失明后，十分焦虑，并向有关部门询问张学良的病情。在他临终前的 18 天，还在病床上召见负责对台工作的罗青长部长，向他交待一定要设法关照好张学良。谈完这件事，周恩来吃力地说：“我太累了，休息一会儿再谈。”说着，就昏睡过去了。周恩来，十亿人的总理，在他生命的垂危时刻，不仅牵挂着祖国统一，而且念念不忘这位“快慰平生”的朋友。

周恩来曾遥祝张学良“善自珍重”，可“后会有期”还未实现，为了这个民族他已累得先去了。这不能不是天大的遗憾！

然而，周恩来与张学良的情谊却天地长久，精神永在！

自信互信团结御侮——第二次国共合作中与张冲的交往

张冲，字淮南，最初是国民党“陈氏兄弟”——陈果夫、陈立夫的部属，是他们办理对苏外交及对中共谈判的副手，最后直接受蒋介石指挥，成为国共两党间的“桥梁”。张冲与周恩来接触最频繁、来往最密切的是1936年到1941年五年多的时间里，虽然他们各自代表所属党的立场和观点，以公事公办为原则，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国共合作的发展，他们的情谊却日渐加深，彼此推诚相见，即使两党关系一时恶化，也没有影响这种友谊。正如1941年11月9日周恩来为《新华日报》撰写的《悼张淮南先生》所言：“自相识之日始，直至临终前四日，我与淮南先生往来何止二三百次，有时一日两三次，有时且于一地共起居，而所谈所为辄属于团结御侮。坚持国策，至死不移，淮南先生诚五年如一日。”是的，周恩来与张冲的接触交往，都是围绕团结抗日这个中心来进行的，并为之而互相信任。每当遇到问题发生争执时，双方都能以“敌人所欲者我不为，敌人所不欲者我为之”的话来互相勉励。

1937年2月9日，国共在西安举行第一次正式会谈。中共代表是周恩来、叶剑英，国民党代表为顾祝同、张冲、贺衷寒。会谈历时一月，张冲带着蒋介石的意见，与周恩来朝夕相处，频繁接触。这时，国民党有人放出口风：“淮南过于冒险，这样的事干好了千好万好，如果做得不好就会成为千古罪人。”张冲闻之后坦然处之，并说：“调查科的任务就是对付共产党，但事至今日，我深切认识到国共合则兴，不合则亡。年年围剿，节节失利；强邻虎视，外债高筑；民不聊生，国将不同。我自受命以来，夙夜忧惧，将尽我职责，争取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至于个人功罪，在所不计。”由于西安会谈因为顽固派的阻梗，致谈判收获不大。接着周恩来到杭州、上庐山、终至南京，历时7个月，同国民党举行了五次灭式谈判，终于扫除重重障碍，促进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作为自始至终全过程参加这场历史性谈判的国共两党代表周恩来和张冲，前者充分展现了政治家的杰出才能和外交家的非几天赋；而后者总是积极参与，热心投入，富有诚心。对此，周恩来感受颇深：“先生与我，并非无党见者，惟站在民族利益之上的党见，非私见私利可比，故无事不可谈通，无问题不可解决。先生与我，各以此自信，亦以此互信。”

张冲为人豁达，性情随和，加之他见多识广，所以思想较为开朗，容易接受新事物。在民族斗争的革命浪潮中，在国共合作的交往中，他受到周恩来思想、作风、品格、才干多方面的影响，耳濡目染，思想认识提高快，进步大，为国共合作、团结抗日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比如，周恩来之所以能在1939年春到浙江、安徽等地视察，同年夏天又顺利返回延安议事，都与张冲的大力协助分不开。是夏，周恩来回延安。事先，国民党当局已同意他北返延安。但当周恩来来到重庆珊瑚坝机场时，检查人员却故意刁难，要他出示离境证件，否则不准离开重庆。正当双方争执之时，适逢张冲到机场为周恩来送行。张冲见情况有异，立即驱车赶到蒋介石侍从室，找到侍从室主任贺耀组，一起去见蒋介石，取到蒋介石手令后，亲自送到机场，直至周恩来上了飞机、起飞。事后，他愤慨地说：“这是顽固分子在捣乱，蓄意制造国共分裂！”

而周恩来给张冲的帮助教育则更多，除了对他的一些错误观点及时给以指正外，还特别注意用具体事实来纠正其偏见。如重庆《新华日报》的发行出售屡遭特务的破坏干扰，周恩来开始向张冲提出这个问题时，张冲还认为

是夸大了事实。周恩来就陪他去现场，在亲眼目睹了特务殴打报童、撕毁报纸的情景后，张冲也感到气愤，随即采取了制止措施。1941年1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了。张冲看了国民党《中央日报》关于事变的报道，对其歪曲事实的一派胡言非常不满，当众将报纸摔于地上，两手交于背后，在办公室踱来踱去，许久一言不发。《新华日报》发表了周恩来的千古绝句“千古奇冤，江南一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及有关揭露事件真相的社论报道。国民党顽固派对此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不仅指使特务无理没收报纸，殴打报童，而且去《新华日报》社门市部捣乱。2月中旬的一天，张冲亲自陪同周恩来赶赴现场，于寒冷的黑夜里，在曾家岩十二小学门前盘桓交涉达两小时之久。当夜，中共工作人员陈家康送张冲上车回家时，张冲问陈家康对近日之事作何想法，陈家康说：“成功；是国家民族之福；不成功，坚持到死不变。”张冲听后喟然长叹：“我死必在君先！”

张冲出此悲言，是有些道理的。正如周恩来所说，国共合作“五年来国内外风波频起，淮南先生尤首当其冲，而风波之险，谣诼之多，甚且侵及先生，但淮南先生辄处之泰然，绝未以一时‘行情’，动其心志，变其神态。”特别是皖南事变后，也就是张冲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两党裂痕加深，局势日致恶化。“今岁一月事起，二月报童随之，三月为参政会期，四五月有中条山战役，此中风浪之险，环境之恶，为五年来所创见，先生劳神焦思，力维大局，备极憔悴。”（周恩来语）就在这时，在国民党内的一次会议上，当张冲谈出国共应继续合作的观点时，与会的一个顽固派反共人物竟破口大骂，还猛地将茶杯向他掷去，幸而未中。张冲遭此侮辱，颇为灰心，甚至准备必要时以自杀来证明自己的心态。他对时局极为忧虑，并预感到顽固分子可能向自己下毒手，心情非常沉重，终日郁郁寡欢。他对周恩来说：“一朝中总有岳飞、秦桧，我们是忠，他们是奸。我们是顾全大局的，他们是不顾大局的。”

一天，张冲又叫来至信部属嘱咐说：“顽固派对我在国共两党的折冲，很有意见，近来我的行动已受到监视，说不定哪一天会被暗杀的。”说毕，取过信笺，给家属立下遗嘱，并交代道：“我一旦身遭不测，你必须把保险柜里我与周恩来先生来往信件，全部烧毁。”可见，张冲先生是随时准备为国共合作以身殉职的。

然而，张冲还没有遭到顽固派的毒手，却不幸于1941年6月感染恶性疟疾。他起初不以为意，仍力疾从公，为国共团结奔走操劳。

就在张冲患病期间，周恩来数次前往探视慰问，张冲于病榻还不忘国共合作，询问两党关系近况。

最后一次见面，张冲还嘱周恩来与自己的后继者（后任国防部二厅厅长的郑介民）保持联系。当时，日寇飞机日夜不停地对重庆进行“疲劳轰炸”，加之气候炎热，医护难免不周。8月11日，张冲在重庆郊外云龙旅馆山洞里病逝。

张冲为之奋斗的两党团结抗战，距胜利还有较长一段路，他夙愿未了却先去了，国共两党都为之痛惜不已。当然，那些反共顽固分子则当别论。

11月9日，张冲追悼会在重庆夫子池新运服务社大礼堂举行。会场内外，挽幛高悬，哀乐低回。蒋介石亲临祭奠，并撰写哀辞：“赴义至勇，秉节有方；斯人不永，干将沉光。”在众多的挽联中，中共领导人的几幅特别引人注目。毛泽东、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陈绍禹、秦邦宪、邓颖超联名致

送的挽联是：“大计赖支持，内联共，外联苏，奔走不辞劳，七载辛勤如一比斯人独憔悴，始病寒，继病疟，深沉竟莫起，数声哭泣已千秋。”朱德、彭德怀送的挽联为：“国土无双，斯人不再；九原可作，万里相招。”叶剑英、李克农送的挽联写道：“豺虎尚纵横，大局岂堪重破坏；巴渝多雾瘴，忠魂何忍早游离。”

与张冲从对手到密友的周恩来，在时局艰难险恶的情形下，对张冲的过早去逝大感哀痛：“先生既逝，联络乃似中断。嗣每遇风波，辄增先生不在之思，而每念先生，更兴安危谁共之感。”他写了“安危谁与共？风雨忆同舟！”的挽联，短联当哭，既表哀思，更忧思局。周恩来还与董必武、邓颖超、钱之光、潘梓年等共产党人一起参加了追悼会，并在会上发表了历时 20 分钟的演讲辞。他讲到最后，感情激动，语不成声。与此同时，周恩来又指导当日的《新华日报》刊出悼念张冲专页，并亲笔撰写《悼念淮南先生》，肯定张冲为国共合作、团结抗日“劳神焦思”，“奔走坛坫”；称颂他“独持正义”，“力维大局”。代表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表达了对这位同共产党真诚合作的国民党的爱国志士的高度评价。

患难相济真诚合作——与张治中相处相知

周恩来与张治中相处始于大革命时期，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黄埔军校，周恩来出任政治部主任，张治中担当军事研究委员。后俩人都调到入伍生总队，周恩来任党代表，张治中当总队副。这样他们接触就更多了，而且配合默契。

张治中起初对工人、农民革命运动所知不多，对政治斗争兴趣淡漠，只醉心于军事教育。自从与周恩来相识后，好像换了个人似的，他听周恩来讲马克思主义、讲工农运动和中国前途。从此，他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思想逐渐进步，把周恩来奉为良师益友。

张治中出身寒微，青年时代吃过许多苦，因而他从感情上向往共产党。在这种环境下，他萌发了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念头，并首先向周恩来提出。当时周恩来非常高兴，表示请示组织后即给予答复。过了一些时候，周恩来对张治中说：“中共当然欢迎你入党，不过你的目标较大，两党曾有约，中共不吸收国民党高级干部入党，此时恐有不便，不如稍待适当时机为宜。但中共保证今后一定暗中支持你，使你的工作好做。”解放后，周恩来曾与张治中回忆过这段往事，张颇有感慨地说：“这可能是我的政治生命的转折，如果当时成为中共党员，我的历史就得重写了。”

1925年7月，蒋介石在组建北伐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时，任命张治中为副官处处长，主管人事和事务工作。当时张治中建议，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一职应由周恩来担任。但蒋居心叵测，始终不允。张治中深为遗憾。

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克武汉后，张治中担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教育长兼学兵团团长，留驻武汉，而周恩来则随军由前线转到上海，俩人的接触至此中断。

“四·一二”大屠杀前夕，蒋介石的反革命嘴脸逐渐暴露。一天，黄埔一期生、共产党员，原张治中军官团连长陈赓突然找到张治中，说要到上海去，需要旅费。张治中非常关心周恩来的安全，问陈赓：“恩来先生现在何处？”陈赓答道：“已到上海”。张治中将旅费交到陈赓手上时，一再叮嘱：“情况不对，你到上海后告诉他，行动务必小心！”显然，张治中已嗅到火药味。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国共两党再度合作。张治中出任湖南省主席，周恩来任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驻在武汉，有时到长沙，与中共驻湘代表徐特立研究工作。这样张治中与周恩来中断十年的交往得以恢复。

1938年，武汉被日寇占领不久，湖南长沙发生了大火事件。火烧长沙是蒋介石下令并指定张治中负责执行的，张对部下也有明确指示；但执行人员误信谣言，仓皇间未经请示批准，没有放空袭警报就擅自到处点火，张治中从睡梦中惊醒时，大火已蔓延开来，电话线路不通，局势无法控制，酿成了一场惨案。张治中明知闯下大祸，惶惶不安。事后，周恩来由郊外回城，看到张治中焦急、憔悴之状，详细询问了情况，在指出他责任的同时，也给以亲切的劝慰。并通过《新华日报》对国民党军事抗战不依靠群众而实行所谓“焦土抗战”的政策提出批评，又对起火原因作了中肯的分析，这无疑给面对各方责难、一片要求惩办的呼声中之张治中，是莫大的安慰。张治中后来终生难忘周恩来这次对他的亲切关怀，充分体现了患难之中的真挚情谊。

1945年秋的重庆谈判，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张治中作为邀请毛

泽东到重庆谈判的建议人之一，又与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一同坐专机赴延安亲迎。

周恩来在这些过程中，再三叮嘱张治中要确保毛泽东的安全。他找到张治中问：“文白兄，你把毛主席接来了，让他住哪啊！”张答：“委员长不是安排了一处房子吗？”周恩来幽默地说：“那么阔气的房子，我们主席住不习惯呀！”张治中这才恍然大悟：周先生是担心毛泽东的安全，并慨然应允：“如果毛泽东先生不嫌弃的话，就住我家的房子吧！”在其他问题上，如警卫问题、接待问题、会议程序问题等等，张治中始终与周恩来密切配合，遇事主动同周恩来协商解决，处处体现出真诚合作的精神。

10月10日经过40天的谈判，国共两党在桂园签订了《双十协定》。第二天一早，张治中又把毛泽东送回延安。在去机场途中，毛泽东对张治中说：“你是真心要和平的。”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和张治中又谈起这段往事说：“你答应送毛主席后，我才放下心来，不然，真吃不下，睡不着。”在毛泽东走的当晚，周恩来在桂园宴请张家的亲属和全体服务人员，和大家一一握手、敬酒，并赠送了延安生产的羊毛筒子、毛线等礼品。

10月12日，张治中返回重庆。次日就踏上了赴新疆与三区人民革命代表谈判的路程。到新疆后，他没有辜负周恩来的重托，经多方努力，把盛世才关押到监狱的131名共产党员和家属，派专人专车并配有医务人员，行程月余，送抵延安。这批干部在以后的解放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9年元旦，蒋介石迫于内外压力，第三次宣布下野；李宗仁上台代行总统，迫于战场形势，又有了这年4月那次北平谈判。这次又是张治中与周恩来分别为各自党的代表团的首席代表，经过他们的共同努力，双方达成了《国内和平协定》，但南京政府决心与人民为敌到底，拒绝了在协定上签字，致使谈判再次破裂。

其时，南京急电，召张治中等速回上海，预定23日飞机来接。

这天，周恩来来到张治中住所，向他分析一番形势后深情地说：“西安事变时我已经对不起一位姓张的朋友，今天再不能对不起你这位姓张的朋友了！”情真意切，态度温和而又坚定，张治中深受感动，终于听从了周恩来的安排。

23日，南京接代表团的飞机到达北平上空，请求降落。周恩来果断地指示机场指挥台回答：“飞机跑道正在修理，无法降落，两天后再来。”飞机只好在北平上空盘旋几圈后返回南京。这实际上是周恩来为挽留张治中等人设下的缓兵计。同时，早在谈判破裂时，周恩来已暗中指示南京和上海两地的地下党组织，将张治中的亲属集中在上海，由专人负责，设法坐下一班接代表团的飞机安全抵达北平。地下党组织接到指示后，全力以赴，胜利完成了任务。

这一天，周恩来兴冲冲地找到张治中，对他说：“文白兄，我们一起去接一个客人吧！”张治中一直没有反应过来。“什么客人，我认识吗？”“是你最熟悉的，到时你就知道了。”说着他们一起乘车到西郊机场。不一会儿，一架飞机徐徐降落，从上面走下来几个人，张治中一看不禁又惊又喜，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原来是他的夫人、孩子及其他家属。亲人团聚，大家都兴奋得抱在一起，张治中揉着发红的眼睛，深情地对周恩来说：“恩来先生，你真会留客啊！”

所有这一切，事前张治中及家人都不知道，周恩来替朋友办事就是这么

稳妥、细致、周到，促使张治中决意留下来，免遭国民党特务的毒手，而获得了新生。

起初，张治中对留下来还有顾虑，担心别人说他是国民党员，现站在共产党一边是投机，经周恩来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他放下包袱，全身心地投入到革命事业中来了。建国初期，他利用自己的身份和影响，参加了和平解放新疆的工作。1954年国庆五周年，毛泽东举行授勋典礼，亲自授予张治中一级解放勋章。他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三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解放以后的20年，无论各项工作或历次政治运动中，张治中都受到周恩来的帮助和教育，使他能注意不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为人民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文化大革命”狂潮中，面对红卫兵的打、砸、抢、抄、抓，张治中受到了周恩来的全力保护。

周恩来与张治中在近半个世纪的长期交往中，尤其是在国共合作、推动中国革命发展的时期，两人相互支持、患难相济、亲密合作。道义相砥砺，生死亦可托。他们的友谊是非常真诚的，真可谓：人之相知，贵相知心。

肝胆相照尊重信赖——把宋庆龄珍爱的禾穗画上国徽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宋庆龄避居重庆。她虽然受到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仅有一楼的自由，但通过廖梦醒和王安娜仍然与周恩来保持经常的信函联系。

1942年冬，宋庆龄邀请周恩来出席为欢送董必武回延安举行的茶餐会。为了热情款待大家，宋庆龄请名厨做了十几道菜。周恩来望着丰盛的筵席，笑着说：“我到孙夫人府上打扰已非一次了，不过容我率直一点说，似乎从没像今天的菜蔬这样有风味。我今天是跟董老沾了光，饱了口福。”一席话说得大家开怀大笑。

在炉火的照耀下，壁炉架上挂着两株稻穗金灿灿、黄澄澄，十分可爱。这是入秋后，宋庆龄到农民家里访问时带回来的。这时，一起参加茶餐会的冯玉祥夫人李德全大声赞叹：“你们瞧，多好看哪！这两株禾穗简直像金子铸成的一样！”

“这比金子还要宝贵呢！”坐在她身边的宋庆龄站起身来，从壁炉架上摘下禾穗，托在手上继续讲道：“我们的国家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大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年年五谷丰登，人民才有好日子过。在几亿农民的心目中，这饱满的禾穗不是比金子还要宝贵吗！”她说得大家点头称是。

周恩来也激动地站起来，走过去接过禾穗，放在右手中，用左手深情地抚摸着，颇有感慨地说：“孙夫人说得好，人人都有工作做，人人有饭吃，这一天不会很远；年年五谷丰登，人民有好日子过，会有这一天的。孙先生在《建国大纲》中提出的设想，会实现，一定会实现的！将来打下了江山，人民坐了天下，一定要把这两株禾穗画在新中国的国徽上！”

宋庆龄含笑颌首，连说“谢谢，谢谢！”她仿佛看到了新中国的曙光，看到了金光闪闪的国徽。……

1949年春，全国解放在即，毛泽东与周恩来系念宋庆龄在上海的安全，于1月19日联名致电宋庆龄，祈请她“命驾北来”，参与指导新中国的成立与建设。周恩来特别叮嘱在香港的中共地下党同志，派出宋庆龄最信任和最可靠的同志，将电报送往上海，并且当面向她致意。要求在港同志：“第一，必须秘密而不能冒失。第二，必须孙夫人完全同意，不能稍涉勉强。如有危险，宁可不动。”字里行间充满着周恩来对宋庆龄的尊重和关切之情。宋庆龄从金仲华、廖梦醒手中接读电报后，十分感动，当即用英文写了复信，深切感谢毛泽东与周恩来的盛情邀请，再次表示：“我的精神是永远跟随着你们的事业。”其时，只是因为宋庆龄身体欠佳，暂不能启程北上。

6月21日，上海已告解放，毛泽东与周恩来又分别亲笔写信，并委派邓颖超持信赴沪，敬请宋庆龄来京。周恩来还指示中共上海市委做好宋庆龄北上护送工作，调派头等卧车，绝对保证安全。8月28日，在邓颖超的陪同下，宋庆龄乘2252次专列到达北京。毛泽东、周恩来亲临车站迎迓。在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宋庆龄热情洋溢地说：“我们达到今天的历史地位，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会上，她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周恩来被任命为政务院总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周恩来没有忘记7年前在宋庆龄住所所见、所论的两株金黄的稻穗。在周恩来建议下，这两株禾穗画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徽。

热情关怀悉心培养——与班禅大师的交往

周恩来是班禅大师最早接触的中共党内高级领导人。而班禅是1943年被班禅堪布会议厅认定为九世班禅的转世灵童，迎往青海塔尔寺供养，其时才5岁。到1951年这位十世班禅也不过是13岁的少年。因此，周恩来一直非常关心班禅大师的成长，在工作中非常尊重他，充分发挥他的积极性和在少数民族事务方面的特殊作用。

班禅与周恩来第一次会见是在1951年4月27日。13岁的大师率领堪布会议厅（班禅属下的办事机构）的僧俗官员40余人到达北京，在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同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一起，共同协商和平解放西藏有关事宜。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为班禅接风洗尘。

13岁，毕竟还是个少年。他一脸稚气，在一批饱经风霜锻炼的共和国领导人面前，更显得年幼，自然有些拘谨和紧张。但是，他又不同于一般的孩子。活佛这一特殊身份，确定了他的特殊地位：从小备受优崇，接受过教育，懂得礼仪。他向周恩来献了一条质地优良的洁白哈达，以示崇敬。两人虽然在年龄和资历方面相差很大，但周恩来对他十分尊重。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从中国革命的胜利到西藏的前途，从即将开始的谈判到班禅在京活动，从藏、汉两个民族的团结到藏民内部的团结……内容十分广泛。13岁的大师虽不能全部理解谈话的丰富内涵和深远意义，但他已经意识到，坐在自己身边的这位巨人，不但是共和国的卓越领导人，而且是自己最可信赖的导师和长辈。

谈话结束，周恩来陪班禅步入宴会厅。在入口处，总理停步，右手微微弯曲，伸出左手，请班禅先行；少年大师则双手合十，稍稍弯腰低头，十分恭敬地请总理先行。席间，总理不断地给大师夹菜，介绍各种菜的味道和特点，偶尔还讲一点烹调技术。整个宴会上，班禅很少说话，他不时转动着那双聪慧的大眼，用好奇的目光注视着这里的一切。周恩来渊博的知识，诚恳的态度，谦和的作风，端庄的举止，慈祥的笑容，炯炯有神、闪烁着智慧之光的眼眸，都给少年大师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后来对别人说：为了能直接听懂周总理的讲话，我要好好学习汉语。

在整个谈判期间，周恩来指示有关领导，关于和平解放西藏问题，要十分尊重和充分听取班禅和堪布会议厅主要成员的意见。在周恩来和中央人民政府的直接关怀下，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达赖集团与班禅集团之间的一些问题，得到妥善解决，班禅固有的地位和职权也得到应有的恢复。

周恩来和班禅第二次相见是在1954年9月。班禅同达赖一起来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当两位佛爷到达北京时，朱德副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自到前门车站迎接。在整个会议期间，周恩来多次到他们的住地看望，对他们的参观访问、饮食起居都亲自过问。

为了进一步建设西藏，1955年3月9日在周恩来主持下，国务院举行第七次全体会议，专门讨论西藏工作。经过会前充分的酝酿协商，会议通过了《国务院对西藏地方政府和班禅堪布会议厅委员会之间关于历史悬案问题的谈判达成的协议的批复》。这一协议的通过，使噶厦和堪厅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得到进一步解决，达赖和班禅之间的关系也密切起来了。

3月10日，周恩来举行宴会，为达赖、班禅送行。席间，周恩来、达赖、班禅都发表了充满情谊的讲话。班禅在讲话中表示回藏后，一定为加强民族

团结，建设繁荣幸福的新西藏，巩固西南国防而努力奋斗。

1956年11月，印度政府邀请达赖和班禅到印度参加释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纪念大会。他们到印度后，在印度的藏族极少数分裂主义分子公然成立所谓“西藏政府”，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企图阻止达赖和班禅返回祖国。其时，正在印度访问的周恩来，分别会见两位大师，同他们进行长时间的交谈，使他们在错综复杂的环境里，进一步明确了方向。班禅向周恩来表示：请中央放心，我一定会照中央的安排办，绝不会接受外界的影响。他严厉谴责极少数分裂分子背叛祖国的阴谋活动，旗帜鲜明地表示拥护中央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拥护祖国统一。在结束纪念活动之后，班禅摆脱了分裂分子的纠缠和干扰，于1957年1月29日毅然乘飞机先期返回拉萨。

在1959年4月的二届全国人大上，21岁的班禅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在这之前，周恩来已发布命令，任命他为西藏肉治区筹备委员会代理主任委员。这样，班禅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从此，他来来往往，到北京的机会多了，同周恩来的接触也多了，聆听总理教诲、向总理学习的机会也更多了。

班禅精力充沛，责任心强，经常是昼夜不停地紧张工作，为平息叛乱、推动西藏民主改革，作出了重要贡献。两藏发生什么重要事情，工作中有什么重大问题，班禅都直接向总理请示汇报，总理也总是给予他热情的支持和具体指导。班禅大师曾多次讲过，周恩来和他不仅是领导者和被领导者，而且是导师和弟子、长辈和晚辈的关系。

然而，正当西藏的民主改革深入发展的时候，由于“左”的错误日益严重，班禅也遭到厄运，1961年后，在西藏对他公开批判，并撤销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理主任的职务，只保留全国政协常委一职。

1964年底，周恩来担心班禅这位26岁的大师在西藏会发生意想不到的事情，便调他离开拉萨，以全国政协常委的身份常住北京，生活上依然享受很好的照顾。

1966年夏，“文化大革命”风暴席卷神州大地。北京不仅是风源，而且是漩涡与中心。西藏民族学院的红卫兵到北京串连，同中央民院和首都高校的红卫兵联合，要揪斗班禅。

周恩来在十分困难的境地下，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班禅多方保护。他一再劝阻红卫兵说，对乌兰夫、班禅这样的少数民族领袖人物要加以保护，他们有问题，可以写揭发材料交给中央；也可以背靠背的批判，但不能揪斗。

8月下旬的一个黑夜，少数红卫兵违背周恩来的指示，擅自翻墙闯进班禅住处，抢走班禅，用卡车拉到中央民族学院关押。他们私设公堂，任意审讯，随意打骂。班禅据理抗争，就说他“不老实”，还用尼龙绳把他捆绑起来。稍后，又把班禅拉出去示众，说他是“叛国头子”、“最大的反动奴隶主”……后来周恩来知道了，立即派解放军加以制止，明确表示要文斗，绝不容许采取侮辱性的斗争方式！他还指示统战部徐冰部长和刘述周副部长，共产党员在任何时候都要履行自己的职责。就是你们自己受揪斗，也要把班禅保护好。徐、刘随即与总理联络员及卫戍区的解放军一起赶到中央民院把班禅转移走了。而刘述周副部长却被红卫兵揪住，说他是“牛鬼蛇神的保护伞”，在校园批斗……

随着“文化大革命”浩劫的不断升级，需要周恩来保护的人太多了：周

周恩来有时也实在无能为力了。1968年夏，班禅再次蒙难，以“监护”的名义又把他监禁起来，一关就是九年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依然惦记着、关心着班禅，想方设法保护他的安全、恢复他的自由。

1971年林彪事件之后，一大批干部相继获解放，周恩来就曾考虑给班禅安排工作，但因各种阻力，未能实现。1974年3月10日，周恩来会见科威特客人，由阿沛副委员长陪同。已经身患癌症的周恩来特意请阿沛副委员长提前到人民大会堂，商议班禅的问题。周恩来提出：应该让班禅出来工作。阿沛当即表示赞同总理意见。可是，随着“批林批孔”的发展，周恩来的这一提议再次受阻。

1976年元月，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了。班禅在狱中听到这一噩耗，感到十分悲痛。他为国家失去这样一位好领导而痛心，更为民族的前途和命运而担忧，也为自己的前途担心。因为了解自己、关心自己的至尊师长去逝了，今后谁来关心自己，自己的问题什么时候才能得到公正的解决呢？！

度过了整整九年又八个月监禁的班禅大师，直到粉碎“四人帮”一年后的1977年10月，才重获自由。

1988年4月4日，班禅大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新闻发言人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回顾这段辛酸历史，满怀感激之情地说：“我在监狱里没有死掉，主要是周恩来总理的恩情。”

可以说，班禅以一个少年灵童成长为国家领导人——人大副委员长，无不浸透着周恩来热情关怀、悉心培养的心血。

特赦功德林常客西花厅——帮助溥仪实现从皇帝到公民的转变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爱新觉罗·溥仪。包括汉奸政权伪满洲国在内，他一生当过三次皇帝。新中国成立后，他实现了“从皇帝到公民”的转变，周恩来则是直接推动者。

1950年7月21日，溥仪结束了在苏联的五年“收容”生活，被遣返回国。在中苏边境的绥芬河车站，两名解放军军官单独接见了，他，第一句话就是：“我们是奉周恩来总理的命令，前来接你回国！”溥仪清晰地记住了“周恩来”这个名字。

1959年12月14日，是溥仪获赦抵京后的第五天，一辆卧车疾驰而至，从什刹海西岸的前井胡同接走了翘首以望的溥仪，周恩来要在中南海接见他。

走进西花厅，与溥仪同一天从北京功德林特赦的原国民党将领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邱行湘、卢濬泉、郑庭荃、杨伯涛、陈长捷等10人已先一步到达了。当周恩来以及陈毅、习仲勋、张治中、傅作义、邵力子、章士钊等一起走进会客厅时，全场起立，热烈鼓掌。周恩来挥手示意请大家就座，开始一个一个地交谈起来。

溥仪是被接见者中唯一与周恩来昔日没有师生或部属关系的人，然而他丝毫没有受到冷落。周恩来不但一一向他介绍陪同接见的各位领导人士，还亲切地与他拉家常。他们谈满族旗人的礼节，服饰以及不同于汉人的相貌特征等等。不过，昔日皇帝第一次面对人人敬仰的周恩来，仍显得很拘谨，谈话中间常常引以自咎，说自己是地主阶级的总头子，又给日本帝国主义当傀儡，一再检讨。周恩来笑了笑温和地说：“你过去已经检讨很多，不要再做检讨了。有时间可以写一些回忆录嘛，为祖国多做一些工作。”于是，溥仪紧张的心情顿时松弛下来，遂向周恩来汇报了他抚顺撰写《我的前半生》回忆资料的情况，引起周恩来的高度重视。在第一次接见过后1月零12天的那个下午，周恩来在政协礼堂再次接见溥仪并宴请他和他的七叔载涛、四弟溥任及6个妹妹。这次接见中，周恩来同溥仪交谈了如何巩固思想改造的成果问题，还面商了工作安排问题。周恩来对他说：“你后几年进步了，但不能说巩固。改造，第一是客观环境，第二是主观努力。”刚刚跨进新生活的溥仪，及时得到了周恩来的教育和引导。

周恩来还当面了解溥仪的知识基础、身体状况、兴趣和爱好等，力图给他安排一个最合适的工作。周恩来征询溥仪：“你想搞哪种工作？”“想搞轻工业或在公社中都可以。”溥仪答。周恩来说：“我看找找各部的研究所，一半学习，一半做工，既照顾你的身体，也学一点自然科学。”后在周恩来的过问下，溥仪被安排到中国科学院北京植物园，研究热带植物。

自古，清官难断家务事。溥仪的二弟溥杰特赦后，非常想接妻子嵯峨浩回中国团聚。但是溥仪认为嵯峨浩可能是日本特务，再加上一些历史原因，他特别反对弟媳回国。结果在这个问题上，溥仪与溥杰哥俩之间结下了别人无法解开的疙瘩。最终还是周恩来出面促进他们家族和睦，并喜搭鹊桥，使溥杰夫妇得以团圆。溥仪分配到植物园时，完全不道知这仅仅是一种过渡性的安排。而他也并不想再要求什么照顾。他曾经得到过大清帝国，却还不曾认真感觉几回，就过眼烟云似地去了；他也曾得到“满洲帝国”的虚假宝座，却在自己的人生层面上留下了一片耻辱；现在他又得到了一座绿色王国，这

里有纯洁而清新的空气，有广阔而自由的天地。他满足了，甚至陶醉了。

但，周恩来仍在操心着，为这些公民的前程安排和设计更理想的方案。

1960年12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国务院的小轿车把溥仪和溥杰又一次接到中南海用恩来家中。

“欢迎你们皇家二兄弟光临！怎么样，身体还好吗？”周恩来热情的问候。

“谢谢总理关心，问总理和邓大姐好！”溥仪似乎对这里一切都熟悉了，也回答得自如。

周恩来在详细听取了溥杰关于工作安排的心愿之后，又问溥仪在植物园半年多有什么体会？溥仪十分满意地表示，他喜欢那里的生活，熟悉了劳动者，学到了知识，每天都觉得有意义。周恩来听了很高兴，表扬他进步了。这时，周恩来关于特赦人员工作安排的总体方案已经形成，消息也逐步透露出来了：劳动以一年为期，然后就转入文史资料的撰写、整理、研究和编辑等业务工作中去。

1961年春节期间，中共中央统战部设宴招待留京的两批特赦人员。李维汉部长、徐冰和薛子正副部长以及国务院童小鹏副秘书长都参加了宴会。就在这次宴会上，徐冰副部长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当场宣布，第一批特赦的7人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担任文史专员。名单里，第一位就是溥仪。这些人的待遇也由劳动期间每月发生活费60元提高为每月工资100元。溥仪听了宣布，无比激动，即席发言说：党和政府在国家经济困难时期，还给予我们令人满意的安排和高于国家17级干部的优厚待遇，这是完全出乎所料的，我发自内心地感谢。

周恩来对溥仪的再婚也很关心。溥仪的“福贵人”已于1957年与他正式离婚。周恩来在接见溥仪及其家属那天，曾风趣地向溥仪建议：“你还得结婚啊！这事你七叔得给张罗张罗吧！”载涛爽朗地笑了起来，他对着周恩来也对着大家十分高兴地说：“这一回就让他婚姻自由吧！”

后来，周恩来曾再三敦促溥仪的再婚事，还不无幽默地说：“你是皇上，不能没有皇娘哟！”不久，由文史资料专员周振强和人民出版社编辑沙曾熙的热心撮合，溥仪认识了北京市朝阳区关厢医院的女护士李淑贤。经过4个月甜蜜的热恋之后，1962年4月30日，他们在南河沿政协文化俱乐部礼堂举行了世人瞩目的婚礼，又是七叔载涛任主婚人，200多位宾客出席。如果不是为了“五一”节活动的特别繁忙，周恩来一定会在这个场合露面的。他虽然没有来，却派了一位代表——国务院副秘书长、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在次日下午亲往溥仪家中祝贺。

周恩来对溥仪撰写的《我的前半生》很重视。他虽顾不上仔细阅读全部书稿，但当他翻阅一半的时候，就认定了它的价值。在周恩来直接关心和悉心指导下，溥仪对《我的前半生》进行了浩大而艰难的修改，终于在1964年3月公开出版了。

《我的前半生》一经问世，立即引起海内外一片赞誉声。一位外国人说：“如果溥仪不是处在北京政权下，他的著作也许永不会出现，因为一个中国皇帝来写他自己的历史是没有先例的。”另一位外国学者说：“本书是难能可贵的文献，它是第一部中国君主的自传；这位君主的一生，始自爱新觉罗的封建王朝，迄于毛泽东的共产主义。在人类历史上的国王和皇帝中，无人有过像他这样变化多端的经历”。

最后几年，中国的末代皇帝患了肾癌。为了治好他的病，周恩来做了许多工作。尽管没能阻挡死神的降临，毕竟让溥仪的有限生命得以延长。

1967 年 10 月 17 日，溥仪停止了呼吸，因为那时正是翻天覆地的所谓“文化大革命”，不可能给他一个全面而公允的结论，却是 4 年之后，周恩来在会见日本客人时给予他以公正的评价：“说句公道话，最后他改造得不错！”“你们读过他写的这本《我的前半生》吧？从他来说认识是提高了。不到 60 岁就死了。如果不是肾癌的话，一定会活得更长。使一个末代皇帝能有这样的觉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巨擘相争缓颊而安——建国后两次保护梁漱溟

1953年，在一次政协会议上，梁漱溟顶撞了毛泽东，两人发生了争执。这一争执对于新政府中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合作来说，不能不说是一次重要事件。

梁漱溟与毛泽东相识已久，当毛泽东还是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一名职员时，梁漱溟已经显露出大学者的傲气。到了1946年，蒋介石策划召开伪国大，民盟中的梁漱溟、罗隆基等人竟违反有重要主张和行动要事先共同商讨的协议，提出了一个有利于国民党而不利人民的“折衷方案”，送给孙科和马歇尔。此事遭到住在南京梅园新村的周恩来的痛斥，他当面斥责梁漱溟是想在共产党背后捅一刀子！建国以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出于民主建国的大计，摒弃前嫌，邀请他们加入了政协和政府。这次梁漱溟顶撞了毛泽东，毛泽东可不留情了，他在1953年9月16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上批判梁漱溟是“反动透顶”、“伪装得最巧妙，杀人不见血的，是用笔杀人”的“杀人犯”。

问题已经上纲上线了，这使张澜、李济深、何香凝、陈铭枢等民主党派领导人着急了，他们想大事化小，保梁漱溟过关，并且找毛泽东和周恩来谈了梁漱溟的问题。对于梁漱溟的问题，周恩来是最清楚不过了，他从统一战线的大局出发，决定缓颊保梁。但是梁漱溟却固执己见，坚持不改变自己的观点，毫不认输。一连三天，会议空气如同要爆炸一般异常紧张，无人敢为缓颊。怎么办呢？周恩来见事急迫，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先给上海打电话，找到沈尹默先生，再托他赶赴杭州邀马一浮先生到北京，一同规劝梁漱溟勉为自我检讨，以搭个梯子，缓解僵局，使梁漱溟能过关。周恩来这个办法一用，果然扭转了僵局，梁漱溟认错以后，毛泽东也就不再追究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梁漱溟一直“闭门思过”，故未惹出大麻烦。但到了1970年，在政协直属组“宪法草案”讨论会上，梁漱溟又不甘沉默，开始讲话了。他针对林彪、江青飞扬跋扈时制订的“宪法草案”说：“我有两点意见，供当局参考，其一，现代宪法产生于欧洲，目的是限制封建国王个人权利太大，有了宪法后，从国家元首到普通公民，都得遵循，而不能把任何一个人放在宪法之上，可今天我们的宪法不仅写上了个人的名字，而且连林彪为接班人也写在‘序言’里，我不赞成。其二，一个国家，不能没有元首，不知为什么在宪法草案中偏偏没有国家主席这一条？”

这两点意见如同两道电光，个个在场的委员们被吓得瞠目结舌，立即就有人喊：“这是恶毒攻击！”“必须批判！”讨论会上，火药味越来越浓。眼见梁漱溟直言相告要大祸临头，主持人当场宣布，将此情况向上级反映，听候处理。

可是不久，上级的处理意见下达，与人们预想的不同，上级意见大意是：因为是征求“宪法草案”意见的讨论会，所以提意见都是可以的，即便个别人借机放毒也不要纠缠。这样，梁漱溟又一次逃过了一场灭顶之灾。

梁漱溟虽然逃过了此灾，似仍心有余悸。他当时猜不透那个大胆保护自己屡屡犯上言行的上级究竟是谁？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才得知，是周恩来通过办公室下达了这个指示，有意放梁漱溟过关。周恩来继1953年之后，在重大纷争中再次保护了梁漱溟。

举贤任能打破常规——1957 年授予钱学森中将军衔

在我国科技发展史上，给导弹专家钱学森破格授衔，成为 50 年代核武器研制过程中的一段佳话。

新中国刚成立，一位世界闻名的科学家即在想方设法回归祖国，他就是钱学森。为了寻找回国的借口，钱学森大步踏进美国海军次长丹尼尔·金波尔的办公室，激动地对他说：“次长先生，我准备动身回国！”金波尔猛地一怔，惊异地睁大眼睛问道：“这是为什么？”钱学森回答说：“我的上司，你很清楚，我受到了麦卡锡的无理迫害，他们甚至吊销了我接触机密的证书，联邦调查局正在罗织我所谓‘间谍’的罪名，有鉴于此，我决定回祖国去。”没等金波尔回答，他已经愤然离开了办公室。

金波尔气得双手打颤，他拿起电话，向移民局通报了重要情况，最后，他恶狠狠地说：“我宁可把这个家伙枪毙了，也不让他离开美国。那些对我们来说至为宝贵的情况，他知道得太多了。无论走到哪里，他都抵得上五个师。”于是，1950 年 8 月的一个子夜，著名的“卡门—钱学森公式”的创造者之一钱学森，连同他的妻小和 800 公斤书籍准备从洛杉矶乘加拿大航班飞机离开美国时，联邦调查局以间谍罪将他逮捕，关押在特米那岛上的拘留所中……

到了 1954 年 4 月，周恩来总理在参加日内瓦印支国际会议前，嘱咐代表团秘书长王炳南务必向美方代表提出钱学森回国问题，但是接触了 10 多次后，仍被美国代表约翰逊以美国在朝鲜战争期间发布的文件为借口，一点不松口。就在周恩来非常着急的时候，钱学森通过陈叔通于 1955 年 6 月转来一封信，请求祖国政府帮助他回国，并说那个文件美国在 1955 年 4 月已经取消，但有关当局仍然扣着不放他走。

周恩来获悉后，高兴地说：“这真是太好了，据此完全可以驳倒美方代表的谎言。”他立即叫外交部信使把钱学森的信件转交给王炳南，不久，下令在七月提前释放阿诺德等十一名美国飞行员……

1955 年 9 月 17 日，钱学森和他的妻子蒋英终于登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漂泊情思，踏上了祖国的海岸……为此，他的导师冯·卡门曾痛哭了一场，是他和钱学森、马林纳等门生一起使加州理工学院成为美国第一所正式研究火箭技术的大学，创建了世界第一流的古根海姆航空实验室，在二次大战期间对美国的火箭研究作出了非凡的业绩，情感之深，可以想见。对于钱学森回国，周恩来在评价中美大使级会谈时说：“我们要回了钱学森，单就这件事也值得庆贺。”

1956 年 2 月，钱学森博士向国务院提出《建立我国国防工业意见书》，为中国火箭和导弹技术描绘了一个实施蓝图。对此，周恩来主持了一次军委会议，专门听取他的报告和建议。周恩来还当即决定筹建我国第一个导弹研究院——国防部五院，由钱任院长。1956 年 6 月，周恩来经过深思熟虑后向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提议：发展核科学和导弹事业。之后，1958 年 6 月 21 日，毛泽东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说：“原子弹就是那么大的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吧，我们就搞一点吧，……”于是，在这次会议之后，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正式行文做出了研制两弹（原子弹、导弹）的决策。

1957 年 7 月，聂荣臻按周恩来的指示，向苏联驻华经济技术总顾问阿尔

希波夫，提出了希望苏联在尖端武器的研制方面给予技术援助的想法。阿尔希波夫表现热情，愉快地表示：“我本人同意，待请示我国政府以后再予答复。”7月20日，阿尔希波夫受权向我方宣布，苏联政府对中国的要求表示支持，并同意中国派代表团去苏联谈判。聂荣臻将这一情况报告周恩来后，周恩来于8月1日致函布尔加宁，正式提出我拟派谈判代表团去莫斯科同苏商谈有关尖端武器的发展和生产问题，并随即着手与苏谈判的一切准备工作。

但是，先遣人员带过对方的口信：他们的火箭，他们的原子弹设备，必须是相当级别的官员或有相当高军衔的人才能参观。面对这一口信，不难明白其中的针对性，然而谁都觉得这个决定无懈可击。

时间很紧迫，周恩来和聂荣臻睡不着觉了。因为钱学森等一些科学家没有军衔。怎么办？要么按苏方的要求去做，但科学家去不成，计划必然落空；要么破格给科学家授衔！

授衔！周恩来的意见是授予他中将军衔。理由是显而易见的，正在为火箭所呼唤的祖国呼唤专家将军，突破暗设的障碍完成谈判与考察任务也需要专家将军。在美国人看来，他抵得上5个师，在中国人看来，科学家是国宝。

事实上，钱学森回国后，国家便一直按将军等级给予待遇的。当时，钱学森看文件与少将同等，保卫工作按国务院的高级官员，工资是特一级，当时国务院进口了少数苏联吉姆车，周恩来拨给钱学森一辆。钱学森归国后，周恩来交待聂荣臻：要好好待他，科学家是我国的精英，他是科学家的一个代表。

授予钱学森中将军衔，周恩来非常幽默地决定了这件事情。当年，美国政府派他跟着冯·卡门老师去德国柏林、不伦瑞克考察德国的V—2火箭时，只授予他上校军衔。而那时他已为美国空军的火箭科研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这次，周恩来说：列宁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尚且高薪聘用，那么一个忠诚爱国的大科学家为什么不能当一个将军呢？周恩来念了龚自珍写的一篇文章，诙谐地说：美国人还是满有度量，40年代就给一个中国科学家上校当当。按照清朝的晋升制，他也该是当中将的时候了。

1957年，中国许多有名望有贡献的大教授、大专家被打成了“右派”，陷入了千古之冤的囹圄。而在当时知识分子地位一落千丈的情况下，钱学森却被一只有力的大手擎着，成为天之骄子。

聂荣臻告诉钱学森：这是总理的也是中央的决定。这说明我们党和政府内始终有头脑清醒的巨人，这正是中国始终有希望的所在。

登门拜访委以重任——请李四光出任地质部部长

李四光是我国杰出的地质学家，是个不喜欢多说话的人。抗日战争时期，李四光在重庆两次见到周恩来。当时，周恩来把毛泽东、中共中央的政治主张传达给李四光，使他在黑暗中看到了胜利的曙光。李四光见了周恩来以后，情不自禁地对亲人说：“我从周恩来先生身上产生一个最大的感觉：中国有了共产党，中国就有了希望。”

从1948年出席伦敦第18届国际地质学会大会以后，到新中国成立之初，李四光一直旅居国外。在此期间，党中央和周恩来始终盼望李四光回来参加新中国的建设。1949年9月，身在国外的李四光就被推选为全国政协委员，10月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听到党和新中国的召唤，当时还担任着国民党“政府”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的李四光，毅然拒绝随蒋迁台的命令，冒着被国民党扣留、暗杀的危险，决定返回祖国。

为保护李四光安全回国，1949年11月15日，周恩来专门给吴文煮和王稼祥大使写了一封亲笔信。嘱咐他们：“李四光先生受反动政府压迫，已秘密离英赴东欧，准备返国，请你们设法与之接触。并先向捷克当局交涉，给李以入境便利，并予保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人民政府就酝酿召开一次全国地质会议，周恩来指示等李四光回国后再开。因李四光旅途困顿，一直等了好几个月。李四光听说周总理早就等他回来开全国地质工作会议，深感党的信任，刚一到北京，就开始考虑全国地质工作问题，请几位与他回来的同志找材料，查情况，找有关人员商议全国地质工作会议的准备工作。一天下午5点左右，他们正在埋头工作，忽然进来两位同志对李四光说：“李四光先生，有位中央负责同志来看你。”李四光刚刚站起身，周恩来已经跨进了房门，一把摸住了李四光的手高兴他说：你终于回来了！欢迎你，欢迎你，祖国需要你呀！李四光完全没有想到，周总理工作那么多，会亲自来看望他。他紧紧拉着周总理的手，仔细端详着周总理，热切地说：“总理，你比前几年胖了。”

周恩来两手在胸前一抱，开朗地笑着说：“我听说，你回国来心脏病又犯了。这可要抓紧时间，请医生看看。还有，许大姐，你的高血压怎么样？也要好好地检查检查。这和在重庆那会儿不同了，我们有了人民自己的医院啰。”

周恩来又指了指桌上的地图、资料说：“你们在一起，真是一谈话就离不开本行啊！”大家都笑了起来。

李四光向周恩来汇报，请示地质工作的问题。周恩来认真听李四光讲究后说：“我们的事业正在开始，不论是工业还是国防，都和地质工作分不开。地质工作要当先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我们就打算召开第一次全国地质工作会议，那时候我想，没有个挂帅的，一定要等你回来。有人说，李四光不会回来，到台湾去了，那是一种传言，我们是不信的。我说我了解他，我相信他不会去台湾。回来晚了一定是路上有什么困难耽搁了。你看我说得不错吧？”周恩来说完又笑了。

李四光听了周恩来这一番话，感动极了：周总理是这样信任自己啊！他本来想向周总理辞去科学院副院长的职务，现在再没有勇气说出口了。

李四光详细地向周恩来讲了回国的经过和在国外的见闻，最后又讲到地质工作上来。他说：可惜过去搞地质的人太少了。旧中国顶多有二百多个，

有的还因生活无法维持改了行。

周恩来说：“是啊，蒋介石摧残科学家，压迫知识分子，有些有本事的人，也被他们糟蹋了。我们要先把这些专业人员集中起来，把队伍整顿一下，你看是不是先成立一个委员会，你来当一段时间的主任，等到条件成熟了，再成立地质部？总之，我们要尽快地开展工作，进行矿产资源的勘探和开发……”

周恩来又问了他关于中国地质构造的特点、地质力学的理论，几年来国外科学的发展和英、法、美一些著名科学家的情况等等。他称赞李四光不盲从外国权威，创建了自己的地质力学，把朴素的辩证法带进了地质学；又委婉地建议他，今后还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把自己的世界观提高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他说：地质力学对传统地质学是一场革命，要发展地质力学，必须以革命的世界观、方法论来指导啊！

时钟敲过了8点，长安街上已是万家灯火。周恩来的汽车已经远去了，李四光的内心还激动不已。

在周恩来的关怀下，李四光担任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地质部部长等负责工作。为了报答党的关怀和周恩来的一片深情，李四光把自己的晚年毫无保留地贡献给为人民服务的伟大事业。

病榻问候用人不疑——对李四光的关心与信任

李四光是一位卓越的科学家。周恩来关心李四光的身体健康，关心李四光入党，十分信任李四光的科学研究能力，极为重视李四光的意见。

1955年1月14日下午，周恩来约李四光、钱三强谈话，薄一波、刘杰在座。周恩来仔细询问了我国原子能科学的研究状况、人员、设备以及铀矿地质等情况：并告诉李四光、钱三强，中央要研究这方面的问题，到时请带上铀矿探测仪器进行探矿模拟表演。

晚上，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约15日下午中央主要负责同志同李四光、钱三强一谈，并观看表演。信中，周恩来说：“下午3时前，李四光午睡。晚间，李四光身体支持不了。请主席明日起床后通知我，我可先1小时来汇报一下今日所谈，以便节省一些时间。”

1957年初，李四光患肾脏病，组织上送他到杭州疗养。3月的一天，阳光温暖，春风宜人。吃充早饭，李四光和夫人许淑彬到院子里散步。突然，一辆汽车开来，停在山坡下面的竹林旁边。一个熟悉的身影走下车来，顺着小路登上山坡，健步向他们的住地走来。啊，是周总理！李四光喜出望外，快步迎了上去。

“总理这么忙，还来看我！”李四光紧握着周恩来的手，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周恩来是趁着陪外宾到杭州参观的机会抽空来看望李四光的。他看到李四光精神很好，两人就亲热地谈了起来。

周恩来先谈了当时国际上为人们所普遍关注的一些事件。接着告诉李四光，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党内很快就要整风了。他要李四光考虑一下，有什么意见尽可以提出来，帮助党搞好整风。他还问李四光自己对参加中国共产党有些什么想法？他诚恳地对李四光说，很需要知识分子为党工作，入党后，可以更直接接受党的教育和领导，可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周恩来又说，入党是自愿的，要李四光好好地再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可以和他所在单位地质部以及科学院党组织的领导同志再谈谈自己的想法。

这次谈话不久，李四光就因病住进了医院。李四光的病被诊断为恶性肿瘤以后，周恩来曾几次到医院去看望他。第三次看望他的时候，周恩来在病榻边又一次谈到了他的入党问题。李四光激动地对周恩来说：“我的入党申请书已经写好了，请党考验我吧。”

临走时，周恩来请李四光考虑是否请董老做他的入党介绍人，因为董老对他了解得很清楚的。周恩来这样关心李四光的政治生命，使李四光感动极了。从李四光当时的神情看，再没有什么能比这件事使他在病中更加感到安慰的了。

1958年12月22日，李四光终于光荣入党。他说：“我入党了，这是我一生中最愉快不过的事情！我活了70岁，到现在，才找到了归宿。”入党以后的李四光更加严格要求自己，更加努力地工作。1959年，他完成了科学名著《地质力学概论》一书。接着，又和其他地质工作者一起，在找矿，以及开发地热、地下水方面取得了许多重大成果。

1966年3月8日，河北省邢台地区发生强烈地震后，周恩来召集有关人员开会，讨论震情和震后所应采取的措施。会上，周恩来问大家：我们能不能预报地震？如果可以预先知道地震的时间，那么就可以减少损失。周恩来问话之后，会场沉默了好一会儿才陆续有人发言。有人作难地说，这个问题

不大好办。有人直截了当地说，地震预报国外搞了许多年都没有解决，我们更解决不了。

最后，周恩来转过头来，问坐在身边的李四光：“李四光同志，你的意见呢？”

李四光答道：“地震也是一种自然现象，它的发生是有个过程的，是可以预报的，不过还需要做大量的探索工作。”

周恩来听了他简短、明确的发言，非常高兴地说：“李四光同志独排众议，说地震是可以预报的。这很好。我们就是要有这个决心，有这样的志气！世界上没有解决不了的困难。我们的前人只给我们留下了地震的记载，我们就要给我们的后人留下预报的记录。”此后，李四光投入了探索地震预测的工作。

60年代后期有段时间，北京周围地区小震活动很频繁，有人向国务院打了一个报告，预报第二天早晨七点钟，北京将会有7级地震发生，要求国务院通知全市居民都搬出去住，并建议毛主席也搬到帐篷里去睡。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周恩来在国务院小礼堂主持开会，紧急通知李四光参加。周恩来在听了各种意见之后，又问李四光情况是否这样紧急？

李四光根据几个地应力台站的数据判断，无异常现象，就对周恩来说，问题不大，北京不像有大地震马上要发生的样子，最好不要发警报，天气那么冷，老人和小孩都出来过夜要冻病的。他还轻轻地对周恩来说：“最好毛主席也不要出来，万一受冻感冒了，怎么办？”

周恩来信任李四光，采纳了他的意见，决定不发临震预报。会议结束后，为了照顾李四光的身体，周恩来让他早点回家休息，自己却和大家一起，坚守工作岗位，直到第二天早晨七点后，才放下心来。由于周恩来采纳了李四光的意见，使人民群众避免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保证了生产和生活的正常进行。

正当我国地震地质工作陆续取得一些进展，可望有所突破的时候，1971年4月29日李四光与世长辞。周恩来对李四光的逝世感到非常沉痛。他指示把李四光遗留的科研成果资料整理出来。

5月2日，周恩来参加了李四光的追悼会，并致了悼词，指出：“李四光同志是一面旗帜”，“对社会主义作出了很大贡献”，“是卓越的科学家”。周恩来号召全国科技工作者要“继承李四光同志的遗志”，“向李四光同志学习！”

微言大义乘机解围——对钱正英的严格要求和精心保护

1950年春天，苏北人民刚解放不久，就着手治理沂河。苏北地处淮、沐、沂、泗诸河下游，淮阴历来是洪涝严重的灾区，人们叫它“洪水走廊”。为了分泄洪水，在这里首先开挖了新沂河。可是，第一期工程开工后，就遇到困难，对这条新河，认识不一致，粮款又没有着落，工程没法进行下去。后来华东军政委员会派钱正英到北京找水利部请求支持。钱正英在招待所住下没几天，李葆华通知说：“总理要直接听你汇报。”钱正英喜出望外，没有想到能够见总理。李葆华带钱正英进中南海，因为第一次见总理，钱正英很紧张。到了总理的办公室，原来是一间普通的平房。周恩来亲切地和李葆华、钱正英握手。他是那样平易近人、和蔼可亲，钱正英的紧张心情很快就消失了。周恩来耐心地倾听下情，询问了新沂河工程的情况。他对苏北解放不久就能办这个工程，十分高兴，并表示支持把工程搞好。钱正英汇报得非常清晰和十分有条理，给周恩来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周恩来关怀下，开挖新沂河工作得到推进，到秋天，顺利完成了第一期工程。不久，发了一场大洪水，新沂河分泄了洪水，减轻了淮阴地区的灾害。

1950年淮河大水后，周恩来亲自主持召开治淮会议，集各有关机关负责干部与水利专家，用了19天的时间拟定了蓄泄兼筹的方案，汪胡桢、钱正英、肖开瀛、王祖烈等按照蓄泄兼筹的方案，制定治淮总体规划，定名为《治淮方略》。周恩来在中南海办公室内亲自审阅《治淮方略》的图文，认真听取了汪胡桢、钱正英的汇报，并肯定这个《方略》原则可行。中国大地上首次建成的钢筋混凝土连拱坝工程——佛子岭水库就是在《治淮方略》中第一次提出来的。

钱正英30年代末就读于上海大同大学土木工程系，40年代初参加革命，并在解放区做水利工作。1952年，钱正英担任水利部副部长，时年29岁，是年轻的人民共和国中最年轻的女副部长之一。1968年6月19日，周恩来向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介绍钱正英时说：“她原是大学生，学工程，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到了解放区后逐步参加水利工作，很快当了副部长，女同志当副部长不容易。不能骄傲。”

在水利业务上，周恩来非常重视钱正英的意见。60年代初，有关部队出于备战考虑，建议在苏北开一运河，得到了军队首长的支持。钱正英否定在苏北违反水利开运河而受到指责时，周恩来当即支持了钱正英的意见，并向军队首长作了认真的解释。1965年北方干旱，河北、北京、天津缺水。1966年1月28日，周恩来听取天津王占瀛关于抗旱与生产安排的汇报。王说：“如果按5亿4分水的话，加上各方面的措施，最多只能种30万亩水稻。我们的意见要保50万亩水稻，不算去年已用的水，今年到6月底给6亿水，还得加上各方面的措施”。对此，周恩来问钱正英：“密云水库还有多少水？”钱正英说：“还有15亿”。周恩来说：“拿出12亿，北京、天津各6亿”。钱正英说：“密云水库的水最好不要再重新分了。要从最坏处作准备。因此，我的意见维持原来的分水方案，6月以后再说”。周恩来赞成道：“好啊！要留有余地嘛！城市和农村都要节约用水”。

钱正英既是水利部的领导又是党内的水利专家，周恩来对钱正英的要求向来是严格的，严肃的批评中，总是包含着希望。

1958年，全国出现了大办水利的高潮。由于急于求成和瞎指挥，有些水

利工程建设没有严格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水电部也不敢向中央如实反映情况。一次，一个大的水电工地发生了事故，周恩来把钱正英找去，严肃地说：“你是个共产党员，应当做到又红又专，遇到这种情况，别人不敢讲话，你应当讲话”。1959年10月，全国水利会议上，水电部曾设想提出在3年内基本解决水旱灾害的口号。当钱正英等拿着文件草稿向周恩来汇报时，周恩来哈哈大笑说：“3年内要基本解决水旱灾害？太积极了一点”。在周恩来的批评与说服下，水电部修改了这个口号。建国10周年时，水电部在密云水库附近大兴土木，修建了一座水利展览馆。有位领导到水库参观，发现了这件事并反映给周恩来。周恩来把钱正英叫去，询问有没有这回事。钱正英回答确有其事，并准备接受总理一顿狠狠的批评，没想到周恩来只是摇摇头，仅仅说了一句话：“没想到你会做这件事。”这句微带失望和痛心的话震撼着钱正英的心，不但激励着钱正英去改正错误，而且激励着钱正英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钱正英一度受到冲击。周恩来多次跟水电部军代表陈德三、张文碧谈“解放”钱正英的问题。

1968年初，周恩来亲自向水电部的红卫兵头头解释：钱正英有错误也只是执行问题。并说：水利，“如果说最大的错误，那就是我们没有将几千年群众治水经验，正确的接受，坏的批判，同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个责任应该由我总理来负，应该受批判”。周恩来的苦口婆心，对说服红卫兵解放钱正英起了促进作用。

当时混乱中施工的刘家峡水电站出了事故。1968年2月日，周恩来嘱值班人员询问水电部军管会：如谈刘家峡水库问题“除军代表外，部长级是否有人抓业务，能否参加国务院业务小会？”其含意是希望懂业务的钱正英出来工作。2月8日下午，恩来在讨论刘家峡水库问题会议上，借着刘家峡事故，正式提出钱正英出来工作。后来，别的部也以周恩来解放钱正英的讲话工作，解放了一批干部。

红卫兵批判钱正英没有执行毛主席支持的“蓄（水）、小（型）群（众办）”的治水方针。对此，周恩来说：“这不是钱正英的问题”，“我们当时没有经验，都有责任”。同时，周恩来还从根本上指出“排（到大海）、大（型）、国（家办）”与“蓄（水）、小（型）、群（众办）”，“这两句话不能绝对讲，不能只要这不要那”。周恩来的讲话，不澄清了对治水的认识，而且保证了钱正英站出来能够顺利地开工作。

“文化大革命”期间，升降沉浮的变化，往往是一夜之间。领人几个月不出面，很有可能是被打倒了。1973年，周恩来的病情发展，几次去玉泉山作手术，接受治疗。此间，钱正英因腿被摔断住进积水潭医院，好几个月没有出来。周恩来很敏感地对有关员说：“请查问一下钱正英的情况，怎么好几个个月没有她的消息？”

几年以后，李先念、余秋里同钱正英一起回忆在“文化大革命”

动乱中周总理对钱正英的精心保护，李先念半开玩笑地说：“钱英啊钱正英，你要在总理像前天天烧烧香”。钱正英不相信九泉知，然而，思念却是永远的、不尽的。

守如处子动如脱兔——相机提高陈毅追悼会的规格

1972年1月6日深夜，“殊勋盖世间，直声满天下”的陈毅元帅停止了呼吸。

对陈毅怎样“盖棺论定”？这是压在周恩来心上的一大难题。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江青两个阴谋集团，一直视刚直不阿的陈毅为眼中钉、肉中刺，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他们狼狈为奸，把陈毅打成“二月逆流的黑干将”，诬陷陈毅“一贯反对毛主席”。林彪集团垮台后，江青阴谋集团仍揪着陈毅不放。

如果客观地评价陈毅，实事求是地论定陈毅的一生，必将影响“文化大革命”，否定林彪、江与两个阴谋集团，肯定1967年“二月抗争”及一大批老干部的作用。这是江青集团绝对不能容忍的。正因为如此，江青集团竭力降低对陈毅的评价，竭力降低陈毅追悼会的规格。

1月8日，毛泽东签发了陈毅的悼词，删去了“有功有过”四个字，这多少减轻了一些周恩来心上的压力。但悼词连头带尾六百字，简历占去一半篇幅。这对功勋卓著的陈毅是不公平的。

对于陈毅追悼会按照政治局通过的文件所定的规格：陈毅已不算党和国家领导人，陈毅追悼会由中央军委出面组织，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主持追悼会，军委副主席叶剑英致悼词，政治局委员不一定出席，参加追悼会人数为500人。周恩来心里很难过，这样低规格的追悼会对威震华夏、誉满中外的元帅外交家陈毅来说是够冷落的。

然而，陈毅一生功德在民，谁也埋没不了。连日来，周恩来的秘书不断接到人大、政协、国防委员会挂来的电话，许多民主人士要求参加陈毅的追悼会。宋庆龄向中央写信，向周恩来打电话，坚持出席陈毅的追悼会，她说：“我深深地景仰他，因为他是一个胆识过人，具有真诚性格的人。”西哈努克亲王亲自打印了唁函，并向周恩来提出要参加陈毅追悼会的请求。周恩来希望满足所有人对陈毅真挚情感的最后寄托；希望提高陈毅追悼会的规格，使国家副主席宋庆龄和西哈努克亲王这样的外国元首也能参加追悼会。但是，周恩来望着桌上政治局委员一一圈阅的文件，他沉重地叹息着，因为他无权改动政治局定下的规格。

10日下午3时，陈毅的追悼会将在八宝山烈士陵园举行。中午已到吃饭的时间了，但周恩来怎么也吃不下，他在西花厅长时间地踱着沉重的步子，他在思索：陈毅不能就这样“盖棺论定”啊！这不仅对陈毅不公道，而且影响到一大批老干部的解放，影响到全国的政治局势。

下午1时，“游泳池”来电话：毛泽东要去参加陈毅的追悼会，而且已经起床了，正调车去八宝山。

周恩来得知这一消息，又惊又喜，迅速而果断地作出了提高陈毅追悼会规格的决定。他首先拨通中央办公厅的电话。大声地说：“我是周恩来，请马上通知在京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务必出席陈毅同志追悼会；通知宋庆龄副主席的秘书，通知人大，政协、国防委员会，凡是提出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要求的，都能去参加。”接着，他又亲自用电话通知康矛召：“康矛召同志吗？我是周恩来，请转告西哈努克亲王，如果他愿意请他出席陈毅外长追悼会，我们将有中国领导人出席。”然后，周恩来又火速赶到八宝山进行安排。在追悼会上，周恩来亲自致悼词。

在悼念过程中，毛泽东动感情地说：“陈毅同志是一个好同志。”“陈毅为中国革命、世界革命做出贡献，立了大功劳的。”毛泽东还公开为“二月逆流”平反：“林彪是要打倒你们老师的，我们的老师他一个也不要。你们不要再讲他们‘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陈老总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的。”

毛泽东出席追悼会、周恩来致悼词以及毛泽东的上述谈话，这是对陈毅最好的“盖棺论定”。

周恩来依据毛泽东参加陈毅追悼会的举动，迅速而果断地作出提高陈毅追悼会的决定，这是一个机敏过人的决断。这一决断不仅是周恩来对陈毅真实情感的流露，而且顺乎党心、顺乎民心，给江青阴谋集团的倒行逆施以当头一棒。这一决断不仅对推翻林彪、江青一伙强加给陈毅的诬蔑不实之词，客观地对陈毅“盖棺论定”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对进一步清算林彪集团的罪恶、打乱江青集团的阵脚、纠正极左思潮、解放老干部等等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主要参考文献

-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
-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
- 《周恩来经济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年版。
-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
- 《周恩来教育文选》，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 年版。
- 《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 年版。
- 《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年版。
- 《周总理青少年时代诗文书信集》，上、下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
- 《怀念周恩来》，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
- 《不尽的思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 年版。
- 《我们的同总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 年版。
- 《周恩来传（1898—1949）》，金冲及主编，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 年版。
- 《周恩来年谱（1898—1949）》，力平、方铭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89 年版。
- 《周恩来和他的秘书们》，程华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 年版。
- 《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裴坚章主编，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 年版。
- 《新中国外交风云》，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 年版。
- 《周恩来与少数民族》，李儒忠编，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情谊与事业——在周恩来心中》，廖心文、李静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年版。
- 《周恩来（领袖交往实录系列）》，肖玉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 年版。
- 《周恩来传略》，方钜成、姜桂依著，人民出版社、外文出版社，1986 年版。
- 《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熊向晖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年版。
- 《周恩来与治水》，曹应旺著，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年版。《红墙里的瞬间》，顾保孜著，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2 年版。《周恩来的行政方略》，吴志鸿、陈尤文著，南京出版社，1993 年版。

